



中国藏传佛教 名僧录

甘肃民族出版社

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

唐 景 福



甘肃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东升
封面设计：一青
版式设计：陈安庆

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

唐景福 编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75 插页2 字数220,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421-0099-8/B·8 定价：4.15元

序　　言

我在前些年，曾拟定过三个科研课题，都是关于研究藏学方面的课题。一个课题，是藏汉佛学词典，我认为这类课题如能完成，对研读藏文书籍很有用处。因为阅读藏文典籍，佛学名词术语，到处皆可遇到，有了藏汉佛学词典这类工具书，对于藏学研究，有很大帮助。一个课题是藏族高僧录。藏族文化，绝大部分与佛教有关连，如能有一部藏族高僧录，把他们的生卒年代能理顺，把他们的事迹与成就介绍出来，对研究藏族文化或其他方面，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方面，就能搞清楚历史承继，互相关系了。一是西藏地理志。因为西藏古今地名变迁很多，疆域界线也不清楚，如能把古今地域沿革名称变迁搞清楚，就是一个大的成就。这方面，曾有四川任乃强先生写过《西康图经》，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著作，但西藏地区与安木多地区，都缺少这类著作。

我拟了这三个课题，是寄希望于对藏学有志之士，来进行这一研究工作，或者个人，或者集体。

这一提议，已过了不少年了，现在为止，藏汉佛学词典，由一个集体的同志们，完成了一个雏形，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协助出了

379/19

版，也进行了第二步工作，份量比第一部大三倍多，也交给了出版社，可能明年出版。第二个提议，最近由唐景福同志个人初步完成。他的稿子给我看了，我认为很好，这虽然是初步，但他收集介绍了一百多个高僧，年代事迹和他们成就与著作等等，都介绍得比较清楚明白，足见他用力之勤。当然论完全，尚谈不到。但有了初步，可再进行第二步、第三步。汉族高僧录，不是也有续编吗？宋代还有断代的宋高僧录。唐景福同志的《藏传佛教高僧名录》，是一个好的开端，希望他或者其他有志之士，接着写续集，一续二续三续……把藏族有名有成就有贡献的高僧，不论小乘大乘，显教密教，于藏族文化有贡献的僧人们，都考证详实，写了出来，这对于藏学研究工作，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第三个提议西藏地理志，现尚不知有人动手专搞没有？这可能是一个最难的工作。它不但要博览群书，主要的还要实地考察，广为探询，藏族居住区域之大，几乎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一，而且峻山雪岭，有些地方人迹罕到。由一个人来搞这项工作，恐怕是难于办到的，由一个集体，也恐怕不是短时期就能搞成的；政府如能关照此事，由政府组织人力，可能方便的多。

长白王沂暖

1990年7月2日

目 录

序 言	王沂暖
巴桑囊 (公元八世纪人)	(1)
桑 希 (公元八世纪人)	(2)
毗卢遮那 (公元八世纪人)	(4)
藏 玛 (公元九世纪人)	(6)
钵阐布娘·丁艾增桑波 (公元九世纪人)	(7)
班第钦布贝吉云丹 (公元九世纪人)	(8)
拉垅贝吉多吉 (公元九世纪人)	(9)
贡巴饶色 (892—975)	(11)
鲁梅慈成喜饶 (九世纪后期人) 等十人	(13)
仁钦桑波 (958—1055)	(15)
琼波南交 (990—1140)	(17)
卓弥·释迦益西 (994—1078)	(19)
苏尔波且·释迦迥乃 (1002—1062)	(21)
仲敦巴 (1005—1064)	(22)
玛尔巴 (1012—1097)	(24)
苏尔穹·喜饶扎巴 (1014—1074)	(26)
博多哇 (1031—1105)	(27)
贡却结保 (1034—1102)	(29)
京俄瓦·楚臣拔尔 (1038—1103)	(31)
米拉日巴 (1040—1123)	(33)
内邬素巴 (1042—1118)	(39)

卓浦巴 (1074—1134)	(40)
娘麦·达波拉结 (1079—1153)	(42)
热琼巴 (1083—1161)	(44)
绛曲格哉 (1084—1167)	(46)
贡噶宁布 (1092—1158)	(47)
杰贡钦波 (1094—1171)	(49)
东敦·罗追扎巴 (1106—1166)	(50)
帕木竹巴 (1110—1170)	(51)
都松钦巴 (1110—1193)	(53)
杰擦 (1118—1195) 与褒丹 (1148—1217)	(55)
向藜巴 (1123—1194)	(57)
林热·白玛多吉 (1128—1188)	(60)
索南孜摩 (1142—1182)	(62)
达垅塘巴扎西贝 (1142—1210)	(63)
止贡巴仁钦贝 (1143—1217)	(65)
扎巴坚赞 (1147—1216)	(67)
藏巴嘉热·益西多吉 (1161—1211)	(68)
却门朗 (1169—1233)	(70)
楚臣喜饶 (1173—1225)	(72)
萨班·贡噶坚赞 (1182—1251)	(74)
杰瓦·洛热巴 (1187—1250)	(80)
郭仓巴·贡布多杰 (1189—1258)	(82)
绒·却吉桑波 (约十一世纪人)	(84)
古宇仁钦褒 (1191—1235)	(85)
噶玛拔希 (1204—1283)	(86)
杨褒巴坚赞贝 (1213—1258)	(89)

邬坚巴仁钦贝 (1230—1309)	(90)
八思巴 (1235—1280)	(92)
仁钦坚赞 (1238—1279)	(105)
意希仁钦 (1248—1294)	(106)
扎巴俄色 (1255—1303)	(107)
加样仁钦坚赞 (1256—1305)	(109)
桑结贝 (1267—1314)	(110)
达玛巴拉 (1268—1287)	(111)
扎巴僧格 (1283—1349)	(113)
攘迥多吉 (1284—1339)	(114)
雍敦巴多吉贝 (1284—1365)	(117)
布顿 (1290—1364)	(118)
贡噶洛追坚赞贝桑布 (1299—1327)	(121)
隆钦然绛巴 (1308—1364)	(122)
却吉坚赞 (1332—1359)	(124)
乳必多吉 (1340—1383)	(125)
仁达哇·旬努洛追 (1349—1412)	(127)
释迦也失 (1352—1435)	(129)
宗喀巴 (1357—1419)	(131)
贾曹杰 (1364—1432)	(137)
绛央却杰 (1379—1449)	(140)
俄尔钦贡噶桑波 (1382—1456)	(142)
得银协巴 (1384—1415)	(144)
克主杰 (1385—1438)	(146)
汤东结布 (1385—1464)	(149)
根敦主 (1391—1474)	(151)

吐顿·贡噶南杰 (1432—1496)	(154)
索南却朗 (1439—1504)	(155)
却扎益西 (1453—1524)	(156)
根敦嘉措 (1475—1542)	(158)
擦尔钦·罗赛嘉措 (1494—1566)	(161)
巴卧·祖拉陈瓦 (1504—1566)	(163)
罗桑丹珠 (1505—1566)	(165)
弥觉多吉 (1507—1554)	(166)
索南嘉措 (1543—1588)	(167)
罗桑曲结 (1567—1662)	(171)
多罗那他 (1575—1634)	(175)
云丹嘉措 (1589—1616)	(178)
咱雅班智达 (1599—1662)	(180)
却英多吉 (1604—1674)	(182)
阿旺罗桑嘉措 (1617—1682)	(185)
罗卜藏旺布扎勒三 (1635—1723)	(189)
华秀·俄项宗哲 (1648—1721)	(193)
罗桑益喜 (1663—1737)	(197)
卓尼·扎巴谢珠 (1675—1749)	(201)
仓洋嘉措 (1683—1706)	(202)
阿旺赤烈嘉措 (1688—1738)	(204)
绛曲多吉 (1703—1732)	(206)
松巴堪钦·益西班觉尔 (1704—1788)	(207)
格桑嘉措 (1708—1757)	(209)
章嘉若必多吉 (1717—1786)	(212)
董·季麦旺吾 (1728—1791)	(215)

却朱嘉措 (1733—1791)	(219)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 (1737—1801)	(222)
巴丹益西 (1738—1780)	(224)
强白嘉措 (1758—1804)	(228)
贡唐·丹白仲美 (1762—1823)	(231)
丹白尼玛 (1782—1853)	(234)
罗桑图旦季美嘉措 (1792—1855)	(236)
隆朵嘉措 (1805—1815)	(239)
楚臣嘉措 (1816—1837)	(241)
凯珠嘉措 (1838—1855)	(243)
罗桑楚臣达吉嘉措 (1846—1906)	(245)
米庞嘉措 (1846—1912)	(247)
丹白旺修 (1855—1882)	(249)
成烈嘉措 (1856—1875)	(251)
尕藏图旦旺徐 (1856—1916)	(253)
土登嘉措 (1876—1933)	(256)
曲吉尼玛 (1883—1937)	(265)
喜饶嘉措 (1883—1968)	(271)
法尊法师 (1902—1980)	(274)
洛桑登真·扎巴他那 (1903—1950)	(278)
根敦琼培 (1905—1951)	(282)
坚白赤烈 (1913—1984)	(288)
丹贝坚赞 (1916—1947)	(292)
确吉坚赞 (1938—1989)	(297)
后记	(302)

巴桑囊

(公元八世纪人)

巴桑囊，是西藏佛教前弘期初期名僧，为藏王赤松德赞时期，初度七人出家人之一，出家后改名为益西旺波。

巴桑囊曾受藏王赤松德赞的派遣，到内地长安取经，迎请汉僧到藏传法。但是当巴桑囊由内地返回到拉萨后，由于反佛大臣的排挤，被贬到芒域，去做地方官。巴桑囊利用这个机会，经过尼泊尔走到印度朝礼大菩提寺和那烂陀寺等佛教圣地，广学大法。回藏后，又在赤松德赞的指使下，迎请著名印僧静命大师入藏传扬佛法。

巴桑囊著有《巴协》一书流传于今，1980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巴协》是一部藏族断代史书，它记述了赤德祖赞和赤松德赞父于二人时期的史实。而重点记述了藏王赤松德赞在位时兴佛的事迹。书中还记述了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结亲的事迹，以及那囊氏抢走金城公主之子的故事，歌颂了藏汉关系，颇有文学色彩。

桑希

(公元八世纪人)

桑希，又称巴桑希系西藏佛教前弘期名僧、佛经翻译家。据称他是居吐蕃之汉人，藏史《巴协》载：“当王子赤松德赞（742—797）四岁居住在温甫才官堡时，唐朝皇帝赠给（吐蕃）王大量礼物。并将使者巴德武之子贾珠格堪做为吐蕃王子的游伴一并献上”（按：巴德武系留居吐蕃之汉族使者，深得赞普信任。其子贾珠格堪，系藏文名称，其汉文名不详）。赤德祖赞（704—755）晚年，派桑希等四人到内地长安学法取经。公元755年，赤德祖赞去世，王子赤德赞幼年即位，当时反佛大臣当权，他们制定了在境内禁绝佛教的禁律，同时想以苯教（俗称“黑教”）来抵制佛教，从香雄地区（今阿里南部），引进比较系统的苯教，并且鼓励他们大力在民间进行活动，又用藏文翻译香雄地区流传的苯教经典。苯教也从此成为有一套“理论系统”的宗教。此时，由赤德祖赞派到长安学佛取经的桑希等四人，返抵拉萨。据说，桑希临回藏时，遇着一位高僧（金和尚）授给他《金刚经》（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十善经》和《稻秆经》等三部经，并且向他说：“现在藏王（赤德祖赞）已死，王子年幼，那些不信佛

法的臣下，正在破坏先王法制，毁灭佛法。此时回到藏地，没有佛教事业可作。你等到王子长大了，把三部经呈上，并须请萨贺国的静命来藏弘法，那时佛法才能光大。”桑希满有汉文经书千余卷，到藏时正遇权臣严禁佛教，幼主无权，就把经书藏在钦朴（在今桑耶附近）的岩洞中。

赤松德赞到了成年以后，见到前代诸王史籍，知道先祖弘扬佛教、建立法制的事迹，深为信乐，就与诸臣筹商复兴佛教的事宜。桑希以为时机已到，就把藏在钦朴岩洞中的汉文佛经取出，呈于藏王，并为略述大意。藏王听了很欢喜，就命桑希同汉人梅果、迦湿弥罗人阿难陀及精通汉语者参加翻译。此三人在海波山的鸟穴内将汉文佛典译成藏文。但此事为舅氏仲巴结所反对，并怪桑希多事，把他贬到芒域（史书上说一些信佛法的人，为了保护桑希，送他到芒域避难）。之后，又在藏王的指使下，迎请印僧静命大师入藏传法。桑耶寺建成以后，法尊大师著的《西藏民族政教史》中称，桑希是初度出家七人之一。桑希对赤松德赞初期掌政及发展佛教，沟通汉藏关系曾起过重要作用。他又是早期把汉文佛经译为藏文的主要译师之一。

毗卢遮那

(公元八世纪人)

毗卢遮那，公元八世纪人，西藏佛教前弘期初期名僧，初度出家七人之一。藏王赤松德赞为培养佛经翻译人材，派毗卢遮那等二人为一批，南喀宁波等五人为另一批先后去印度留学。毗卢遮那在印度大菩提寺，从一位金刚乘的师傅学密法，回藏之后，他传授金刚乘密法，遭到了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寂护的门下和印度其他学显教的班府达们反对他，说他所传密法，并非佛教。这是佛教内部显密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支持苯教的贵族，特别是赤松德赞的正妃才邦氏反对他。（这是从苯教的角度反对他。但是，赤松德赞本人很支持毗卢遮那。实际上，他是莲花生一流人物的继承者，也就是所谓金刚乘派下人。他在赤松德赞保护下，从事“怛特罗”典籍的翻译工作（“怛特罗”即指密宗经典、仪轨一类的书籍）。他翻译的密宗典籍，大部保存在后来的宁玛派总集中，宁玛派把他们这一派的始祖一直追溯到此人和印度僧人莲花生、无垢友等。所以说，毗卢遮那是印度密宗传入西藏最早翻译人之一。号称西藏佛教前弘期三大译师之一。

（以上参见王森著《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等）。

除此，在译经方面，“毗卢遮那与玛·仁钦乔（宝胜。玛，家族名，吐蕃时期的大世家）、聂·旬努协饶、努·松吉益西等曾秘密译出《普成王经》、《集密意经》、《幻变修部八教》等教典和要门”（见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宗派源流》甘肃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60页）。在传教和授徒方面，“宁玛派”教义之九乘说中的“行部及瑜伽部是毗卢遮那佛说的”（见同书61页）。“宁玛派最主要之法，即有名的大圆满要门。此分心部、界部、要门三部。心经有母子十八经，五经是毗卢遮那所传（十三经是无垢友所传。界部亦是无垢友所传。），要门部中有名之‘宁提’（意为精要中的精要，是大圆满法要门部中的特殊教授。内中特重策厥和妥噶法要。策厥，意为断坚，属修见性的法要。妥噶，意为超越，属修光明证佛身的法要。）则纯由毗卢遮那所传出”。（见《宗派源流》65—66页）。另，“大圆满有名的心品类，先由毗卢遮那和玉扎宁布传聂·旬努协饶……，又由毗卢遮那传邦·桑结贡布”等。

藏 玛

(公元九世纪人)

藏玛是藏王赤松德赞之长子，赤德祖赞（即热巴巾）之兄，系藏传佛教前弘期名僧。他幼年出家为僧，学习佛法。其父死后，由其弟赤祖德赞继任赞普位后，他积极支持大力弘扬佛法。

朗达玛灭佛时，反佛大臣结道热设计把藏玛流放到卓木（即今之亚东，见《红史》39页）。又据《贤者喜宴》记载，藏玛后来又被那囊妃芒杰毒死。

钵阐布娘·丁艾增桑波

(公元九世纪人)

钵阐布娘·丁艾增桑波，系西藏佛教前弘期名僧，藏王赤德松赞（约798—815在位）幼年读佛书的师僧。赤德松赞即位后，他受到信任，对当时吐蕃王朝政治事务有一定的发言权，当时被称为班第钦波。班第钦波简称班钦波，《《唐书》中之钵阐布、钵掣逋，即此称号之对音。元和五年（810）5月唐宪宗命徐复使吐蕃并赐钵阐布书，所指或即此人）。这一事实说明僧人在当时已干预政事。看起来，元和、长庆年间，唐蕃之和，蕃僧起了一定作用，可能是事实。

朗达玛即位后灭佛时，相传此人与玛·仁钦乔等随印僧逃往印度，中途被反佛大臣结道热收买的刺客刺杀云（见王森《关于西藏佛教历史的十篇资料》）。

班第钦布贝吉云丹

(公元九世纪人)

班第钦布贝吉云丹，是西藏佛教前弘期名僧。藏王赤祖德赞（即热巴巾）在位时，曾委用他为“却伦”（意为教法大臣），其职位在“大伦”之上，掌握内外军政大权。822年（唐长庆二年）唐使刘元鼎入蕃和盟时，吐蕃方面即由此人主盟。现在拉萨大昭寺前保存的和盟碑侧，吐蕃预盟大臣中，此人列为第一名。据《布敦佛教史》记载，由于热巴巾把王朝的军政大臣交给佛教僧人，引起了“爱做坏事”的贵族们的极大愤怒。于是，他们积极策划消灭佛教势力。他们先向热巴巾进谗言说他大哥藏玛虽然出家，但他不守清规戒律，使热巴巾把藏玛流放到边远的地方（《红史》说是流放到亚东）去。接着，这些贵族们又造谣说在王朝掌权的钵阐布贝吉云丹和王妃交绕萨贝吉昂楚私通，热巴巾一怒之下将贝吉云丹处死，昂楚也寻了自尽。《贤者喜宴》中说：“贝吉云丹逃往北方，反佛大臣贝达纳坚追踪而至，捕杀贝吉云丹，后又剥其皮，其人皮后供于叶尔巴神殿，又供于聂塘嘉容地方。”

拉垐贝吉多吉

(公元九世纪人)

拉垐贝吉多吉，原名达尼雅桑，西藏仲堆恭莫切地方人，具体生卒年不详。他是西藏佛教前弘期著名僧人。

拉垐贝吉多吉原先是一位武将，守卫在汉藏边地。传说他头盔内有“死后将入地狱”的咒语。于是他便同他的叔父及三兄弟前往桑耶，随毗玛拉米扎出家为僧。又从莲花生处获得菩萨律仪。他与他的两个兄弟热久旺波央和尊巴贝吉央，同在芝布之嘎莫容修行。（以上见《贤者喜宴》）。

在朗达玛灭佛之时，拉垐贝吉多吉已是有相当名望的僧人，再加上他以前是武将出身，所以受到了政界和宗教界人们的关注，也都激励他下山刺杀朗达玛。当时的猎官和鱼官就寄信给他，暗中鼓动他下山。再者，宗教界的桑结益西也亲到叶尔巴寺，鼓动拉垐贝吉多吉刺杀赞普朗达玛。由此看出，拉垐贝吉多吉是当时各方面注重的中心人物。

后来，在各方面的鼓动下，拉垐贝吉多吉从叶尔巴查拉孜下山，经过化装，潜入拉萨，调查掌握了赞普朗达玛的准确行踪，乘朗达玛看逻些（拉萨）碑文时，发箭中其眉间，箭尾直通赞普

后颈，朗达玛被杀（见《贤者喜宴》）。

《布顿佛教史》说，当时朗达玛正在读碑文，拉垅贝吉多吉见到后，便来大昭寺和吉祥塔前，当朗达玛正在此处叉腰而坐。拉垅贝吉多吉便用铁弓铁箭，从其膝部发箭，而朗达玛还以为向他敬礼（见该书木刻版125页）。拉垅贝吉多吉行刺成功后，急回叶尔巴，又以伪装修行瞒过官府的追查，然后逃往多康。《红史》说，朗达玛被佛徒拉垅贝吉多吉箭射身亡。拉垅贝吉多吉逃往多康之麦吉顶地方。据一些资料看，拉垅贝吉多吉刺杀藏王朗达玛之后，逃到青海黄南地区的尖扎地方，先是隐居，到了晚年，和后来由西藏逃往在青海化隆的越格琼、藏饶赛等人收徒传法，是为安多藏区有佛教活动之始。

贡巴饶色

(892—975)

贡巴饶色，青海循化北宗喀德康地方人。又称喇钦·贡巴饶色，“喇钦”，意为大喇嘛、大师，是一种尊号，因他对复兴佛教在藏区传播有大功劳，故加此称号。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法”的始祖。

《红史》说：“当朗达玛灭佛时，有藏饶色、约格迥、玛·释迦牟尼三人用一匹骡子驮载戒律经卷，从吉祥曲卧山，逃往阿里地区，又从噶禄罗（似指勃律，待考），绕行霍尔（指突厥）地区，到达朵麦、安琼南木宗地方，当地有一苯教徒的儿子名叫木苏赛巴，见三大德，立生净信，遂皈佛法，以藏饶色为堪布，约格迥为亲教师，受沙弥戒出家，取名格哇色，后被称为贡巴色。一年之后，还由藏饶色任堪布，约格迥为轨范师，由玛·释迦牟尼任屏教师，拉隆贝吉多吉因刺杀国王（指杀朗达玛），不能参加受戒，所以又找来两名汉人和尚（指果旺与基班）为尊证师等五人，给贡巴饶色授比丘戒。”

贡巴饶色受比丘戒后，又从果绒僧格扎巴学律藏和四阿含及其注释。当时丹底（在西宁塔尔寺东南，黄河以北黄河岸上）地方

的头人请他去传法（时在940年左右），之后他就一直住在丹底，宏法建寺，不少地方头人都从他出家受戒。这一情况传到西藏后，桑耶地方的领主查兰益西坚赞，遂为施主，资送鲁梅等十人赴丹底地方，依贡巴饶色学戒律。鲁梅等回藏后，分别建立道场，普传戒律，使佛教的余烬从“下路”（藏族人习惯称西北为上，东南为下，因为康藏几大河流都是从西往东流的，故甘青藏区称为朵麦，属下路。）又重新复兴起来，开佛教在西藏地方再弘之端。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在他著的《宗派源流》中说：“由此渐次弘传，使卫藏诸地，僧伽遍满，讲解实修，蒸蒸日上。故喇钦与鲁梅等，对于我们雪域藏民恩德很大。”

鲁梅慈成喜饶等十人

(公元九世纪)

鲁梅慈成喜饶，系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传十位僧人之一。上藏地区经过朗达玛毁法，寺庙封闭，僧人逃散。在达玛之子永丹、斡松及其子孙时，虽然已经不再严禁佛教，但仍没有正式出家人和正规的宗教活动，更没有僧伽组织。后来到达玛七世孙益西坚赞（达玛长子永丹六世孙）时，听到丹底（地在今西宁塔尔寺东南，循化以北黄河岸上）地方，有佛教流传，“遂为施主，资送十人赴朵康学法，十人之中，属卫有五，即鲁梅慈成喜饶、热希慈成琼乃、征益西云丹、巴慈成洛追、松巴益西洛追。属藏有五，即洛顿多吉旺徐、古摩饶卡、聪尊喜饶僧格、阿里二弟兄、博冬乌波德迦等十人到达丹底地方以后，从贡巴饶赛出家受戒，同他的弟子学习律藏和经论。大约在公元975年前后，这些人陆续回到上藏。《印藏佛教史》说：鲁梅“等十人，得戒后，依仲智幢（指贡巴饶赛弟子）听讲律藏，余人先归。途次朗塘遇巴戒智（即巴慈成洛追）、喜饶戒生（即热希饶慈成琼乃）之二弟来迎，见二兄生敬，遂依罗敦（指洛顿多吉旺徐）出家。罗敦谓诸人云：‘汝等暂留此，吾先进藏侦之，若能弘法，即往’”。

彼，汝等亦可来，不然仍回此住。”乃随商人赴藏。后在藏部建寺，度二十四人出家。明年鲁梅诸人亦入卫部。拉萨虽为前代大德驻锡之地，恐禁令犹存，未敢轻往，遂暂住桑耶寺，后得安达赤巴王之助，鲁梅十人等，得在卫藏，广度弟子出家，分散各处，建立道场，由此佛法赖以渐兴。史家遂判达玛以前，为前弘期，喇勤（指贡巴饶赛）以后，为后弘期。”据《青史》说佛教再度在藏流传开始于978年。十人之中鲁梅的影响最大，弟子也最多，有四柱、八梁、三十二椽之称。据载有名杰拉康就是鲁梅的“四柱”之一向那昂多吉旺徐（976—1060），于1012年所建。

仁钦桑波

(958—1055)

仁钦桑波（意为宝贤），藏传佛教后弘期著名高僧和译师之一。他于公元958年（后周世宗显德五年）出生于古格的宁旺热特那地方（今之阿里地方）。十三岁时（970）从益西桑波（意为智贤）出家。以后由阿里王益西沃（意为智光）賚以多金派往克什米尔和印度学法。临行嘱之曰：“迦湿弥罗有大善巧宝金刚，东印有法护，西印有迦若那等须迎至藏，闻印有波若占瓦里通二《集论》，善破外道，辩才无碍，并有《摄真实论》之庆喜藏译，均应尽心学习。外有班智达宝洲及法护所传之《断业障续》，世论师所释，胜天所造《三百四十曼陀罗天法》，亦应学回。余如佛智足所造之《集密修法》，龙树所造之《曼陀罗仪轨》，宝金刚之《时论》、《金刚四座》之经释，俱当觅回，勿吝黄金，尽量迎致超岩等寺诸大德……。^①”仁钦桑波秉命赴印，依75位班智达，尽学显密诸法，随学随译。后返藏时，迎请能信铠、作莲密、佛陀宝利辛底、觉护、莲花密等很多印度僧人到阿里，他们合作译经。在显教方面，他译过17部经，33部论；在密教方面，他译了108部怛特罗，其中包括《集密》、《龙树和佛智二

释》、《摄真实论》、《庆喜藏释》等重要密籍，建立金刚乘。藏僧认为，从他开始，才把密教提高到所谓和佛家理论相结合的“高度”，并把他和他以后的其翻译家所译的密教典籍，称作为“新密咒”，把他以前包括吐蕃时代所译的密籍，称为“旧密咒”。同时，西藏僧人一般把达玛灭佛以前的佛教称为“前弘期”，把贡巴饶赛和仁钦桑波以后的佛教称为“后弘期”。

阿里王益西沃迎法护入藏时，仁钦桑波又依其听受庆喜藏派之瑜伽部法。他四十九岁时，又依班智达达沃桑波（月光贤）、毗那斯、莲命等受具足戒。他根据新的梵本改订了一些吐蕃时代的旧译本。由于他新译和改订的佛经最多，影响甚大，所以时人与后世尊称他为“洛钦”（意为大译师），后弘期的第一位译师。仁钦桑波的宗教活动，不仅在译经传法方面，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他到处建寺修塔，他在阿里三区建立了不少寺庙，至今阿里人，以至拉达克人，还把几乎所有的重要寺庙都说成是由仁钦桑波开始建立的。益西沃之子拉德为王时，尊他为“金刚阿阇黎”（这是密教的尊称），并把布让地方的一个谿卡赐给他作为封地，成为他的私有谿卡，还拨了一定的税收供他使用。西藏的寺属谿卡从此时开始。

阿底峡尊者入藏，与仁钦桑波大师相遇于晚年，他又依尊者，学习各种咒道教授。后修咒道成就。他有众多弟子，最著者为玛善慧，继承法统。世寿九十八岁入灭。

注①见刘立千编《印度佛教史》52—53页。

琼 波 南 交

(990—1140)

琼波南交，又译作琼布·瑜伽士，藏传佛教噶举派（藏传佛教派别之一。俗称“白教”，理由是这一派的创始人玛尔巴、米拉日巴等人在修法时都接从印度学来的习惯穿白颜色的僧裙。）两大系统之一的香巴噶举创始人。“琼波”系吐蕃时一官族名，当时领有后藏下部地区。

《土观·宗派源流》说，香巴噶举“是善巧成就者琼波大师所传出。他的家族属琼波。幼年曾学苯教，后知其非，改学《大圆满法》，亦未惬意。乃往尼泊尔依苏摩谛论师（善慧）学梵文，旋赴佛法来源地的天竺，往返天竺、尼、藏三地约50年，亲近竺尼大善知识与大成就者约150人。通达显密经论及一切要门。他的共同上师有大金刚座主、弥勒巴、沸多瑜伽、罗睺罗等四人。不共的上师有尼古智慧空行母、乐成空行母六人为主。尼古是那若巴佛妃，已成虹身，适逢她正来作空行众会首领，因与之相遇，遂传以《幻身道灌顶》、《六法金刚句》、《幻身道次第》等教甚多。又从弥勒巴听授《六臂大黑天》法聚。”“回藏后依朗日塘巴受比丘戒。住盆域的觉波山（盆域，指拉萨北面的

彭波地区，现为林周县属），弘法时，罗喉罗密金刚特从天竺来递传法门，授以《五部本续》大灌顶，《明王》法聚等，凡众所知闻的，或未知闻的种种教授甚多。遵照空母的授记，至叶茹的香地（后藏香曲河流域一带地区的总名。现为甲错、南木林、拉布三宗），在三年中，建立了以雄雄寺为首的108寺。集僧徒约8万人，在此弘法30年。此后，遂以香巴噶举之名而著称于当时。”

以琼波南交为起点的香巴噶举有其特点的，即该派的僧人除了平时学法以外，还重视从事社会上的技艺活动。如十五世纪时，以修建铁索桥而闻名于世的唐东结布，就是香巴噶举派的僧人。到了十五世纪以后，香巴噶举派就不怎么听说了。

琼波南交的弟子甚多，其中最著名的有麦乌敦巴、雅波嘉摩齐、杜敦·仁旺等七人，史称为“七宝法统”。

卓弥·释迦益西

(994—1078)

卓弥·释迦益西，西藏芒喀地方人，是藏传佛教后弘期著名高僧，最大译师。《土观·宗派源流》说：“在后弘初期，洛顿·多吉旺徐（公元十世纪人，从贡巴饶赛首次学戒十人之一）来藏弘法时，正当藏王贝柯赞之子扎西孜巴统治茹拉（位于今后藏与阿里连界的南部地方）时，扎西孜巴的三个儿子请洛顿派遣亲教师和轨范师各一人来弘扬佛法。洛顿遂派堪布释迦旬努和轨范师益西尊追二人前去建立僧伽。”“卓弥即於此时出家。释迦旬努等相议，若欲光大法门，必遣人赴印留学，遂集僧徒300余人，选出卓弥·释迦益西、达洛等，赴印求法。临行嘱咐他们说：‘戒律乃圣教根本，般若乃圣教心藏，密法乃圣教精髓，应善学之！’卓弥依六贤门及勇金刚，求得经续要义。后又迎请迦耶达惹供黄金五百两得《喜金刚》、《金刚帐》、《桑浦扎》、《惹里》、《四阿惹里》等续及《密诀宝露》（即《道果法》）诸法要，遂译出宏广。其弟子有长於要门者三人，长于本续者五人，得成就者七人。尤以《密诀宝露》（《道果法》），有利圣教不鲜，其所宏法要，后来萨迦一派多传承之。卓弥大师住印度及尼泊尔历十

三载。其得迦耶达惹之密诀，已五十二岁，听其教授，讲授三载，至六十三岁时，始传出此法。”（以上见《印藏佛教史》55页）。

卓弥·释迦益西有一个特点，每向弟子传一密法，必索多金（按：在当时传法，特别是密法，都需供养，或财或物。卓弥不过是要的特别多而已）。卓弥弟子中最有名的是建萨迦寺的贡却结保，噶举派的创始人玛尔巴译师，也跟他学过梵文。

苏尔波且·释迦迥乃

(1002—1062)

苏尔波且·释迦迥乃，是藏传佛教宁玛派（宁玛是“古旧”之意，以传承弘扬旧密咒为主，称旧派，名宁玛瓦。该派的僧人均戴红帽又称“红帽派”，所以俗称红教）早期著名高僧，为该派教典传承第一位大师。“苏尔”是家族名，“苏尔波且”意为大苏尔。他起先从当时许多旧密咒师学习到不少密法以后，就开始整理当时宁玛派的密法典籍，在肯定一些根本性法典之后，加以阐述和注释，使其系统化。他是第一个把当时宁玛派经典进行整理使之系统化的人，从他这一代起，宁玛巴才始有一个教派的规模。后来他在邬巴垅地方，建邬巴垅寺，所以人们又称他为邬巴垅巴。

苏尔波且的弟子很多，相传其中经常修定的弟子有108人，其中有名的四人。他为了学得道果教授，曾向卓弥译师献黄金百两。他是一个梵行者，一生未娶妻室。于1062年（宋嘉佑七年）去世，享年六十岁。

仲 敦 巴

(1005—1064)

仲敦·甲哇琼乃(意为“胜生”),藏传佛教噶当派(“噶”译为教,意为佛的教诲,“当”译为教诫,意为僧徒行持修行的指导。噶当即用佛语来教导人接受佛教的道理。)的创立人。他出生于藏北念青唐拉沃扎吉莫地方,属羊协氏族,父名达松古卒,母名枯沃莎兰吉。幼时母亲去世,其父续娶。因继母经常打骂,他外逃至康区,投奔喇嘛赛尊,白天干家务活,即饲养牲畜、磨面等,附带学习一些知识,晚上为喇嘛赛尊看守田地。他不管是伺候喇嘛,还是学习都从来没有耽误过,在空闲时间还向班智达弥底学习了声明学和桑支达语。后来,听说阿底峡到了阿里,他就徒步从康区匆匆赶到阿里,在阿底峡准备动身返回印度的前两三天,于普兰的吉兴村见到了阿底峡。象阿底峡这样的大师从印度到藏区还是第一次,因此卫藏地区的格西、学者们亲笔写信,让仲敦巴一定要把阿底峡请到卫藏,仲敦向阿底峡说明以后,于是阿底峡取消了回印度的打算,决定留在西藏,并来到前藏。从此以后,仲敦巴就一直跟随着阿底峡。公元1054年(宋至和元年),阿底峡圆寂于聂塘,仲敦巴遂成了阿底峡的大部徒众的首领和师长。1055年仲

敦巴和阿底峡的徒弟们在聂塘为阿底峡举行了一个极为隆重的追悼纪念会。会后仲敦巴在聂塘建立聂塘寺。不久，达木地方的头人们集议决定迎请仲敦巴到热振地方传法，1056年初，仲敦巴率领众徒到达热振，次年（公元1057年）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寺，就是西藏佛教史上著名的热振寺。遂以此寺为根本道场，逐渐形成了噶当派。

仲敦巴一生只受过居士戒，没有受比丘戒出家，是一个居士，但他持守戒律比僧人还严，他在热振寺建成之后，一直居住在该寺，以讲经授徒为事。公元1064年，仲敦巴圆寂于热振寺，享年六十岁。

仲敦巴有很多弟子，其中著名的为博多哇仁钦色（1031—1105）、京俄巴（1038—1103）和普穹哇·宣努坚赞（1031—1106）三人。前两人都收徒传法，而普穹哇不收徒，遂形成噶当派中教授与教典两支派。

玛 尔 巴

(1012—1097)

玛尔巴，本名却吉洛追（意为法慧），藏传佛教达波噶举派的始祖，藏族佛教史上著名译师之一。前藏南部洛扎曲其普地方人，父名玛尔巴旺秋俄色，母名杰莫俄色。他在兄妹四人中排行第二。《上观·宗派源流》说：“他初从卓密学梵文，以后三赴天竺，四赴尼泊尔。参访班钦那若巴、安达弥勒巴（麦哲巴）、吉译智戴、大成就成寂贤等大善知识108人，尽学《集密》、《胜乐》、《喜金刚》、《摩诃摩耶》、《四座》等大瑜伽父续母续之讲解、教授、实修等，悉数翻译流布。依弥勒巴生起大手印的彻底证悟。”回藏后，在洛扎地方的卓窝垅定居授徒。他一生没有出家，娶无我女为妻。他除授徒传法之外，还从事经商、种田。他弟子甚多，其中最著名的有四大柱，即俄敦·却古多吉（法身金刚）、楚敦·旺安、麦敦·村波索南坚赞和米拉日巴。

俄、楚、麦三人领受到讲解的语旨。其后相继而起的弟子广宏《集密》、《喜金刚》、《胜乐》、《四座》和《摩诃摩耶》等之灌顶与本续讲解。楚敦多吉所传之《集密》灌顶与本续讲解，直至后来布敦大师与宗喀巴大师亦曾绍其传承。

尊者米拉日巴领受到实修的语旨，以修法而著称。米拉传至达波拉结时，遂形成达波噶举支派。玛尔巴译师遂被人承认为是该派的始祖，所以亦把他列入高僧之中。

苏尔穹·喜饶扎巴

(1014—1074)

苏尔穹·喜饶扎巴，是藏传佛教宁玛派教典传承的第二位大师。“苏尔穹”，意为小苏尔，他是苏尔波且的养子，也是其弟子。他小时候跟随父亲素尔贡行乞到苏尔波且所在地邬巴垅地方，征得素尔贡的同意，苏尔波且把他留下来，做为养子，遂给他取名喜饶扎巴。他从苏尔波且处学到不少教法，但因无钱而不能得到密法传授（在当时传授密法是交很多钱的）。后来，苏尔波且让他与一个家里富有的寡妇的女儿结婚，利用其家财来学习密法。他逐步学到了苏尔波且的全部密法，并继邬巴垅寺住持。后来，他把邬巴垅寺委托给三个弟子管理，遂到甲卧地方修法13年，所以人们称其为甲卧巴。以后在年绕地方，和学显教四名僧人辩论，四人因辩不倒他而拜其为师，因此名声大震，同时也就富裕起来，成为当时佛教徒中最富有的一位。他有很多弟子，其著名的有“四柱八梁”之说。他有三子，女儿数个，据载都修宁玛法得到成就，成为宁玛派的名僧，尤其是他的幼子卓浦巴最为著名，并继承了他的事。他于1074年卒，享年六十岁。

博 多 哇

(1031—1105)

博多哇，是藏传佛教噶当派创始人仲敦巴的著名弟子，噶当教典派的著名高僧。他本名叫仁钦赛，生于1031年（宋天圣九年），幼年在杰拉康寺出家，曾为扎交寺业日瓦（即管家、管事人）。1058年，他二十八岁时，到热振寺，从仲敦巴学法，遂成为仲敦巴的著名弟子。1064年，仲敦巴去世之后，他把全部精力用在静修方面。到了1081年，他五十一岁时，开始游历各个寺院，讲经收徒，常随其左右听法者有千余人。他平时讲授的主要经典是：《大乘经庄严论》、《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即《菩萨地》）、《集菩萨学论》、《入菩提行论》（汉译为《菩提行经》）、《本生鬘论》、《集法句经》等六论。这六论通称为“噶当六论”，博多哇极为重视阿底峡大师的《菩提道灯论》，所以再加上此论即噶当派教典派人常讲的“噶当七论”。

博多哇在任热振寺堪布期间，因寺内有口舌，他遂离热振另建博多寺，并移居该寺。由于博多哇讲经收徒，才使噶当派的名声在前后藏扩大起来。同时，由于博多哇师徒的行为都是合乎佛教经典，特别是戒律所规定的标准，所以当时藏人都称噶当派僧人最

有德行。噶当派的声誉广为传播。1105年（宋崇宁四年）博多哇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博多哇有很多弟子，其中最有名且影响较大的是朗日塘巴（1054—1123）和夏尔哇巴（1070—1141）。朗日塘巴，本名叫多吉僧格。他非常重视讲经授徒，他除讲授的经典“噶当七论”之外，还讲授“慈氏五论”。常随弟子约2000人。夏日哇巴，本名叫云旦扎，是一个牧民的儿子；从博多哇出家学法。相传他是博多哇弟子中最聪明的一个，默记了很多经典。博多哇逝世后，他把博多哇的一部分徒弟收拢起来，连同自己所收授的弟子，共有3000余人。他也是以讲经论为主，撰著有经论一部。1141年去世。继承他的事业的是他的两位弟子甲怯喀巴（1101—1175）和董敦（1106—1166）。

贡却结保

(1034—1102)

贡却结保，意译“宝王”。公元1034年（宋景祐元年）出生于后藏日喀则西南的夏卜地方的藏族贵族昆氏（《元史》作款氏）家族，是藏传佛教萨迦派（“萨迦”是地名，因地名而得派名。又因该派寺庙墙上刷有红、白、蓝之色条纹，故俗称“花教”。）的创始人。

贡却结保幼年从父兄学习宁玛派灌顶和密咒，修习和精通了父祖辈们的教法，又很喜欢新译密法。《汉藏史集》说：“有一次，当地举行盛大的歌舞庙会时，上师贡却结保也去了。在众多的游乐杂要节目中，有一些咒师头戴二十八位自在母的面具，手执各种法器，奏乐击鼓，与化妆成天女的女子们一起跳舞，在庙会中最引人注目，出尽了风头。他返回以后，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哥哥，哥哥说：‘现在是密法错乱之时，今后吐蕃修习旧密的人已不可能获得成就。我们家所有的教法，有自己的功效，我家祖上经典都在芒喀地方的学者卓弥译师那里，你可去向他学教法’”。于是，贡却结保遂带“十七匹马驮的货物连同马匹，以及作草料钱的一串珠宝全都奉献给卓弥译师，请求传授教法。”贡却结保依次

向卓弥译师学习新译教法，并以卓弥所传“道果法”为自己的主要教法。后于扎卧垅地方建寺，即有名之萨迦高波寺。又后，贡却结保师徒数人一起外出散心，见本波山旁，地白而润，知为瑞气所冲，堪宏大法，於是买山建寺，即吉祥萨迦之根本道场——萨迦寺，时在公元1073年（宋熙宁六年）。萨迦派也因此寺而得其名。

贡却结保执掌法座30年，广作利益佛法之事，于公元1102年（宋崇宁元年）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京俄瓦·楚臣拔尔

(1038—1103)

京俄瓦·楚臣拔尔，“京俄瓦”（又译作京俄巴），意为“眼前人”或“身边人”，即上层喇嘛的贴身侍从（内侍）。因为他常侍奉其上师仲敦巴左右，故有此名。他是藏传佛教噶当派教授传承的代表，洛寺的修建者。

1057年，他二十岁时，到热振寺拜仲敦巴为师，由于他勤奋好学，受到仲敦巴的特别喜爱，给他授以秘密教授。仲敦巴去世以后，他从师事衮巴哇等人。他在学法的过程中，还学会了梵文，能从事佛经的翻译。他对于诵咒、供佛和静修是特别重视的。他一生有很多弟子，其中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是甲域哇钦波。

甲域哇钦波是京俄瓦的弟子堆垅巴仁钦宁波的侄子，是京俄瓦的茶侍匈奴沃，因为他修建甲域寺并常驻该寺，故称之为甲域哇钦波（见《红史》）。他是堆隆之果高垄地方人，幼年丧父，其母改嫁，他由姑母抚养。年十二岁出家为沙弥。十四岁以后，他开始习研了噶当派的基本典籍和一些其他经论。后为京俄瓦的侍者。由于他竭尽心力承事京俄瓦，京俄瓦对他极为喜爱，每讲经传法，必使甲域哇在侧。京俄瓦逝世后，甲域瓦在普琼、蔡琼等地

方住。后在甲域（在塔波地区以南的一个地区）建寺，以后即长驻此寺。他对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特别擅长。噶举派的创始人达波拉结曾从他学法。他有弟子约2000人。其主要弟子是藏巴仁波且和冲协仁波且（1100—1170）。

米 拉 日 巴

(1040—1123)

米拉日巴，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第二代祖师。公元1040年（北宋仁宗宝元三年）出生于西藏后藏恭塘地方，他姓米拉，本名退巴嘎，汉意为闻喜，全名应叫米拉闻喜。日巴是粗布衣服的意思，这是他后来学佛，穿着粗劣，故名为日巴，以后米拉日巴这个名字，是人人皆知了，原来的米拉闻喜或米拉退巴嘎这个名字，人们反倒不熟悉了。

米拉日巴的祖父和父亲，都善于经商，因此致富，在地方上很有威望的。他父亲娶妻白庄严，生了他和比他小四岁的小妹贝答。在他还幼年的时候，父亲不幸病死。父亲临死时，怕他们寡母幼子，不能料理家务，便嘱托他的伯父姑母，帮助照管，哪知伯父姑母，竟生歹心，霸占了他家的财产，并虐待他们母子三人，让他们吃猪狗吃的食，做牛马做的活计，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用茅草绳作腰带，整天整天不停地劳动着。

米拉日巴到十五岁那年，母亲想给他娶亲，同伯父姑母要求归还财产。伯父姑母不但不归还财产，反把他们母子痛打了一顿，他母亲一气，便让米拉日巴外出去学密宗的咒术，来报伯父姑母夺

产之仇。米拉日巴也就因此外出，走上了学佛的道路。母亲死前一直没有回家，这中间还有他的一段神话传说，说他确实学会了咒术，放咒使他伯父的房屋倒塌，压死了他伯父正在举行婚礼的儿子，和其他帮助他伯父虐待他母子的30多个人。也就因为他压死了人，在佛教上来说，犯了杀生的罪，他才不敢回家，并寻求怎样来消灭罪孽的办法，于是想到去学佛法。这当然是神话了，但是学佛一事，则是真的。

当时，他听到有一个密宗上师玛尔巴，他是西藏山南地方的人。是藏传佛教四大宗派之一的噶举派创始人，就投奔他去，做了他的弟子。玛尔巴这个上师，非常严厉，让他修房子，作杂务，折磨了好多年，以后才传给他密法。据上师说，这样折磨，是消除他的罪障，是利于即生成佛的。

米拉日巴从玛尔巴上师那里得法后，修学了一个短时间，便返回故乡，去探视母亲，他回村一问，母亲已死了八年。到家一看，只见房中一堆母骨，妹妹贝答，据说已外出乞食，不知流落何方。未婚妻的妻子，也已不见踪影，于是他便离故乡，到深山古洞修行。以后他的妹妹和未婚妻找见了他，他决心不出山洞，不再成亲，坚决地修学密法。他主修的是大手印法，和以上乐金刚、金刚亥母为本尊的密法。他住山洞，行苦行，煮蕨麻野草为食，骨瘦如柴，无衣可穿，全身变成了绿色，人们看见他，都以为他不是人而是一个鬼，但他却毫不动摇，一直修出有了成就。

他修学有成就以后，便到处讲经说法，继承玛尔巴做了这一派的第二代祖师。于公元1123年（北宋徽宗宣和五年）圆寂，享年八十四岁。

米拉日巴的弟子很多。热琼巴和达波拉结便是他最著名的大

弟子。达波拉结创立达波噶举。他的弟子帕木竹巴创立了帕竹噶举。帕竹噶举这一支系的绛曲坚赞，在公元1354年（元至正十四年），取代了萨迦派在西藏的地方政权，元顺帝曾封绛曲坚赞为大司徒。这一派执政一直到1435年。达波拉结的弟子都松钦巴创立了噶玛噶举，此系曾继帕竹政权，管理过西藏。可以看出，米拉日巴对于噶举派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米拉日巴，在佛教中注重实修苦行。他不但是噶举派最尊敬的人，各教派也对他极为尊敬，一般在家人，一提到米拉日巴，也都啧啧称赞，成为西藏的一位圣者，在西藏的语言中，叫作至尊，他除苦修实练而外，主要值得称赞的还是他的道德高尚、性行纯洁，足以为人师表。他反对出家人借着佛教的幌子，欺骗群众，图名图利。他在苦行时，他妹妹看见一个大喇嘛，下坐重裯，上张伞盖，酒茶交饮，供养物数都数不清，要他去做这个喇嘛的一个徒弟或侍者，这样会使生活享受好一些。他却说：“我赤身露体，住在山洞，没有可耻的道理，比那明知是恶，而不知戒，扰乱父母生下来的身心，盗窃上师和三宝的法财，为遂己欲，想出种种下劣和欺骗的方法，以损害众生，过这样生活的人，自害害他，才是天人正士所共耻者。”他还曾写诗讽刺这样虚伪骗人、积聚金钱的喇嘛们说：

只逞口舌的大师，
辩论象骗子那样说谎，
说话象狡猾人那样欺诈，
睡眠象大官那样睡法，
走路象税吏那样走法。

当时的一些喇嘛，确实有些象他说的那样，借着喇嘛上师的名望，收人供养，愚弄群众，使群众罄其所有，向他们作布

施和供献。他们就这样聚集财宝金钱，供自己特殊的享受。米拉日巴比起他们来，真是何等不同啊！他死后的遗物，是一块迦希迦布、一个尖可钻物、背可打火的小刀、一包黑糖和留给弟子们的一封书信。此外，别无他物。

米拉日巴不但是佛教的圣者，也是一位有名的诗人。他在藏族僧侣作家当中，是第一个有诗歌专集的人。他的诗，风格语言与民间诗歌极为接近，也影响了后来的藏族诗歌创作，尤其是民间的诗歌创作，他自己说过：

“我的嗓子非常好，人们听到我的声音，就心生喜欢，于是人们都说，闻喜这个名字，起得真好。”

他的诗歌，可分两类：一类是以宗教道理为内容的宗教诗；一类是以祖国山水景物为内容的风景诗。以宗教为内容的诗，当然是宣讲宗教道理的诗，但其诗惯于采用三段体或四段体，与后来民歌的分段体，即三段体或四段体的发展，可能有源流的关系。

至于他的山水景物诗，则是别开生面，独创一格，以祖国山水景物为内容的作品，除他而外，无论藏族文人作家，或者是民间歌手的作品中，都很少见。现在把他的这类作品，在下边举出一例，这首诗没有题，实际是描写“姜秋宗”的一首写景诗，译成汉文是这样：

姜秋宗是清静乡，
沟头雪山耸天上。
下边沟口是人家，
施主很多有信仰。
后山宛如毡帐张，
前边重叠林带长。

碧绿草地宽又广，
香美红莲正开放。
嗡嗡更有六足蝶，
飞来飞去采花忙。

铮淙泉水细细淌，
水禽引颈真优雅。
枝繁叶茂果树丛，
美丽飞鸟鸣啁啾。
微风细韵轻吹拂，
村边村郊舞不休。
高青翠竹绿枝条，
猿猴上下喜翻腾。
草坪平展如碧玉，
牛羊散放在草坪。
照看牧羊有牧童，
歌声阵阵伴笛声。
世间众人如仆役，
熙来攘往红尘中。

这首诗把姜秋宗的形势和它四周的景物描写得很细致、很活泼，好像一幅天然图画。而且是二十多句，是比较长的一首风景诗。由于他常住在山林之间，有亲身感受，所以能写出这样风景画一般的诗来。

在西藏佛教人物中，人们都知道，有三个伟大的人：一个是米拉日巴，他刻苦自修，道德高尚，不爱金钱，的确给喇嘛僧众做出了榜样；一个是贡噶坚赞，他是知识渊博的班支达，为统一

祖国，出过大力；一个是宗喀巴大师，他对于佛教，有集大成的业绩，把大小显密，熔铸一炉，实是佛教中一位博大精深的人物。

在西藏僧侣作家中，也有三个享有盛名的诗人：一个是米拉日巴，他是一个开创写宗教诗、风景诗的诗人；一个是贡噶坚赞，他是一个开创写格言诗的诗人；一个是仓洋嘉措，他是一个专门写爱情诗的诗人。他们都是僧侣作家中的佼佼者，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给藏族文学史增添了灿烂的光彩。

这些人中，米拉日巴则是时代最早、最有影响的一个人。

内邬素巴

(1042—1118)

内邬素巴，是藏传佛教噶当派兼医术的一位著名僧人。他的本名叫益西拔，因为他出生于内邬素地方，所以人们称他内邬素巴。他是阿底峡的弟子，热振寺第三代堪布袞巴哇的门徒。他幼年出家为僧，擅长于修定。1068年(宋熙宁元年)，他二十六岁时去热振寺从师事袞巴哇。1082年袞巴哇逝世后，他又师事博多哇。

内邬素巴不仅擅长于修定，而且还学有一套医术的本领，特别擅长医治龙病（藏族对麻疯病的称谓）。他的老师博多哇在达垄阅经时，有十余个僧人染麻疯病，博多哇使内邬素巴治愈之，因此一般人遂认为他是一位术士，而不知他是佛教经典知识方面很精通的人。

后来，他在内邬素地方建立了一座寺庙，他在这座寺庙居住的时候，常有一些知名的咒师前来从他学法和医术，对于藏医的建立与发展，他是有一定的贡献的。

他平时常讲关于修法的经论，也常讲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和《教次第论》，弟子约有千人。他的主要弟子是杰贡钦波(1090—1171)和绛曲格哉(1084—1167)。

内邬素巴卒于1118年(宋重和元年)，享年七十六岁。

卓 浦 巴

(1074—1134)

卓浦巴，本名叫释迦僧格，是藏传佛教宁玛派早期三位著名高僧之一，为“三苏尔”中第三苏尔。他是苏尔穹的最小儿子。他出生时其父即去世，由他母亲和舅父抚养长大成人。因他在卓浦地方建立卓浦寺，故名卓浦巴。

卓浦巴从十五岁开始学法，到了十九岁以后，其家庭更发达起来，更加富有，他为了照顾家产，无暇出外学法，便把父亲的几位著名弟子邀请到家里，为他传法。他学到了宁玛派的经、幻、心三部密法和大圆满法，以及密法的仪轨和灌顶等，遂成为一位有名的僧人。之后，他收徒传法，有弟子千余人。土观·却吉尼玛著的《宗派源流》说：“卓浦巴有弟子号称为‘四麦’、‘四纳’、‘四敦’共12人。四纳中最胜者为拉吉·节敦甲那（按：拉吉是医师，节是吐蕃时的大世家。敦是敬称。节敦甲那为公元十一世纪时人），他学习中观量论，成为精通教典之人。曾来卓浦与卓浦巴辩论，辩后得胜，卓浦巴大喜，遂将教授完全传授给他。”

又，卓浦巴亲弟子当波桑结·贡拉瓦（当波桑结，意为元始

佛，是一种尊号），将法要广宏于朵康。另一弟子迦当巴·德协（本名协饶僧格，或名博巴塔叶意为辩才无边），在金沙江边的邦博岗（按：系朵康六冈之一，即今四川甘孜州德格南部地区和云南西部一带即白玉县城北四十里地方）境内，有地形似梵文“噶”字，即在其处建一寺，名噶陀寺（在今甘孜州白玉县境内，建于十二世纪时），大宏法要。噶陀寺受历代德格土司的支持，寺主以转世形式世代相承，该寺是康区历史悠久，较有声望的一个寺院。

娘麦·达波拉结

(1079—1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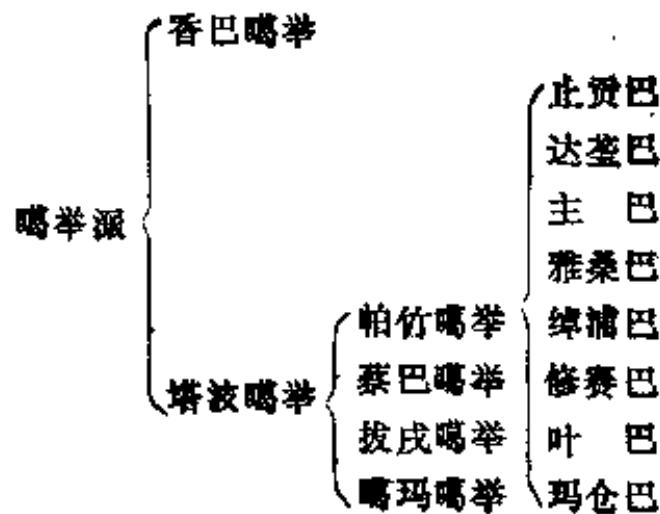
娘麦·达波拉结，“娘麦”为无等，即无可比拟之意思，是一种敬称。“达波”原为部落名，后转为地区名，古时属约茹的范围。“拉结”是医生的意思。这里全用的是尊号。《红史》中说，他是西藏聂地人，属尼哇氏家族，兄弟三人，彼为老二，乳名宁波贡噶，先学医，出家后取法名索南仁钦。《土观·宗教流派》记述道：“米拉日巴第二大弟子如日的达波拉结者，传说他就是向世尊请问《三昧王经》的月光童子。达波幼年学医，造诣最深，遂有达波拉结之称。娶一女为妻，年二十余妻死，心极悲痛，因从噶当派格西·夏巴林巴出家，受具足戒。又依甲域瓦、女绒巴、甲日贡喀瓦等学习了噶当派的教授甚多。闻米拉尊者之名，非常仰慕，遂去拜见，米拉很高兴，摄受了他，尽传所学，以此修习，心生殊胜证悟，遂将噶当派的道次第和米拉的《大手印》教授融会一起著成《道次第解脱庄论》。从此噶当与大手印二大教流遂汇在一起，以《大印俱生和合》的引导次第来教诲后学。”《红史》中还说达波拉结善长“定功”，“一坐能持续十三日之久，抑制寻思，获得十地之预兆（按《入中论》发心第十讲：得大

乘菩萨十地之预兆，可知自他先世百年，来世百年，见佛百容，入佛百田，云，）”。他四十三岁时（公元1121年）在达波拉岗波（即今达波地区）建造岗波寺，以其为道场，广收门徒传法，遂形成达波噶举。

“达波拉结一生，开二利之门，利无量众生。彼之传承弟子犹如繁星罗列。所教化之众生，亦复无量。”（见《红史》）。在众弟子中有四人分别在前后藏建寺收徒，形成四个支派。其中帕竹一派又分出八个支系。噶举派人遂把这些支派总称为“四大八小”^①，有些支派直到现在还传承不断。凡是提到噶举派而不专门说明是指香巴噶举的话，那就都是说的达波噶举。

达波拉结在岗波寺住了30年之久，他一面经传教，一面著书立说，影响很大。当时西藏佛教界普遍重视讲经，和他的积极提倡是有关系的。他死于1153年，岗波寺寺主由其侄继任。后来多由其家族后裔继承。

注：①四大八小即：



热 琼 巴

(1083—1161)

热琼巴，是藏传佛教噶举派著名高僧。他是西藏“恭塘人，原名多吉扎，幼年丧父，其叔父娶其母，他遂成为叔父家的奴仆。他少时善于念诵，以为俗家诵经所得报酬，献其叔父与其母，来取得他们的欢心。在他十一岁时（正是米拉尊者米拉日巴闭关九年圆满之年），于恭塘的山谷中见到米拉尊者，即向米拉献上礼品，从其修‘拙火定’（修脐轮火，为一种密宗修法），获得进益。”①

“十五岁时（1097年），患得麻疯病，遂离开米拉日巴，独居荒屋，时遇三位天竺游方僧，见其可怜，带他到天竺，依止上师瓦拉真扎（又写作，瓦罗尊扎），彼传以《威猛鹏裙本君法》（《土观·宗教流派》作：《忿怒金刚手金翅鸟裙法》），命他诵修，不久麻疯病得愈。之后，他去尼泊尔在阿都邦达夏等师处听受《胜乐》等一些密续经教。回藏后又从米拉尊者学法”②。

“米拉对他说：‘天竺有《无身空行类法》共九种，其中五种已为祖师玛尔巴请回，尚余四种，你去天竺学习，使其完足！’热琼巴便往天竺，向那若巴和弥勒巴二人的亲教弟子谛普巴，（此人系噶举法脉来源的印度传承祖师）请求传法，同时还请得其他教

授甚多。回藏后便将所学之法献与其师米拉。米拉以此法传恩宗敦巴。敦巴曾写了几本书，从此流传下来的则名为‘胜乐耳传’。热琼巴自己传给他人的则名为‘热琼耳传’^③。”

后来，热琼巴离开米拉日巴到前藏去传教。他到过山南的雅隆、塔布的涅麦等地，还在香卜的雪山中静修过一段时间。他在山南的洛绕地方停留时间最长，当地向他学习的弟子也最多，其中还有一个洛基头人，除跟他学佛外，还给他当助手约二十五年之久。热琼巴所传的教法后来在洛绕一带长期传承不断，但是没有能形成一个支派，这主要是因为他只注重密法修炼，而不注重教法传承的缘故^④。1161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注：①见《青史》藏文版522—523页。

②同上①

③见《土官·宗教流派》刘立千译本，63页。

④《西藏佛教史略》王辅仁著，140页。

绛曲格哉

(1084—1167)

绛曲格哉，是藏传佛教噶当派修持密法的高僧。他是西藏阿里地方人，幼年出家习律，从聂译师等学《般若》和《慈氏五论》。以后师事阿底峡的弟子，热振寺第三代堪布袞巴哇的弟子内邬素巴，学习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公元1118年内邬素巴逝世后，曾从甲域哇（1075—1138）学法，后在达坚寺常驻，最后在那里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贡噶宁布

(1092—1158)

贡噶宁布，是藏传佛教萨迦派创始人贡却结保之子，为萨迦五祖之首。其母名玛吉尚姆，幼时随父学习写读并听文章讲经。十一岁时其父去世，其母将萨迦寺住持职位交给喇嘛巴日译师（1040—1111，名为仁钦扎）代管。贡噶宁布除向巴日译师学法外，《土观·宗派源流》说他“又从章德·达玛宁布学《对法》，从穹·仁钦扎与麦浪译学《中观》与《因明》，从朗卡乌巴昆仲学《集密》及《大黑天》等密法。还从吉曲巴·扎拉拔和贡塘巴学习《喜金刚》、《胜乐》及《帐明王》等。特别是从向敦听其《亲口教宝》的教授历时四年。”另外“天竺成就大德昆缚巴为其上门传法重到萨迦，共传他有七十二种本续要门，别传十四种不出寺围的甚深法要。”尤其是他饱享《亲口教宝》（即指萨迦派的最高宝法《道果》教授）的近传之后，又吸收各种显密教法之长，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道果教授法”，这样对萨迦派的教理系统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萨迦派的人尊称他为“萨钦”（意为萨迦派大师），尊列为萨迦第一祖。

萨钦贡噶宁布二十岁起任萨迦寺的住持，共47年。公元1158

年去世，享年六十七岁。

萨钦贡噶宁布的所有著作收入他的全集中，分两函。德格印经院藏有此书。

杰 贡 钦 波

(1090—1171)

杰贡钦波，是藏传佛教噶当派善长于修定的高僧，仁进岗寺的创建者。他的本名叫匈奴扎巴，因他出生于杰拉囊族，且又以修持而著称于当时，故被称为杰贡钦波（意为杰家族大修行人）。

他一开始就从内邬素巴学法，特别重视学习修定，他也曾从甲域哇弟子学法。后在加麻地区仁进岗地方建仁进岗寺，寺僧约800人。这一个寺也一直以传承内邬素巴的修法和密法为主。1171年，杰贡钦波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东敦·罗追扎巴

(1106—1166)

东敦·罗追扎巴，是藏传佛教噶当派创始人仲敦巴后世弟子，该派著名高僧，著名的纳塘寺的建造人，所以也称纳塘巴·东敦·罗追扎巴。

他从噶当派高僧夏尔哇巴学经。夏尔哇巴去世以后，他从1141年到1152年共十二年时间在后藏扎什伦布寺东南约一日里程的纳塘（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县曲美区）附近讲经说法，聚集了很多徒众。1153年，他在该地创建纳塘寺。寺院建成后，他住持该寺，专门宏传律戒（主要是喀且班钦释迦室利的律学）和噶当派教法而著名。1166年去世，终年六十岁。

十二世纪初期，幼时在纳塘寺学习法相学后成为大学者的君丹热赤（君丹日贝热赤）和卫巴罗色桑杰恰等把散在西藏各地（一说是本寺搜集的）大量藏译经、论，整理编纂为甘珠尔和丹珠尔一套完整的大藏经。公元1731年，由颇拉索南多杰（即颇罗鼐）任施主，刻了甘珠尔100函的印板，此后继续刻了丹珠尔225函的印板。该寺还保存有其它很多古文物。

帕木竹巴

(1110—1170)

帕木竹巴，全名为帕木竹巴·多吉杰波，也简称为帕竹·多吉杰波。康区金沙江流域的哲垅乃学地方人，属韦哇那盘托家族。他是噶举派帕竹噶举的创始人。

帕木竹巴，“七岁即开悟慧，九岁在甲奇寺从堪布林额元吐苏楚逞和阿闍黎林额畏色嘉措（意为光海）出家，取法名多吉杰波（意为金刚王），未从师学即娴文字绘画。在康地曾依大德16人，亦曾宣讲《入行论》等论典。十九岁时，他到了前藏，在堆隆从嘉玛瓦和卡巴却季僧格闻法。二十五岁时，以顺浦甲杜为亲教师、嘉玛尔为轨范师、阿尔为屏教师，受具足戒。从亲教轨范二师学律学，从屏教师学《现观庄严论》、从娘镇（在拉萨色拉寺西边，噶当派古庙。这里娘镇可能是指娘镇颇翁喀巴，他是噶当派普穹瓦的弟子）学《入行论》，遂成博学之名。”（见《土观·宗派源流》）

后来，又依玛尔·却吉坚赞、大吉祥瓜译师、萨钦贡宁（即萨迦初祖贡噶宁布）、降森·达瓦坚赞等广闻诸显密教授。到了1152年，他到岗布地方参拜达波拉结，得其教授，特别是传给他《俱生和合法》的大印法门，顿然契悟大印法门。他感到昔日所

学诸法皆是表皮。从此，他便拜达波拉结为“根本上师”，同时他也就成了达波拉结最著名的弟子。

1158年（宋绍兴二十八年），他到现在西藏桑日县境内的帕木竹地方，修建了一座小寺，即后来著名的丹萨替寺，他一直住在这座寺里。所以，人们称他为帕木竹巴。从他开始的这个支派也由此而得名，简称帕竹噶举。从此，帕木竹或帕竹就成了地名、人名、教派支系名和以后出现的帕竹家族名、地方政权名五位一体的名字了。

帕木竹巴，“自许为是和释迦牟尼共一体性”。“他的及门有成就的俊彦不可胜计。常有弟子八百人，执伞盖者五百人。此中入室弟子有诚敬第一的达隆塘巴·扎西贝、证悟第一的林惹·白玛多吉、智慧第一的柏浦·罗追僧格、咒力第一的青堡·嘉热。以上为‘四大第一’的弟子。”（见《土观·宗派源流》）还有“四大教授”弟子、“四大心传”弟子等。1170年，帕木竹巴在丹萨替寺圆寂，他的弟子达隆塘巴、止贡巴、白玛多吉等分别在康藏各地建立寺院，传法授徒，自成体系，遂形成了八个小支派。其中达隆噶举和止贡噶举两个支派，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

都松钦巴

(1110—1193)

都松钦巴（“都松”意思是三时，或译三世；“钦巴”意思是知者），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四大支系之一噶玛噶举的创始人。《红史》说他“出生于多康哲雪岗吉热哇地方，家族为达东噶波氏，父亲贡巴多贡布，母亲拉明色玛，他俗名格培，十一岁时祈请父亲授吉祥天母法，修行之时，亲见吉祥天母，征服鲁如之魔鬼。十六岁时，在噶扎寺中随从堪布乔拉大师恰森格扎出家，取法名却吉扎巴”。 “继在阿底峡的弟子约却旺及其弟子扎惹哇两昆仲座前，听受了阿底峡所传的‘胜乐灌顶’和许多密修法，及不动如来等许多阿底峡所传法门。十九岁时到了卫部（前藏），二十岁去到堆隆色塘地方，依堆隆·嘉玛哇、卡巴·却吉僧格学“弥勒法”及“中观”、“因明”等，已得精进。又从夏惹瓦学噶当的“道次第”，从巴曹·尼玛扎译师学“中观”，从墨杜增受具足戒并学律学。”（以上见《土观·宗教源流》）。“都松钦巴三十岁时，拜见杰达布仁波且，逐次祈请授一切灌顶教诫，依次证悟拙火定”。在岗波苦修三年，成为八百僧人中著名的苦修者。又去后藏东布地方拜见了米拉的几位弟子，

祈请顿格楚二兄弟、顿茂日巴、宾普巴、加洛邦康巴、谢巴热加等人传授教法，他还到盆域甲桑扎拜见精通幻化的岗波，到蛮地任部落首领的受供喇嘛，此后又返回请求热琼巴传法，在尼木地方依上喇嘛宗巴，向喇嘛比若、成就者贝增、贝喀罗（吉祥喀译师）和成就者阿僧等入学法，住在许地方朱赐寺。此后在卫藏三十年，其中17年闻思，12年修行。又按达布叔侄之授记，五十多岁时至多康，五十五岁时居于岗波圣地，给卫藏地送来50头犏牛驮的茶叶等布施。七十四岁返回藏堡召集一千僧人，于达麦罗乌如地方建噶玛寺（按：又称噶玛拉顶寺，或称噶玛丹萨寺，在西康类乌齐境，噶玛噶举遂由此寺而得名，遂成派名，时在公元1147年）。曾多向上师的各个法座奉献大量财物，又经珞巴到卫地，建堆垄祖卜寺（地在拉萨西北堆垄地方，时为公元1187年）。调解查巴和喀热两宗族之间的纠纷，并亲见沙乐和麦智巴和米拉等尊者，他有无数奇特之事迹，使无数僧徒成熟解脱，遵循喇嘛米拉一生之教言执事，于八十四岁土牛年（1193年）虎月三日圆寂。”（以上见《红史》）。《青史》说他撰有《方便道直观教导》流传于世。

从都松钦巴开始的噶玛噶举派，是藏传佛教各派中最早采取活佛转世制承袭的，而且也是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今的一个支派。

杰擦与袞丹

(1118—1195) (1148—1217)

杰擦，又称仁波且杰擦，与其弟弟袞丹（1148—1217，又称袞丹热巴）都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帕竹噶举创始人帕木竹巴的弟子，绰浦噶举的创始人。

杰擦是后藏日喀则的西南夏卜地区的皆地方人，属于努氏家族。他五岁时学习藏文和书算。幼即勤想于学法，十九岁之前从多师广学法要。十九岁时，他去前藏寻师学法，遇布让译师之亲弟子玛·却吉杰布，拜为上师。以后遵玛·却吉杰布之嘱，往朝帕竹，从师于帕木竹巴，“闻其教授，生起大手印的特殊证悟。”到1171年，他遵帕木竹巴之意，回乡传法收徒。同年受比丘戒，时年五十四岁。后买到绰浦地方的地基一块，建寺收徒，此寺名绰浦寺，本派即以此寺而得。1195年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袞丹，又称袞丹热巴是杰擦的弟弟。杰擦在帕竹学法时，他为其兄送粮至帕竹寺，适逢帕竹为徒众正讲米拉日巴尊者的故，听后遂立志欲效其所为，就留寺学法。蒙帕木竹巴大师传与教授，以之修习，得殊胜“证悟”，成为一个大成就者。不久当地遇到荒年，发生了饥馑。传说，袞丹立绰浦寺大殿前，以禅杖击

殿门而作语说道：“诸瑜伽母，今天请赐给瑜伽士一点布施吧！”语毕，即由大殿门隙中流出很多青稞，地方民众，咸来领取，放赈五天，青稞还未流完。这样，袞丹又以有“神通”称著于当时（见《土观·宗派源流》）。1217年袞丹去世，享年七十岁。

向 蔡 巴

(1123—1194)

向蔡巴，全称为向·卓卫贡布·玉扎巴。“向”是家族名。“卓卫贡布”是尊号。“玉扎巴”为其别名。他的本名叫尊追扎，是达波拉结的法嗣，藏传佛教噶举派四大支系之一蔡巴噶举派的创始人。

向蔡巴是西藏拉萨附近吉雪（蔡巴竹）地方人，其父是修习密法的僧人，幼时曾听父讲轮回、地狱之苦，便随其做转经活动，希望能摆脱痛苦。所以从小就学习藏文。《土观·宗教源流》说：“从九岁起至十八岁间，博闻显密经论，二十六岁（1148年）受具足戒，名号尊追扎。从瓜译师广学教授，旋谒达波拉结弟子岗布瓦·楚臣宁布（系达波拉结之侄，达波死后他继承岗布寺的法座）听受大手印法门，得噶举传承加持，契证自心实相。”1175年（宋淳熙二年）他在拉萨蔡谿卡（这个庄园在拉萨附近的贡塘地方）的贵族噶尔杰哇琼乃的资助下，建立了蔡巴寺，此派即以该寺名而得其派名。

据说，他在建寺的过程中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常常去抢掠他人的财物，并肆意勒索周围的僧俗居民，因此经常和别人进

行武装械斗。《土观·宗派源流》中说：“他可能考虑到时事的需要，曾多次挑起战乱。有些凡俗世夫认为他在造作恶业。”但是，他自己解释他自己心中全无俗念、无善恶、无生灭的境界，他和人械斗，抢掠他人财物，都不是为了自己，而完完全全是为佛法。言外之意，他那样作不仅是无罪的，而且是有“功德”的。后来，西藏佛教信徒，不但不责备他，而且还欣赏他那所谓一心为教的精神，甚至把他和帕木竹巴·多吉杰波及宗喀巴大师，合称为藏地的“三宝”。这除了藏传佛教以外，任何佛教派系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1187年，向蔡巴在他的弟子们帮助下，又在蔡巴寺附近建立了一座贡塘寺。到了晚年，“他接受了都松钦巴的劝告，不再作乱。曾于七处现七种身，所以得七种号称，凡有所指示鵝面护法皆遵命而行。尔后作了很纯白善业，当二利圆满时”，遂于1194年圆寂。终七十一岁。

向蔡巴“摄受弟子不少，为首的有南喀沃（虚空光，系向蔡四大弟子之一，在桑耶西面的扎甲建邦雄拉日喀寺，从此发展蔡巴支寺甚多）、卡绕巴都瓦沃（律光）、拉却巴·尼达沃（日月光，为贡塘寺第四任座主，建拉却喀寺）、止绕·释迦沃（释迦光），此四人为向蔡巴的著名四大弟子，分建四寺。都瓦沃在卡绕建鲁都寺，据说在他的弟弟住持此寺时，曾拥有徒众万余人。”

在向蔡巴逝世后，这一派的宗教活动由蔡巴寺和贡塘寺这两寺的堪布主持。堪布一职由师徒相承，或由徒众推举产生。贡塘寺的住持自达玛扎后，有娘麦·释迦益西（释迦智，贡塘寺座主第二任）、释迦后为阿闍黎·绛耶（菩提智，第三任座主）、拉却巴·尼达沃（第四任）、桑吉本（觉亿，第五任）、桑结宁布

(觉藏，第六任)、桑结热巴(第七任)、色康顶巴(金殿首，第八任)相继为住持。此外，还依次出现了玛巴沃(系蔡巴法统)等对宏扬宗教方面有所建树的人，这些便称为蔡巴噶举系。

另外，蔡巴与贡塘两寺的实权被向蔡巴的侍者达玛匈奴掌管之后，即达玛匈奴一家的后辈叔侄相承。到了1268年(宋咸淳四年)时，蔡巴·桑结额珠(觉悉地)继承，被元朝封为万户长，遂名正言顺地掌握了这一万户的政教两权，成为当时前藏三大万户之一(其余两个为帕木竹巴和止贡万户)。到了十四纪中叶，桑结额珠的玄孙贡噶多吉继任万户长时，此人曾编纂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的目录而名声大震。到了明代，这个教派随着蔡巴领主的失势而衰微，“诸大佛寺皆被火毁，现今仅存留有塔像经书和护法殿堂等而已”(见《土观·宗派源流》)。黄教兴起之后，该派寺院皆改宗黄教属寺，此派从而绝传。

林热·白玛多吉

(1128—1188)

林热·白玛多吉，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四大支派之一帕竹噶举派创始人帕木竹巴的弟子，主巴噶举派的创始人。他是后藏娘堆（年楚河上游，后藏江孜一带地区的古名）地方人，属“下林”家族，故称林热。

他九岁学诵读，十三岁即精通所学。十七岁从阿阇黎林热受近事戒，并从其学法。当时有一个曾和他家作对的官员，家道突然衰败下来，生活穷困，人们以为是林热·白玛多吉使用咒术的结果，林热也因此成为著名的咒师。后来，他又跟随翁塘巴学密法，被一位名叫曼摩的女人所勾引，林热遂破戒，与其结为夫妇。他们夫妻遂双双着布衣修法，但无证验。

1165年，他三十八岁时，入拜帕木竹巴之门。据说帕木竹巴一向是不喜欢有妻室的瑜伽行者，然而对林热·白玛多吉则特别喜爱、器重，遂授以密法口诀，林热居静专修，获得证悟，述其所悟于帕竹，帕竹甚喜。《土观·宗教源流》说，他入帕竹之门后“听其（指帕竹）讲解引导而修习之，仅三日则得高深之证悟。将其所悟求证于师，卓卫贡布（帕竹）亦深加赞许。”到1166年

他居帕竹，帕木竹巴命他抛弃其妻子，他把妻子送到一个叫雅库地方安置下来。他回到丹萨替寺不久，又在该寺附近桑日地方寻找了一位妇女一起修“大手印”密法，不久这个妇女又被他遗弃。他便到康区一带去云游。

1170年帕木竹巴逝世后，他便云游卫藏，曾帮助蔡巴噶举的向蔡巴打过仗，获得了大量财富。他把财富的一半留给自己，另一半帮助向蔡巴造了一尊大佛像。又把获得的全部佛经送到丹萨替寺。晚年，在那浦寺收徒传法，广作利生之事，直到去世。

林热·白玛多吉的著作有关于密法修证经验的书约有五、六种。

索 南 孜 摩

(1142—1182)

索南孜摩，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二代祖师。《土观·宗派源流》说：“索南孜摩大师从恰巴却吉僧格学《中观》和《观庄严论》七年。至十六岁，即已透澈通达诸本续和要门。亲见各种本尊，继承法座。”他十七岁时，把萨迦寺住持让给自己十三岁的弟弟杰尊扎巴坚赞，自己去前藏学法。二十六岁时，写了一部《佛教入门》的论著。关于他是否当过萨迦寺的住持，有两种说法，在德格版《萨迦世系史》236页5行至329页6行的辨析中，认为他没有当过萨迦住持，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因为其弟扎巴坚赞自十三岁接任住持之后，在他死后一直担任住持。

索南孜摩在传授萨迦教法和发展教徒上是有作用的，《土观·宗派源流》说他“为众多弟子宣讲《亲口教宝》（指《道果法》）教授，随学于此派的日益众多。”索南孜摩大师的著作编为全集，共计13函，德格印经院有此版本。

达垅塘巴扎西贝

(1142—1210)

达垅塘巴扎西贝，是帕木竹巴的弟子，帕竹噶举八小支派之一达垅噶举派的创始人。“达垅”是地名，在今林周县旁多区之西。1180年修达垅寺。

他是朵康羊雪邦若登地方人，其家族名告斯（一说扎斯征波）是，鲁格支系。幼年丧母，不为继母所容，几次想出家为僧，都被其父所劝阻。他十八岁（1159）到塘迦拉康地方，从噶当派高僧堪布拉冈巴·喜饶多吉出家作沙弥，取名扎西贝。从师学习显教经论及噶当派教法。“数次欲住天竺，行时为家人所阻”。后来，“慕帕竹之名，年二十四时，游于帕竹之门，作帕竹侍者，受到上师的青睐，遂将所有教授都传授给他。一次他闲游于替寺（‘替’是地名，也是寺庙名，此指丹萨替寺。寺在泽当过江的东北，属桑日县境），寺侧草原，因坐其处便入定，进入三摩地生起殊胜证悟。正逢卓贡（指帕木竹巴）也来到那里，用禅仗指他的心间说道：‘我们祖师那若巴说：当修诸法自性空而无我，即在此无我之中同时兼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名四无量）和诸方便法门，这才是获得无住涅槃之道’。他由于得此深广指示，心

中便生起‘大手印无修瑜伽’。”（见《土观·宗派源流》）。

帕木竹巴圆寂以后，他又去墨竹（即墨竹工卡）从怯喀巴学噶当派教授，从向夏热瓦受比丘戒。年三十九岁（1180）受达尔、扎、绒和旁多（达即达域，扎即扎丁，绒即学绒均在墨竹工卡和林周北面，旁多即今林周县彭波区）等地的人迎请至达垅。他遵师预记，在此建寺，遂成有名之达垅寺，达垅噶举支派的名称即由此而来，他本人也因此被称为达垅塘巴。

达垅塘巴扎西贝自出家以后，足不入俗舍，戒晕酒，亦不以酒食酬应，凡寺宇内院不许妇女进入，所定的戒律守则非常严格。他有弟子3000余人，在当时达垅寺僧人以戒行清整而著名。他本人被认为是“最有德行”的高僧。

1210年，达垅塘巴扎西贝在达垅寺圆寂。由其侄温·仁钦贡布（宝怙，别名古耶仁钦贡）继承法位。此人曾营建大佛殿，并建分寺多处。达垅寺堪布传到第九任扎西贝孜（1359—1424）时，曾被明成祖封为国师，赐银印诰命。

止贡巴仁钦贝

(1143—1217)

止贡巴仁钦贝，是帕竹噶举八小支派之一止贡噶举的创始人。他是西康邓玛（今四川邓柯县）人，属于“居热”家族，所以有的书上称他为“居热大师”。

止贡巴仁钦贝的家，世代传习宁玛派教法。在他幼年时，家乡邓柯一带遭到自然灾害，他就到康区南部给人家念经维持生活。后来闻知帕木竹巴之名，遂去丹萨替寺从帕木竹巴学法，“得其教授，心生智慧，现见诸法真实之义。”后来，“曾患癫痫，修大悲心。见龙魔及其眷属均离身而去，于是得愈。”“二十五岁时以杜托巴（或称向·松托巴，帕竹弟子）为师，受具足戒。三十七岁去止贡寺（系帕木竹巴弟木雅贡仁创建的一个小庙），后逐渐扩建寺宇”，取名为止贡替寺。后来便成为西藏著名寺院之一。止贡巴的名字就是由他建止贡替寺而得来的，所传的教派也就被称为止贡噶举，他亦就成为该派的创始人。

止贡是一个很富庶的地方，它处于农牧业交叉的地带，又是康藏交通的要道，商贾来往很多。《土观·宗派源流》说，止贡替寺有一次举办法会止贡巴大师说法时，“听法徒众就达五万

五千五百二十五人。某次安居，比丘受着筹者达十万人，名声遍于南瞻部洲。”

止贡巴仁钦贝的主要论点是：认为僧众是佛教的根本，而戒律又是僧众的根本。他自己严持戒律，不饮酒食肉，徒众效之，所以声名著称于全藏。他有很多弟子，其中有号称“京俄”的四位，有号称“巴钦”的十二位等。这些弟子也曾分头在各地建寺收徒。而止贡替寺，则由其家族（居热家族）掌管。在止贡巴死后的三、四代，他们的职权只限于宗教方面，还没有管理当地地方行政事务。到了元朝初年，朝廷分封西藏地方势力——分封13万户时，止贡为前藏一个万户。这时居热家族的成员多吉札，既是止贡噶举派的首领，又是地方行政的主持人——万户长。

止贡噶举在西藏佛教界有一定的地位，止贡万户在西藏地方13万户中，是实力比较强大的，加之又有元世祖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的特别支持，止贡万户长的头衔又高于一般万户（指止贡万户和萨迦本钦都有过宣慰使的头衔，是为元朝宣政院所属地方职官品级最高头衔）。到了十三世纪晚期，止贡常与萨迦派发生纠纷，发生战争。1290年萨迦本钦阿迦伦调集了几个万户的兵力，并奏请忽必烈派兵进藏，才打败了止贡噶举的武装力量。在这次战争中，止贡替寺被焚毁，藏史称为“林变”（即寺院事变）。从此，止贡势力大大衰落，但在宗教方面，仍然有一定的影响，一直延至解放后。

扎巴坚赞

(1147—1216)

扎巴坚赞，是藏传佛教萨迦派始祖贡噶宁布的第三子，是萨迦派第三祖。他八岁至十二岁跟着父亲学法甚多。《土观·宗派源流》说：“他从绛森达瓦坚赞大师受梵行勤策戒，不食荤酒，严持戒律”。 “年十一岁，他就能讲海生阿闍黎所说《喜金刚》，深得要领，听者都非常惊异”。十三岁其父去世，其兄索南孜摩让他当萨迦寺住持，直到七十岁，共57年。他在任住持期间，曾住持修建萨迦旧寺大屋顶佛殿及金汁书写甘珠尔。把人们所布施的财物，全部用于造佛像、佛塔或者又布施穷人等善事。他去世以后，除了一个坐垫、一套袈裟之外别无他物。享年七十岁。他的著作编为全集，共计四函（以上见《红史》注释266条，民族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

藏巴嘉热·益西多吉

(1161—1211)

藏巴嘉热·益西多吉，是藏传佛教帕竹噶举八小支之一主巴噶举派创始人林热·白玛多吉的上首弟子，中主巴支派的创建者。他是后藏娘堆人，故称藏巴，“嘉热”指嘉氏家族能穿布衣御寒的人。他幼年时期，其父母因孩子多（他共兄弟七人）就把他托养在一苯教徒处，那苯教徒给他取名雍中白。“十二岁时父亲将他放置兄处，学法甚多。十三岁削发名喜饶白。后从喇嘛向（即向蔡巴系的始祖尊追扎）出家，又改名为益西多吉。”（《见土观·宗派源流》）。十五岁起，他从喀尔奎巴学宁玛派的大圆满法和《量证》等显教经论，共住八年。其间，他也曾从其他人学过《大幻》、《大悲伏藏》、《真实名经》（即《文殊师利真实名经》）和阿底峡所传的《大悲法》以及《入行论》等经论。

“当其二十二岁时，正遇吉准·林热巴（即林热·白玛多吉）住在热隆寺，与之相见，仅以盐一升为贽见，请问法义甚多。后去卫地（前藏），在那浦又重遇林热，学了《六法》及《俱生和合》等教授，只修七日，即能胜得起着单布衣。冬天用泥封门静修，能将内外风息合为一致，可以穿墙无碍，得等虚空的明空三摩

地。据藏取出热琼巴所埋藏的六种《平等一味法》。遵喇嘛向所预记，建隆多寺(时在1192年，宋绍熙三年)。又遵本尊所示建热隆寺(地在后藏江孜东面)。遵林热所示建主寺(“主”藏语意为雷)。当初建此寺时，雷声霹雳而至，因此该寺遂以雷为名，此系所出的法嗣则称为主巴噶举系。传说聚有弟子约5万人，教化甚广。说他是那若巴的化身。主巴法嗣非常广泛，约灵鹫飞十八日路程的面积。谚语说：“藏人半为主巴，主巴半为乞士，乞士半得成就”。此语风行全境。”(见《土观·宗派源流》)

藏巴嘉热·益西多吉经常告诫他的徒众们：不要以世俗事务来扰乱修道之心；要时刻想到为法人为他人牺牲自己，要尊敬师长。他于公元1211年去世，享年五十一岁。他这一派先以“主”寺为主寺，后来以热隆寺为其主寺，由热隆寺传承下来的，称为中主巴。藏巴嘉热的弟子中最大者初期大弟子有巴姜二人(按，巴，是巴日瓦，建巴日绛曲林寺；姜，是姜真喀巴，建姜莫喀寺。二人均因寺得名)；中期大弟子有嘉哲二人(嘉，是嘉雅巴，在绛地建嘉热寺；哲，是哲莫瓦，在娘堆建哲莫寺。二人也是因寺得名)；后期大弟子有洛郭二人(洛，是杰瓦洛热巴；郭，是郭仓巴)。以上六人中以后期大弟子洛郭二人(上主巴和下主巴的创始人)为最著名。其他还有众多门徒。

却 门 朗

(1169—1233)

却门朗，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帕竹噶举八小支派之一雅桑噶举的创始人，雅桑噶举的主寺雅桑寺的创建者。

帕木竹巴的弟子格丹益西僧格（门阙人），幼年为人牧羊，后从帕木竹巴学法，及有“证悟”。后于札饶地方建索热寺，聚有一部分徒众，却门朗就是徒众之中最优秀者。却门朗是藏协地区玛尔木地方人，属于努氏家族。他幼年出家，先向噶当派僧人怯喀巴学噶当派的教法和戒律。1186年，他十八岁时从嘉律师受比丘戒，后苦研律藏达五、六年时间。以后听说格丹益西僧格是帕木竹巴的重要弟子，就去到索热寺从他学噶举派教法，拜他为师，师徒二人相处很好，情感很深。以后又到各地求师学法，到1199年，他三十一岁时，又回到了索热寺，在该寺修习密法。1206年，他在山南乃东县西南雅桑地方建雅桑寺，由此寺名而有雅桑噶举派名。第二年（1207年）他的老师格丹益西僧格去世，却门朗就把徒众牧罗到自己门下，势力发展很大。特别是自却门朗建雅桑寺以后，山南各地的封建主常常请他去主持法会，他的活动范围也就随着扩大起来。如他在洛扎地区前设立过45个法

座，在洛喀设立过47个法座，声名和影响都很大。他的徒弟们也分头在各地建寺收徒传法。

1233年，却门朗去世以后，雅桑噶举和当地地方势力相结合。元世祖在西藏分封万户时，雅桑是13万户之一，其势力虽然不大，但却很活跃。十四世纪中叶曾和止贡、蔡巴两万户联合起来，与帕竹为敌。到1349年前后，帕竹绛曲坚赞把雅桑万户灭掉。雅桑地方势力衰亡后，雅桑噶举的教法也逐渐消亡失传了。

楚臣喜饶

(1173—1225)

楚臣喜饶，即绰浦译师，又名强必贝（见《布敦佛教史》）。他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帕竹噶举八小支派之一绰浦噶举（又译作超浦噶举）创始人杰擦和袞丹兄二人的侄儿。绰浦译师父名觉彭，母名斯摩色吉。师六岁开始学念诵，八岁从杰擦学法，十岁时杰擦和袞丹二人作堪布阇黎为他授沙弥戒，取名强必贝（意为慈氏祥）。从十一岁到十六岁他从名僧藏噶学习显密经论，能解经义，善于辩论。到十九岁时，师从向格哇学习梵文，渐能译经，就在这年，他受了比丘戒。受戒以后，他又从藏那尊追僧格学戒律两年。二十一岁从袞丹学洛若热巴所传的方便道。“杰擦、袞丹二师为他讲授一百三十六种不同宗规的教授和十三种语旨。”1196年他去尼泊尔，从班智达佛陀师利（印僧）广学显密经论。在那里遇到了弥扎佐格（尼泊尔僧人，又译作弥陀罗交基），1198年他把弥扎佐格迎请到绰浦寺，讲经传法18个月。以后他迎请佛陀师利来藏传法，在聂地传法时，绰浦译师作翻译。前来听法的僧俗人众很多，这些人供养佛陀师利黄金共有300两。他们返回绰浦寺以后，绰浦译师和佛陀师利就用这些金子请人制造慈氏大像。

1204年，绰浦译师带弟子从印度的吠琉璃集市地方，迎请印僧释迦室利（此人是印度那烂陀寺最后一位座主）进藏传戒。释迦室利北至热娘，南到洛扎等广大地区，周游传法传戒律，绰浦译师一直跟着做翻译，十年之间，在戒律传承、显教教义和因明学说方面都留下了很大影响。西藏佛教史称其为“上路律统”的开创人。

绰浦译师先后迎请了三位印、尼班智达进藏传法，扩建绰浦寺，塑造葱氏大像，像高八十肘。这样，使绰浦噶举这一派在当时也有了相当高的声望。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在他的《宗派源流》中说，绰浦译师“饶益众生和宏扬佛法的德业不可计量。”

1225年，绰浦译师在前藏去世。他的后代森巴钦波继承了绰浦寺的事业。森林钦波的弟子是羊孜巴仁钦僧格。羊孜巴的弟子就是著名的布顿仁钦朱。

绰浦译师所说法门有《九字要门》、《三四一十二种心言》、《大手印九义》等。所成立见宗方面的理论，又纯是噶举大印之见。此外绰浦译师的《百种要门》，其中收有释迦室利为四方大众所开示的散论，金刚座寺座主腻迦楞伽提婆所传之《解缚论》，论中所谈见解，亦与大印相契合。

萨班·贡噶坚赞

(1182—1251)

萨班·贡噶坚赞，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藏族史上著名的学者、诗人。1182年（宋淳熙九年）出生于后藏贵族昆氏家族。原名贝丹顿珠，幼年从伯父扎巴坚赞尊者“尽学萨迦先祖所传口教精华甚深显密要旨”，并从受近事戒，取名贡噶坚赞。

1204年，他二十三岁，从在藏的克什米尔高僧释迦师利跋陀罗“及其弟子僧伽师利、苏古达师利（妙逝祥）、达那尸罗（施戒）等学《声明》、《量论》等大五明，学诗学、藻词等小五明，对此十明全部学习得到精通。”（见《土观·宗派源流》）。因而得到了“班智达”（即通达大、小五明者）的称号。“萨班”就是萨迦班智达的称号。1206年，他年二十五岁，从释迦师利受比丘戒。同时，依印藏佛教徒的习惯，萨班取其师名的一部分，即以师利跋陀罗译为藏文贝桑波加在他名字的后面称贡噶坚赞贝桑波。之后，萨班又从释迦师利广学显密教法，声誉渐隆。《土观·宗派源流》说：时萨班“造因明的《理藏论》及《三律仪差别论》，尽破当时之邪说及邪执。复于吉宗（吉隆宗，现属日喀则行署）时以正理破南天竺因陀罗为首的外道六敌，使皈信佛法，

因此美声名誉，遍于大地。”土观这段话是指当时有印人绰杰噶瓦等六人（非佛教徒），闻萨班名来藏求晤面辩论。萨班与他们在济咙会面，双方辩论了十三天，绰杰噶瓦等人承认失败，他们都削发为僧，做了萨班的弟子，从此，萨班声名大噪。1216年，萨班接管了萨迦寺的管理权。萨迦派发展到萨班时，已是西藏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虽然它在寺院的绝对数字上比不上噶当派，但是它是“政教合一”的割据势力，直接控制当地政治、经济权力，因此它的实力在卫藏地区是数一数二的，这也是萨迦派和元朝建立联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萨班生活的年代正是蒙古军事力量在中国北方崛起的时期。

到了1239年，领兵驻扎在凉州的成吉思汗之孙阔端，派他的将军多达那波率军进藏，从青海一直攻到藏北，烧毁了公元1056年兴建的热振寺和1012年兴建的杰拉康。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西藏有500多僧俗人众被蒙古军杀死。多达那波在进藏后，发现藏地由各个地方势力割据，不相统属，难于单靠武力进行控制。多达建议阔端选用当地领袖协助进行统治，他说：“现今藏土，惟噶当巴丛林最多，达垅巴法王，最有德行，止贡巴京俄大师具大法力，萨迦班智达，学富五明，请我主设法迎致之。”（见《续藏史鉴》11页）。阔端在处理完其父窝阔台的丧事之后，从和林回到凉州，于1244年又派多达那波和另外一个名杰曼的人领兵去西藏，不过这次没有动用武力，而是带着阔端给萨班的信和礼物，邀请萨班到凉州去和阔端见面。这封信的内容：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萌护助理，
皇帝圣旨。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贝桑布知之。我为报答父母及

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喇嘛，在选择之时选中了你，故望不辞道路艰难前来此处。若是你以年迈为借口（不来），那么以前释迦牟尼为利益众生做出的施舍牺牲又有多少？（对比之下）你岂不是违反了你学法时的誓愿？你难道不惧怕我依边地的法规派遣大军前来追究会给无数众生带来损害吗？故此，你若为佛教及众生着想，请尽快前来，我将使你管领西藏地方的僧众。

赏赐给你的物品有：白银五大锭，镶嵌有六千二百粒珍珠的珍珠袈裟，硫磺色锦缎长坎肩，靴子（连用袜子）；环纹缎缝制的一双、团锦缎缝制的一双，五色锦缎二十四。着多尔斯袞和本觉达尔玛二人赏送。

龙年八月三十日写就。”①

萨班接到阔端的邀请信时，已经六十三岁，要走上从西藏到凉州这样一条艰巨而漫长的道路，可以想象绝不是一种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从阔端来信的口吻来看，不去是不行的，而且时间也不得拖延。于是，萨班作出了决定，携带着自己的两个侄子，十岁的八思巴和六岁的恰那多吉，由萨迦动身，经拉萨前往凉州。他们经历了长时期的旅途生活，最后在1246年8月到达凉州②。1247年初，萨班与阔端在凉州举行了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阔端与萨班会见后，对萨班印象极好。萨班不仅有萨迦派的教主地位，而且佛学知识渊博。据《萨迦世系史》记载，在萨班到达凉州以前，阔端身边已有几个藏族僧人，但是由于他们的佛学知识不甚精通，因此在举行祈愿法会时，是由也里可温（原意为有福缘的人，这里专指基督教教士。元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也

被称为“也里可温教”）和蒙古萨满教的巫师萨满坐在僧众的上首。萨班到凉州以后，在原来维吾尔族僧人向阔端介绍佛教的基础上，使阔端对佛教的教义更加明了，因而阔端下令，以后在祈愿法会上也里可温和尚不能坐在上首，而是由萨班坐在上首，并由佛教僧人首先祈愿。这是有关西藏佛教与基督教接触的最早记载。阔端还特地在凉州为萨班修建了一座幻化寺，作驻锡之所。此外，萨班还是一位精通医道的人，据说有一次阔端身患重病，多方请医诊治无效，最后由萨班为阔端治病，方才霍然而愈。因而更加增进了阔端对萨班的崇敬心情。接着，阔端与萨班具体协商了西藏归蒙古的条件。在取得一致意见以后，由萨班写了一封致西藏各地僧俗领主的公开信，即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萨班在信中首先叙述他到凉州后，如何受到阔端的优待。他竭力赞扬阔端信奉佛教的虔诚，接着就奉劝西藏各地领主，权衡利害，归顺蒙古。萨班指出归顺蒙古是大势所趋，还举例说明归顺者如何得到了好处，拒不归顺者则遭到了惩罚性的进攻，最后还要被迫投降。他劝说西藏人不要以为路途遥远，蒙古人不会进军，因而抱有幻想；也不要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不切实际地准备抗御。总之，无论如何考虑，都以从速归顺蒙古为上策。

关于归顺条件，信中说，西藏地区的僧俗官员和百姓属民都要承认自己是蒙古的臣民，世俗行政事务由蒙古派人来管理，宗教和寺院僧人的事务由蒙古委派萨迦派的领袖人物来主持（这里，萨班已经把自己从一个教派领袖的地位抬高到各教派的总领袖地位）。在此前提下，西藏各地的僧俗官员都可照常供职，而由蒙古派出的官员对他们重新加以委任，给以达鲁花赤（指蒙古管理军民事务的高级行政官员）的名义。凡是愿意归顺投降的，都要造三种表册，一是地方官员的姓名，二是百姓属民的数字，

三是缴纳贡物的品种数量。三种报表都要写成三份，一份送阔端，一份送萨迦，一份由各地方官员自己保存。一定要在文字上写清楚，谁是归顺了的，谁是没有归顺的，以备将来蒙古军队进到西藏以后加以区分，凡是归顺了的，就会受到保护；凡是沒有归顺的，就是讨平的对象。

从萨班的这封信可以看出，通过阔端和萨班的谈判确定了如下前提：西藏是蒙古汗国的属地，西藏的僧俗官员和百姓都是蒙古大汗的臣民，都是履行作为蒙古属民应尽的义务，萨迦派在西藏佛教各教派中占据领导地位。历史表明，自十三世纪四十年代起，西藏地方即已处于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

1251年，萨班和阔端先后卒于凉州，据说萨班的肉身灵塔建造于他生前驻锡的幻化寺中。萨班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以六十三岁的高龄，长途跋涉数千里，不避旅途艰辛，不计个人安危，毅然前往凉州，建立起西藏地方与蒙古王室之间的直接政治关系。经过萨班的努力，蒙古对于西藏地方基本上没有进行军事征伐，由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西藏地方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保证，藏族的封建经济也由此而得到持续发展，这些都是符合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萨班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竭力说服持种种不正确见解的人，将自己的晚年献给祖国统一的事业，这些又都是顺应了当时全国历史发展总潮流的，因而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我们还应看到他既是一个西藏封建领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又是一个西藏佛教的领袖人物，他的所作所为，无疑是为了维护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

萨班一生著述甚多，其中在西藏佛教界著名于当时并影响后世的有三部：一、《三律仪论》，主要是评述印藏当时及以前各佛教派系的是非，阐述他自己对佛教的见解的一部书，该书一直

为萨迦人必读书之一；二、《正理藏论》，主要综括陈那因明主要著作《集量论》和以《量释论》为首的法称的七部因明著作的内容，而用他自己的认识论和逻辑理论体系所写成的一部书。这部书不仅是萨迦派人学习量论的必读书之一，而且在黄教（格鲁派）兴盛以前在西藏一直是因明方面的一部地位很高的因明著作；三、《萨迦格言》（旧译作《善说宝藏》）共九章四百五十七首格言诗，不但内容相当丰富，而且卓有思想见地。作品的最终目的虽是宣传佛教信仰，鼓吹出世比世间好，只有佛法才是究竟了义，才能解脱出生死轮回之苦。但它对于当时世间的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人民是不同情的，并提出了要“合理征税”的主张，极受人们的欢迎。例如他写道“坏女人坏朋友和暴君，谁会去依靠他们？猛兽出没的森林，有识之士谁肯安身？”“君王不要伤害百姓，要实行合理的征税；芸香树的香汁，取的过多也会枯萎。”这部《萨迦格言》语言清新精炼，所以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影响很大。十五世纪末的黄教喇嘛索南扎巴（1478—1554）所著《格丹格言》和十八世纪贡塘·丹白仲美（1717—1788）所著《水树格言》等，都是在他的影响下写成的。《萨迦格言》还有蒙古文译本，名为《苏布喜地》，长期以来，是蒙古人民所喜读的文学作品之一。汉文也有译文出版发行。

注：①转引自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18页。

②与①同。

杰瓦·洛热巴

(1187—1250)

杰瓦·洛热巴，本名旺秋尊追，他出生于雄地区的扎钦地方，属洛囊家族，所以称他洛热巴。他是藏巴嘉热的弟子，1241年建噶布却隆寺作为主要坐床处，后来即形成噶举派的下主巴系。他就是该系的创始人。

洛热巴六岁时开始学识字，十六岁时曾做了到雄地区传法的藏巴嘉热的侍者。次年又随父到聂塘栋地方，拜见藏巴嘉热。十八岁那年，他到觉莫隆（在今堆隆县境）从拜第堪布^①出家，取法名旺秋尊追（自在精进）。以后，他依止藏巴嘉热学法。不久，他家里派人来叫他回家娶妻成家，他不听从，又跑到藏巴嘉热处，从其学“拙火定”法，能着单衣御寒。在一个秋天嘉热为他受了比丘戒，成为正式出家人。以后，他又学习《律经》、《喜金刚》以及其他密教修法。《土观·宗派源流》说：“此人有六大誓愿，六随誓愿，一胜誓愿，共有守持十三种誓愿的事迹，精修具五能仁教授”。他随嘉热去“主”寺，发了七个誓愿即：不回家乡、不下山、常坐不卧、足不入俗家之门、常作一布单衣、少言谈、每日供“水供”一百零八碗不间断（见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

1211年，洛热巴二十五岁，其师藏巴嘉热去世，他便住到一个山顶上进行苦修苦炼，在苦修时把所遇到的障碍，转为修道的助缘，据说由此，他证到了“很高的境界”和“很深的智慧”。从此以后，他开始收徒传法。1241年，他五十五岁，在雅隆河谷东面建了一座噶波却隆寺，这座寺遂成了下主巴的主寺，据说当该寺举办较大的法会时，参加者达一万人之多。后来，洛热巴还到过不丹，并在不丹的本塘地方，建立了一座塔尔巴林寺，这可能是主巴噶举在不丹建立的最早的寺院。

洛热巴弟子有家族系统的侄子又兼是及门弟子绛仰贡布（妙音怙）等三善巧、咱日热钦等三热巴、阿洛释迦三瑜伽士等，为数众多。其中绛仰贡布著作有觉域法教授的《深义心要》与《十开门》广为推行。洛热巴本人在当时以能施舍、厌离世事、精进、禅定、学识和利众等方面为藏僧所称道。1250年，洛热巴逝世后，由其侄子咱日热巴（即咱日热钦）继位主持噶波却隆寺，事业宏伟，培育弟子也很多，遂形成了下主巴这个小支系。

注：①班第堪布，班第（又译作白地），即羊卓湖西北的北地宗。班第堪布本名扎炯旺秋楚臣（1129—1215），是噶当派大德，1169年建党莫隆寺，专宏传戒律。现属浪卡子县一个区。

郭仓巴·贡布多吉

(1189—1258)

郭仓巴·贡布多吉，“郭仓”为寺名，是贡布多吉所建，在阿里地区的协噶尔附近。贡布多吉继承藏巴嘉热法统，开创了上主巴支系。

郭仓巴·贡布多吉，西藏山南洛扎地方人，初名顿珠桑格。后从藏巴嘉热出家，改名贡布多吉，时年十九岁。他在藏巴嘉热那里住了三年，嘉热很喜欢他，教他修定的方法和归依、发心、四瑜伽，以及止贡派所传的“俱生和合”、“方便导引”、“平等一味”等密法。1209年，他二十一岁时，到“主”寺静修，并从嘉热广闻法义。又征得嘉热的同意，去止贡从止贡巴学习密法。他也曾到热振寺，谒见过达隆塘巴和向蔡巴等人，并向他们学密法。但是他仍然特别敬信藏巴嘉热，不久便又回嘉热处学法。

1211年，藏巴嘉热去世。次年，郭仓巴开始了云游生活，从山南到后藏、阿里的冈底斯山一带都有他的足迹，他还到过克什米尔和印度的闍闍达罗（在今旁遮普邦）等地。他云游七年之后，又回到了热隆寺，当时热隆寺的主持人是藏巴嘉热的侄儿温热·达玛僧格。他遵达玛僧格指教，到拉喀地区修定了三年，之后又

回到热隆寺，从温热·达玛僧格受比丘戒。到了1226年，在后藏协噶尔的郭仓地方建立了寺院，名郭仓寺，并定居于该寺，所以人们遂称他为郭仓巴。

郭仓巴·贡布多吉在佛教方面知识是非常渊博的，他到后藏后又接触到希解派的教法，因此在他的教法中，融合了各教派的教法。《土观·宗派源流》说：“此人有守持十二本尊誓愿和一精进铠甲共十三戒，又有身语意三密的根本誓戒，今生利乐七誓愿，殊胜五本誓愿等，懿行胜事多有不可思议。”

郭仓巴·贡布多吉晚年在后藏又建立了登卓、细扎、绛林、德钦登、巴尔卓多吉林等寺，并分别住在这个寺收徒传法，这几个寺里都有不少的徒众，遂形成了一个派系。1258年卒，享年七十岁。

郭仓巴有很多弟子，其中著名的有十几人，多数是在各地建寺收徒。最著名弟子为杰瓦·羊衮巴（1213—1258，杰瓦为尊号，羊衮是地名，本名为坚赞贝）和邬坚巴（1230—1309）。他曾有《三方域论》等很多论著。

绒·却吉桑波

(约十一世纪人)

绒·却吉桑波，西藏后藏空绒地方人，所以在名前加绒字，其生卒年具体不详。他是藏传佛教宁玛派与苏尔波且大约同时的一位以经典传承为主名僧。

据说绒·却吉桑波从十三岁起，就以通达经典而著名。他会梵文，能译经，除译有密教典籍以外，还著有有关密教典籍的若干注疏和论著。他还写过几部有关藏文文法的书，因此他有西藏班智达的称号。《士观·宗派源流》说：“有黑行阿阇黎（指一印度大德）的转世后身，名为绒·却桑大师（法贤）精通教理，无有伦比。他善于为他人讲述集、幻、心三部的讲解和实修，使传法事业得到很大发展。”

从他传下来的宁玛派密法是以“心品”为主的。这一传承以后发展好似又分成三个系统，一为“心部”，一为“自在部”，一为“教授部”。这三个系统都各有师承，且又互相影响，宁玛派的人把这三个系统的最后一个教授部，称之为“大圆满法”。

“大圆满法”遂成为宁玛派主要的教法（见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

古宇仁钦袞

(1191—1236)

古宇仁钦袞，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帕竹噶举八小支派之一达垄噶举创始人达垄塘巴扎西贝的族侄，达垄塘巴扎西贝逝世后任达垄寺堪布，时年二十岁。

古宇仁钦袞十一岁出家为僧，十三岁到达垄寺，为达垄塘巴弟子，受教修法7年，十七岁受比丘戒，二十岁任达垄寺堪布。他担任堪布以后，最初达垄寺的寺僧多数散去，由3000人减到700人。后来，由于他有教无类，善于为人治病，据说他能使盲者见，聋者闻，各方供施骤增，曾于1228年营建达垄寺大殿，寺既富有，僧众复集。先有2,800人，更增至3,700人，遂兴建分寺数处，最后达垄寺僧众竟达5,000余人。

1236年古宇仁钦袞逝世，终年四十五岁。

噶 玛 拔 希

(1204—1283)

噶玛拔希，本名却吉喇嘛，意为法师。他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二世活佛，十三世纪前半期噶玛噶举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藏传佛教所特有的活佛转世制度即从此人开始。虽然在名义上他被说成是噶玛噶举派创始人得松钦巴的转世，但他在得松钦巴去世后十一年才出生的。《红史》：“说他出生于康区哲荃丹却秋地方，家族为哉波普氏，称为‘麦多冬齐’。其父为楚查加旺，母亲叫桑仁萨朗吉，他的俗名叫却增。六岁时学识字，九岁至十岁时，对所有经论、典籍浏览一遍即能领悟，遂自然而然地即会修定。他在去卫地（即前藏）学法途中遇见得松钦巴的再传弟子仁波且崩扎巴时，显现许多奇兆，仁波且崩扎巴认为他为得松钦巴之转世，为其灌顶授一切教诫，此后受沙弥戒，起法名达尔玛喇嘛。此后由仁波且噶托巴绛巴本任堪布、仁波且崩扎巴任阿闍黎授比丘戒。”出家后先入噶玛丹萨寺，后到拉萨附近的粗卜寺，逐渐有了名望，成为噶玛噶举派的著名高僧。许多人说他“神通广大”，拜他为师。

公元1253年，忽必烈南征云南大理，看到噶玛噶举在康区势

力较大，派人召他到川西北的绒区色都地方会见。忽必烈要他长期随侍左右，他不遵命，而前往甘肃、宁夏和内蒙等地传教说法。灵州（今宁夏灵武）和甘州（今甘肃张掖）一带都有他的足迹。《红史》说，他栽了一棵树，并说：“等树长大后，我再返回此处。”在宁夏和内蒙古交界处，还有他建立的一座褚囊朱必拉康寺。公元1256年，当他动身返回西藏时，接到元宪宗蒙哥召他前往会见的诏书，他即随使臣们到达和林，受到蒙哥以及阿里不哥的崇信。蒙哥赐给他金印、白银等，据说还赐给他一顶金边黑色僧帽，这就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黑帽系名称的来源。公元1259年蒙哥去世后，忽必烈于公元1260年即大汗位，后来又战胜了与他争位的阿里不哥。忽必烈想起以噶玛拔希不愿留侍身边的旧事，又因噶玛拔希有帮助阿里不哥的嫌疑，于是下令将噶玛拔希逮捕。这一段历史《红史》是这样记载的“王子忽必烈是最初邀请他的人，但他未住彼处，故忽必烈对他不满，他又站在蒙哥汗一边，得到大量奉献。故忽必烈下令对他施行火烧、抛入水中、用兵器砍、喂毒、头上钉铁钉等刑罚，并派人分三班轮流看守，七天不准进食，”云。据说有金刚亥母、四部智慧空行母等神灵的救护，没有对他造成伤害。后来因为“灾异迭生”，估计主要是因为忽必烈考虑到噶玛噶举派影响，才没有杀掉他。《红史》说：“汗王（忽必烈）要他去蛮子地方（指南方，即江浙一带），他请求回西藏，得到汗王同意。到达曲玛城（地望不详）和兴贡（指甘肃临洮，详见《安多政教史》）地方时，二十四宗的全体百姓聚集，祈请修建寺庙，但未建”。只进行传法收徒。“之后逐步返回西藏，居粗卜寺，发展无数弟子僧人”。“怙主八思巴任皇帝之帝师，由朝廷返回西藏（按：时在公元1270年，八思巴升任帝师前第一次返回西藏时），在粗卜寺二人会见，二人法座相平，不分上

下。噶玛拔希对八思巴说：“以前我任蒙哥汗之供应喇嘛时，我看到你是菩萨降世，是多么高兴！”另有一些资料说噶玛拔希先是被流放到一个远离京城的地方后，又获准返回西藏的。

《红史》载：“羊年（公元1283年）1月噶玛拔希开始得小病，3月大地不停地震动20天，示显奇特征兆。羊年9月3日噶玛拔希涅槃。9日火葬后，塑身像，并为他建无数舍利塔。”享年八十岁。

公元1283年噶玛拔希去世后，1284年生于后藏贡塘（今西藏吉隆）的攘迥多吉（1284—1339）被认作他的转世，是为黑帽系第三世活佛。噶玛拔希被认为是第二世活佛。

杨衮巴坚赞贝

(1213—1258)

杨衮巴坚赞贝，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帕竹噶举八小支派之一主巴噶举上主巴创始人郭仓巴著名弟子之一，该派著名高僧。他是后藏拉堆洛的衮巴拉冬地方人，属于冬氏家族。这个家族世代都有宁玛派的著名僧人。他从五岁时，开始学习密法。1218年六岁时，从浦玛尔哇的学习和接触到宁玛、噶当、希解、觉域、萨迦等派的密法，共有三年时间。可能是他这个家族在当地很有势力，使他九岁的时候就当上了拉冬寺的堪布。

他的老师除了郭仓巴以外，还有其他教派的人，如著名的萨迦班钦，也曾当过他的老师。他还从京俄、桑结热钦等人学当时的显密教法。1234年，年二十二岁，他受比丘戒，取名坚赞贝。后来，他建立一座名叫室利日南定的寺院，他在四十六岁那年逝世在这座寺院里。他的门徒很多，据说他讲经，很负盛名，各地僧俗人众来他处听经学经的人多达万余人。他著有几部讲修定的书传世。

邬坚巴仁钦贝

(1230—1309)

邬坚巴仁钦贝，又称朱妥，邬坚巴，仁钦贝是他的原名，后藏人。他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帕竹噶八小支派之一主巴噶举上主巴创始人郭仓巴的著名弟子之一，该派的著名高僧。

邬坚巴仁钦贝的祖先都是修学宁玛派的密法。他在幼年时，也学习宁玛派的“玛摩”等法。1245年（宋淳祐五年），他年十六岁，到博东艾地方从仁钦孜摩学《集论》、《俱舍论》、《量决定论》和《现观小注》等显教论著。他善长辩论。当时郭仓巴（1189—1258）由德钦登去江隆，路经过高隆浦，邬坚巴去拜见他，对他产生敬仰之心。后来郭仓巴到补扎地方时，邬坚巴献给他一把铜茶壶和一块红糖，并愿当他的近事弟子，从受五戒，并从他学习了噶举派的“大印法”。同时，邬坚巴又从高隆地方的多第贝学习戒律。

1249年（宋淳祐九年），他年二十岁，同时受沙弥、比丘二戒，取名仁钦贝。接着，他闭关修法十二年，不饮酒、不食肉。之后，他又从多师先后学习了“时轮金刚”全部教授，以及历算等。又到德钦登寺从郭仓巴学得了噶举派的全部密法。在郭仓巴

允许下他去邬仗那，途经玛域（今拉达克）、克什米尔等地，从当地各师学到不少密法口诀等，因为他到过邬仗那（邬仗那为唐人译音，藏译作邬坚），所以人们称他为邬坚巴。1258年，邬坚巴回到西藏以后，郭仓巴已经去世。他以“未闻遗嘱”为词，给郭仓巴造了几尊遗像。因郭仓巴临终时遗嘱弟子们不要为他造像，邬坚巴还是造了遗像，这说明他与郭仓巴师徒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261年（宋景定二年），邬坚巴又偕徒众多人去印度朝礼金刚座寺（相传释迦曾在此座上成道，座在佛陀迦耶，译言大菩提寺，今印度比哈尔省迦耶地方），相传他在金刚座附近住的时候，印人相信他曾降伏当地鬼神，从此成为有名的大瑜伽师。《土观·宗派源流》说他“在那里得空行母的加持，顿获证悟。”另外，他还懂得医术，常为当地人治病，所以很有名望。他从印度回到西藏以后，又游历了聂地的洛饶、错那、交尔等地。后应元世祖忽必烈之诏，到了大都（今北京），为忽必烈授“时轮曼陀罗”灌顶。不久，他要求返回西藏，忽必烈令他留住大都，他不受命，竟自返藏。所以，他回西藏时，未有任何财物和封号。

1309年（元至大二年），邬坚巴仁钦贝卒于西藏，享年八十岁。他的弟子甚多，其中著名的有五、六人。

八思巴

(1235—1280)

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著名高僧。他无论在藏族史或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都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人物。他一生的活动，对元代政治、宗教、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在数百年中其影响仍及于西藏历史及西藏与内地中央王朝的关系史。

八思巴于公元1235年（藏历第四饶迥阴木羊年乙未，南宋理宗瑞平二年，蒙古窝阔台汗七年）3月6日生于后藏昂仁的鲁孔地方。其父名桑察索南坚赞，母名玛久贡吉。八思巴本名洛追坚赞，有一小名叫娄吉（意为羊年生）。其家族为萨迦昆氏（《元史》作萨斯迦款氏）。昆氏一族在吐蕃王朝时期就是比较显贵的家族。八思巴从幼年起即在萨迦班智达的细心照料下学习佛学。四岁（1238年，宋嘉熙二年）时随萨迦班智达到后藏吉仲地方游历，朝拜帕瓦底寺。五岁时，其父桑察索南坚赞去世，他的学习与生活全由萨迦班智达照管。由于萨迦班智达的精心教导，加之八思巴本人聪明好学，所以在九岁时就能在法会上为僧人们说经，名声大著，被萨迦派人称之为“八思巴”（意为圣者）。此后，八

思巴就成为他的通用名字（《元史·释老传》说：“八思巴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其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

约在1239年至1240年年间，驻守在凉州的窝阔台之子阔端派遣手下将领多达那波率军攻入西藏，一直到拉萨地区的北部。西藏各个分散的地方势力和教派领袖无力抵抗蒙古军的进攻，或表示归附，或躲避不见。阔端依他治理西夏故地的经验，认识到要把西藏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必须扶植和利用西藏佛教的领袖人物，于是派人进藏了解各教派领袖的情况，由于萨迦班智达学识渊博，精通教法，因而决定迎请他到凉州。1244年8月，阔端派人携带手谕和礼品到萨迦寺去请萨迦班智达。萨迦班智达接到阔端的手谕后，权衡利害，毅然以六十三岁的高龄决定携带两个侄子，即十岁的八思巴和六岁的恰那多吉（1239—1267）前往凉州（见《西藏王臣记》，90—91页）。

八思巴在赴凉州的途中，于拉萨地方从萨迦班智达和苏浦寺堪布却吉强曲受沙弥戒出家，成为一名学经僧人。1246年6月，萨迦班智达叔侄一行到达凉州，时阔端因去参加选举贵由为蒙古大汗的王公会议，不在凉州。到次年元月阔端回到凉州，与萨迦班智达会见。阔端让八思巴继续跟随萨迦班智达学佛法，让恰那多吉着蒙古服装，学习蒙古语。在凉州的几年中，八思巴勤奋学习，学业进步很快，能提笔作文。例如收入在《萨迦五祖全集》的《怙主赞颂》，就是他在1250年12月在凉州所写的。此外，他还广泛地接触了蒙古、西夏、汉地的人士，了解各民族的语言、历史、风俗民情和政治情况，增长了知识和才干。这些都为他在萨迦班智达去世后独自登上政治舞台，发挥重大作用准备了良好的条件。《萨迦世系》说，八思巴与忽必烈会见后，八思巴就以通

晓汉地与吐蕃历史，具有渊博的学识和谦逊诚朴的品格使忽必烈折服。

1251年（宋淳祐十一年），八思巴十七岁，蒙古王公大会选举蒙哥为大汗，是为宪宗。蒙哥即位后，即以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军事。是年夏，忽必烈驻军六盘山，遣使到凉州迎请萨迦班智达，萨迦班智达以年迈未赴，八思巴随闍端之子蒙哥都去六盘山拜见忽必烈，忽必烈大喜，赠蒙哥都马军一百，留下八思巴，与八思巴结为施主与福田，尊八思巴为上师（见《红史》48页，《汉藏史集》下册16—17页）。不久，萨迦班智达病危，八思巴离忽必烈营帐又回到凉州。萨迦班智达在临终前将自己用的法螺及衣钵传给八思巴，并将自己的弟子都托付给他。11月4日，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幻化寺去世。这样，八思巴就成为萨迦派新教主，史称萨迦五祖（见《萨迦世系史》88页）。八思巴时年仅十七岁。

1252年（宋淳祐十二年，蒙古蒙哥汗二年），2月3日，八思巴在凉州分别给噶当派高僧扎巴僧格、索南僧格等人写信，请他们担任为自己授比丘戒的堪布。5日，八思巴致书卫藏各高僧大德，通告萨迦班智达去世。同年8月，八思巴在凉州处理完萨迦班智达的后事并为萨迦班智达的灵塔举行开光仪式后，动身返回萨迦。当他走到朵甘思地方时，从来往客商口中听到伍由巴（即索南僧格）去世的消息，于是八思巴改变去萨迦的计划，中途折回，于1253年年底，与忽必烈会合，一同北返，驻于蒙古和汉地交界叫作忒刺的地方（见《萨迦世系史》99页）。这样，双方建立了巩固的政治与宗教上的关系。接着，在1254年春夏之交，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份谕令，藏文史籍称“札萨博益玛”（意为藏文诏书），这份谕令是保护萨迦派掌握的后藏地区的佛教寺院和僧人，它宣布了忽必烈与八思巴的政治和宗教关系，历数了忽必烈献给八思巴的各

种物品，重申了阔端和蒙哥汗已宣布过的对僧人免除兵差赋税的优待。忽必烈以萨迦派施主的身份对后藏地区的僧人提出要求，要他们依照释迦牟尼的教规学经、修习，并声言蒙古人将依据他们持戒修行的情况来决定对待他们的态度。尽管这份谕令并不像后世一些藏文史籍中所说的忽必烈在接受第一次灌顶之后向八思巴奉献了乌斯藏13万户作为供养，但是它对于当时地位和前途都不确定的萨迦派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八思巴对它十分重视，在当年夏天就在这份谕令的前后写了对释迦牟尼、萨迦班智达、成吉思汗、窝阔台、拖雷、蒙哥以及忽必烈、察必的赞颂诗，并送到萨迦寺珍藏起来。

1255年5月，八思巴离开忽必烈，在河州（即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附近从涅塘巴·扎巴僧格、恰巴·却吉僧格、雅隆巴·喇嘛强曲坚赞等人受比丘戒（见《汉藏史集》下册17页）。之后，八思巴又前往今山西、内蒙古和河北北部的桓州（今多伦）、抚州（今张家口）一带。当时忽必烈受命主持汉地事务，常驻桓、抚之间，并于1256年春，命僧人子聪（即刘秉忠）在桓州以东、滦水以北择地建开平府城（即后来的元朝上都）。这两年中，八思巴与忽必烈及其左右谋臣的关系进一步加深。

1257年（宋宝佑五年）夏，在忽必烈的鼓动和支持下，八思巴前往佛教圣地山西五台山朝拜。在五台山约住三个多月，写下了《文殊菩萨名号赞》、《文殊菩萨坚固法轮赞》等。八思巴是西藏佛教领袖人物朝拜五台山的第一人。

1258年（宋宝佑六年）7月19日，八思巴写成《道果法明鉴》。《道果法》是萨迦派特有的主要教法，始于卓弥译师，卓弥传贡却结保，贡却结保传萨迦五祖，至八思巴为六传。这一年春夏之交，由于佛教与道教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发生争执，蒙哥汗命

忽必烈在开平府宫中主持释道两教辩论《老子化胡经》的真伪。佛教方面参加的有那摩国师、八思巴、刘秉忠、少林寺长老等300余人。道教方面参加的有张真人等200余人，还有忽必烈手下主要谋士姚枢、窦汉卿、廉希宪、张仲谦等200余人作见证。这场辩论不仅关系到蒙哥汗的宗教政策，而且对以后忽必烈的宗教政策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在辩论中，八思巴以他渊博的学识，直接问难，成为佛教方面主要发言人之一，起了重要作用。辩论结果道教失败。忽必烈下令将道士樊志应等17人送到龙光寺削发为僧，焚道教经典45部，将道士占据的237所佛寺归还佛教（见汉文大藏经《至元辨伪录》卷五）。

1259年（宋开庆元年）5月，八思巴在王子答刺麻八刺宫中写成《密宗行部所说无量寿佛修行法》。同年7月，王子答刺麻八刺得病，八思巴为其做法事禳灾。11月，八思巴到了中都（金朝的中都，即后来元朝大都，今之北京）写了一篇《赞颂之海——诗词宝饰》。他在题记中说：“阴土羊年（1259）冬十一月，于汉地无数帝王出世之地、众吉祥之相、装饰之中都大地写就。”此为藏族领袖人物的文章中第一次出现的对北京城赞颂。

1260年（宋景定元年，蒙古忽必烈汗中统元年），忽必烈在开平府宣布继蒙古大汗位，为元世祖。当年就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见《佛教历代通载》卷32）。

1261年（宋景定二年，蒙古中统二年），忽必烈派遣一位名叫达门的官员携带诏书及八思巴的法旨入藏设置驿站。达门一路上在各地召集民众，颁发赏赐物品，宣读诏书和法旨，根据道路及物产供应情况在脱思麻（今甘肃藏区）设七个大驿站，在朵甘思（今西藏、昌都）设九个大驿站，在乌斯藏设十一个大驿站，

驿路直通萨迦（见《汉藏史集》上册195—197页）。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驿站，对于把西藏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以及沟通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忽必烈继位后，随着八思巴的地位的提高，他得到元朝的封赏也更多，这样以来八思巴就有了雄厚的经济力量来壮大本教派的力量。1264年，他派人给萨迦送去许多财宝，由本钦释迦桑波在萨迦北寺兴建了一座大金顶殿（见《萨迦世系史》）。

1264年（宋景定四年，蒙古中统四年）5月1日，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份“珍珠诏书”。这份诏书以皇帝之名义宣告自己从八思巴处接受灌顶，并已封八思巴为国师，任命他掌管所有的僧人，要僧人不可违背八思巴的法旨。诏书还再次宣布不准军官、军人，守城官、达鲁花赤、金字使者欺凌僧人，不准向僧人摊派兵差赋税和劳役，不准金字使者住宿佛殿和僧舍，不准索取饮食和乌拉差役，不准夺占寺院的土地、水磨等。同时也要求僧人们遵守教律，为皇帝祝祷祈福（全文见《萨迦世系史》94页）。在八思巴动身返回西藏时赐给他这份“珠诏”，用意在于强调皇室和朝廷对八思巴的支持，以提高八思巴在西藏佛教各教派僧人中的声望。藏文史籍记载，约在此时忽必烈曾打算下令在西藏禁止除萨迦派以外的其他教派的教法，独尊萨迦派。八思巴考虑到西藏佛教各教派教法虽有差别，但都是佛教一门，而劝阻了忽必烈，改由忽必烈与八思巴共同下令准许各派僧人修习自己的教法。这表明了八思巴富于政治远见和善于团结各个教派僧人的宏大气度。

1265年（宋度宗咸淳元年，蒙古至元二年）元旦，八思巴抵达拉萨，从拉萨大昭寺写诗向忽必烈祝贺新年。当年春，八思巴回到萨迦寺。作为佛教虔诚的信徒和僧人领袖的八思巴努力于萨迦寺的扩建，他在大金顶修建了几座金刚界诸天神的吉祥过门塔

作为装饰，并为七座纪念先辈教主的灵塔修了宝盖、金铜合金法轮以及金顶，并用金汁写造显密经典及般若经，共二百余部。同时，八思巴还继续向西藏各地的高僧大德学习佛教理论，全面而深入地掌握佛学各方面的知识，继承和发扬藏族的文化传统。八思巴在萨迦这一段时间里，他仍然与朝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联系记录在《萨迦五祖全集》中有：1265年5月，忽必烈父子在京城建成佛塔，八思巴奉旨去萨迦写成赞颂诗进献；1266年元旦，八思巴在萨迦寺写诗遥寄忽必烈，祝贺新年。同年2月在萨迦寺写题为《珍宝之鬘》（珍宝串珠）诗二百五十四颂，寄阔端之子启必帖木儿。另外，在此期间，八思巴仿照蒙古的帐殿制度，设置13种私人侍从官员：即森本（司寝）、索本（司膳）、却本（掌诵经祭祀）、仲译（秘书）等，组成私人办事机构，这成为后世西藏佛教大活佛拥有私人公馆（拉章，亦译作拉让）的开端。为此，八思巴的好友、大学者觉丹热智曾寄诗嘲讽说：“衙署乌云障佛教，长官夺去众生福，浊世沙门贪富贵，不解此理非圣者。”这是从宗教徒的角度出发规劝八思巴不要参与政治活动。但是八思巴由于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已认识到要使民众生活安定幸福，就要保证政治的稳定，防止分裂混战的局面，作为一个佛教僧人也应为民众奔走，因此八思巴写诗作答：“教有盛衰佛明训，众生安乐自由业，随类被机施教化，不解此理非学者。”

1267年（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八思巴带领随从人员离萨迦前往朝廷。藏文史籍说八思巴任命其异母弟仁钦坚赞（《元史》作亦邻真）代理萨迦教主（见《萨迦世系》，142页），任命释迦桑布为本钦，负责乌斯藏行政事务。《红史》、《汉藏史集》记载了历任萨迦本钦的事迹，释迦桑布为第一任本钦，忽必烈授给他“乌斯藏三路军民万户”的官职（见《红史》53页）。可见八

思巴对西藏事务的影响力。

关于八思巴这次入朝时在路途中的情形，现在能见到的有两份文献。一份是八思巴1267年10月25日在藏北当雄地方赐给却顶寺的一份法旨，宣布对却顶寺免除赋税差役，保护却顶寺及其属寺的土地和财产（按：这份法旨原件照片收入西藏注独特·舒所著《西藏印章学》）。另一份是噶当派的一位老僧南喀本所写的《八思巴事迹》，详细记述了1267年11月15日至26日八思巴在当雄活动的情况。按他的记载，八思巴住在毡幕中，有很多随从人员，平时生活简朴，白天接待前来欢迎和拜见的地方官员和僧人，晚上与各教派一起举行宗教仪式或讲论教法、授给灌顶，直到深夜才入睡，过着一个虔诚的宗教职业者的生活。特别是这位前去拜见的噶当派僧人感动的是，八思巴对别派僧人也逊让有礼，尊重他们的宗教仪式和感情，处理事务细致周到，分别时八思巴还赠他一件法衣、一匹马、一锭黄金和一份法旨。另外，八思巴在这次入朝途中还决定兴建萨迦大殿（由萨迦本钦释迦桑布调集卫藏13万户人力）及拉康拉章、仁钦岗拉章、都却拉章，由1268年奠基动工，历时十年，至贡噶桑布任本钦时完成。萨迦大殿所存文物极多，著名的有忽必烈献给八思巴的大法螺、刻有龙纹的头盔、描绘八思巴生平的“唐喀”、萨迦历代教主的灵塔等。尤其令人惊叹的是萨迦所存的大量经籍，其中用梵文书写的贝叶经，数量之多世所罕见，殿后墙堆列之经典，从地面直至殿顶据说有10余万册之多，是八思巴时代集中西藏能抄写经书人员抄写的。八思巴决定兴建萨迦大殿，收集和抄写经典，对保存藏族古代文化遗产是有重大贡献的。

1269年（宋咸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八思巴一行经过两年的艰苦跋涉，到达朝廷。忽必烈派皇太子真金率后妃、大臣等以

安设珠宝网络装饰的宝座之印度大象、伞盖、经幢、鼓乐等接入宫中（见《萨迦世系史》128页）。八思巴回到朝廷后，献上他奉命创制的蒙古新字，忽必烈下诏颁行于天下。诏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尔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寝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以其国字副之。”此即后世所说之八思巴字。

1270年（宋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萨迦世系史》说，八思巴再次给忽必烈传授密宗灌顶，忽必烈将西夏国王的玉印改制为六棱玉印赐给八思巴，并敕封他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梵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还赐给黄金百铤、银两千铤、绸锻四万疋。从八思巴受封帝师开始，元朝从始至终都有西藏佛教僧人担任帝师，成为定制。从他以后，元、明、清三代的西藏佛教领袖都与中央王朝建立了类似的关系。元代的帝师、明代的法王、清代的达赖和班禅都可以说是八思巴的后继者。这些西藏佛教领袖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虽然带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政治内容总是放在第一位的。通过中央王朝对西藏佛教领袖的册封，西藏在政治上和中央王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也更加深入和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关系在历史上是起进步作用的。忽必烈与八思巴作为这种关系的开创者，当然，对西藏历史的发展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的。

八思巴这次入朝后的宗教活动，见于汉文史籍的有两条。一是至元六年十二月，忽必烈命八思巴率领僧人在太庙作佛事七昼夜。

夜，这是在蒙古皇室祭祖仪式中加进佛教内容的开端。次年十月，忽必烈又下令祭祀宗庙的祝文要用八思巴字书写（见《元史》卷74，祭祀三，宗庙上）。二是至元七年二月间，依八思巴之言，在忽必烈坐朝的大明殿的御座上安置了一顶白伞盖，“顶素锻，泥金书梵字于其上”，据说它可以“镇伏邪魔，护安国刹”（见《元史》卷77，祭祀六）。

此外，八思巴在大都还参与元军渡江灭南宋的战争的准备工作。《汉藏史集》记载，忽必烈曾问八思巴说：“蛮子国之王，属下民众富庶，我朝若以兵攻取，加上佛力之助，能否成功？”八思巴回答说：“眼下朝中尚无能完成此功业之人，我将察之。”次年，忽必烈之弟旭烈兀遣伯颜入朝奏事，大臣月儿鲁荐之，忽必烈将伯颜留下。在一次宫中的宴会上，八思巴见到伯颜，就向忽必烈举荐伯颜能当灭南宋之任，故忽必烈命伯颜为帅。伯颜出兵时，由尼泊尔工匠阿尼哥建一神殿，内塑护法神摩哈噶刺像（亦译作大黑天），脸朝江南，八思巴亲自为神像开光，并祈愿元军胜利（《汉藏史集》上册，200—201页。关于举荐伯颜为帅，《元史》卷203页中有类似记载，但说举荐人是方士田忠良）。

1271年（元至元八年，宋咸淳七年），约在夏初，八思巴离京赴临洮。此次离京之后再未返回。八思巴在临洮一直住到1274年，在此期间，他与忽必烈及其诸子、阔端之子启必帖木儿都有书信往来，关系密切。

1274年（元至元十一年，宋咸淳十年）3月，八思巴在皇太子真金率军护送下动身回萨迦。忽必烈以其异母弟仁钦坚赞继任帝师。1275年，八思巴启程回藏不久，元军大举南下伐宋。南宋遣贾似道督师拒元军，宋军溃败。同年3月元军攻入建康，江浙各地纷纷归降，临安已不日可下。八思巴听到元军渡江的消息，

于8月22日在玛尔康赞多新寺写《贺平江南表》，寄献忽必烈，颂扬忽必烈统一全国的功业。他在题记中说：“因蒙古第五代大皇帝忽必烈之福德，所有国土终成一统，尤其立国已久，王统未尝断绝，国政稳固，疆土广大之蛮子国归降于人主脚下之莲台，使皇帝福运之光遍照于直抵大海之大地坛城。为赞扬此圣业，比丘八思巴阴木猪年秋八月二十二日写于玛尔康地方之赞多新寺。”

（《贺平江南表》全文收在《萨迦五祖全集》ba函335页）。从这份贺表中可以看出八思巴作为元朝统治集团的一员，对元朝统一全国的事业采取了积极支持和赞扬的态度。

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年底，八思巴回到萨迦，在路上共用了两年时间，在路途中，他还向皇太子真金讲解佛教基本教义。他对真金宣讲的内容，后来汇集成本书，题为《彰所知论》，在元代即已译成汉文，有刻本，又由念常置于《佛祖历代通载》卷首，被收入汉文大藏经中。

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皇太子真金率军护送八思巴回到萨迦，体现了元朝皇室对八思巴的全力支持，在全藏引起震动，极大地提高了八思巴的威望。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八思巴于1277年元月，发起在后藏曲弥仁莫（今西藏日喀则县曲弥区）地方，举行了一次大法会，由皇太子真金以其父忽必烈的名义担任施主，参加的人有来自后藏各地方僧人七万名，加上俗人，总数达十万人。法会上向僧人们提供了丰盛的饭食，给每个僧人布施黄金一钱、每三名僧人发一套袈裟。法会由八思巴主持，举行了各种规模巨大的宗教活动（见《萨迦世系史》130页，《汉藏史集》下册，19页）。

接着，八思巴着手解决萨迦派内部事务。首先免除了贡噶桑布的本钦职务，由尚尊接任。贡噶桑布被免职后退居甲若宗（今

江孜县），仍然得到一部分人的拥护，形成萨迦派内与八思巴对抗的一股势力。另外，八思巴在选择自己的继承人问题上，他指定其弟恰那多吉遗子达玛巴拉作萨迦家族和教主的继承人，这一指定虽然因为八思巴的威望和真金太子代表皇室支持而得到萨迦派的承认，但也有一些人从内心感到不满。真金回朝后，萨迦派内部的矛盾再次趋于尖锐。1279年（元至元十六年），元世祖忽必烈派总制院院使桑哥领蒙古军七万入藏，攻打原萨迦本钦贡噶桑布所据甲若宗，八思巴的司膳侍从洛追桑布至军前劳军，建议迂回包抄，蒙古军先破朗卓康马（今江孜专区康马县）城，炮轰甲若宗，城破后执杀贡噶桑布，将支持贡噶桑布的八思巴弟子喇嘛衮曼、衮噶则兄弟流放江南。桑哥于军事行动结束后往萨迦拜见八思巴，还改动乌斯藏驿站管理办法，命蒙古军士接管藏北驿站，由各万户供应物资。桑哥还在乌斯藏各要地留蒙古军驻守，警戒西蒙古海都及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冬仁部落对乌斯藏的侵扰，并派蒙古军担任八思巴之侄达玛巴拉的警卫（见《汉藏史集》上册208—210页，《红史》52页）。由于蒙古皇室的全力支持，萨迦派内部矛盾暂时平息下来。

1280年（元至元十七年）元旦，八思巴在萨迦写祝辞寄忽必烈，祝贺新年。同年11月22日，八思巴在萨迦南寺拉康拉章示寂，终年四十六岁。按他生前的安排，由达玛巴拉继任萨迦派教主，并继嗣萨迦昆氏家族。

关于八思巴的死因，有的藏文史籍说是他的侍从挑拨他与贡噶桑布的关系，并背着八思巴向忽必烈奏报，因而忽必烈派桑哥领兵入藏，其侍从恐事情经过为八思巴察觉而受到责罚，故下毒将八思巴毒死。但从事件前后经过看，八思巴对桑哥领兵入藏并非毫未所闻，故此说尚有待考证。还有人怀疑是因为八思巴回藏后变

乱继起，与忽必烈发生隔阂，抑郁成疾而逝。但是1280年3月忽必烈还立都功德使司，掌奏帝师所统僧人并吐蕃军民等事，12月还下令刻印八思巴新译戒本五百部，颁降诸路僧人（《元史》卷11，世祖本纪8，至元十七年条）。说明此说也不确切。那末，八思巴是因何去世，我们估计一种可能是病故，一种可能是被贡噶桑布的余党所害。《汉藏史集》说，八思巴的死讯奏报朝廷后，忽必烈任命强仁为本钦，赐给宣慰司的六棱印及玉印，其后，强仁在襄冬波塘地方被贡噶桑布的四名亲信仆人之一强巴意希桑布暗杀。可见贡噶桑布被杀后，他的余党的反抗还是很剧烈的。

八思巴去世不久，忽必烈加封八思巴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忽必烈又下令在大都为八思巴造舍利塔。仁宗延祐六年十一月，元朝下令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有加。泰定帝泰定元年八月，元朝又绘帝师八思巴像十一份，颁发各行省，令各地塑像祭祀（据陈庆英著《元帝师八思巴年谱》等资料）。

仁钦坚赞

(1238—1279)

仁钦坚赞（意为宝幢），《元史》释老传译作亦邻真，为八思巴之弟（系八思巴之父桑察索南坚赞的第二妇所生，是八思巴的同父异母弟）。

八思巴去蒙古时（当指1270年八思巴到大都之事）由他担任萨迦住持，后来他也到了朝廷，成为忽必烈供养的上师，时年三十九岁。1279年（土阴兔年）逝于大都梅朵热哇花苑，享年四十二岁。关于他的死，另一说法是说：八思巴返回卫藏时将汉地临洮及梅朵热哇的法座都交付给他，于四十五岁的水阳马年（1282年）逝世于甘肃临洮。

《元史》释老传说：“至元十一年（公元1275年）（八思巴）请告西还，留之不可，及以其弟亦邻真嗣焉……亦邻真嗣为帝师，凡六岁，至元十九（1282）卒”。此处“九”字盖误。据同书世祖本纪，应改为卒于至元十六年（1279），则与藏文资料记载相符。

关于仁钦坚赞的事迹，在《萨迦世系史》中，只说他在皇宫附近修建了一座僧寺，云云。（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意希仁钦

(1248—1294)

意希仁钦，《元史》释老传译作亦摄思连真。《元史》本纪译作亦摄思怜。

此人在《萨迦世系史》中没有关于他的记载，因为他不属于萨迦昆氏家族。《红史》中是这样记载的：萨班和八思巴的弟子分东、西、上三院。东院的传承是从象雄地方的觉本开始，觉本的长子夏巴协迥从萨班出家，从本钦释迦桑布手中买得夏尔拉章。他在出家以前生有一子，名秀波杰尊加。秀波杰尊加的三个儿子都是八思巴的弟子，其长子即意希仁钦。当八思巴住在临洮时，由萨迦派大众选派意希仁钦到八思巴那里，后随八思巴到汉地，得到薛禅皇帝喜爱，封为帝师，享年四十七岁，逝世于五台山。《元史》卷十四世祖本纪说他至元二十三年（1286）任帝师。释老传说他至元三十一年（1294）卒。

意希仁钦之所以能被封为帝师，与他的家族在萨迦派中的地位是分不开的。他的叔祖多吉俄色曾任夏尔拉章（即东院）的住持，他的姑表兄弟意希坚赞到朝廷当过忽必烈和皇子忙哥刺（封秦王）的上师，他的弟弟加洋仁钦坚赞后来也当了帝师（见《红史》民族出版社1981年藏文版50—51页）。

扎巴俄色

(1255—1303)

扎巴俄色，《元史》译作乞刺思八斡节儿。

此人也不属于萨迦昆氏家族。《红史》记载：说他属于萨班和八思巴弟子中的康赛传承，其父为松巴扎巴。他曾任八思巴的侍从却本，后来作为达玛巴拉的随从到了朝廷。忽必烈时任帝（时年四十九岁），五十八岁逝于朝廷。《萨迦世系史》中记载，他曾任达尼钦波（似指八思巴，有人认为是指达尼钦波桑波贝）的却本。八思巴去世后，因畏惧皇帝降罪，萨迦派无人敢去朝廷报丧，他自告奋勇到朝廷报丧，后被任命帝师。

关于他任帝师的时间，《元史》卷十六世祖本纪说是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授乞刺思八斡儿为帝师，统领诸国僧尼释教事。”《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纪说是至元三十一年（1294）六月“以合刺思八斡节儿帝师，赐玉印。”至元二十一年六月任命他为帝师的是元成宗，因为忽必烈已于当年一月去世，这可能是成宗新继位，重新任命一次。

如按《红史》记载，他在忽必烈时任帝师，和世祖本纪的记载来看，他应是1291年开始任帝师。《元史》释老传中说他卒于大

德七年（1303）。又说他元成宗特造宝玉石五方佛冠赐之，元贞元年又更赐双龙盘纽白玉印，印文曰：“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

扎巴俄巴还有一件事，需要提及。在八思巴死后，八思巴异母弟意希迥乃的儿子达尼钦波桑波贝因与达玛巴拉为萨迦的继承权而发生倾轧，忽必烈将达尼钦波桑波贝流放到江南，并且不承认他是萨迦派昆氏家族的后裔（大约因为意希迥乃是八思巴父亲的侍女所生）。到了元成宗时，达玛巴拉已逝世，并没有后嗣。扎巴俄色为首的一些萨迦派上层向元成宗说情，才把达尼钦波桑波贝从江南找回，承认他是昆氏家族的后裔，让他回西藏繁衍家族。到了达尼钦波桑波贝的儿子们时，帝师一职，又由昆氏家族的人来担任（见《萨迦世系史》与《西藏王臣记》）。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扎巴俄色与萨迦昆氏家族的密切关系（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加样仁钦坚赞

(1256—1305)

仁钦坚赞，《元史》译作辇真监藏，《红史》译作加样仁钦坚赞。

仁钦坚赞是萨迦东院人，约在1288年左右，元世祖曾命他为萨迦寺细脱拉章（萨迦派后分为四大拉章）的座主，共做座主十八年，到此，元成宗召之至京，嗣为帝师。大德九年（1305）卒。《元史》卷二一，成宗本记载：大德八年一月，“庚午，以辇真监藏为帝师。”大德九年正月，“戊午，帝师辇真监藏卒。”释老传说：“（乞刺斯八斡节儿）大德七年卒，明年，以辇真监藏嗣，又明年卒。”《历代佛祖通载》也说他卒于大德九年。

《红史》中记载：他先被忽必烈封为萨迦细脱拉章的住持，后到朝廷，元成宗完泽笃迎请为帝师，享年四十九岁，逝于朝廷。并说他任帝师时，是萨迦派权势最盛的时期。

桑 结 贝

(1267—1314)

桑结贝，《元史》译作相家班。据《红史》记载，他是第五任帝师扎巴俄色的弟弟的儿子，任元成宗完泽笃、元武宗曲律、元仁宗普颜笃的帝师，四十八岁时，逝世于朝廷。

《元史》卷二一，成宗本纪大德九年三月条云：“以乞刺思八斡节儿侄相家班为帝师。”释老传说：“以鞞真监藏嗣，皇庆二年卒，相儿加思嗣，延佑元年卒”。这里的“相家班”和“相儿加思（班）”都是“sngas-rgyasdpal”的译音。所以说这是同一个人名的异译。皇庆二年（1313）与延佑元年（1314）紧接。他任帝师是从大德九年（1305），至延佑元年（1314）。按他1314去世，享年四十八岁算，他应生于公元1267年。

达 玛 巴 拉

(1268—1287)

达玛巴拉《元史》释老传译作答儿麻八刺乞列，《元史》本纪译作答耳麻八刺合吉塔。系八思巴的侄儿。他出生时，其父恰那多吉已去世六个月，即公元1268年（土阳龙年）正月，故达玛巴拉为恰那多吉之遗腹子（见《红史》北京民族出版社藏文本245页，东嘎·洛桑赤列注释276条）。恰那多吉是八思巴的同母弟，六岁时与八思巴一同随萨班到凉州，阔端王让他穿蒙古服装，并把女儿门卡达（一作茫噶拉）嫁给他。以后忽必烈赐他金印，封为白兰王，并任命为藏族地区的总首领。1265年与八思巴一起返回萨迦，又娶夏鲁万户家的女儿坎卓木。二十九岁（火阴兔年1265）去世。达玛巴拉是坎卓木所生。他十三岁时，八思巴去世，由他担任萨迦法主。而在八思巴在世时，就已确定由他继嗣萨迦昆氏家族，所以他既是萨迦派宗教方面的首领，又是世俗方面的首领。公元1282年，他十四岁时，去到大都朝见忽必烈，居住在梅朵热哇，曾建一大佛殿及水晶塔。忽必烈恐萨迦昆氏绝嗣，强使他娶了两个妻子，一是诸王后必帖木耳（阔端之子）的女儿贝丹，贝丹未生子。第二妻觉莫达本生子早逝。达玛巴拉二十岁（火阴

猪年，1287）逝世于朵甘思哲明达地方（见《萨迦世系史》143—144页）。《红史》说他是受命管理吐蕃事务，在回藏途中逝世在朵甘思的。《元史》释老传说：“亦邻真嗣为帝师，凡六岁，至元十九年卒，答儿麻八利乞列嗣。”《元史》卷十二世祖本纪说：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诏立帝师答耳麻八刺合吉塔，掌玉印，统领诸国释教。”而下一位帝师据《元史》本纪十四说：至元二十三年（1286）任命的。

从以上记载可知，达玛巴拉是从1282年至1286年任帝师的，约在1286年受命回藏管理吐蕃事务（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扎巴僧格

(1283—1349)

扎巴僧格，又称征古热巴桑哇，由于元帝室曾封他为国师，并赐给他一顶红色的帽子，所以由他开始的这一转世系统，被称作藏传佛教噶举派噶玛噶举二支系之一红帽系(另一系为黑帽系)，他本人即是红帽系的第一世。

扎巴僧格是麦彌波(即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乡城县境)地方人，属夏家族旺吉支族。父名达穹，母名阿桂萨，十三岁时出家为僧，取法名扎巴僧格，从上师罗追扎巴学噶举派密法——那若六法，修“拙大定”能着单布衣御寒，人们称其征古热巴桑哇，到了二十三岁时，他到桑浦寺学习《波罗密多》、因明学等显教经论，共七年。尔后，又师事噶玛噶举黑帽系三世活佛擦迥多吉在德钦寺学习密法，听受了全部“口传宝戒”，后又从擦迥多吉受比丘戒。1333年建乃囊寺(此寺在1490年建羊八井寺以前，这个寺为红帽系的主寺)。擦迥多吉自北京传命，令他住德钦寺，但因他晚年多病，仍多住乃囊寺，有弟子甚众，其及门弟子有雅德班钦(1299—1378，雅德在后藏尼木和吳佑之间的一地名，班钦即大班智达，公元十四世纪人，为噶玛噶举红帽系中一位大佛学家)最为知名。此人曾建埃瓦木寺。扎巴僧格1349年圆寂，享年六十七岁。

攘迥多吉

(1284—1339)

攘迥多吉即却杰仁波且攘迥多吉，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三世活佛。他出生于阿里芒域贡塘抗秀莫边上的扎普垄雪地方，父亲阿强却贝是一名旧密学者，攘迥多吉五岁时(1288)，成就者邬坚巴仁钦贝把他认定为噶玛拔希的转世。七岁时随从堪布贡丹喜饶出家，取法名攘迥多吉。十八岁时由堪布旬努绛曲和赖·格顿仁钦大师授比丘戒，依止尼多贡噶敦珠等众喇嘛、格西和学者，学习许多佛教的法相学和许多密宗教法（见《红史》藏文注释462条）。《红史》说在羊年（公元1331年）元文宗图帖睦尔派人赍诏书和蒙哥赐给噶玛拔希的金印去西藏召攘迥多吉来大都。他“在羊年七月动身，到了卫地。”为到拉萨贡塘与帝师贡噶坚赞贝桑布为首的人会合同行，他来到当雄。十一月闻雷声大作，发生了日蚀，天降大雪之故，攘迥多吉预言说：“大皇帝将寿，我们不必前往”，遂又返回粗卜寺。猴年（公元1332年）二月再次动身，在汉藏之路途大作利益众生之事，他得知元文宗死在起辇谷的消息后，为元文宗超度亡灵。此后他为王子热达那室利（皇帝懿璘质班）的根本上师，并在起辇谷建寺。此时，没有

出现与发展事业有违碍之征兆，于是他于10月18日到达皇宫，受到皇帝仁波且贝（懿璘质班）及大臣们的欢迎和敬奉。他为皇帝和大臣们灌顶，使皇帝大臣们得到如愿以偿之教法。他从征兆得知懿璘质班的寿命也不太长（按：元宁宗懿璘质班在位仅一个月，年仅七岁即夭亡）。于鸿年（公元1333年）1月15日，元惠宗妥懥帖睦尔从蛮子（指南方）地方到达大都（北京），在数百万僧俗欢迎队伍中，谁也无法开道路，法王攘迥多吉头戴黑帽，口念六字真言，人群都为他让出路来。元惠宗手拿大哈达前来向他顶礼膜拜，无限敬信，奉献无数财宝。攘迥多吉为皇后的王族、燕铁木儿太师等众官员灌顶，彼之近侍扎赞被任命为太徽院参院。当众官员串通一气与太师发生了纠纷时，经法王攘迥多吉劝解之后，纠纷平息。元顺帝妥懥帖睦尔于公元1333年在上都即位后，赐给攘迥多吉“领悟一切法性空噶玛巴”的封号，并封为“国师”，赐玉印、金字圆符（牌符）。他的弟子多康人喇嘛定增桑布和蔡·格迥钦波也受封为“司徒”。粗卜寺内还建立了供奉元文宗图帖睦尔画像的影堂（指记录当时真实情况的彩画）。攘迥多吉在公元1334年反藏途中，曾到过佛教圣地五台山，然后经宁夏（藏文说西夏地方）、甘肃和青海回到粗卜寺。《红史》说，“他居住在桑耶钦浦时，无数贤哲和僧徒拜他为师。他为蔡巴提供条件，写造金汁丹珠尔经”后，“元朝多次派人携带重礼，再三请他进京。鼠年（公元1336年）八月起身，十五日离开当雄，在前往元朝皇宫路途中广作利益众生之事，直到与元顺帝相会。”攘迥多吉这次进京，主要是为元顺帝作法事，祈祷皇帝延年益寿。《红史》还说：“他在牛年（公元1337年）八月预先察知京密县（gim mi shan之音译，地望不详，估计为大都附近地名。）将发生大地震（按：据《元史·五行志二》，至元三

年（公元1337年）八月辛巳夜，京师地震，壬午，又大震，损太庙神主。疑指此次地震），他从屋里搬到外边，居于平坝之上。地震时，城被毁坏，百姓都逃走，凡是跑到擦迥多吉跟前祈求护佑者们，以及其弟子均未受到伤害。”除此，该书还引其他藏文史料记叙了当时由于朵思麻和汉地一些僧人行恶，反对佛教的大臣们都主张下令除吐蕃地方以外，其他地方不守清规的僧人一律还俗，让他们负担差税，支服兵役。此事虽然经帝师、国师的竭力劝阻，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于是皇帝旨令群臣在皇宫的午门以东集会议决，帝师与伯颜太师等都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擦迥多吉以理力争，才阻止了这道命令的执行，并“派数名达尔干（指古代蒙古官职名）带着诏书到各地宣布，如此暂时安定下来。由干巴（为大臣、管家之意）为施主，在大都建噶尔寺，在中间殿堂塑造胜海佛及其侍从，在左右厢房中塑造噶举派喇嘛和胜乐五佛之护法立体坛城。在临洮也建造噶尔寺。擦迥多吉把玉印交给止贡和帕竹派活佛，把噶玛拔希的金印交给粗卜寺住持。”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元朝后期，朝廷中有一部分大臣对皇帝笃信佛教的做法是持反对态度的。同时，也可以看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对元王室影响日增的事实。此后不久擦迥多吉于公元1339年因病圆寂于大都，享年五十六岁。著有《历算论典集要》和《空性赞疏》传世。

雍敦巴多吉贝

(1284—1365)*

雍敦巴多吉贝，雍是地名，多吉贝是本名，简称雍敦巴，是藏传佛教宁玛派著名僧人。他善长新旧密咒宁玛教法及《时轮金刚》，尤其是以精通咒术而著称。《土观·宗派源流》说：“雍敦大师为一德学兼优而又具有佳话遗闻的大德，在新旧诸派中，为人所承认。”

雍敦巴曾受元帝成宗之诏请进京，在帝前献金刚舞，赐予丰厚。又曾奉命去内地一个遭到旱灾的地区作法求雨。这是早期的宁玛派和元朝发生关系的情况。

* 另一说法雍敦巴多吉贝生于1287年，卒于1368年。

布顿

(1290—1364)

布顿，是其全名布顿仁钦朱的通称，元时译作卜思端。他是萨迦班智达以后，宗喀巴大师之前，西藏一位著名的佛教学者，藏传佛教夏鲁派祖师。夏鲁派系藏传佛教一小派。

布顿大师于1290年（藏历阳铁虎年）3月24日生于后藏卓浦附近的下麦衮乃衮波地方，其父坚赞贝桑波，又名扎顿，是一位宁玛派的名僧；其母索南本，也有很深的佛学造诣。布顿五、六岁时，其母教他读诵《临终智慧经》和《地藏十轮经》等，他能熟练地背诵经典条文，被人称为神童。七岁时曾到卓浦巴处求学发菩提心的教授，学习《大乘菩萨之发心》等。八岁时随其祖父宁玛派大师楚臣贝桑波学习宁玛派密咒《大圆满心识》和《大圆满法界部》等。后又听受希解外续怛特罗、莲花生大的“伏藏”等十八部经典，从此精通了宁玛派经典教法。

公元1307年，他十七岁时，拜克什米尔学者、卓浦寺堪布羊孜瓦仁钦僧格和善知识大德索南贡为轨范师学习“三藏”、“五部大论”，修习《沙弥律议》和《律经根本律》，又在索南贡座前，修炼波罗密多心经。十八岁时从福怙出家为沙弥，更以其学

《八千般若颂》、《两万颂般若注解》、《入行论》等经论。通过几年的勤奋学习，布顿对三藏经典已烂熟于胸，在经典、理论方面达到了学新、去讹、解惑的境界，尤其是他那超群的摄受能力，常使他人感到惊奇，并要与他比试一番，但结果都是失败，不得不承认他的学识博深。

在他二十三岁（1312）时，依噶希巴扎巴旬努、阿阇黎索南扎巴、持律者索南桑波等在藏地措堆古尔摩拉章受比丘戒。接着，又在扎巴旬努和索南扎巴座前，听受《十诵律比丘戒本》、《戒律根本经》、《律仪发心》、《行菩提心》等所有的律经和修心教法。随后，布顿为了综合并补充诸上师的见解，应诸弟子之要求，在卓浦寺宣讲《波罗多经》、《因明学》、《大乘阿毗达磨集论》等经论，并到各地广传教法。与此同时，布顿不忘自身的修学，到了三十岁左右时，他的学业与思想已经成熟，他不仅遍修显密，取得巨大成就，且对西藏佛教的主要宗派为宁玛、萨迦、噶举、噶当、希解、觉域等派的主要教义、教规都曾作过潜心的修习。这些都为他在以后完成《丹珠尔》的编纂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藏历阴铁猴年，布顿应日喀则东南夏鲁地方的封建领主孤香扎巴坚赞的邀请，到了后藏名刹夏鲁寺，并做了该寺寺主。布顿到夏鲁寺不久，就撰写了《量决择论》、《波罗密多经》和《阿毗达磨集论》等经典的注疏。这样，不仅布顿更加誉满卫藏，而且夏鲁寺也名声大振。所以，后世有人将布顿及其弟子创立的教法称为布顿派，而不称为夏鲁派。

由于布顿一生勤奋治学，笔耕不倦，撰写了不少关于佛学和历史的著作，其全集有26函，共200多种。在西藏佛教史上，布顿大师的主要贡献有二：一是他编纂的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目录，是

一部较完备的定本。这部《丹珠尔》可以看作是那塘版的一个扩充版，以前任何一种结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与这部《丹珠尔》同日而语。明代或明以后刊刻的《丹珠尔》基本上都是以此为蓝本。布顿大师完成《丹珠尔》的编纂，是对藏族文化和西藏佛教的巨大贡献。其二，是他在1322年写了一部佛教史，通常译作《布顿佛教史》或《善逝教法源流》。这部著作的历史价值，首先在于它是西藏历史上第一部成型的教法史（或教法源流）。该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用一半的篇幅讲佛教在印度、尼泊尔传播的历史；第二部分，是记述佛教在藏族地区发展情况，包括西藏佛教“后弘期”初期的历史，即指朗达玛灭佛后至元统一西藏以前的记载颇为详细，这对于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最好的资料。因此，布顿的这部著作被后人视为标准史料，而广泛引用。第三部分，是《甘珠尔》、《丹珠尔》的总目录，是研究西藏佛教史主要参考资料之一，因为它全面地反映了元和元以前西藏佛经翻译的全貌。这部著作，在藏族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很早以前，就被国内外藏学界人士的注意，1931年海德堡出版了奥伯米勒的英译本。在国内郭和卿先生的汉译本《佛教史大宝藏论》，于1986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布顿有不少弟子，其中有几个还曾当过宗喀巴的老师。元朝的末代皇帝元顺帝曾经邀请布敦大师到北京去，他未奉召。他在西藏佛教史上虽有一定影响，而在政治上无什么势力。

贡噶洛追坚赞贝桑布

(1299—1327)

贡噶洛追坚赞贝桑布，《元史·释老传》译作公哥罗古罗思坚赞班藏布。是藏传佛教萨迦派僧人。生于公元1299年（藏历土猪年）。父名达尼钦波桑波贝，母名贡噶本。公元1309年（藏历土阳鸡年），他十一岁时到达朝廷朝见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普颜笃，受到皇帝、后妃、大臣的崇奉。普颜笃封他为帝师。公元1327年（藏历火阴兔年）逝世于“梅朵热哇”（即现在北京法源寺），年仅二十九岁（见《萨迦世系史》）。《红史》记载说：他曾任元仁宗普颜笃、英宗格坚、泰定帝也孙铁木耳三位皇帝在位时的帝师（按：这几位皇帝寿短）。享年二十九岁，火阴兔年（1327年）逝于大都。

隆钦然绛巴

(1308—1364)

隆钦然绛巴，“隆钦”系地名，“然绛巴”是博通经教人的一种称号，后来成藏传佛教僧人的学位名称。他的本名为智美畏赛，是宁玛派中学识、修证都很高而得到一般公认的名僧。

他十二岁出家，从当时有名学者学习宁玛派和其他教派的密法。之后，又在桑浦寺投师学“慈氏五论”和“法称七因明论”等显教经论。以后又在一岩洞中苦修三年，遂成为当时兼通显密的一位著名人物。他曾修订过宁玛派的密法，并著有相当多的讲解宁玛派密法的书，这些著述成为后来宁玛派僧人所极为重视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有所谓“七宝藏论”），成为宁玛派寺院中的必读之书（以上见王森著《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在《宗派源流》中称赞说：“隆钦然绛巴尊者，是旧派（即宁玛派）掌教中唯一精通教理的杰出人物。关于各种明处，显教教理和新密旧密两派等方面的著作亦很丰富。”

隆钦然绛巴当时在传法收徒方面，曾受到当时西藏地方最大统治者大司徒绛曲坚赞的阻挠和敌视，后经调解，他才继续收徒

传法。他曾到过不丹，并在不丹建立了一座叫做他尔巴林的寺院，宁玛派的教法就是通过此寺在不丹境内传播出去的。他又从不丹到尼泊尔传播宁玛派法。1364年逝世，享年五十六岁。

却吉坚赞

(1332—1359)

却吉坚赞，系藏传佛教萨迦派四个喇让之一拉康喇让的开创人，元帝师贡噶坚赞的长子。此人曾于公元1356年入京朝元，受封为大元国师。却吉坚赞之子贡噶扎西坚赞（1345—1359），《明史》作昆泽思巴，在明朝初期，受明封为大乘法王。拉康喇让这一支系到了十六世纪初已基本绝嗣。却吉坚赞于公元1359年卒，终年二十七岁。

乳必多吉

(1340—1383)

乳必多吉，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转世活佛。

他于1340年（元惠宗至元六年）出生于西藏昌都地区阿拉绒的扎热那宗地方。父名索南顿珠，母名宗追金。三岁时，被黑帽系三世攘迥多吉的弟子道丹贡杰哇认定为攘迥多吉的转世灵童，遂被接到粗卜寺继承法拉，从道丹贡杰哇和雍顿多吉贝等众学者学了许多显密经典和语诀。七岁时，随从措格顿岗巴堪钦顿珠贝巴和索南本大师二人出家，起法名却吉扎巴。此后，多年学习法相学和密宗教法（以上见《红史》注释495条）。1348年乳毕多吉九岁时受蔡巴的最后一位万户长格微洛追（即蔡巴贡噶多吉）的邀请，到拉萨的贡塘寺。同时他还得到帕竹地方政权建立者绛曲坚赞的器重和信任。十八岁时，从以前的亲教师受比丘戒。此后受元顺帝妥欢帖睦尔之邀请，遂于公元1358年从粗卜寺启程经北路去北京。途径康区时，受到各地方势力的迎送。1359年他经过青海宗喀地方时，刚满三岁的宗喀巴（格鲁派创始人）被领来见他，他给宗喀巴授了近事戒（即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酒，

又称五戒），所以说宗喀巴最早接触到的藏传佛教，是噶举派的噶玛噶举。乳必多吉在途中曾遇到变乱和地方豪酋之间的争斗，曾在米聂饶岗地方调解了两个部落的争斗，使之声誉大扬。

1360年乳必多吉抵达大都（北京），为元顺帝父子传授“金刚亥母灌顶”，讲授“那绕六法”，传“方便道”（指密教中男女双身修法）。乳必多吉不仅给皇帝传法，而且还给在北京的各民族统治阶级人物如蒙古、汉、西夏、高丽等的一些王公贵族讲经传法。他在大都一共住五年，于1364年启程返藏，在回藏途中，曾在甘州附近建立了一座寺院，进入康区以后，曾到类乌齐在噶玛丹萨寺为僧人讲经说法，然后才回到粗卜寺。

元朝灭亡以后，明太祖朱元璋曾先后派人入藏，召请藏族僧俗领袖进京，乳必多吉也曾受召，但他没有应召前往，只是从1374年开始派人去南京朝贡。1383年乳必多吉逝世于工布地方，终年四十四岁。

仁达哇·旬努洛追

(1349—1412)

仁达哇·旬努洛追，“仁达”是萨迦与拉孜之间一地名，因旬努洛追出生于仁达地方，故称仁达哇。他是藏传佛教史上在布顿仁钦朱和宗喀巴之间的一个重要人物，即萨迦派后期在显教方面有贡献的人物。

仁达哇·旬努洛追先从萨迦派聂温·贡噶贝（宗喀巴大师曾从此师学般若学）和玛谛班钦学习显教，达成究竟。西藏佛教各教派都重视《中观论》，特别是月称的《入中论》和《中论明句论》等，在他以前一段时期，在西藏几乎是失传了，由于他的努力钻研，并极力传扬，使这一佛教哲学，又重新在西藏佛教界居于重要地位。《土观·宗派源流》中说，仁达哇从堪钦绛森听讲中观论，用自己的慧力观察，通达应成派“中观”的最细最扼要之处，用以教诲后学。仁达哇曾自述说：“吾初求学时，只听说有《中观论》一书，但无人重视。现在都知道《中观论》的重要了，这可算作我对佛法所作的一点贡献。”因此，他在西藏佛教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另外，仁达哇还从译师南喀桑布、译师扎巴坚赞、译师郊乔

巴（别名室利跋陀罗，曾为宗喀巴施主）等人听受《集密》等密法，及一切本续口诀，并广事宏扬。众皆咸知他能如实宏显《集密》和应成中观见，在萨迦派住持教法的大德中，唯有仁达哇的功劳最大。

仁达哇的弟子众多，其中著名的有所谓博解经论的七善知识，善译四论的十弟子，通晓《现观庄严论》、《因明论》的弟子则超过百余人，宗喀巴三父子（指宗喀巴及其二大弟子贾曹杰和克珠杰三人之通称）亦属于此数之中。

仁达瓦的著述有：瞻部洲前胜庄严的四大论和《中观根本颂》、《入中论》、《四百论》、《大乘宝生论》、《俱舍论》、《吉祥集密经》等共十部经论的注疏传世。他于公元1412年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释迦也失

(1352—1435)

释迦也失，又称绛钦却杰，系明朝册封的大慈法王的音译。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著名弟子之一，拉萨黄教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的创建人，他是宗喀巴大师同明朝联系并向明朝进贡的代表。曾两次到过内地北京。

1409年（明永乐七年），明成祖派钦差四人进藏迎请宗喀巴大师赴京传法。宗喀巴考虑到黄教正是初创时期，自己作为教主不便离开，于是委派释迦也失作为他的代表前往北京。“成祖见其学德”于1414年封他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并赐给玉印。数年后他回藏，于1418年（明永乐十六年）依大师之命，用他从内地带回的资财，在拉萨北郊兴建色拉寺。所谓“色拉”有两种解释：一说是雹子，据说建寺时曾降冰雹；一说是野生蔷薇花生长的地方。前一说较为普遍。色拉寺初建为五个扎仓（学院），后经合并为三个扎仓，即结巴、麦巴和阿巴扎仓，前两个扎仓为显宗扎仓，后一扎仓是密宗扎仓。寺院僧人数目仅次于哲蚌寺，定员5,500人。寺内保存有释迦也失从北京带回的金写藏文《大藏经》一部和旃檀木雕十六尊者像一套。

释迦也失在建成色拉寺之后，他又代表黄教到达北京。1434年，明宣宗又封他为“大慈法王”，他的名字绛钦却杰就是这个封号的音译。他还到蒙古等地传播佛法。《土观·宗派源流》说：他“在内地创立黄教宗风”。法尊大师说：“戊戌年（永乐十六年）依大师命创色惹寺名大乘洲，后复晋京为永乐宣德两代国师，于内地蒙古等处，广宏黄教，是为黄教传布内地之始。”据说山西五台山的黄教寺院，也是释迦也失修建的。今色拉寺正殿四面墙壁上还有释迦也失两次到内地传播黄教，受到明朝皇帝封赠的一些壁画。

释迦也失的上述这些活动，对于沟通、促进藏汉、藏蒙民族关系，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公元1435年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宗 喀 巴

(1357—1419)

宗喀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意思是善规，或善律，这是从该派倡导严守戒律而来的，又因宗喀巴和这一派的僧人戴黄色僧帽所以又俗称黄教或黄帽派）的创始人。他的原名叫罗桑扎巴，出生在今青海省塔尔寺地方。包括西宁、湟中在内的青海东部湟水流域，在吐蕃时期就被藏族称为宗喀。宗喀巴成名以后，藏族人民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不直呼他的名字罗桑扎巴，而尊称宗喀巴，还有尊称他为杰仁波且（意为宝贝佛爷）。

宗喀巴的父亲是元朝兼管当地军民政务很有实力的官员——达鲁花赤。属藏族内之默族。宗喀巴兄弟六人，他排第四。他三岁时，正值西藏佛教噶举派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赴北京途经宗喀地方时，宗喀巴的父亲就带着他去和乳必多吉相见，并给宗喀巴授了近事戒。宗喀巴七岁时，在西宁正南偏西黄河北岸的一个小寺即甲琼寺出家，他的老师是该寺寺主、当地著名的噶当派高僧顿珠仁钦。顿珠仁钦曾去西藏学过经，他不仅在青海一带有名，就是西藏也是比较有名望的高僧。宗喀巴从顿珠仁钦学经九年时间，在藏文、显教经论、密法等方面，打下了比

较坚实的基础。

1372年，宗喀巴十六岁，他辞别老师，前往西藏学经。这是藏族地区的一个传统，不论家乡在哪里，学佛学到一定阶段，必须到西藏去深造，另一方面也是去朝拜西藏佛教的圣地拉萨。1373年，宗喀巴到达前藏，先到第瓦巾寺（在拉萨西南郊），这是一座噶当派寺院，也是他的老师顿珠仁钦的母寺。他在该寺专学以《现观庄严论》为主的《慈氏五论》。到了1375年，他就到萨迦去投奔当时著名的萨迦派僧人仁达哇·旬努洛追，从其听学《俱舍》和《入中论》。仁达哇·旬努洛追在佛教观点上属于应成中观派，在学问修持方面都极好，因此成为宗喀巴一生中最重要的师长，对宗喀巴的影响也最大。宗喀巴在西藏学经，总的来说是先显后密。他从1373年开始，用了10年的时间学习显宗，各教派的内容都接触到了，以后他又转入系统地学习密宗。教他学密宗的老师中比较有名的一个是布顿·仁钦朱的弟子却吉贝。到了十四世纪八十年代末，宗喀巴把西藏佛教显密宗各派的教法几乎全部系统地学了一遍。1385年，宗喀巴在雅隆地区的南杰拉康寺，从楚臣仁钦受比丘戒。此后，他经常为别人讲经，到1390年左右，据说他已能够讲十七部经，包括了大乘显教各派的代表作，而且不发生混乱和遗漏，当时的人对他都表示钦佩，认为这不是一般人的才智所能达到的，宗喀巴的声望也从此越来越高。宗喀巴除在前后藏各寺院讲经外，在显教方面，是参访师友，研讨疑义，深造自得的一个阶段。在密教方面，一般如以前随缘学法，此时又加遇机专修，亲自体验。特别是从布顿仁钦朱再传弟子袞桑瓦学各部续密之事相仪轨之后，是他密法学习的完成阶段。自1393年以后，宗喀巴的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并开始他的宗教社会活动，即进行“宗教改革”。

当时，藏族社会情况是这样的：已经普遍建立了封建制度。从十三世纪到十四世纪末这二百年，是藏族进一步获得发展的历史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普遍确立，西藏佛教的一些教派也得到了发展。萨迦、噶举等教派先后达到了它们权势极盛的阶段，这些教派的上层僧人直接参与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活动；他们享有特权，蹂躏妇女，欺压百姓，横行不法；为了争权夺利，各教派之间还经常发生争斗。到了十四世纪后期，西藏佛教各派由于戒律废驰，僧人腐化，出现了“颓废萎靡之相”，换言之，即一些原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派渐渐丧失民心，走向衰落，丧失了宗教的号召力量和帮助封建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功能。在此情况下，封建统治阶级认识到需要一个有号召力量的新教派代替颓废的旧教派，这是统治阶级支持宗教改革的原因。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厌恶那些不守戒律，胡作非为的僧人中的权势分子，但是他们还是信仰宗教，所以也对宗教改革是支持的。这就是宗喀巴“宗教改革”成功的历史背景。宗喀巴“宗教改革”活动分三个方面：

首先，提倡僧人必须严格遵守戒律。大约从1388年，宗喀巴改戴桃形尖顶黄色僧帽，表示自己坚决重视戒律的思想。黄帽原是持律者所戴，据《土观·宗派源流》说：“贡巴饶色（朗达玛灭法后复兴佛教的大律师）送卢梅到西藏去的时候，把自己戴着的一顶黄色帽子送给鲁梅，说戴上这个就想起我来了。因此，过去一些大持律者都戴黄帽子。宗喀巴想振兴戒律，因而也就戴上了与过去的持律者同样的黄色帽子。”1935年，他依南喀坚参（意为空幢）之规劝，供精其寺慈氏像（通俗称弥勒菩萨）、比丘衣具一套（按：改善萨像成比丘像，用意在于真菩萨亦应守比丘戒，反显自命为菩萨的喇嘛们，自以为可以不守比丘戒是错误

的），这等于宣布大小显密一切僧众均应守戒。1940年春，宗喀巴在拉萨西郊的噶瓦栋寺给四百五十多人讲大乘戒律方面的一些内容。原因在于当时西藏佛教各教派的僧人都不愿意受比丘戒的约束，理由是他们都是学大乘佛教的，不该用小乘佛教的戒律来约束他们。这只是一种借口。这种情况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难于用比丘戒来约束僧人了，所以宗喀巴改用大乘戒律来说教，意思是说不管学显宗还是学密宗，都必须遵守僧人应该遵守的生活准则，要受戒律的限制、约束。宗喀巴提出，如果僧人生活不受戒律的约束，那僧人和俗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其次，宗喀巴在提倡僧人要严守戒律的同时，又通过著书立说为“宗教改革”建立理论基础。1401年，他开始写作《菩提道次第广论》，次年完成。这一部巨著，有二十四卷，书中依据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阐述从人到成佛的修道次第，先用佛教显教的道理论述，最终用密宗理论结束。宗喀巴批评他以前西藏佛教徒对佛陀言教的不正确态度说：“今勤瑜伽多寡闻，广闻不善于修要，观视佛语多片眼，复乏理辨教义力。”这是概括了当时西藏佛教徒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也是宗喀巴著《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动机，他想用佛教的理论批评那些片面的认识和作法，这是他改革佛教徒弊端的弘愿。到1406年他又写《密宗道次第广论》，也是宗喀巴专门叙述密宗的来源、派别，以及修密法之密集，大威德、胜乐金刚等最高本尊的巨著，从此以达到即生成佛的目的。因为密宗有一定的神秘性，加之实践密宗的过程中，还有用“密妃”之说，有些人因为不了解其真谛，也产生一些看法，对于密的道理和神秘性，的确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宗喀巴有许多其他著作，如《菩萨戒品释》，菩萨戒和比丘戒，是性质与范围不同的两类戒律。比丘戒是专门约束出家比丘的，要求出

家比丘遵守戒条，总共约253条。而菩萨戒，是约束比丘菩萨和世俗菩萨的。这里讲的“菩萨”并不是我们从认识上习惯叫的“菩萨”概念，它是指具体的“人”，判断这个“人”是否是“菩萨”，主要是从思想和行为上来判定。思想是要有“大悲心和菩提心”，行为是要实行“六度万行”，所以菩萨戒又叫“饶益有情戒”。它的戒条虽不像比丘戒的戒条那么多，但它却有与比丘戒性质不同的特点。比如，“不杀生”这条戒，在比丘戒中是绝对需要遵守的，如果违犯了，就要按戒律惩处。按“饶益有情戒”的要求，如果对“有情”，具体说对“人”以“利人”的心为出发点，去做一切事情，就算合乎菩萨戒的要求，否则，就算违犯了菩萨戒。这两种戒都是释迦牟尼制订的，因为约束的对象不同，所以要求也不同。宗喀巴提倡这两种戒，是为他的“宗教改革”服务的（以上见杨化群《著名的藏文翻译家一法尊上人》）。

第三，修复寺庙，创立讲经法会。对宗喀巴的“宗教改革”支持得最积极、给以援助最多的是帕竹地方政权。因为宗喀巴提倡的那一套，对恢复西藏佛教在人民群众中的号召力，加强西藏佛教作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的功能，是有好处的。所以在帕竹政权支持下，宗喀巴的宗教改革活动，除上述两个方面外，修复寺庙和创立讲经法会也是一个重要内容。1393年夏，宗喀巴师徒九人去阿喀宗以北精其寺，朝礼寺中慈氏像（即弥勒像），设供发愿。1394年，劝化阿喀宗宗本父子重修寺庙，而自任殿堂彩绘之费用。到了1397年，宗喀巴在聂地区之饶仲寺，创办讲经法会。先是聂地区四部之第巴（指地方头人），因争班次先后等问题，彼此不和。宗喀巴设法调解，采取在饶仲寺举办讲经法会作为四个第巴彼此会晤和好的场所。四部第巴也从此成为宗喀巴的施主。同时也给宗喀巴在社会上带来了声望。1399年初，

自藏历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宗喀巴师徒在精其寺弥勒像前举行祈愿法会，参加约有200余僧人。后来，宗喀巴在帕竹地方政权的掌权人、明朝册封的阐化王扎巴坚赞和内邬宗（今拉萨西郊）宗本南喀桑布及其侄班觉桑布的大力支持下，于1409年的藏历正月间，在拉萨大昭寺发起了一个大型的祈愿法会。这个祈愿法会藏语称“默朗钦摩”，汉语叫传大召或传召大会，参加僧人达万余人，观看的俗人有几万人，而且是不分教派、不分地区的西藏佛教徒的大聚会，声势之大过去是没有的。宗喀巴能发起这样一个大法会，说明这时他已经提高到被公认为西藏佛教界的一个领袖人物。

之后，宗喀巴又在帕竹地方政权属下的贵族仁钦贝和仁钦伦布父子的大力资助下，在拉萨以东偏北30公里的地方创建甘丹寺（又作噶丹寺）。从此，以他为首的新教派——格鲁派，以甘丹寺为主寺成立起来。因为宗喀巴的思想体系和主要著述，又是继承和发展了噶当派的思想体系而成的，所以在一个很长时期格鲁派被称为新噶当派。

1414年，明朝永乐皇帝又派使者邀请宗喀巴进京，因大病初愈（另一说：宗喀巴考虑到黄教正是初创，自己不便离开），遂派弟子释迦也失（1352—1435）代表自己进京。1415年，永乐皇帝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于是宗喀巴又成为明朝大国师之师。1416年，宗喀巴另一弟子绛央却杰（1379—1449，意为妙音法尊）在拉萨西郊建哲蚌寺。1418年，释迦也失在拉萨北郊建色拉寺。这样，甘丹寺和这两个寺，通称三大寺，奠定了黄教发展的基础。

1419年（明永乐十七年），藏历10月25日，宗喀巴圆寂，享年六十三岁。宗喀巴之后，由贾曹杰·达玛仁钦任甘丹寺赤巴。

贾 曹 杰

(1364—1432)

贾曹杰，全名为贾曹塔巾钦巴·达玛仁钦，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第一位大弟子。“贾曹”意为将继君位之王子，此称原于印度，西藏佛徒引用于宗教事务中。杰为尊称，意为主。具体的说就是“接替宗喀巴法王地位的人。”达玛仁钦是法名。后藏仰堆地方人，1364年生。十岁时在内宁寺以仁钦坚赞(宝幢)为亲教师，以童戒为阿阇黎而出家受沙弥戒，法名达玛仁钦是此时所取。他依止二人学习沙弥律仪，又从吉祥怙学习藏文文法，次依岗仅庆喜祥学《释量论》、《决定量论》等因明诸书。依宝金刚学习《现观庄严论》等般若部教义。依仰堆巴义成学习对法。依慧贤学习戒律。尤其是依止萨迦派的仁达哇·旬努洛追(童慧)复习般若、因明、戒律、对法、中观等显教经论，进学集密等密教诸法，对于内外各种宗派教义均能贯通，成为仁达哇的上首弟子。二十五岁时(1388)在后藏拉堆受近圆戒，成为比丘。

此后，到萨迦、桑朴、孜塘等后藏各大寺院辨析十部大论，与藏教释迦坚赞及大贤亚巴等萨迦诸大德辩论而闻名，获“噶居

巴”之称。又到前藏诸寺立宗，会见宗喀巴，发愿为其长随弟子。此后直至宗喀巴入灭以前二十余年，一直随师之侧，凡师所讲显密教授，随所听闻，详为记录，或依意旨作注。《圆满次第春期明点笔记》等，都是他记录师说之作。

1309年春，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广兴供养之后，初建噶丹寺，即由贾曹杰和都增扎巴坚赞（持律名称幢）二人负修建。凡一切修造仪式，如观地、白僧、规定净厨、差职事人等，均照律中的制度。

宗喀巴在世时，其徒众已都从贾曹杰受学，凡经宗喀巴度令出家受戒的弟子，贾曹杰都摄护使他学业增长，不令荒废。

1419年，宗喀巴“大师在涅槃时，以法衣及头冠付与贾曹大师，便知道师意是在传位给他。于是都增扎巴坚赞和上座仁钦坚赞等诸大弟子，遂同声启请，贾曹乃领受灌顶，继登大狮子宝座。当时，克珠大师造《吉祥功德赞》，班钦根登珠巴亦造《殊胜普贤轮诗》作为赞颂。他也如宗大师的事迹一样，清净了律学的讲听轮三戒之实行，以此为本，兼宏《集论》、《俱舍》、《量论》、《现观庄严论》、《中论》等显教。别宏总的密乘，其中特弘《集密》、《胜乐》、《时轮》、《欢喜金刚》、《大威德》等本续讲解和二次第引导。总之宏传了藏土先德智境所未达到之处的大师所有妙论，并以自己的验证和无垢教理而为证成。如是，说法十有三载，宗师的多数亲教弟子和所有具备法缘的智者，皆油然的生起景仰，恭敬礼奉，视同犹如大师在世没有丝毫差异。他如子绍父业一般建立起大师讲修教法的宗风”（见《土观·宗派源流》）。

1431年，赴后藏内宁寺，朝礼供养宝幢的遗塔并广供僧众。这时宗喀巴另一大弟子克主杰来见，于是一同回噶丹寺，并请克

主杰住持法座，他自己则退居于嘉康则静修。

次年（1432），在拉萨布达拉宫示寂，寿六十九岁。由克主杰率众，将遗体运回噶丹寺，在嘉康则院中火化。

贾曹杰一生的著述很多，现在刻版流行的共有八函，包括显密各方面。关于因明方面的有：《释量论颂释》、《决定量论大疏》、《正理滴量论释》、《集量论释》、《论量备忘录》、《现量品备忘录》、《因明道论》、《观察关系论释》、《相违连系建立》、《释量论略义》。拉卜楞寺所刻全集本内有《因明正理藏论》的注解。中观方面有：《中论八大难义备忘录》、《中论八大难义释》、《入中论略义》、《中观宝鬘论释》、《中观四百论释》、《中观庄严论备忘录》、《六十正理论释》、《六十正理品讲录》、《二谛建立正见讲授》。《现观庄严论》方面有：《现观庄严论显义解心藏庄严论》、《现观庄严论略义》、《现观次第修法》、《入现观七十义修法》。密宗方面的有：《集密妙吉祥金刚曼荼罗仪轨》、《集密师承祈祷文》、《修法普贤义释》、《集密难义笔记》、《时轮二次第道修法》、《修法品四印笔记》、《时轮六支瑜伽略讲》、《圆满次第春期明点笔记》（见法尊《嘉曹杰》）。

绛央却杰

(1379—1449)

绛央却杰，是“妙音法尊”之意，他的本名为扎西贝丹。他是西藏桑耶地方人，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闻持第一的大弟子、哲蚌寺的创建者。

绛央却杰幼年在属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帕竹噶举的泽当寺出家，也曾到过桑浦寺和觉摩隆寺学法。以后，他回到泽当寺，担任掌管寺内排定座次的职务。后来，他追随了宗喀巴大师，并从其师受了比丘戒。

绛央却杰是一位“凡有讲说皆由心中背诵而说”的人。《土观·宗派源流》说：宗喀巴“大师曾让他背诵百部经论，师（即绛央却杰）能背诵显密经论一百零八部的文字和义理，……。”所以说他是宗喀巴大师弟子中闻持第一的弟子。

1414年（明永乐十二年甲午），宗喀巴大师受帕竹地方政权的首领扎巴坚赞之请，于扎喜朵喀安居，为数百三藏法师讲中论、因明、菩提道次第、入行论等深广教法时，一日告妙音法尊曰：“汝可建一圆满道场，子寺较过于母寺（指噶丹寺），尤能发展兴盛。”并授于绛央却杰曾从果巴日山（在噶丹寺旁边一座小山

名）伏藏中取出之法螺。次年（1415年）由乃乌宗宗本南喀桑布为施主，在拉萨西郊遂建哲蚌寺大道场。1416年（明永十四年）哲蚌寺建成时，宗喀巴大师为表示重视，亲自主持了“开光”仪式。

哲蚌寺的全名是“吉祥米聚十方尊胜洲”，简称为哲蚌寺。“哲蚌”意为米聚之意。初建时，派七位说法阿阇黎，各别宣扬法要后遂成为七大扎仓，后来逐渐合并为四个扎仓，即果莽、罗赛林、德扬和阿巴扎仓。前三个为显宗扎仓，后一个密宗扎仓。哲蚌寺规模宏大，房屋众多，寺院建成就有2,000余名僧人，后来定员为7,700人，是黄教在西藏四大寺院中发展最快的一座寺院。

哲蚌寺建成以后，绛央却杰就当该寺寺主，一直到他逝世为止。公元1449年去世，享年七十岁。

俄尔钦贡噶桑波

(1382—1456)

俄尔钦贡噶桑波，是藏传佛教萨迦派后期（即十四世纪后半期）在密教方面出现的三个支派中俄尔支派的创始人（其他两个支派是贡噶支派和擦尔支派）。

萨迦派在萨班以前，在宗教方面是有相当声望的，到萨班时萨迦派的声望最大。自从萨迦派在政治上得势以后，萨迦人在中央和西藏地方多据要津，声势显赫。这时，除了几个在宗教史上著名的僧人以外，其他多是在家学法，纵然晚年出家，也已娶妻生子。所以，出家与在家的分别不太严格。特别是他们进入宦途以后，往往改着蒙古官服，贪求享受，追逐利禄，形同俗人。萨迦派失势之后，这一派才又有一部分人恢复了他们的宗教生活，出现了新建的寺庙，也有人把他们称为萨迦派的几个支派。俄尔钦贡噶桑波就是在密教方面三个支派之一的俄尔支派的创始人。

俄尔钦贡噶桑波生于萨迦，学于萨迦，1390年他九岁时出家，在萨迦东院学习萨班·贡噶坚赞著的《三律仪论》。以后又从萨迦派其他人学习显密经论，而以佛陀室利（属喇嘛当巴索南坚赞法统，索南弟子贝丹楚臣的弟子）为他的根本上师，从其

学习萨迦派的道果教授。以后他曾做过萨迦的堪布，相传各地来从他受戒的人，有万余人。1429年他年四十八岁时，创建艾旺却丹寺，即俄寺（在后藏纳塘寺和霞鲁寺之间）。这个寺成了晚期在后藏传播萨迦派密法的重要场所。贡噶桑波在寺里先后讲《道果》教授八十三遍，“传《金刚鬘》灌顶六十余遍，由此可知其传授的灌顶、引导、要门等之多不可计量。传授具足戒过万人。终生守持净戒，日为素斋一食。”（见《土观·宗派源流》）。另外，他除到前藏两次、阿里三次传授萨迦派密法外，还曾两次到洛敏汤地（原属西藏，现在尼泊尔境），传授萨迦派密法。

俄尔钦贡噶桑波的弟子有很多人，其中为首的是沫钦·摩诃萨埵·贡乔坚赞（按：“沫钦”是部落兼地名，“摩诃萨埵”意为大菩萨，是称号）继承他的俄尔寺堪布地位。贡噶桑波对余人来说的《道果》心要皆秘密传与贡乔坚赞。从此以后讲授《道果》法门的风规遂有“对会众说”及“对弟子说”之分。由贡乔伦珠、塔孜巴·南喀白桑、朱康巴·白丹顿珠等法嗣，次弟相承，后遂号为俄尔支派。

得 银 协 巴

(1384—1415)

得银协巴，本名却贝桑波，系藏传佛教噶举派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明朝封给西藏佛教各派诸王中地位最高的法王——大宝法王。

得银协巴，出生于西藏工布地区娘布地方（即尼泽河流域）。其父亲是当地专修密法的人。1387年，他四岁时就从喀觉旺波（红帽系第二世活佛）学法，学习《金刚鬘》、《六法》（即“那绕六法”）及《时轮六加行》等密法。1390年，七岁，在工布地区的则拉岗出家，取法名却贝桑波。十八岁时，他到昌都地区的馆觉和类乌齐一带传法，当时馆觉正有发生战争危险，经他的调解，战争才未发生。于是受到馆觉地方长官斡即南喀（即《明史》卷十三中所说的封为护教王之宗巴斡，即南哥）给他贡献了大量财物。之后他又回到工布。1403年他二十岁，在则拉岗受比丘戒。后来，明成祖派宦官侯显与和尚智光专程到西藏召请得银协巴去南京。他应召于1406年冬到了南京后，永乐皇帝在华盖殿设宴欢迎他。第二年春，明成祖命他在灵谷寺为其父母（明太祖帝后）荐福，设普渡大斋，史称“多有灵瑞，帝大悦”。到了这年3月，

明成祖赐给他“如来”的名号，“得银协巴”，就是“如来”的藏译。此后他就称得银协巴，他的原名却贝桑波，反而不再使用了。同时，并封他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简称“大宝法王”。得银协巴的弟子中也有几个人先后被封为国师、大国师。明成祖又命得银协巴在五台山为新故的皇后“荐福”。

1408年（明永乐六年），得银协巴返回西藏。回藏后他先后两次到前藏各地传法，前来听法的僧俗官民，不计其数。1415年（明永乐十三年）卒，终年三十二岁。

自从得银协巴受封为大宝法王以后，这个封号遂成为黑帽系的历代转世活佛专有的一个封号。一直到明末，他们都自称“大宝法王，”按期派人到京师朝贡。噶玛噶举除有寺院所属农奴并占有耕地牧场外，但未形成为当时的一个地方政权（元朝所封的十几个万户中没有他，《明史》也称其为游僧），得银协巴以后，一直到其第十世，都是采取周游各地，传法收徒，联络地方势力，以保持和扩张其势力的，所以被称为游僧。黑帽系第六、第七、第八和第九世活佛的事迹记载不多。

克 主 杰

(1385—1438)

克主杰，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两位大弟子之一（另一位是贾曹杰）。“克”是说他显宗学得精通；“主”是说他密宗修得有成就。这个名字是对他的尊称。因为他对大师宗派建树有大功劳的缘故，而被称为宗喀巴内心传弟子唯一之人。

1385年（明太祖洪武十八年）4月8日，克主杰出身于后藏拉堆多雄地方的切卧村。父名贡噶扎西，母名布珍甲姆。幼年到萨迦寺出家，拜萨迦派大德僧格里赞为亲教师，功德光（云丹沃）为阿阇黎出家受沙弥戒，取法名格来贝桑（又作格雷贝桑）。先从二师学沙弥律仪，后亲近萨迦派仁达哇旬奴罗追，受学七部因明、大小对法、《慈氏五论》、《中观理聚》和毗奈耶等，通达无碍。以后从智祥受欢喜金刚的灌顶，并学道果教授。再从福幢（索南坚赞）等广学显密教法，获得辩才，通达宗派深义。

克主杰学完诸部大论后，遂往后藏地区各大寺院立宗辩论。1400年冬，他十六岁，到昂仁寺立宗，与浦东却列南杰进行辩论，克主杰获胜，于是“名震一时”。克主杰很有文学才华，他十八岁时造的《说法狮子文殊菩萨赞》，就是著名的文学作品。

1405年，克主杰二十一岁，依仁达哇旬奴罗追为亲教师，班觉喜饶为羯磨师，无等慧为屏教师受比丘戒。此后常于仁达哇座前听诸法要，“精通显密二宗”。1407年，他二十三岁，持着仁达哇的介绍书信到前藏色拉却顶谒见宗喀巴。他见宗喀巴衣食住行皆如律制，而自己平时以大学者自居，所着服装，都不合律，感觉惶愧。接着，把仁达哇的介绍信呈上，行弟子礼，拜宗喀巴为师。宗喀巴为他传授十三尊能怖金刚大灌顶，并传授以大威德为根本经典《七观察续》、《三观察续》、《四瑜伽次第》等关于大威德的一切教授。另外，他还从贾曹杰、都增扎巴坚赞等的弟子听闻法要。在噶丹寺中，凡经十月，依止宗喀巴大师日间讲授《菩提道次第》、中观、对法、因明等显教经论和集密、欢喜金刚、胜乐、时轮等密教经论，夜间讲授生起次第、圆满次第要义。

他学得一切教授之后返回后藏，作仰朵绛惹住持，广播教法，因此有绛惹迦巴的称号。又建日窝觉巾寺，常住寺中净修宗喀巴所传的显密教授。

1431年，贾曹杰到后藏内宁寺时，克主杰往见。贾曹杰请他继承噶丹寺法位，于是同返前藏。到噶丹寺时，上座宝幢率寺内全体僧众迎接礼敬。贾曹杰退位，请克主杰升登宗喀巴大师的狮子宝座，依照成规如法教化大众，每年讲《菩提道次第论》一遍，并传授请尊灌顶、教授。另外，克主杰大力募捐，获得了足够的铜铁和黄金，在贮藏宗喀巴肉身银塔的藏式大殿的屋顶上，建造了一座汉式的金顶（俗名金瓦寺），这是噶丹寺历史上建筑的第一座金瓦寺。贾曹杰去世后，将其遗体迎回噶丹寺火化，并在宗喀巴塔右侧建造银塔供养遗骨。此外又在噶丹寺兴建讲经扎仓，派释迦室利等为教经阿闍黎，宣传五部大论，弘扬宗喀巴的教法。

克主杰的得法弟子很多。其上首有法王慧法护、霞鲁瓦勒巴坚赞（继克主杰后任法座）、堪勤福胜成、遍智圣光、拔梭法幢、宝海慧、京俄慧幢等。

克主杰的著述，现在流传的有十二函。在显教方面有：《宗喀巴大师传》、《现观庄严论注疏》、《释量论大疏》、《显示甚深空真实义论》、《三律仪建立论》等多种，都是现在西藏佛教学者所必须参考的书籍。在密教方面有：集密的各种修法，能怖金刚、胜乐轮、欢喜金刚、时轮等各种修法和经的注释。又有总贯诸部密教的《续部总建立论》等。（参见法尊《克主杰》）

克主杰自1407年拜宗喀巴为师以后，即成为宗喀巴创立格鲁派的忠实信徒。作为宗喀巴的第二大助手，跟随宗喀巴12年，在阐述格鲁派教义、制订格鲁派的各种法规和学经程序，以及黄教寺庙的管理制度等方面，他都亲身参与了筹划工作。他对宗喀巴的思想和成就，都有深刻的体会。所以后来虽然有不少黄教高僧大德撰写了多卷本《宗喀巴传》，但都没有超过克主杰撰写水平。

1438年（明英宗正统三年）2月21日，克主杰在噶丹寺第三任赤巴任内逝世，享年五十四岁。由于贾曹杰和克主杰作为宗喀巴大师的第一、第二两大助手，对于创立格鲁派起了奠定基础的作用，因此藏族宗教界把宗喀巴、贾曹杰和克主杰三人合称为“师徒三尊”、“父子三尊”，在寺院中有他们的塑像。

后来，藏族宗教学家和史学家追认克主杰为第一世班禅。

汤东结布

(1385—1464)

汤东结布，全名叫做吉祥成自在宗追桑布，人称甲桑朱古，意即铁桥活佛，后藏人。出身贫苦家庭，幼年出家为僧，是藏传佛教噶举派（俗称白教）僧人，是明代藏族著名的建筑师和藏戏的奠基人。

传说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十几座铁索桥，都是汤东结布通过演藏戏募捐集资修建的。雅鲁藏布江铁索桥是一种古老的具有民族特点的桥梁建筑，把铁索凌空悬吊在河的两岸，再在铁索上铺以木板，构成简单的桥面。载重量不大，一次仅可通行两人，或一人带一只羊，或一人背一包东西。这种渡河方式很惊险。但是，在五、六百年以前边远的西藏地方，汤东结布就能因地制宜地创建这种桥梁，是难能可贵的。它反映出当时藏族社会已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也充分显示了藏族人民的聪明才智。所以，直到现在藏族的工匠们仍把汤东结布奉为祖师。

传说汤东结布又是藏戏的创始人。据《云乘王子》剧本的作者在《序言》中说：“昔，我雪域之最盛成就自在唐东杰白（即汤东结布）赤列尊者，以舞蹈教化俗民，用奇妙之歌音及舞蹈，

如伞纛复盖所有部民，复以圣洁教法及伟人之传记，扭转人心所向，而仪轨殊妙之‘阿佳拉莫’遂发端焉。”类似这种传说极为普遍，并说汤东结布经常采用书、画、说、唱等方式传教，后来经过进一步地加工和改革，就成为藏族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藏戏。

传说中的汤东结布，是一位洒落不羁，颇肯接近群众，素为藏族人民群众所爱戴的人物。关于他的故事和传说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十七世纪初，居迈德钦根据民间传说写了《汤东结布传》，有德格木刻版传世。1982年四川民族出版社铅印出版。《汤东结布传》多以神话故事，关于他建筑桥梁等事迹记述不详。

汤东结布于1464年逝世，享年七十九岁。

根 敦 主

(1391—1474)

根敦主，又作根敦主巴，意为僧成，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大弟子之一，后藏扎什伦布寺的创建者。后来被追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

根敦生于1391年，生在后藏萨迦寺附近的一个牧场主家庭。父名贡保多吉，母名觉真朗吉，根敦主兄弟姊妹五人，他排行第三。因家遭匪抢劫，生活困难，所以他自幼在家帮助父母牧羊。七岁时丧父。他亲手写出《药师经》一部为亡父忏罪。

1405年（明永乐三年），根敦主十五岁，出家为僧。是年3月，在纳塘寺，依成就慧为亲教师，罗敦巴阿闍黎，受沙弥戒，取法名僧成祥，后在末后自添贤字，具名“僧成祥贤”（根敦主贝桑波），简称根敦主（僧成）。

根敦主出家以后，住纳塘寺依师学声明五种结合等，又从温敦能仁祥贤受学各种灌顶，及经论讲解。1410年，他年满二十岁，仍依成就慧为亲教师，在纳塘寺受比丘戒。遵师命聆听讲全部噶当派法类。又依罗敦巴的指示，先学因明论。同时在亲教师前，受欢喜金刚九尊等多种密法灌顶。又受中观派的发菩提心的

仪轨，并受菩萨戒。还听了噶当派六论等许多教法。1415年，他二十五岁，与饶却巴结伴赴前藏，先到茶主寺，后到塘波伽寺，从绒敦释迦幢听讲《现观庄严论》。此时，宗喀巴大师受当时统治西藏地方的帕竹地方政权的第五代法王扎巴坚赞（名称幢）之请，在扎喜多喀地方向僧俗民众讲经说法。根敦主随侍滚桑巴往见宗喀巴，请决《决定量论》之疑义。听讲《辩了不了义论》、《中观论释》、《事师五十颂释》、《根本罪释》等。由于他智慧聪颖，深得宗喀巴大师的嘉许，并给以一件穿过的五衣作为将来弘扬律学的因缘，继而他从师命，回塘波伽依日幢受学集密不动等、十三尊金刚怖畏、十三尊红大威德、五尊红大威德等密法。后来到噶丹寺，仍从宗喀巴闻法。1416年秋，他又到噶丹寺从宗喀巴听讲《菩提道次第广论》和《胜乐轮根本经》等。并从贾曹杰听讲因明、《现观庄严论》等法。如是经过三年学法很多。1419年，宗喀巴到哲蚌寺时，他又从听讲《菩提道次第论》，并受《那绕六法》、《入中论》等许多法。宗喀巴后到色拉寺会释迦智法王（即释迦益西），依着清净戒律为基础，树立讲授集密和胜乐的道场，根敦主亦随从参加。同年，宗喀巴圆寂，根敦主又从贾曹杰学显密二宗，“自谓关于显教从贾曹杰得益最大”。1432年，贾曹杰圆寂，经噶丹寺僧共同商定，迎接克主杰前来噶丹寺就任第三任噶丹赤巴，根敦主“复从克主杰学多法要”。此后根敦主返回后藏，在纳塘寺、绛勒寺、达擎日库等处讲经，门徒渐众。1437年，他四十七岁那年，完成了《因明正理庄严论》的撰写。此后他自己多次讲说此论，至今仍为西藏不少寺院学习因明时必备的要论。同年把日库寺住持让位于善慧法王，自己暂在格塔寺闭关自修。

1447年10月，根敦主得到桑主则（即今日喀则）宗本乃穹吉

巴·班觉桑布之资助，在桑主则之旁兴建了扎什伦布寺，寺成即任该寺赤巴。此后就多在此寺广讲经论，寺僧日增，遂成格鲁派在后藏的唯一大寺，并为西藏格鲁派四大寺之一。

1438年，噶丹寺赤巴克主杰圆寂，噶丹寺教务乏人主持，遂在1450年寺僧派人去请根敦主前往继任噶丹寺的赤巴，根敦主说：“吾不能去，若才建此寺即离去，恐不坚稳。”他举荐了克主杰之弟拔梭·曲结坚赞前往噶丹寺担任了第四任噶丹寺的赤巴。扎什伦布寺建成以后，根敦主又想建立集密诸像，树立讲说集密法的规则，命其弟子贤吉祥在寺讲说。同时，铸造集密五部像及白度母像。又在大殿中，塑造教主、无量寿佛、药师佛、八大菩萨和二十五肘高的弥勒像。1464年，根敦主已七十四岁，还邀请各处善书者，抄写经藏一部，并彩绘佛殿的壁画。随后又铸各种尊像。以后，又刻贤劫千佛像，历代传承师长、三十五佛、十方诸佛、药师八佛、及诸本尊的石像，并佛名号等很多。教化完毕，遂把寺事嘱咐大弟子，于1474年12月，圆寂于扎什伦布寺，寿年八十四岁。根敦主圆寂后，由其大弟子班青·桑布扎喜继任扎什伦布寺的赤巴。

根敦主一生广事弘法，弟子很多，前后藏大小寺院的住持、讲经法师多是他的弟子。初期最著名的有慧密、祥贤等，中期有班钦教理海等。晚期有广喜利乐，善慧日等。

根敦主讲说经论，多依据宗喀巴、贾曹杰和克主杰的注疏而讲。自己的著述有：《毗奈耶因缘大集》、《律经大疏》、《别解脱经注》、《释觉论疏》、《正理庄严论》、《中观论疏》、《入中论疏》、《戒学规章》。又有诸佛菩萨的赞颂、愿文等，约数十种。另外还有《俱舍颂释》，是他的大弟子菩提祥等听他讲说时所作的笔记。

吐顿·贡噶南杰

(1432—1496)

吐顿·贡噶南杰，“吐”系家族名，因出生吐弥桑补扎族中，故名吐顿。幼名扎安杰布（据说他幼年时即善巧五大陀罗尼的诵持，故有此名）。他是藏传佛教萨迦派在十四世纪后半期，在密宗方面出现的三个支派之一贡噶支派（另两个支派是俄尔和擦尔）创始人。

吐顿·贡噶南杰从吉·降巴林巴（慈洲大师之意）受比丘戒。后以喇嘛当巴索南坚赞的三传弟子扎托巴·索南桑波为根本上师，学习密法。1464年，他三十三岁时，在前藏贡噶宗的东边创建多吉丹寺，后来通称贡噶寺。这个寺逐渐成为在前藏传播萨迦派晚期密法的重要场所。

另外，《土观·宗派源流》说，吐顿·贡噶南杰还“创立各种曼陀罗仪轨，法事实修次第，以及跳神等的事相，获得护法感应，有神通法力，名声很大，著作等身。”从此系所出的则名为“后宗巴系”，或名贡噶支派。

吐顿·贡噶南杰1496年去世，终年六十四岁。

索 南 却 朗

(1439—1504)

索南却朗，后藏恩萨（今日喀则县江南区境）人，生于1439年（明英宗正统四年）正月初十日。幼时传说他能追述班禅第一世生前之事迹，聪明异常，后到噶丹寺出家为僧，一日去到当时担任噶丹寺赤巴拔梭·曲结坚赞座前顶礼时，赤巴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毕鸟”（即牛犊之意）。赤巴曰：“犊长成牛。”牛，藏语称“朗”，因此赐法名索南却吉朗布，简称索南却朗。见其灵慧异常，遂收为门徒，授以灌顶。由于他勤奋好学，精通显密二宗，特别善长于辩论，在当时噶丹寺的三千喇嘛中，凡与索南却朗辩论过的人，都败在他的手下，在噶丹寺“声名大著”，得有格西学位。

索南却朗中年以后，离开噶丹寺返回后藏，驻锡隐更寺，专事禅修，不问俗务，有僧徒十六人，俱成大器，广宣佛法，在后藏宣扬和发展黄教有一定的贡献。

1504年（明弘治十七年）3月25日圆寂，享年六十五岁。法身宝塔供于后藏隐更寺中。

后来，西藏历史学家追认为第二世班禅（见《班禅大师全集》）。

却 扎 益 西

(1453—1524)

却扎益西，一般藏文史料称他为沙玛尔却扎巴，他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四世转世活佛，羊八井寺的创建者。

却扎益西十岁时曾到青海西宁一带，并从西宁北上去蒙古族地区云游传教(一个活佛系统总是有一些核心人物，实际主持着一切事务。他们的活动就是在活佛本人很年幼的时候也照常进行)。返回西藏以后，又曾到康区、工布，以及前藏各地进行活动。后来他的活动得到后藏贵族仁蚌巴·顿悦多吉的大力支持，于1490年在拉萨西北的羊八井地方建立羊八井寺。五世达赖喇嘛在他著的《西藏王臣记》中说，顿悦多吉和沙玛尔却扎巴结成施主与受供养者的关系，他们两人计议之后，由顿悦多吉资助兴建羊八井寺，并且拨给谿卡(庄园)和农奴。从此，红帽系的主寺就从1333年建立的乃囊寺迁到了羊八井寺。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地方势力的首领和一个宗教派别首领结合的关系，通过这样的关系，噶玛噶举和仁蚌巴家族就形成了利害与共的一个集团，却扎益西就是这个集团的谋士。他们的矛头指向是帕竹与黄教结成的集团。1481年，仁蚌巴以武力打败帕竹地

方政权，就是红帽系四世却扎益西主谋的。1498年，仁蚌巴的势力到达拉萨以后，禁止哲蚌、色拉两寺的僧人参加一年一度的传召大会，也是却扎益西出谋划策的。直到1518年，哲蚌寺和色拉寺两寺的僧人才被允许重新参加传召大会，并由哲蚌寺的寺主持法会。1524年却扎益西逝世，享年七十一岁。

根敦嘉措

(1475—1542)

根敦嘉措，是被后来追认的第二世达赖喇嘛。他于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出生在后藏达纳地方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名贡噶吉村，母名贡噶贝姆。

1485年（明成化二十一年），他十一岁时，被迎入扎什伦布寺。次年，从隆日嘉措受近事戒，取名根敦嘉措贝桑波，同年出家，受沙弥戒。后来即1494年（明孝宗弘治七年），因与扎什伦布的第四任赤巴班青益西孜莫失和，而接受哲蚌寺赤巴嘉样列巴曲觉之请，遂前往哲蚌寺学经。后又拜嘉样列巴曲觉为师，受比丘戒。就在此前后，支持格鲁派（黄教）的帕竹政权已经衰落，而后藏仁蚌巴贵族集团与噶举派的噶玛噶举相勾结，对黄教采取敌视态度，当仁蚌巴贵族集团的武力控制了拉萨以后，自1498年到1517年间，竟禁止哲蚌、色拉两寺僧人参加每年一度的祈愿大会。与此同时，大昭寺的祈愿大会的主持人也改由桑浦寺噶玛噶举的僧人担任。在这期间，根敦嘉措被迫离开了哲蚌寺，避居于斡尔喀（这个宗的宗本全家，从宗喀巴在世时，就一直是黄教的支持者）。另一说根敦嘉措在当时来往前后藏、山南、达

布各地传法讲经，宣扬黄教，扩大黄教的影响和势力，为以后黄教势力统一西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509年(明正德四年)根敦嘉措在塔布地区的加查宗拉摩南错湖滨建立了一座名叫群科杰寺。这座寺建成后，他每年夏秋两季都要来此居住。后来群科杰寺和拉摩南错湖被认为是黄教的圣地，许多人认为未来的事情能够在湖水中显现出来，后世达赖喇嘛去世后寻找转世“灵童”时，西藏地方政府往往派人到这里来看拉摩南错湖中的显现情况。另外，群科杰寺在建寺和大修时，根据佛教上“魔胜”的说法，寺院上层分子要在该寺的大殿四个角落活埋四个男孩。这是事实，并没有丝毫夸大，最后一次是在1957年，当时还要活埋儿童，被救了下来(见《西藏佛教史略》207页)。

根敦嘉措把群科杰寺建成后，扎什伦布寺的上层喇嘛认为他对黄教的振兴做出了最大贡献，于是在1512年(明正德七年)派人把根敦嘉措请回扎什伦布寺担任堪布。他把扎什伦布的大殿扩修为八十二根柱子。后来，仁蚌巴家族渐衰后，格鲁派争回了主持拉萨正月祈愿法会的权力。根敦嘉措又在哲蚌寺全体僧众的要求下，又被请回哲蚌寺，担任第十任赤巴(寺主)，同时又兼任色拉寺第九任赤巴。从此时起，根敦嘉措冬春两季住在哲蚌，夏秋两季住在群科杰寺，他的主要身份虽然是哲蚌寺的寺主，但实际上已成为整个格鲁派的领袖人物了。

1530年，根敦嘉措在哲蚌寺西南角修建了一个名叫甘丹颇章的建筑。它建成以后，成了后来的第三、四、五世达赖喇嘛居住的地方，直到第五世达赖扩建布达拉宫以后，达赖喇嘛的住处才迁到布达拉宫。1541年，根敦嘉措又由古格土王的资助，创建阿里扎仓于山南泽当东北、藏布江以北(见《西藏佛教史略》)。

1541年(明嘉靖二十一年)，根敦嘉措在哲蚌寺去世，享年

六十七岁。

根敦嘉措圆寂以后，哲蚌寺的上层喇嘛正式寻找他的转世灵童。在1544年认定了堆垅地方的一个贵族子弟为他的转世，并于1546年把这个年仅四岁的幼童迎接到哲蚌寺，让他接替根敦嘉措的法位，称其为活佛，这就是黄教采用活佛转世制度的正式开始。这个幼童就是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索南嘉措在1578年（明万历六年）被俺答汗赠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由此往前追认，根敦嘉措即为第二世达赖喇嘛。

擦尔钦·罗赛嘉措

(1494—1566)

擦尔钦·罗赛嘉措(明慧海),是藏传佛教萨迦派在十六世纪时教法史上一位有地位的人物,是密教方面擦尔支派的创始人。此人先学格鲁派教法,在扎什伦布寺为僧。后改学萨迦派密法,关于这一改宗,在《土观·宗派源流》中记有这样一段传说,说某天有尼姑来对他说:“多仁巴尊者遣我来召唤你,寄有此物为凭”。语罢便授与一书,即失所在。擦尔钦心动了,遂往见多仁巴,详述上事。多仁巴说:“瑜伽母亦会偷书呀!观看经架中正缺空行母秘传小册一卷,被窃取后的空隙犹在,将小册放入,恰相符合,他深生虔信。”于是他就从格鲁派僧人改从萨迦派人多仁巴·贡桑却吉尼玛及达钦·洛追坚赞广学俄尔和贡噶两支派所传萨迦密法,并学其他派别尚不知名而只有俄派所特有萨迦家族的嫡系耳传(即萨迦派所不传的萨迦密法)。这样教授遂成为萨迦派各种教授支派总汇一起的大海。一时在西藏宗教界颇有声名。

“杰瓦·索南嘉措(即第三世达赖喇嘛1543—1588)曾从擦尔钦学帐明王和四面明王护法等教授。第五世达赖从索南乔丹(福胜,为擦尔钦·罗赛嘉措的弟子)学擦尔派的道果十三种金法和

修大小明王诸教授法类。故现在格鲁派中亦较为盛行金法及面明王等诸要门。”擦尔钦·罗赛嘉措常住在萨迦以西，拉孜以南的茫喀地方的图丹根培寺，有不少知名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形成了一个传承，即由擦尔钦所传出来的是所有萨迦派中耳未曾闻过的极密对弟子说的要门传承，藏文书上把它称萨迦派的擦尔支派。擦尔钦·罗赛嘉措于公元1566年去世，终年七十二岁。

巴卧·祖拉陈瓦

(1504—1566)

巴卧·祖拉陈瓦，原名顿珠，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噶玛噶举乃囊寺（系噶玛巴红帽系第一世活佛扎巴僧格所建）巴卧活佛却旺伦珠的转世，为该寺第二代活佛，又是当时的一位佛学造诣很深的学者。土观·善慧法日著的《宗派源流》中称：“迦玛巴历代转世之徒众亦多，西藏中部及边远地区，无不遍迦玛之法嗣与寺院。惟迦玛不动金刚（系巴卧·祖陈瓦之师——引者）、勇教鬘（即巴卧·祖拉陈瓦——引者）、主巴白莲（主巴系）等，似应时代需要，专重研究外明诸论。”又说：“不动金刚弟子勇教鬘，学问可入善巧之类，著有入行动大疏、历教论、佛教史等甚多”。（见西北民族学院研究室《资料丛刊》之二）。

巴卧·祖拉陈瓦所著《智者喜宴》一书，是一部“以史料详实和内容丰富而闻名遐迩”的藏文史书。根据作者自述，他从四十二岁和六十岁先后两次撰写此书，六十一岁阳木鼠年（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在贝桑结敏久伦珠寺完稿，刻板于洛扎乃囊寺，故又称作《洛扎佛教史》。该书主要记述吐蕃王室传承和佛教在藏族地区传播、发展的历史。以时间而论，从远古西

藏起到元明时期止。言其内容，除西藏本身之外，还涉及到汉地、突厥、苏毗、吐谷浑、于阗、南诏、西夏、蒙古等，至于古印度、泥婆罗、克什米尔、勃律、大食等地的历史情况，也有记述。具体地说，该书内容涉及西藏的政治、历史、经济、宗教、文化、法律、天文、地理、自然、医学、建筑、音乐、歌舞、绘画等各个方面。

巴卧·祖拉陈瓦，治学严谨，探微求源，注重原始真实史料的搜集。如在《智者喜宴》中记载吐蕃早期十二小邦的史料就与敦煌古藏文史料基本相合。桑耶寺几次兴佛盟誓之盟文诏书，就目前所见史籍来说可谓独他一家。至于记述吐蕃末期属民奴隶大起义的史料，亦堪称第一人。他在治学之道上面，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求实而不盲从旧说。例如他对一年之内“三均贫富”之传统说法，表示怀疑；对于奴隶起义军挖掘吐蕃赞普陵墓一事，认为并非如此。因而也招致一些史学家的非议，但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恰恰正是他的优点。当然，巴卧·祖拉陈瓦和其他藏族史家一样，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和身为宗教上层，唯心史观、宗教意识和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在其著作中屡见不鲜，这反映了他的阶级局限性。但总观全书，《智者喜宴》可列为藏史中之上乘，巴卧·祖拉陈瓦不失为藏史名家。公元1566年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罗桑丹珠

(1505—1566)

罗桑丹珠，后藏叶如德结祥领寺附近，雅鲁藏布江流域答奎恩萨地方人，生于1505年正月初四日，父名索南多吉，母名贝宗吉。与索南却朗系同一家族。

1516年，罗桑丹珠十一岁，蒙大德扎巴邓珠（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说是格白堪青）剃度，受沙弥戒，赐名罗桑丹珠。从极拉热巴聆普拉道次第、时轮金刚、大威德金刚，并受灌顶。后又去后藏扎什甘贝寺，拜该寺堪布曲结罗周坚赞为师，学《集秘金刚灌顶》法。之后，又去扎什伦布寺，从罗桑西尼、土丹朗加等诸大德高僧，精修显密。然后云游各地，讲经传法，广收门徒，名声大振。据说他能“知未来”。

1566年（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2月23日罗桑丹珠圆寂，享年六十二岁。

1713年（清康熙五十二年）他被追认为第三世班禅。

弥 觉 多 吉

(1507—1554)

弥觉多吉，系藏传佛教噶举派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八世活佛。是昌都西北之昂曲河边叶垄噶迪普巴当地方人。父名阿缘木，母名拉麻淳。

五岁时被认定为黑帽系第七世却扎嘉措的转世。六岁时依止粗朴寺贾察活佛第一世扎喜朗杰受大乘别解脱戒，取名却吉扎巴贝桑波。八岁时到了苏莽(今青海玉树县西南附近之大小苏莽)后，即被邓柯大成就者桑杰年热迎到绛曲林寺，受到1,000多僧众的热烈欢迎。1516年(明正德十一年)他抵达云南丽江时，沐天王(指云南丽江纳西族木土司)乘轿，其叔父及其弟乘大象，并备大象一头备骑，延请入宫，极为尊敬。弥觉多杰途经甘孜境内雅江渡口等地时，又迎请邓柯之大成者桑杰年热，在其尊前受沙弥戒，并听习佛法，时年仅十岁。不久返回绛曲林寺，闻习灌顶传经，约住了3年时间。1519年(明正德十四年)，弥觉多杰曾决定奉召进京，但未成行。后抵工布，剃度工布波曲贾察活佛，取名扎巴班觉。二十一岁时，即1528年(明嘉靖七年)受比丘戒。直到三十一岁时才回粗朴寺。1554年去世，享年四十八岁。有著作二十八函逝世。

索 南 嘉 措

(1543—1588)

索南嘉措，《明史》作译锁南坚错。他是第二世达赖根敦嘉措的转世，于1543年（明嘉靖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出生于拉萨西北的堆龙地方的一个贵族家庭。据说索南嘉措的家族，是吐蕃王朝赤松德赞在位时，最早出家的“七觉士”之一玛·仁钦乔所属家族的后裔。索南嘉措的祖上在萨迦地方政权时期就担任官职，到帕竹地方政权时期仍然当官。他的父亲南结扎巴，是穹结宗的宗本，地方上的实力派。母亲名白宗布赤，是帕竹噶举一个上层人家的女儿。哲蚌寺上层喇嘛选中他为根敦嘉措的转世，可能有加强格鲁派和帕竹地方政权的关系的意图。

1546年（明嘉靖二十五年），年仅四岁的索南嘉措被哲蚌寺上层喇嘛用隆重的仪节迎至哲蚌寺供养。1549年，索南嘉措七岁举行了出家仪式，拜哲蚌寺赤巴索南扎巴为师，受沙弥戒。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哲蚌寺赤巴索南扎巴卸任，全寺僧众即拥立索南嘉措为哲蚌寺第十二任赤巴，并主持了当年举行的祈愿大会，为与会僧众讲《佛本生经》。然后，他历游前后藏，从师学法。返回拉萨后，应色拉寺僧众之请，索南嘉措兼任了色拉寺的

第十三任赤巴。1564年（明嘉靖四十三年），他二十二岁，拜格勒巴桑为师，受了比丘戒。然后又周游各地，收徒传法（见《西藏佛教发展史略》）。

就在此时，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成吉思汗十七代孙）率部众从河套进入青海，占据了青海湖一带的藏族地区。俺答汗到达青海时，格鲁派（黄教）已在当地群众中颇有威信，对俺答汗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于是俺答汗为了安定长年征战之后的部众，避免部众叛离，便想利用黄教来巩固他在青海的统治。恰好在当时索南嘉措在西藏宗教界已有很大的名望，于是俺答汗于1576年（明万历四年）派遣代表到西藏迎请索南嘉措到青海会晤。

当索南嘉措成人时，他面临的正是格鲁派的传统支持者帕竹地方政权日趋衰落，敌对的噶举派虎视眈眈，竭力限制和扼杀格鲁派的险象环生的局面。索南嘉措和格鲁派上层僧侣也正希望能找到力量强大的支持者和同盟者，来加强格鲁派在西藏的地位。因此，蒙古军事力量在青海的活动以及他们皈依自己的教派，也是索南嘉措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俺答汗和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的使者到达拉萨后，索南嘉措很快就接受了这一邀请，动身到青海去与俺答汗见面（见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

1577年（明万历五年）11月，索南嘉措从拉萨哲蚌寺动身，1578年5月间在青海湖边新建成的仰华寺（系俺答汗之子丙兔于1577年建成，明万历帝赐名仰华寺）与俺答汗王公会见。会见以后，俺答汗赠送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索南嘉措也回赠俺答汗“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的尊号。“圣识一切”是“遍知一切”的意思。“瓦齐尔达喇”是梵文

“金刚持”的意思。“达赖”系蒙古语，意为大海。“喇嘛”为藏语，上师的意思。

索南嘉措得到“达赖喇嘛”的尊号后，格鲁派寺院集团的上层僧侣立即将索南嘉措定为第三世达赖喇嘛。追认根敦嘉措为第二世达赖喇嘛，根敦主为第一世达赖喇嘛。

索南嘉措与俺答汗会见后，没有立即返回西藏，他继续在蒙古族统治阶级中结纳关系。正如《安多政教史》所记，他以格鲁派教主的身份在青海剃度了一批藏族和蒙古族人出家为僧。又到俺答汗之子丙兔的营地（在甘青两省南部），并在那里为丙兔修建的一座寺院举行了开光仪式。这时俺答汗派西藏三大寺熬茶放布施的僧格喇嘛由西藏返回青海，带回一信，请求索南嘉措尽快返回西藏。索南嘉措没有同意他们的要求，而离开青海前往西康各地讲经说法。1580年（明万历八年），他到康区的理塘地方，这里，当时是云南丽江木土司的辖区。索南嘉措在理塘时，主持建立了理塘大寺，又与木土司建立了联系。

索南嘉措于1582年到了昌都，在那里说法讲经，广收教徒，准备返回西藏。俺答汗的继承人僧格派到昌都请索南嘉措去参加俺答汗的葬礼，索南嘉措不得不从返藏途中折回，再次向北方进发。他在经过宗喀巴的出生地时，在当地人为纪念宗喀巴而修建的白塔旁边建立了一座寺院，后来这座寺院逐步扩大，成为今天青海的塔尔寺。

俺答汗和索南嘉措的会见也引起了明朝的注意，索南嘉措曾通过明朝在甘州（今甘肃张掖）的官员写信给明朝，要求准许他进贡，得到明朝的准许。《明史》是这样记载这件事的：

“时有僧索南坚措者，能知已往未来事，称活佛。”

顺义王俺答亦崇信之。万历七年，以迎活佛为名，西侵瓦剌，为所败。此僧戒以好杀，劝之东还，俺答亦劝此僧通中国。乃自甘州遣书张居正（时为明朝宰相——引者），自称释迦摩尼比丘，求通贡，馈以仪物。居正不敢受，闻之于帝，帝命受之，而许其贡。”（见《明史·西域三》）。

明初，朝廷对藏族僧人进贡没有过多限制，后因回赐总是多于贡品几倍，朝贡的人因有利可图而越来越多，致使明朝穷于应付，遂规定没有“国师”封号的僧人，一律不许进贡（见《明史·西域二》、《明会要·外藩二》）。明朝准许索南嘉措朝贡，显然是把他当作国师或高于国师地位的人来看待的。当明朝得知索南嘉措到达土默特部的消息后，特地派人前往，封给他“朵儿只唱”的名号，为藏文的音译，意为金刚持，赐印章，并召他来北京。这时察哈尔部的图们汗也邀请索南嘉措顺路到察哈尔部传教。于是索南嘉措动身从土默特起程，不幸于1588年3月卒于途中一个名叫卡欧吐密的小地方，时年四十六岁。

罗桑曲结

(1567—1662)

罗桑曲结，全名为罗桑曲结坚赞，系法名，本名叫曲结巴丹桑布。生于公元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4月。父名仲措·贡噶沃色，又叫才仁巴觉，母名措加。后藏日喀则之西的兰伦热布谿卡的竹加白哇村人。

罗桑曲结十三岁入当地安贡寺出家为僧，拜克珠柔结益西为师，剃发受了沙弥戒，取法名罗桑曲结坚赞。由于他努力勤奋，不但精通佛经，而且很有辩才，于是在十四岁时，被拥立安贡寺赤巴。以后，他离开安贡寺去到扎什伦布寺学经，参加辩论，以求深造，获得“柔钦”（全称为“热卜绛钦布”，（为格鲁派初期对有学问的喇嘛的一种尊称。）的学位。

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年二十二岁，拜大堪布班钦当秋亚白（又作唐曲元培）为师，受了比丘戒。之后，罗桑曲结就去拉萨，先在大昭寺内朝拜了文成公主带进藏的释迦牟尼像，并进行了祈祷供养的大典。然后，入噶丹寺学经。在学经的过程中，他选择了“中观”与“因明”两门课程，参加辩论，获得了高僧大德和僧众们的好评。

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罗桑曲结离噶丹寺回后藏安贡寺，接管寺政，传法收徒。并担任该寺的赤巴，后又兼岗建曲培寺的赤巴。当时扎什伦布寺的第十五任赤巴拉旺洛追卸任，扎寺僧众一致决定罗桑曲结担任扎寺的第十六任赤巴。罗桑曲结担任赤巴之后，于1603年，创立了扎什伦布寺的默朗木大会，规定每年正月初三至十六日为会期，内容与拉萨大昭寺的默朗大会相同。公元1607年，罗桑曲结又在扎什伦布寺内创建了专修密宗的阿巴扎仓，从而形成了扎什伦布寺自己完整的由显到密，先显后密的学经体系。

罗桑曲结生活的那个时期，正是西藏社会处于农奴制的上升时期，由宗喀巴发起的喇嘛教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起着扫除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促进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进步作用。但是，这一社会的进步运动，受到旧的保守势力的打击、排挤、摧残，一直发展到必欲置之死地的严重程度。而进步运动为了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对这种保守势力的迫害，必然要进行反迫害的斗争。这就是罗桑曲结生活的那个时代出现的迫害和反迫害斗争的时代背景。

当时迫害势力是相当大的，除了帕竹噶举之外，几乎所有的旧派，对格鲁派都采取敌对态度。其中力量最大的噶玛噶举、止贡噶举和藏巴汗这三股僧俗势力结合在一起，成了格鲁派的死对头，是当时迫害黄教的主力，他们不仅有土地和农奴，而且还有他们自己控制的军队和地方政权。对格鲁派的公开迫害，早在十六世纪就开始了，直到公元1616年第四世达赖云丹嘉措突然在哲蚌寺噶丹颇章宫内暴亡，并下令禁止第四世达赖的“灵童”“转世”，达到了高峰。

不久，藏巴汗忽然得了重病，请多医诊治，均不见效。有人

认为罗桑曲结精通医方明，遂请他前来治疗。罗桑曲结本来是藏巴汗的死对头，是他消灭的对象，但为了活命，迫不得已乃使人去聘请罗桑曲结前来治病，罗桑曲结欣然应命，经他精心治疗，藏巴汗的重病居然痊愈了。藏巴汗对罗桑曲结救命之恩非常感激，准备给扎什伦布寺的阿巴扎仓捐献一处谿卡作为酬谢，罗桑曲结坚决不受，仅提出一个条件，要求藏巴汗允许云丹嘉措的“灵童”转世。藏巴汗也只好答应了，取消了以前发布的禁令。于是哲蚌寺的僧人才公开到各地去找寻四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不久就找到了五世达赖。1625年（明熹宗天启五年）罗桑曲结为五世达赖剃发，授了沙弥戒，取法名阿旺罗桑嘉措。1638年，又给五世达赖授了比丘戒。两人结为师徒关系。

1634年（明崇祯七年），藏巴汗勾结蒙古却图汗要消灭格鲁派，格鲁派也不能不在蒙古族的首领中寻找支持他们的同盟者。据说五世达赖（时年十七岁）和四世班禅罗桑曲结（时年六十二岁，不仅在宗教上获得很高的威望，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一个相当成熟的领袖），共同商议，秘密派人到新疆，要求蒙古和硕特的首领固始汗率兵到西藏，保护黄教。固始汗为了搞清楚这些重要情况，1635年化装成到西藏朝佛的一般“香客”，平安到了西藏以后，据罗桑曲结的《自传》记载：他对达赖和班禅非常尊敬，给五世达赖送了很多金銀珠宝，达赖也给固始汗赠送了“丹增曲吉嘉波”（护教法王）的尊号。给四世班禅也送了白银二千两，并请四世班禅念了平安吉祥经。固始汗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后，就和五世达赖、四世班禅秘密议定了由固始汗率大军由新疆前来青海，第一步消灭却图汗，第二步消灭白利土司，第三步进藏消灭藏巴汗的战略计划。

按上述计划，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太宗崇德七年），固

始汗很快地消灭藏巴汗，占领了西藏。五世达赖也由哲蚌寺的噶丹颇章宫移住到布达拉宫。格鲁派以最后获得全胜宣告结束。在这次斗争中，四世班禅罗桑曲结实际上是幕后主持者，但在公开场合他常以“调解者”的身份出面，并且非常谦逊，从不居功。但是人们公认他是这次斗争的实际领袖。1645年（清世祖顺治二年），固始汗仿照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达赖喇嘛”尊号的前例，给罗桑曲结赠送了“班禅博克多”的尊号。“班”是“班智达”的简称，是梵语智慧的意思。“禅”是藏语“钦波”的简称，“大”的意思。“博克多”是蒙古语，是蒙古人对睿智英武人物的尊称。同时，固始汗把后藏的数十个谿卡，全部捐献给扎什伦布寺，作为僧众的供养。

在1642年固始汗推翻西藏藏巴汗的地方政权统治之时，明朝中央政权虽然尚未崩溃，但是当时清太宗皇太极已全部占领了山海关以外的东北地区，并已扩大到漠南蒙古地区。这时，固始汗与达赖、四世班禅在研究西藏的从属问题，他们共同决定：派遣代表前往盛京（今沈阳），向清朝政府表示归顺。1652年，五世达赖应清世祖邀请赴京。同年11月，清世祖特派噶喇嘛、达根曲结、色岗噶举巴等人前来扎什伦布寺看望罗桑曲结，呈上清世祖的信件，并赠送灰鼠皮衣一件。1655年5月，清世祖从北京派喜热喇嘛和敖布翁巴二人，专程到扎什伦布，给罗桑曲结赠送了印度印制的梵文《甘珠尔》经文一全套。

1662年（清康熙元年），罗桑曲结因病去世，享年九十二岁。五世达赖为他选定转世灵童罗桑益喜，建立了黄教的另一个转世系统，并从罗桑曲结往上推认了三世，罗桑曲结为第四世班禅。

多罗那他

(1575—1634)

多罗那他，是藏传佛教觉囊派著名高僧，有学识的宗教学家。传说他逝世后转世为外蒙古喀尔喀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哲布尊丹巴活佛。

多罗那他，初名叫贡噶宁波。出生于前后藏交界处的喀热琼尊。他家系嘉译师的后人。他幼年时在西藏拉孜东北雅鲁藏布江南岸的觉囊寺出家学习佛法。后游历卫藏各地，从多师学习显密教法。1604年，他年三十岁，受比丘戒。多罗那他是位很有学问的人，在三十四岁时（1608年）著《印度佛教史》，这是一部讲述印度佛教晚期历史的名著，一直流传至今，有汉文和德、日、英等外文译本，一向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印度佛教衰落以后，印度国内保存的有关印度佛教历史的记载很少，所以印度人研究佛教史，也要借助于多罗那他的这部著作。除此而外，多罗那他还先后写作过一些有关宗教著作，其中有几部是阐扬觉囊派宗义的书，在西藏佛教界有一定的声望。

藏传佛教觉囊派起初受拉堆绎地方首领（万户）的支持。拉堆绎万户势力衰弱后，它又受到藏巴汗地方政权的支持。十七世

纪初，多罗那他已经享有一定声誉，觉囊派势力在这时也有所发展。1614年，多罗那他在觉囊寺附近创建达丹彭错林寺。建寺后不久，漠北蒙古汗王派人到西藏请喇嘛到蒙古传经（以前漠北蒙古已经建立过寺庙，传经喇嘛属萨迦派）。这时，藏巴汗势方盛，当然不希望格鲁派的势力向漠北蒙古发展，于是抓住此一机会在宗教方面扩张自己的势力，同时也为和漠北蒙古汗王取得政治联系创造条件，遂派遣多罗那他前往漠北蒙古地方传法。相传在多罗那他动身去漠北之前，四世达赖喇嘛曾经赠给他一个“迈达理”的称号。因此，蒙古人都把多罗那他称为“迈达理”活佛。

多罗那他到达漠北蒙古地方后，常驻库伦（今乌兰巴托），他在那一带传法达20年之久，得到了蒙古汗王的信奉和支持，又称他为“哲布尊丹巴”（这是蒙藏两族僧人对精通佛法又严守戒律的大喇嘛的称号），这个称号在藏语中意为尊贵的圣人。

1634年，多罗那他卒，时年六十岁。

在多罗那他去世的第二年，蒙古土谢图汗恰好生一子，漠北蒙古汗王遂以此子为多罗那他的转世，将他算作第一世哲布尊丹巴（1635—1723），此即蒙古最大的活佛哲布尊丹巴的由来。

到了1649年，第一世哲布尊丹巴进藏学经，他先到后藏日喀则会见四世班禅，次年在扎什伦布寺从班禅受戒，又到拉萨会见五世达赖。哲布尊丹巴学经完毕要回蒙古时，五世达赖已受清朝政府的册封，正是势力全盛之时，五世达赖对他提出以改宗黄教为条件，才能承认他在宗教上的活佛地位，才能允许他返回蒙古。面对着当时格鲁派势力的空前膨胀，觉囊派在西藏已被排斥，甚至被消灭的形势下，哲布尊丹巴一世只有接受改宗的办法。之后漠北蒙古所有寺院，都改信了黄教。也就在这前后，五世达赖运

用权力将达丹彭错林寺改为黄教寺院，改名为甘丹彭错林寺。全藏觉囊派的属寺均改为黄教寺院，觉囊派作为一个教派此时已经消失。

云丹嘉措

(1589—1616)

云丹嘉措，蒙古族，第四世达赖喇嘛，内蒙古土默特部人，系蒙古俺答汗之孙苏弥尔代青洪台吉之子。这是在历世达赖喇嘛中，只有这一个蒙古族人，其余都是藏族人。

俺答汗和索南嘉措在他们会见后的十年中，虽然相继去世，但是由于他们生前所作的各种安排和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不仅没有停顿，而且得到了继续发展。索南嘉措去世后的第二年，即公元1589年，俺答汗之孙苏弥尔的夫人（系成吉思汗弟哈撒尔十六世孙诺诺·卫征诺颜之女，名拜罕·珠拉）生育一子，很快就被蒙古王公和藏族格鲁派的僧人共同确认为是三世达赖索南嘉措的转世。接着，西藏格鲁派上层如三世达赖索南嘉措的管家班觉嘉措等也承认了这一认定，1592年班觉嘉措还到内蒙古进行认定，并命名为云丹嘉措。1602年，云丹嘉措已十四岁，西藏三大寺派出正式代表前往土默特迎接他入藏。蒙古各王公也派人专程护送。云丹嘉措沿途受到青海、西藏的蒙藏僧俗人众迎接，于1603年到达西藏，先在藏北热振寺举行了坐床典礼，后到拉萨，住进哲蚌寺，拜噶丹寺赤巴根敦坚赞为师，举行出家仪式，受沙弥

戒。

1607年，云丹嘉措赴扎什伦布寺，向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学法，两个人相处感情甚洽。云丹嘉措在扎什伦布寺住了一个时期才回到拉萨。1614年，云丹嘉措请四世班禅到哲蚌寺，拜四世班禅为师，受了比丘戒。接着云丹嘉措应哲蚌寺僧众之请，继任了哲蚌寺第十三任赤巴，又应色拉寺僧众之请，兼任了色拉寺第十五任赤巴。1616年，明朝万历皇帝派专人进藏，给予四世达赖喇嘛“普持金刚佛”的封号和封文（见《西藏中世纪史》99页），这是明朝对三世达赖喇嘛封号的继续。

1616年12月15日，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在哲蚌寺去突然世，时年二十八岁。

对云丹嘉措之死，有人说是因为藏巴汗彭措南杰派人刺死的。因为藏巴汗得了病，据说是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对他进行了诅咒所致，被藏巴汗察觉，于是派人刺死云丹嘉措。这只是一个传说，无有确凿的事实。但当时西藏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藏地区完全落入藏巴汗的控制，而藏巴汗对黄教采取敌对态度，则是事实。云丹嘉措的死，反映了当时西藏封建领主之间的权力斗争。

咱雅班智达

(1599—1662)

咱雅班智达，又作咱雅班第达、扎雅班梯怛，原名为南喀嘉措，又译作那木海·扎木苏或纳姆哈嘉木措。他是明末清初蒙古族藏传佛教高僧、宗教学者。

他生于公元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关于他的出身，《咱雅班智达传》中说：“和硕特部有古噜格沁族，族中有商嘎思氏，大师所自出也。祖父洪果尔，名满四卫拉特内。洪果尔有子甚多，长即拜巴噶斯。拜巴噶斯有子八人，第五子即此圣者咱雅班智达也。”又说：“以车臣汗（按，指鄂尔齐尔图）之父拜巴噶斯诺颜为首，卫拉特四部众诺颜等互相约定，每人各以一子为僧。于是和硕特部各诺颜均使其一子为僧，师以拜巴噶斯·巴图尔诺颜有言：‘代我子嗣，尔其为僧’，遂于十七岁时由曼殊师利呼图克图受戒为僧焉。”注

咱雅班智达出家以后，于公元1616年到达青海，1617年到达西藏，入专门学习显宗的参尼扎仓学经，学成后通过辩论获得最高级的拉然巴格西学位，以后他又在达赖五世身边随侍。到1638年，他受五世达赖之命返回卫拉特四部侍教，驻锡于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

城）附近的拜巴噶斯之子鄂齐尔图汗的营地。1640年，喀尔喀部的扎萨克图汗派人邀请他去传教，以后他又受土谢图汗和车臣汗的邀请，前往土谢图汗和车臣汗部传教，成为喀尔喀部三大汗的上师。这样，使黄教在蒙古族地区的影响得到了加强。据载，他参加了塔尔巴哈台召开的卫拉特与喀尔喀各部王公会议，并使会议制定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即“察津毕其格”）充分肯定了西藏佛教格鲁派和喇嘛的神圣地位与特权，但是这个法典的原本与副本俱佚。

咱雅班智达由于精通佛学，又出身于王公贵族之家，在卫拉特四部和喀尔喀部有巨大的影响，他还在回鹘式蒙文的基础上，创制了拼写卫拉特方言的蒙古文——托忒文，蒙古人称“托忒·必扯克”，意即“明确的文字”，基本上在新疆蒙古族中流行使用。这是研究十七世纪蒙古族社会、政治、经济、法制、军事、文化、宗教与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重要文献。

1644年（清顺治元年），咱雅班智达着手翻译藏族文献《玛尼全集》，又称《玛尼噶本》（即《十万宝颂》）。1651年，咱雅班智达到拉萨大昭寺，向五世达赖奉献白银五万两。次年，又向扎什伦布寺奉献白银三万五千两。咱雅班智达还奔忙于卫拉特各部王公之间，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缓和卫拉特和喀尔喀之间的宿怨，为蒙古族的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662年，咱雅班智达在第三次赴藏途中病逝，享年六十三岁。

注：似指东科尔呼图克图。据《安多政教史》记载，东科尔活佛云丹嘉措死后，有三名转世灵童，一为喀尔喀部曼殊师利，一为鄂尔多斯曼殊师利，一为康区的甲哇嘉措。甲哇嘉措（1588—1639）被认为是第三世东科尔活佛，他曾受卫拉特部的邀请，五十二岁死于凉州。第四世东科尔活佛嘉木央嘉措（1639—1683）曾去西藏向五世达赖和固始汗请求在青海建寺，获准在丹噶尔（今湟源县）建甘丹群科林寺，从此东科尔活佛被称为西宁东科尔活佛。1665年嘉木央嘉措被康熙皇帝封为“曼殊师利禅师”。

却 英 多 吉

(1604—1674)

却英多吉，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十世转世活佛。西藏古洛地方人。

却英多吉所处的时代，正是藏族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即：由于中央的明王朝权势日渐衰落，在西藏地方，出现了以噶玛噶举和后藏的仁蚌巴、藏巴汗联结为一方，以格鲁派（黄教）和帕木竹巴及其一部分家臣为另一方，正在进行争夺权势的斗争。双方的背后，各有蒙古族军事力量的支持，作其后盾。蒙古族的军事力量甚至深入到西藏地方来进行战争，最后以黄教寺院集团的胜利而告终。却英多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他自己的活动的，所以说他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在八岁和十四、五岁的时候，就曾两次（即1617—1618）派遣专人向明万历皇帝朝贡，与中央的明王朝进行联系。

另外，早在1610年，当时却英多吉才七岁就有一个叫克洛济的蒙古头目邀请他去青海传法，后因故未能成行。1614年，他又受到邀请，去到蒙古族地区曾为一个名叫岱青的蒙古族首领传法，从此他和蒙古族的首领人物拉上了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他和十七

世纪前半期（1618—1642）控制西藏地方政权的第悉藏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虽然他和第悉藏巴结合起来与黄教敌对的，主要是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六世活佛却吉旺秋（1584—1635），但却英多吉是噶玛噶举的领袖人物，与这种结合不能没有关系。这一时期，参加到西藏地方的争权斗争中的蒙古族各部的首领，有喀尔喀部的却图汗、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和硕特部的固始汗等人。却图汗是支持噶玛噶举派的，在1621年（明天启元年）他派他的儿子阿尔斯兰率兵到西藏去支持噶玛噶举。不料，阿尔斯兰到藏之后，却被黄教人收买，反而攻击噶玛噶举，噶玛噶举采取了同样的办法，用重金收买了阿尔斯兰，联合对付黄教。后来黄教再一次用大量的钱财收买了阿尔斯兰，当阿尔斯兰反过来又想为黄教攻击噶玛噶举时，噶玛噶举派人送信给正在青海的却图汗，告发了阿尔斯兰这种唯利是图的行为，并提出了抗议和要求，却图汗下令处死他的儿子阿尔斯兰，时在1636年。约在此时，察哈尔的林丹汗被却图汗说服争取到了噶玛噶举一边（按：林丹汗原来是支持黄教的），并带兵向青海地区出发，为噶玛噶举打仗。但不久林丹汗病死于青海。却图汗又在青海地区被支持黄教的和硕特部的固始汗击溃身亡。从此，支持噶玛噶举的蒙古族汗王便全部被消灭。1642年固始汗又进兵西藏，消灭了第悉藏巴，使黄教取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却英多吉处境困难，后经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的出面调停，取得五世达赖喇嘛的谅解，噶玛噶举和黄教的关系才稍有缓和。但时间不久，即从1642年到1644年在工布和山南地区又爆发了噶尔巴反对黄教和固始汗的斗争，使却英多吉又卷入和黄教斗争的漩涡之中。噶尔巴是康区类乌齐附近的一个家族，仁蚌统治者就出于这个家族。这个家族在历史上一直和噶玛噶举的关系很密切。举兵反抗黄教噶尔巴其人的父母，都是噶玛

噶举派中有地位的人。1642年噶尔巴在工布地区的代表雪喀巴被固始汗击败。1644年，噶尔巴又在山南靠近不丹的地区再次举兵反抗，又被击败。

由于噶尔巴的叛乱，却英多吉因与其有关而被软禁起来，后来逃到云南丽江木土司家中避难，接着只身又前往青海果洛，途中被强盗劫掠一空，被人又接到木土司家里。

黑帽系十世却英多吉的声势，虽然因藏巴汗被消灭已大大下降，但是他在康藏地区的宗教地位和影响，依然保持着。所以到了1653年（清顺治十年），清朝顺治皇帝刚刚送走了到北京朝见的五世达赖喇嘛，就马上派人到藏召他到北京去，他迫于自己的困境，没有应召进京，只是派人上表朝贡，争取清朝政府对他的承认和支持。1660年顺治皇帝封赐却英多吉，并颁发给他印信，承认他的地位。但是这时整个噶玛噶举派的实际地位已远远不如往昔了。

1663年（清康熙二年），经过西藏佛教界人士多方斡旋，却英多吉才回到西藏祖卜寺。噶玛噶举派不得不承认受达赖喇嘛的监管，一直到解放前，达赖喇嘛的议仓还派有一个官员常驻祖卜寺，负责监督噶玛噶举的事务。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却英多吉去世，享年七十岁。在他逝世后的黑帽系各世活佛，仅仅是一个教派领袖，只从事宗教活动，再也没有干预政治的能力了，名声不大，故从略。

阿旺罗桑嘉措

(1617—1682)

阿旺罗桑嘉措，是第五世达赖喇嘛。1617年（明万历四十五年）出生于前藏山南琼结地方，属琼结巴家族，父名都杜绕登，母名贡噶拉则。其家系山南地区的一个封建主，也是帕竹地方政权属下的贵族，日喀则就是帕竹地方政权封给其家族的领地，他家世袭日喀则宗宗本职务。

1616年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去世之后，藏巴汗禁止寻找转世“灵童”，经过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多方斡旋，最后才得以在他的主持下认定五世达赖。1622年，经过班禅罗桑却吉坚赞的认定和主持下，六岁的阿旺罗桑嘉措才被迎入哲蚌寺供养。1625年，拜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为师，受了沙弥戒。1637年又请四世班禅给他受了比丘戒。没有多久，他就担任哲蚌寺的第十五任赤巴，兼色拉寺第十七任赤巴。自五世达赖以后，历代达赖即为哲蚌、色拉两寺的当然赤巴，别人不得充任，故后来两寺的寺主，均由达赖兼任，达赖另派堪布一人代表他去管理寺政。

当时西藏为噶玛地方政府统治时代，由第巴管理政事，噶玛噶举和藏巴汗对黄教采取压迫摧残的政策。大约在1630年左右，

第悉藏巴·丹迥旺布利用土默特部的拉尊和珲台吉发生内讧的机会，发动了一次反黄教的高潮，致使五世达赖不得不避往山南。但是，黄教当时在西藏地区和青康一带，甚至蒙古各地也很普遍，经过了自宗喀巴以来近180年的发展，取得了广大藏族群众的拥护，黄教受噶玛噶举的极力压迫，也不得不采取对抗办法。1641年，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商议，派人赴青海密招固始汗率兵进藏，推翻噶玛地方政府的统治，遂拥立五世达赖喇嘛建立“噶丹颇章”政权。然而实际上，西藏地方完全受固始汗的控制。固始汗之后为其子孙达颜汗（1654—1668年在位）、达赖汗（1668—1701年在位）、拉藏汗（1701—1717年在位）所控制。只是在经济和宗教方面给黄教寺院集团及其政府（噶丹颇章）以实惠而已。

五世达赖喇嘛在固始汗支持下，“噶丹颇章”政权建立之时，正是明朝末年，内地兵荒马乱，明王朝即将崩溃，以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为首的黄教寺庙集团，为了巩固其已取得统治地位，争取中央王朝的支持，加强和中央王朝的联系。于是，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和固始汗经过协商，决定和在东北盛京建立的清朝政府建立联系，遂于1642年，派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为代表，前往沈阳。次年到达盛京（沈阳），清太宗亲皇太极立即率领亲王、贝勒、大臣等出城迎接。皇太极还亲自对天行三跪九叩之礼，这意味着西藏人的到来是出自天意的安排，是上天护佑清朝的表现，因此要感谢上天。入城以后，皇太极又亲自到伊拉古克三等的住处去看望。伊拉古克三等朝见皇太极，呈上达赖喇嘛和西藏各方面的信件时，皇太极又站起来亲自接受。伊拉古克三等在盛京停留了八个月，受到盛情款待（见《清太宗实录》卷六三、六四）。伊拉古克三于1644年返回拉萨时，清太宗给达赖、班禅和固始汗等都写了回信，并称赞达赖喇嘛“拯济众生”，“扶兴佛

法”，还赠了厚礼。

1644年，清军入关，顺治帝即位，即派人入藏邀请达赖喇嘛进京。但是，五世达赖接到清朝的邀请后，只是向顺治帝献礼、问安，没有作出应邀动身的反应。此后，清朝又在1648、1650、1651年接连派遣专人三次进藏，敦促五世达赖前来内地。1648年，五世达赖曾向进藏邀请他的清朝官员推托说：“我今不往，然我必欲往，当于卯年（1651）送马匹，辰年（1652）前来。”（见《清史稿·藩部八》、《蒙藏佛教史》）。

1652年正月，五世达赖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率随行人员三千人，自西藏启程，前往内地。1653年阳历元月十五日（顺治九年腊月十六日），五世达赖到达北京。顺治帝以“田猎”为名，与五世达赖（“不期然”而相会于南苑猎场。顺治帝在南苑会见五世达赖时，赐坐、赐茶、赐宴，待以殊礼，当天由户部拨供养银九万两（见《蒙藏佛教史》上）。

五世达赖居留北京期间，一直住在安定门外清朝专门为他建造的西黄寺中。

五世达赖在北京停留了两个月后，便以“此地水土不宜，多病，而从人亦病”为由，向顺治帝提出返藏的请求，顺治帝当即允许他返藏。1653年2月20日，五世达赖喇嘛离开北京时，顺治帝除赐赉重厚礼外，还命和硕亲王济尔哈朗、礼部尚书觉罗郎丘等人在南苑德寿寺为达赖饯行。当年5月，五世达赖达到代噶时，顺治帝派出以礼部尚书觉罗郎丘和理藩院侍郎席达礼为首的官员，携带满、蒙、藏、汉四体文字的金册、金印赶到代噶，正式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五世达赖返回拉萨以后，次年（1654年）亲赴扎什伦布寺，

看望四世班禅（时年八十三岁）。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为师徒关系，情感甚洽。因此，五世达赖执政后，对四世班禅非常尊重，曾两次亲往扎什伦布看望（第一次在1642年）。

此后，五世达赖以内地带来之金银，在前后藏各地新建了十三座黄教寺院，称为黄教十三“林”。同时，又给全藏所有黄教寺庙规定了常年居住的僧数、制订了黄教大小寺院的严格僧制，如寺庙内部的组织机构，僧官的任免制度，喇嘛的学经程序，寺内纪律仪式等等。

五世达赖到了晚年，不大过问政事，一切由1679年委任的第巴桑结嘉措（1653—1705）主持治理。他专心著作经典。其著作共有三十余卷，其中主要的有《相性新释》、《西藏王臣记》、《菩提道次第论讲议》等最为出名，传播甚广。1682年，在布达拉宫病故，享年六十六岁。

罗卜藏旺布扎勒三

(1635—1723)

罗卡藏旺布扎勒三，蒙古族，系清代喇嘛教（即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的哲布尊丹巴大喇嘛，亦称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是外蒙古的主要活佛。称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

明崇祯八年（1635），罗卜藏旺布扎勒三出生于蒙古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之家，父名衮布多尔济。自幼出家当喇嘛，被当时势力很大的车臣汗等尊为喀尔喀蒙古活佛。

在明代，喀尔喀部与西藏佛教发展关系的代表人物是阿巴岱。阿巴岱派专人到西藏去迎请西藏佛教的高僧到喀尔喀部传播佛教。前往传教的藏族高僧，是觉囊派的多罗那他（1575—1634）。多罗那他在外蒙古一带传教达二十年之久，他常住土谢图汗部的库伦（今乌兰巴托）。喀尔喀部称汗始于阿巴岱，但阿巴岱汗号是斡齐赉巴图。阿巴岱有一子额列克，额列克有一子衮布多尔济，到衮布多尔济时，始称土谢图汗。多罗那他是阿巴岱请到喀尔喀部的，但他的活动主要是在额列克和衮布多尔济的时期。多罗那他在喀尔喀部受到各王公和民众信奉，还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就有了“哲布尊丹巴”的称号，这个称号在藏语中意为“尊贵的圣

人”。

1634年，多罗那他卒于喀尔喀部，第二年土谢图汗衮布多尔济恰好生了一个儿子，喀尔喀各部汗王认定衮布多尔济之子是多罗那他转世，遂将他算作第一世哲布尊丹巴，这就是蒙古最大的活佛哲布尊丹巴的由来。

哲布尊丹巴一世五岁时，在喀尔喀受戒，取法名为罗布桑丹贝成勒。1649年，十四岁的哲布尊丹巴一世去西藏学经，他先到日喀则会见四世班禅，次年在扎什伦布寺从班禅受戒，又到拉萨会见五世达赖，这时正当格鲁派在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的帮助下在西藏取得优势之际，而哲布尊丹巴当时尚属觉囊派，而觉囊派的“他空见”教义受到格鲁派的反对，五世达赖指斥“他空见”为西藏佛教中的异端邪说。哲布尊丹巴一到西藏来，五世达赖考虑到他在漠北蒙古地区的影响，也估计到支持他的喀尔喀部王公贵族的反响，在表面上优待他，据《哲布尊丹巴传》说，五世达赖授给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法号，还赠给他一顶黄伞盖。但是在1651年哲布尊丹巴学成将要返回喀尔喀部时，五世达赖终于提出要他改宗，即由觉囊派改宗为格鲁派，否则，哲布尊丹巴的宗教地位就得不到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的承认。面对着格鲁派势力的空前庞大，觉囊派在西藏已被排斥，甚至被消灭的情势下，哲布尊丹巴一世只有接受改宗的办法。由于当时五世达赖已是西藏佛教的实际领袖，哲布尊丹巴一世得到五世达赖的承认和支持后，对他在喀尔喀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1651年哲布尊丹巴一世回到喀尔喀部时，还带回西藏格鲁派的高僧和油漆彩画建筑工匠共六百多人。几年内，仿照西藏寺院的建筑形式，在库伦等地修建寺院。从此，喀尔喀部都信奉了格鲁派（黄教），此前传入的西藏佛教各派如萨迦和觉囊等派，都

相继淹没无闻了。

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哲布尊丹巴一世遣使朝贡，向清朝政府奉献佛像等礼物。同年秋，他再赴西藏，从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学法。次年，返回库伦，举行规模盛大的法会，广传佛法。以后，他又多次派人向清朝政府奉贡请安，并坚决反对沙俄的入侵，同清朝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1693年（清康熙三十二年），清朝政府正式册封了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正式承认了哲布尊丹巴总领喀尔喀喇嘛教的地位。从此以后，哲布尊丹巴一世常驻北京，除了在喀尔喀部讲经说法外，还积极为清朝政府统一新疆而奔走效力。

1723年（清雍正元年）正月，哲布尊丹巴一世圆寂于北京，享年八十八岁。

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圆寂后，喀尔喀各部即为他的转世灵童问题，展开了激烈斗争。最后雍正皇帝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还是土谢图汗势力强大，不便得罪，决定由土谢图汗惇多布尔济之子罗卜藏丹彬多密为第二世哲布尊丹巴，才平息了这次纷争。1756年（清乾隆二十一年）被敕封为“敷教安众大喇嘛”。1575年，他患天花圆寂于库伦，时年三十三岁。

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圆寂后，乾隆皇帝怕又因活佛转世问题，引起喀尔喀各部的纷争。同时，又怕土谢图汗独操喀尔喀的政教大权，称霸一方。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派人暗示第七世达赖喇嘛，要他表示第三世哲布尊丹巴应转生西藏。这样一来，又为达赖发展自己的宗教势力提供了一个极好机会，与七世达赖关系极为密切的一个叫丹津衮布的封建领主，和七世达赖视为心腹的一个噶布伦的女儿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七世达赖当即选他为第二世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报请清朝政府批准后，迎往库

伦，成了第三世哲布尊丹巴。从此以后，成为一种制度，即就是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都在西藏寻找。第三世哲布尊丹巴名伊什丹巴尼玛，生于1758年（清乾隆二十三年），逝世于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仅活十五岁。

第四世哲布尊丹巴罗卜藏图巴坦旺舒克，生于1775年（清乾隆四十年），系第八世达赖喇嘛伯父索诺木达什之子，由第八世达赖指为第三世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1778年，在布达拉宫受戒。三年以后，由喀尔喀各部王公迎至库伦坐床。1813年，他由京赴五台山朝佛，在回归库伦途中病逝，时年三十八岁。

第五世哲布尊丹巴罗卜藏楚勒都木济克默特，1815年（清嘉庆二十年）生于西藏，父名衮布敦多布。1819年在布达拉宫正式拜班禅为师，受沙弥戒。次年，被迎至库伦。1821年在库伦正式坐床。1843年圆寂于库伦，时年二十八岁。

第六世哲布尊丹巴，（姓名不详）1842年生于西藏，由七世班禅抽签选定为六世哲布尊丹巴。1848年迎至库伦坐床，同年患痘病，不治而死，时年仅六岁。

第七世哲布尊丹巴凯珠布丹桑，西藏拉藏附近人，生于1850年，父名米谷玛尔。1851年由七世班禅抽签选定为七世哲布尊丹巴。1855年迎至库伦坐床。1868年病死，时年十八岁。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西藏地方人，生于1870年，其父为十二世达赖喇嘛之近侍。1874年被迎至库伦坐床。1911年在沙俄的策划下，擅称“大蒙古国皇帝”。后迫于形势，放弃自治，被当时的北京政府册封为“外蒙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汗”。1924年逝世在库伦，时年五十四岁。

华秀·俄项宗哲

(1648—1721)

华秀·俄项宗哲，“华秀”系家族名，“俄项宗哲”为其本名。相传他到西藏拉萨后，赴各寺供养朝礼，大昭寺中文殊菩萨含笑接受了他献的哈达，故有“嘉木样协比多吉”（“嘉木样”是文殊菩萨，“协比”为笑意，全意为“妙音笑金刚”）之称。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的创建人，该寺第一世活佛，即第一世嘉木样。

华秀·俄项宗哲于1648年（清顺治五年）出生在今甘肃省夏河县甘加乡哇代地方。父名华本加，母名塔姆仙。他幼时行仪端庄，不作孩童嬉，不同凡儿。七岁从伯父索南伦珠学读诵时，常要举一反三，稍说即悟，进步神速，不久即写诵熟练。十三岁时，从曲却益西嘉措大师出家受沙弥戒，从此守戒如护睛，不稍违犯，取法名洛桑坚赞。二十一岁时，启程入藏，进哲蚌寺郭莽院学法，稍诵讲义，领悟透彻，参加辩论，对答如流，如已久习。二十五岁取得“格西”学位。后又依章嘉语自在具法（章嘉活佛一世）和给塘慧施诸大德。听讲五部大论，无量教典。同时于声明、修辞、音韵、诸学，举一反三，稍说即

悟。他博学多闻，慎思明辨，均得其究竟奥义。后参加在桑浦地方举行的夏季法会，于五天之中，立五部论宗，与会者有十一学院之大善知识，师辩才无碍，威仪安详，引发一切会众信敬，由此美誉遍扬，声望日著。二十七岁于五世达赖喇嘛座前受比丘戒，自是夜间亦唯趺坐持瑜伽行。二十九岁入拉萨续部下院学习密法。四年中各种法会，未曾一日间缺。诵持生起圆满二次第广略两释，并遍参密权威宝增大师、嘉那华慧海，墨尔根喇嘛语自在觉慧、畅跋哇圆盛、娘惹寺住持法称等智慧圆融高僧大德，听讲大疏修学胜乐集密大威德三尊本续；受弥达罗派金刚鬘等灌顶法；渐生、百根、大海等三种修行结缘法；菩提道次第广略二论生起圆满次第三种教授等显密经论多种。另于四种续部曼荼罗之绘法，堆彩土法等之绘图，天轮、地轮、面供、纸供等制作法，均详细学习，受持实行，务期准确无误。在立续部时，卫藏大德学者，共集问难，师一一应对无碍，各方智者也就自然倾倒，极为敬佩。当时，藏王第巴桑结嘉措，挽师任阿里梯当寺住持，或噶丹寺赤巴，或续部院堪布，均坚持不就。三十三岁往增善山（一著名修行圣地，在郭莽院背后）静修。二十年间，远离一切名利恭敬，间为殷勤恳求法之善士传授共与不共法，以维宗喀巴所建正教法幢于不坠。五十三岁时，第六世达赖喇嘛以郭莽院众僧之意，坚请大师出任该院之堪布，传授五部大论精义。其间又应众僧之请求，著《五论广疏》（五部宗教哲学辩论注释），为该院传承讲授所依。甘肃、青海、蒙古和西康一切讲学之寺院，亦多依师之著述为主要教本。

1709年（清康熙四十八年）大师六十一岁，受青海和硕特前首旗蒙古族河南亲王察罕丹津父子的敦请回籍，建寺宏法。师于同年6月从拉萨动身东返，9月抵河南亲王辖境，亲王举行了隆重

的欢迎仪式，王献金曼陀罗，马、牛、羊、绸缎以及珍宝用具多种，作为供养。

1709年，系藏历土牛年（己丑），为宗喀巴大师创建噶丹寺三百周年的纪念日，故先为建寺择吉，嘉木样遂让弟子作了吉祥长净仪式，作为建寺之开始。所以历史记载，以土牛年为拉卜楞寺建寺之年。次年即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选定扎西旗滩为寺址，大师亲率弟子举行了隆重的建寺奠基仪式，参加僧俗达万余人。河南亲王献出方形蒙古包一座，可容纳八百人，暂代经堂，并征集僧徒三百人。大师委任大弟子赛·俄旺扎西为僧官，华热·俄项克却为领经师（经头），并规定经堂制度等按哲蚌寺执行，辩经制度以郭莽院执行。大师亲自开示讲授辩论例证，并讲道、次广论，大张庆筵。大师、亲王以及其他施主檀越均邀茶放衬，是为拉卜楞寺建立之始。

1711年农历3月，河南蒙旗亲王派卡加六族运输木料，其他部落出差役，正式动工兴建。首先修建了八十根柱子的大经堂一座，于同年秋完工。同时，河南亲王献出犏运、巴运（今青海省河南蒙旗县境）和然多（今四川省若尔盖县境）的五百户为神民。堪布诺门罕和额尔德尼台吉亦各献宣旁拉喜（今青海省同仁）与迭部地方的萨茹（今四川省红原县境）为教民。1714年，嘉木样大囊（佛宫）建成。1716年修续部下院。

1711年4月，达赖瓦格尔曾巴（又名益西嘉措）赐嘉木样“郭莽额尔德尼诺门罕”封号及伞盖。1720年，清康熙皇帝册封嘉木样大师“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罕”金敕金印，并准许穿黄马褂。师时年七十三岁。

1721年，嘉木样大师圆寂，享年七十四岁。河南蒙族亲王夫妇及僧俗集献白银千两，修建肉身灵塔，并多宝严饰，以示崇敬。

第一世嘉木样大师俄项宗哲一生中，培养弟子甚多，其中著名者有：达赖瓦格尔曾巴、米旺保拉哇（即藏王颇罗鼐）、土观二世、夏尔·噶丹加措、贡唐仓一世·更登彭措（为第七世达赖喇嘛经师）、郎木色赤一世·坚赞桑僧格、火尔藏包一世·华旦智化、赤钦·俄项却丹（继更登彭措之后任七世达赖经师）、赤钦·南喀桑、德哇仓一世·罗桑顿珠、青海同仁隆务寺活佛一世·堪钦更登加措、昌都·帕巴拉佛、拉毛夏茸（青海一活佛）等有声望的高僧与活佛。

另外，大师在西藏哲蚌寺郭莽院任堪布期间，在治教之余，还往来于西藏政坛，曾与西藏政界人物拉藏汗、第巴桑结嘉措等人来往频繁，共议政事，成为西藏当时政教事务中的名流。

嘉木样一世，一生著述甚多。其主要的有《因明疏》、《因明法程》、《现观庄严论之探讨》、《入中观之探讨》、《律经注》、《怖畏金刚释》、《生起次第自在成就法》、《圆满次第四种瑜伽文殊释》、《宗派纲目详释》、《佛历表》等。《佛历表》是他1716年写成的，上起藏历第一饶迥第一年（1027年），下至成书之年，按年纪载佛教大事，诸如高僧大德之出生、入灭及重要著作，各大寺院的修建情况都有记述，并收录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备考等，是一部研究西藏佛教史的重要著作。

罗桑益喜

(1663—1737)

罗桑益喜，是第五世班禅，法名罗桑益喜贝桑布，生于公元1663年（清康熙二年）农历七月十五日。系后藏托布结竹仓村人。父名索南旺扎，母名才旦布赤。

罗桑益喜出生后，扎什伦布寺即于八月初一日，派四世班禅的苏本堪布前来看视，后经用前班禅用过的器物，如灵药、骰子、铃杵等进行测试，派苏本洛桑丹增、本仓济仲等人前往拉萨向五世达赖详细报告了考察“灵童”的经过及其结果，五世达赖听取报告以后，即表示承认这个小孩确系四世班禅“转世”的“灵童”。遂于1667年10月17日，把“灵童”迎至扎什伦布寺，时年罗桑益喜五岁。按五世达赖的来信，择定土猴年（1668年）正月初三日为良辰吉日，举行坐床典礼。五世达赖给班禅“灵童”取了法名为罗桑益喜贝桑布（简称罗桑益喜）。

同日，六岁的罗桑益喜登上了四世班禅坐过的僧群益格穹曾殿内设的法座，成为第五世班禅。他举行了坐床典礼之后，扎什伦布寺聘请托布结谿卡甘丹热卜结寺的洛本罗桑丹增为经师，给罗桑益喜教授藏文，学习佛经。

1670年（清康熙九年）7月15日，在布达拉宫的堪松南加殿上，五世达赖正式给五世班禅授了沙弥戒。时年八岁。

1673年（清康熙十三年），五世班禅罗桑益喜年满十二岁，按黄教制度，是正式学经的时期。这样直到1683年，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二十一岁时，到了受比丘戒的年龄。扎什伦布寺特派强佐前往拉萨，打算觐见五世达赖，约定由五世达赖给五世班禅传授比丘戒的时间。第巴桑结嘉措告诉强佐，五世达赖已经“入定”（实际上，五世达赖已于1682年去世），从此不见任何人，也不能给五世班禅授比丘戒，要他们另请高僧为五世班禅授比丘戒。于是决定由扎什伦布寺的阿巴扎仓堪布贡觉坚赞为授戒师，决定1684年农历12月8日为授戒日，在扎什伦布寺的益格穹曾殿举行授戒仪式，五世班禅时年二十二岁。

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年）七月初四日，第巴桑结嘉措给班禅去信称，“五世达赖喇嘛业已圆寂多年，我因遵奉达赖喇嘛遗嘱，秘而未宣。今年我派尼麻唐夏仲晋京，向皇帝报告了达赖喇嘛圆寂以来的情况。不久六世达赖灵童将经过浪卡子，迎接至布达拉宫坐床”等语。这时五世班禅才知道五世达赖早已逝世。同年9月17日，六世达赖到了浪卡子宗，在该宗丹增颇章，与五世班禅见了面，然后由五世班禅给灵童剪了发，取法名罗桑仁钦仓央嘉措，授了沙弥戒。同年12月13日，五世班禅罗桑益喜应噶丹赤巴楚臣达吉的邀请，前往噶丹寺讲经说法。

1695年（清康熙三十四年），清圣祖派钦差前来扎什伦布，送给班禅金锞子两锭，约重二百两，并有信一封，内云：“朕父曾请五世达赖喇嘛前来北京会面，对宏扬佛法，增进汉藏和好，均作了重大贡献。……如果班禅不辞辛劳，前来北京一行，对汉藏友谊，佛教宏扬，众生安宁，将大有裨益。”当时，五世班禅

罗桑益喜三十三岁，正年轻力壮之时，他本来也想仿照五世达赖前例，前去北京与清圣祖会晤，以提高他在西藏的社会地位，扩大扎什伦布寺的影响。但被当时掌握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大权的第巴桑结嘉措所阻，未能成行。到1698年，清圣祖又派包加古齐、恰格恰古齐二人前来扎什伦布，迎请五世班禅赴京，结果又被第巴桑结嘉措所阻未能成行。至此，第巴桑结嘉措以为自己阻挠班禅赴京的阴谋最后得逞，气焰更加嚣张，于是又在固始汗势力驱逐出西藏问题上大做文章。结果被拉藏汗擒杀。

拉藏汗杀了第巴桑结嘉措以后，即派使者赴京，向清圣祖报告了西藏情况，并说第巴桑结嘉措所立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是“假达赖”，请求予以“废黜”。之后，拉藏汗立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请五世班禅于1707年农历3月初8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了授沙弥戒，取法名为伊喜嘉措贝桑布，简称伊喜嘉措。

拉藏汗拥立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不仅西藏僧俗群众中有强烈反对意见，而且在青海蒙古群众中，也发生了很大争论，并向清政府告状。在此情况下，清圣祖也感到西藏局势不稳，拉藏汗拥立的伊喜嘉措不得人心。为了安定西藏局势，清圣祖于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喜为“班禅额尔德尼”称号。据《清实录》载：“谕理藩院：‘班禅呼土呼图，为人安静，熟谙经典，勤修贡职，初终不倦，甚属可嘉。著照封达赖喇嘛之例，给以印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从此以后，历代班禅都世袭了这一封号。西藏历史上就形成了达赖、班禅两大世系。

1717年（清康熙五十六年），准噶尔策凌敦多布击破唐古特兵，杀拉藏汗，将伊喜嘉措囚禁在药王山上，另委达仔哇·拉杰饶丹为第巴，秉承策凌敦多布的意志，管理西藏日常政教事务。

至此，固始汗及其子孙控制西藏地区长达七十五年（从1642—1717）的时代，永远结束了。

策凌敦多布占领西藏后，不服清朝政府的统治。康熙五十七年（1718）九月，清军抵达藏北喀喇乌苏地方（即今那曲），被准噶尔之兵包围，相持月余。弹尽粮绝，总督额伦特和侍卫色楞殉职，全军覆没。次年，康熙帝再次派兵入藏，击败准噶尔，对于曾为准噶尔人效过劳的人，如第巴达仔哇·拉杰饶丹等人均予逮捕。时在1720年。同年九月，平逆将军延信护送住在塔尔寺的达赖喇嘛到达拉萨，9月15日，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典礼。11月5日五世班禅为达赖授沙弥戒，取法名罗桑格桑嘉措，简称格桑嘉措，是为七世达赖。原由拉藏汗拥立的达赖伊喜嘉措，从囚禁的药五山上释放出，奉旨送到北京处理。

1727年（清雍正五年），发生噶伦阿尔布巴等人杀了藏王贝勒康济鼐，准备与准噶尔联合反抗清政府。次年，雍正帝派军入藏，平定叛乱，封在平叛中有功的颇罗鼐代替康济鼐，总理西藏事务。五世班禅罗桑益喜为七世达赖受了比丘戒。乾隆元年（1736年）二月，清高宗特派大喇嘛全培达吉和罗桑巴觉二人，到扎什伦布寺看视班禅。9月七世达赖到扎什伦布寺看视五世班禅，并住了将近一个月时间，经常与班禅会面，班禅给达赖传了显密两宗的许多法。清乾隆二年（1737）七月，五世班禅病情日益恶化，医药无效，延至7月5日圆寂，享年七十四岁。

综观五世班禅罗桑益喜一生，他是生活在祖国统一与分裂的尖锐斗争时期，处境是困难的。但他坚定地站在清朝中央政府一边，站在维护祖国的统一与促进满、汉、蒙、藏各民族团结的一边，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卓尼·扎巴谢珠

(1675—1749)

卓尼·扎巴谢珠，西藏拉萨小昭寺参尼扎仓住持。安多地区卓尼土司所辖洮州（今甘肃省卓尼县），又名热布地方人。

他七岁时开始跟随父亲松嘉贡学习写读，九岁时在赤钦·根敦扎巴处出家受戒，专学应默记之类的仪轨修法等。后从达日格隆医师学医学知识，能为人治病。到了二十一岁时，前往西藏朝圣学法。先入小昭寺色热扎仓，从师扎西贝桑学“现观庄严论”和“入中论”等经论。由于他能刻苦学习，佛学知识优异，获得了格西学位。三十一岁时，他去后藏受比丘戒，后即返安多故里。

1706年，卓尼禅师昂索爷进京晋谒皇上，帝命其在小昭寺内建参尼扎仓（即宗教哲学学院）。该扎仓建成之后，委派卓尼·扎巴谢珠为扎仓住持。1716年，他四十一岁时，其母去世，他忧伤成疾，遂辞扎仓住持之职位，专心从事著述达七年之久。后因昂索爷再三请他出任该扎仓住持，他无法推辞，只好答应。六十二岁时，再次辞去住持职位，从事著书立说。七十四岁逝世。

卓尼·扎巴谢珠的著作有：中观、般若、因明及律部等方面的注释，还有词藻学、正字学、诗学等。

仓 洋 嘉 措

(1683—1706)

仓洋嘉措，系第六世达赖喇嘛，又是一位在藏族人中间享有盛誉的诗人。他的全名是阿旺洛桑仁钦仓洋嘉措，藏历阴水猪年（癸亥）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正月十六日，出生于西藏南部门域的宇松地方。他的家庭信奉红教（藏传佛教宁玛派）。父亲叫扎西旦增，母名才旺拉姆，是门巴族人。仓洋嘉措十五岁以前，在家乡度过。可能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内，他接触了大量的民歌，为他以后创作许多情歌打下了基础。

康熙三十六年（1697），仓洋嘉措被当时的摄政第巴桑结嘉措选为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是年九月，自藏南迎至拉萨。在途径南噶则宗时，与事先安排好的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会晤，拜班禅为师，剃发受戒，取了法名。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成为第六世达赖喇嘛。

仓洋嘉措坐床以后，当时的西藏政治形势，表面上似乎比较平静，他在第巴桑结嘉措严格监督下开始了学经活动。由于在农村自由生活惯了，所以有时厌倦学习佛典而去外出散步，经师们尾随，恳求他坐下听经，唯恐第巴桑结嘉措追究责任。仓洋嘉措往往

为经师及自己这种心情不安的活动流下凄然之泪。但是，他仍被迫学习了许多经典。

后来，由于桑结嘉措与当时代表清廷治理西藏地方的蒙古汗王，在政治上有尖锐的冲突，桑结嘉措联合新疆蒙古准噶尔部入藏，企图赶走拉藏汗，而被拉藏汗于1705年刺杀。因而拉藏汗奏请清朝皇帝，说桑结嘉措所选立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措“耽于酒色，不守清规，请予废立”。康熙皇帝允其奏请，命将“仓洋嘉措执送京师”，行至黑河附近，以水肿病逝世，时为1705年（清康熙四十五年），享年仅二十四岁。一说仓洋嘉措于青海工噶洛地方去世，时为1706年（清康熙四十六年），年仅二十五岁。又一说仓洋嘉措到内地后，被清廷软禁于五台山，后来即死在那里。还有一说仓洋嘉措抵袞噶瑙后，于风雪夜中悄然遁去，先往青海，复返西藏，1716年（清康熙五十五年）时，到内蒙古阿拉善旗班自尔扎布台吉家，收其子阿旺多尔济为徒，并在当地弘扬佛法。直到1746年（清乾隆十一年）六十四岁时坐化。遗体一直保存在位于贺兰山中的广宗寺内。总之，目前关于仓洋嘉措之死，尚未有定论。

仓洋嘉措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的生命，却留下光辉灿烂、永垂不朽的诗篇——《仓洋嘉措情歌》，为广大藏族人民所赞美传唱。他的政治上的情况如何，尚不十分清楚。他的抒情诗，主要是歌颂爱情追求爱情生活的。如写道：

面对大德喇嘛，
恳求指点明路，
可心儿怎能收回？
已跑到姑娘那里。

阿旺赤烈嘉措

(1688—1738)

阿旺赤烈嘉措，系甘肃省卓尼禅定寺第二任堪布，卓尼《甘珠尔》印版刻制者，著名高僧。

阿旺赤烈嘉措是卓尼第十代土司罗桑敦主（杨威）的次子。因其从小多病，多方医治不见效应，遂送进禅定寺，拜阿旺索南为师，剃度出家，取法名阿旺赤烈嘉措。说来凑巧，他入寺后，身体渐渐康复，精力也加充沛，便请汉师罗先生教习汉文，成绩优异。后又学习藏文，更显才华，他在一年之内就能将《四续部》仪轨等通读熟记，所以在1710年（清康熙四十九年）被委任为禅定法台。

1713年（清康熙五十二年），同其兄杨汝松赴京朝见康熙皇帝，被封为国师，并敕赐“禅定寺”扁额及金印等。回寺后又拜多师，广习经典，通晓显密二宗。在这期间即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在禅定寺建参尼扎仓。任以讲、辩、写三种形式阐述宗喀巴大师教义的智华夏知布为讲经院的法台，为禅定寺培养了一大批精通释典的名僧、学者。

同时，在卓尼第十一代土司摩哨贡布（杨汝松）的支持下，

于1721年（清康熙六十年）始刻大藏经《甘珠尔》印版，到1731年完成，并举行隆重的开光典礼，这就是著名的卓尼大藏经《甘珠尔》的由来。

1738年藏历正月十九日病逝，终年五十岁。

绛曲多吉

(1703—1732)

绛曲多吉，系藏传佛教噶举派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十二世活佛。在他短短的一生中，西藏地方是一个多事之秋。1718年，他被请到拉萨，会见了准噶尔将领策楞敦多布。1720年，清军护送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到达拉萨时，他又在拉萨会见了当时所有的首脑人物。包括清朝的将军们和康济鼐、颇罗鼐等人物。在颇罗鼐掌政以后，向他送过礼。

1728年，他得到清朝雍正皇帝的诏书召他进京。他在进京之前，曾和红帽系八世及司徒仁波且等人先去尼泊尔和印度朝圣。1731年，绛曲多吉和红帽八世一同到了北京。1732年，他二人逝世在北京，享三十岁。

松巴堪钦·益西班牙觉尔

(1704—1788)

松巴堪钦·益西班牙觉尔，土族，于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生在青海省湟中县（即《安多政教史》说的“生于固始汗法王之孙——青海额尔德尼台吉仓巴扎布之族”）。他是青海佑宁寺（藏文称郭隆寺）的著名高僧、松巴佛第三世。

他六岁在塔秀寺出家学法。十二岁入佑宁寺经院，以学习优良而著称于世。1723年（清雍正元年），他二十岁，在华仁·阿旺扎西大师处学习了《金刚鬘》之后，赴藏入郭莽扎仓，拜拉摩南喀阿闍黎为师，学习全部教程，于冬季学习会上进入《般若》级。1726年（清雍正四年）获得“林色噶居”学位。另外，在哲蚌寺格派扎仓与乌甲年玉巴、卡多索巴嘉措、雪·顿悦克珠、曲弥隆巴·喇嘛嘉样等结为法侣（学法分伴侣）。先后又在赤·南喀桑、赤·阿旺乔丹、工布甘珠巴·曲仁钦、沙玛尔·喜饶嘉措等师处求法，扩大了闻听领域。又从扎底格西的徒弟佐毛卡哇·莫朗伦珠处学得《因明学》和绘画。在衮本巴·桑洛木同处学习《藏文文法》和《音势论》。向衮赞保弥村杂智巴论珠处学习了各种书法及绘曼荼罗方法等。还从第巴桑结嘉措的弟子学习了汉藏历

算。在各方面都学有成就后，于1731年（清雍正九年）返回故乡。到贵德上寺参直堪钦根登敦珠处学习时轮金刚灌顶等。1737年（清乾隆二年）赴内地朝觐皇帝，期间还拜会了哲布尊丹巴活佛。1739年返回家乡。1740年修建了佑宁寺的静修庵、大佛殿内的弥勒佛像、弥勒殿左右两旁佛殿里的三尊佛像以及寺院旁的大佛塔。1742年又赴京，次年返回，先后在博库的博肖图寺修建佛殿、佛像等。

1746年（清乾隆十一年）任佑宁堪布，先后计三次。佑宁寺为湟水之北岸诸寺之冠，大通、互助、门源一带寺院，分为其分支。长期以来，佑宁寺僧众法台（堪布）以下都为土族，通行土族语。

松巴堪钦·益西班牙觉尔在语言学、文学、历史、传奇等方面，知识渊博，谈论起来口若悬河，是藏传佛教的著名学者。六世班禅赴京为乾隆皇帝祝寿时，在塔尔寺期间，松巴堪钦，不论何时会见，即相互谈论关于天文、医学方面的学问；有时谈及内外典籍、边疆人士、文武官员等等的爱好和行为；有时谈论飞禽走兽，无一不精确到家。益西班牙觉尔在讲经时的精辟绝伦，满人所欲，因而他收罗了如土观呼图克图等许多弟子。

他的著述有：《如意宝树佛教史》，该书记叙了印度古代王统及佛教发展史，还有汉、藏、蒙古等地佛教史，是一部闻名于中外的著作。1908年，印度人达斯译成英文并加注释。此外，还有《南瞻部洲总志》和自传《松巴堪布传》等传世。

1788年（清乾隆五十三年），松巴堪钦·益西班牙觉尔去世，寿年八十四岁。

格桑嘉措

(1708—1757)

格桑嘉措，是第七世达赖喇嘛。今四川理塘人，生于1708年（清康熙四十七年），父名索南达结，母名索南曲措。他八岁时在理塘寺出家。

第巴桑结嘉措被杀后，仓洋嘉措被废黜，拉藏汗立益西嘉措为六世达赖。但是，西藏各阶层僧俗群众，尤其是拉萨三大寺上层喇嘛们对拉藏汗擅自决定达赖喇嘛废立的做法坚决反对，他们坚持仓洋嘉措是真正的六世达赖，但仓洋嘉措已经去世，应当寻找他的转世灵童。三大寺的僧人们从仓洋嘉措写的一首情歌：“洁白的仙鹤，请把双羽借我，不到远处去飞，只到理塘就回。”得到了启示，既然他是“只到理塘就回”，于是他们就到理塘寻找仓洋嘉措的转世灵童，结果找到了一个名叫格桑嘉措的儿童。这时，拉藏汗也注意到理塘“灵童”格桑嘉措的重要性，先后两次派人到理塘察看，这就引起了青海和硕特部首领们的警惕，为了避免拉藏汗在格桑嘉措身上打主意，他们果断地在1714年年初将格桑嘉措转移到康北的德格地方。随后，根据康熙帝之令将格桑嘉措送至青海西宁附近的塔尔寺居住（见《清实录》圣祖卷263）。直

到1719年清朝派大军进藏平定侵扰西藏的准噶尔时，才正式承认格桑嘉措为六世达赖。但是，格桑嘉措是作为仓洋嘉措的转世灵童找来的，格鲁派的僧人认为他是七世达赖，清朝却坚持格桑嘉措是六世达赖，认为格桑嘉措是接替而不是继承已被废黜的六世达赖的法位，所以不能认作七世达赖。至今保存在拉萨解放公园（龙王潭）的康熙帝《平定西藏碑》（1721年立），仍称格桑嘉措为达赖六世。后来，因为藏族人民始终认为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到了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乾隆帝封强白嘉措为八世达赖时，等于默认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仓洋嘉措为六世达赖。

1720年，清朝正式颁发给格桑嘉措一颗金印，印文是“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之印”，另外还有金册等物品，由第十四皇子允禩代表清朝中央颁给七世达赖喇嘛（见《清实录》圣祖卷827）。这时，格桑嘉措才十三岁，一切事务都由其父索南达结代为处理。

1720年4月，七世达赖格桑嘉措随同平逆将军延信的军队从青海启程进藏。9月初抵达拉萨，9月15日，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典礼，拜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师，受了沙弥戒。然后，入哲蚌寺学经。1727年，格桑嘉措二十岁，又从五世班禅受比丘戒。

格桑嘉措入藏后，其家属也随同前往拉萨，清朝政府封为公爵，西藏地方政府又给了很多庄园和农奴，遂成为西藏一大贵族，即今之“桑珠颇章”家族。

1727年，在西藏发生了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三噶伦谋害首席噶伦康济鼐，预谋叛离清朝的叛乱事件。1728年，清政府派查朗阿率军至拉萨，将阿尔布巴、隆布鼐二人凌迟处死。这些事件中，七世达赖格桑嘉措之父索南达结参预其谋。清政府为防止再起事端，遂决定将七世达赖移往理塘。同时诏五世班禅罗桑益西至拉萨，摄理黄教教务。同年9月，班禅到拉萨，11

是七世达赖由驻藏大臣玛拉护送至理塘。

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在理塘居住了一年后，于1730年又奉诏移驻泰宁惠远庙。其间，雍正帝曾召达赖之父索南达结自理塘进京，面斥其干预藏政的错误，索南达结向帝承认错误，保证不再重犯。于是雍正帝为安抚达赖，遂又加封索南达结为辅国公。1735年春末，清廷命达赖七世自泰宁返拉萨，其职权严格限制在宗教事务方面。其父索南达结令常驻桑耶寺，每年只许到拉萨一次，期限为一个月，以防其干预藏政。西藏一切行政事务，由驻藏大臣监督。委任颇罗鼐全权办理。颇罗鼐尽职尽责，直到1747年他去世止，二十年间，西藏社会出现了安定和繁荣的局面。

1747年颇罗鼐去世，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上台，诛除异己，仇视达赖，不尊重驻藏大臣，又一次与准噶尔部联络，准备发动叛乱。清朝政府很快地于1751年又平定这次叛乱。在这次平叛中，七世达赖格桑嘉措表现比较好，当叛乱一发生，他即命班第达暂管卫藏事务，并下令逮捕谋杀驻藏大臣的凶手罗布藏达什等人，同时火速奏请清政府处置。这次变乱平息后，清朝才感到西藏这一远离内地的边远地方，放手给地方势力以行政大权是很不安全的，个人掌政容易专断，集体掌政又容易发生纷争。于是在1751年清朝政府下令由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掌管西藏地方政权。黄教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是从这时候(1751年)开始的。

七世达赖格桑嘉措亲政后，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弘扬佛法。西藏地方的行政事务，主要由清朝驻藏大臣掌管。格桑嘉措一生谦逊俭朴，颇得僧俗人民爱戴。

1757年，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逝世，享年五十岁。七世达赖逝世后，乾隆皇帝命第穆诺门汗呼图克图为摄政，在新达赖未亲政之前，代理达赖的职权。

章嘉若必多吉

(1717—1786)

章嘉若必多吉，亦名意希丹贝仲美，即章嘉三世，为清代四大活佛系统之一。他是甘肃凉州（今武威）人。父亲古菇丹增是一名咒师，为人正直，好武敢为。母亲布吉，无妇人之缺点，具有威信，经常努力行善。

章嘉若必多吉三岁时（公元1719年），被认定为第二世章嘉活佛阿旺曲丹的转世灵童，1720年迎至青海省互助县佑宁寺出家，成为第三世章嘉活佛。此后随师学习藏文写读和佛教经典，他天赋聪颖，过目成诵。七岁时，即1723年（雍正元年）郭隆寺（即佑宁寺）喇嘛因为参加了罗卜藏丹津反对清王朝的叛乱，清军将这座著名的喇嘛庙焚毁。章嘉三世被几个近侍喇嘛藏到一个偏僻的山洞里，隐蔽起来。清军统帅部向雍正报告后，雍正皇帝即位前曾从二世章嘉听受佛法，来往甚密，于是便下令清军寻找。清军接到帝命之后，贴出布告，限数日之内，交出小活佛，否则将大肆烧杀。躲在山上的喇嘛，听到这个消息，哭作一团，而小活佛却“不愿连累别人，挺身而出”，坦然地走出山洞。当一群喇嘛簇拥着这个小活佛走到清军营帐，许多喇嘛被刀枪林立的森严

气氛吓得魂不附体，而小活佛却毫不畏惧，对清军将领的问话，对答如流。因此不久即在1724年章嘉若必多吉在他年甫八岁时，被护送到北京。

雍正皇帝对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极为喜爱，有时还把他抱到怀里哄逗。雍正还下令，这个小活佛，享受前世章嘉活佛一切尊贵的生活待遇。同时，他先后依止二世土观·阿旺嘉措等驻京高僧多人，学习梵文、藏文和蒙文，钻研攻读印度古代佛学大师“二圣六庄严”和西藏佛教先贤大德们的经典著作，并在雍正皇帝的关怀下，与皇四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皇二子弘昀一起读书多年，学习汉、满文化。他到十八岁时，已成为精通汉、满、蒙、藏四种民族语文，熟读了佛教显、密经典，成为一个博学多识的佛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

1734年（雍正十二年）夏天，雍正皇帝派遣章嘉活佛三世偕同果亲王允礼前往四川泰宁惠远庙，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回藏。同年冬，章嘉三世与果亲王允礼，长途奔波到达泰宁，向七世达赖宣读了雍正帝的谕旨，并送给许多礼品。七世达赖很高兴地为他们设宴洗尘。1735年（雍正十三年）春，果亲王允礼回京复命，章嘉三世则与副都统福寿等率领驻防泰宁官兵500名，护送七世达赖喇嘛回拉萨。一路上，两个活佛相随相伴，切磋经典，结下了深厚的友谊。7月，七世达赖喇嘛于布达拉宫坐床。章嘉三世则抓紧时间，广泛结交西藏上层僧俗人员。他曾在甘丹寺、哲蚌寺讲经说法，他的广博的佛教知识、机敏的辩经才能，折服了许多知名的大喇嘛，声名大震。他又专程到后藏扎什伦布寺拜访了五世班禅，并从其受具足戒。年迈多病的五世班禅打算劝章嘉长住西藏，宣扬黄教。但是，章嘉三世是负有政治使命的钦差喇嘛，是不可能久居藏地的。这时，传来雍正帝去世新皇帝乾隆继位的

消息，于是章嘉三世匆匆整装返京。

章嘉三世回到北京之后，立即拜见了新皇帝乾隆，向他报告了西藏情况。乾隆对他圆满的完成这项政治使命，十分满意，遂命他管理京都各寺庙喇嘛，并赏赐他“札萨克达喇嘛”印一颗。1751年（乾隆十五年），又赐给他“振兴黄教大师”印一颗。

章嘉三世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七世达赖传·如意宝穗》、《五台山志》、《宗派建立论·须弥妙庄严》、《藏文正字学·智者之源》、《藏文三十颂与字性添接法略解·智者生喜》等。他的译著也是为后世所瞩目的，1740年他遵乾隆皇帝旨意，把藏文大藏经的《丹珠尔经》225函全部译成蒙文。他为翻译好《丹珠尔经》还编纂了一部《蒙藏合璧字典》。这部字典所包含的内容不只是关于宗教方面，而且关于逻辑学、语言学、新字体、艺术、医学等多方面，它的编成不仅使蒙译佛经的翻译趋于规范化，也为蒙藏人民互相学习语言提供了方便。据1979年《民族译丛》第二期长尾雅人的《日本西藏研究概述》中说，日本学者酒井真田曾把《蒙藏合璧字典》中有关宗教方面的词汇译成日文，题为《日译藏文真言名目要略》，发表在1942年《密教文化》第8期上。1772年至1790年历时十八年，章嘉若必多吉奉乾隆帝之命主持完成了将藏文《大藏经》的《甘珠尔》部译成满文。另外，章嘉若必多吉发现汉文《大藏经》中有《首楞严经》，全名《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有十卷，系唐代房融所译，而藏文佛典中无有此经。于是在1752年，他商请乾隆皇帝，将其译为满蒙藏三种文字。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入灭，世寿七十。乾隆命于五台山镇海寺造石塔，存放其舍利。

董·季麦旺吾

(1728—1791)

董·季麦旺吾，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拉卜楞寺寺主第二世嘉木样活佛。他于1728年（清雍正六年）出生在青海同仁县境囊惹地方。父名俄项朗杰（语自在尊胜），青海尖扎（即今青海尖扎县）土官，母名索南木吉。五岁时，从诺布坚赞大师授居士戒（指不出家的佛教徒所受的一种戒律）。七岁时随伯父东科活佛（名索南嘉措）居住，取名郭拉。从舅父罗追嘉措（慧海）比丘学习藏文。十三岁时在东科活佛座前受沙弥戒，出家为僧。

董·季麦旺吾出家后，东科活佛倾腹授他菩提道次第和大威德灌顶等。大师聪明敏捷，才智过人，自幼即擅写作，十六岁以前就撰写有：《六严二胜》、《文殊法狮》、《阎罗法王》等赞及道次讲记等，达五百页之多。这样，大师（季麦旺吾）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好学，已远近闻名，为各地僧众引为美谈。

当时，在拉卜楞寺方面，由德哇仓·洛桑顿珠和河南蒙古亲王王妃南木吉卓玛，主持嘉木样活佛转世事宜，以上师及护法之授记，见季麦旺吾与授记相符，认定他为嘉木样活佛一世转世无

疑。遂于1743年7月13日，迎至拉卜楞寺。坐床之日，各大善知识起立辩论，以正法为庆祝之仪。时他才年甫十六岁，为众僧讲菩提道次，莲花妙生，事理圆融，群僧皆为叹服。

二十二岁时，以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章嘉喜遊戲金剛）大国师为亲教师受足具戒，赐号“三宝无畏自在妙智精进称军”。二十五岁赴西藏学法，供养达赖等活佛大小昭等佛殿，及大小各寺僧众，各如其分。旋入郭莽院，以鲁本罗桑达吉（龙亿慧扬）法师为受业师。八年之中，心无外骛，不顾饥渴寒暑，专心致志，刻苦学习，遂通达五论、四续要旨精髓。尤以时轮金刚修法，遍求卫藏各处，所有各教派传承以后，融会贯通，最有心得，获得了“格西”学位。三十二岁，完成了住藏学法，于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5月23日，启睿东返，临行之际，西藏地方政府颁赐敕印，授予他“具善明教班智达诺门罕”称号，并赠送有服饰、伞盖、乐器、乘骑等堪布全部用具和氆氇四十疋。同年9月15日抵达拉卜楞寺。次年，任本寺住持座（寺主），以无上方便法门宏宣五部大论要义。之后，季麦旺吾在年三十六和三十八岁时，先后兼任青海佑宁寺和塔尔寺法台。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大师四十二岁时，内蒙古乌都斯王派丹卓华贡赞普诺门罕和华曲吉旦增成来，到拉卜楞寺敦请，并献银九百两。翌年，赴东蒙四十九旗，讲经传法，普降法露，安立彼地有情于成熟解脱之道。之后，取道北京，从章嘉呼图克图金刚持，学习集密“五种次第明灯”。又从善巧密续之参珠堪钦，学弥多罗修行百根本灌顶法。

1772年，大师四十五岁，返回拉卜楞寺。同年，清乾隆皇帝敕封为“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罕呼图克图”。

返寺后，季麦旺吾大师在十余年内，先后创建了丁科尔扎仓

(时轮金刚学院) 和曼巴扎仓(医药学院)。又因僧人逐年增多，原有八十根柱子的大经堂，已不能容，翻修扩建为一百四十根柱子，可容纳3,000僧人在内诵经的大经堂。同时，在辖区之内普遍建寺，如在阿木去乎建兜率法轮寺、日楚扎西庚丕寺、美秀尕若循寺、岔干维相寺，阿坝六族居巴寺、华若土尔欠寺、美武旧寺；扩建了合作寺、曲藏寺、却曲夏尔寺、博拉安布塘寺、岗岱寺、扎油寺、西仓寺、达参寺、藏格尔寺、甘加白石崖寺、香里卡寺、甘都寺、色强寺、金科尔寺、郭买寺等等。或创立新建，或修葺旧有，前后有四十处之多。且均各适宜时地环境需要，分别建立清规法矩，以为轨范。所谓“拉卜楞寺属下一百零八寺”，即是在这一时期由第二世嘉木样董·季麦旺吾主持发展起来的。各寺下属的部落，随其寺主都归拉卜楞寺院管辖，以拉卜楞寺为诸寺之母。确立了以显密二宗之讲授学习为主，以医药、历算、词章、音韵、书法、声明、雕板、印刷、绘坛、步法、歌舞等为辅的学习体系。建立了各个学院的考试制度。闻思学院建立了“多仁巴”制度，每年规定考取两名，并设立了十三个学级。在续部下院、时轮学院和医药学院，各设三个学级，九个学期制度。同时，参考西藏各大寺院的规章制度，制定了本寺院各个扎仓(学院)的规章制度。

此外，董·季麦旺吾还主持建立了各种法会。如正月“毛兰木”(祈愿)法会、二月亮宝会、七月米拉劝法会等。

季麦旺吾五十八岁时，再赴西藏，除在大小昭等重要神殿，达赖、班禅等重要活佛大德尊前，前后藏四大寺(哲蚌、色拉、噶丹、扎什伦布)及萨迦寺等，普修无量广大供养(达七万两白银之多)外，并在各处宏传显密心要各法。财法二施之隆，无与伦比。同时，在此期间，撰写第二世班禅善慧吉祥妙智大师传两

函，并访学前未学的各法。对于传承稀少之法，凡有余响可寻者，莫不奋勇勤学。对于稀有经卷进行抄写，共收集佛经万余部，于1786年（清乾隆五十一年），全部带回拉卜楞寺收藏起来。他返回拉卜楞寺后，修建了“禧寿寺”（即弥勒佛殿），花费了白银四万两。同时，还修饰了大经堂，作了柱套顶幕、幡幢及其所有装饰品。给他的伯父东科尔活佛索南嘉措铸银像一尊。在他的故乡也修建了弥勒佛殿，塑造了弥勒佛像。

1789年（清乾隆五十四年），他兼任夏群寺（又称妙翅鸟寺，在青海湟中县境）住持方丈，时年六十二岁。1791年（清乾隆五十六年）10月27日，他在返回拉卜楞寺途中圆寂于甘都地方，享年六十四岁。弟子们护灵归寺，修建灵塔，以示尊崇。

第二世嘉木样董·季麦旺吾，继承第一世事业，终生奔走各地，宏扬佛法，遍迹于前后藏、安多、康区、东蒙诸地，声誉甚高，弟子众多。其中著名者有：堪钦·更登嘉措（即堪布仓活佛）、隆多朱旺（即隆多成就自在）、阿里活佛、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等，皆出其门，为一时俊彦，其他及门桃李，遍满蒙藏。他的著作有：《第一世嘉木样传》（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出版）、《班禅洛桑华丹益西传》、《塔尔寺志》、《入中论之探论》、《宗派论述宝鬘》、《般若八品之探讨摄要》等传世。

却朱嘉措

(1733—1791)

却朱嘉措，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十世转世活佛，六世班禅巴贝益西的同母异父兄，后藏扎西孜人。父名德巴塘拉，母名宁达旺母。生于藏历第十二饶迥水鼠年（1733）。年及五岁时，被认定为红帽系九世活佛的转世，遂取名贝丹米旁却朱嘉措，从司徒活佛学习显密经要。以后曾到拉萨、粗普、羊八井、当雄、那曲、德格等地，广行善事，宏扬佛法。

却朱嘉措的哥哥，亦即六世班禅的哥哥，是仲巴呼图克图（即《清史稿》西藏传中之仲巴呼图克图，他的本名是罗桑金巴）。1780年（清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七十寿辰时，六世班禅巴丹益西赴京入觐庆寿，因痘病死于北京。乾隆帝及满、蒙、汉各族王公大臣给六世班禅馈赠了很多金银财宝，总计约值数十万两白银。当时担任扎什伦布寺总管的仲巴呼图克图，想把这笔巨款据为己有，而以教派不同为借口，不分给红帽系十世却朱嘉措。对此，却朱嘉措愤愤不平，衔恨在心，欲倾扎什伦布寺以为报复，遂西走廓尔喀王国，唆使廓尔喀王构衅。廓尔喀原为今尼泊尔境内一个民族，1769年（清乾隆三十四年）廓尔喀

族征服原来的三个小王国，统一了尼泊尔，改国名为廓尔喀。自廓尔喀掌权以后，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就有些紧张。主要是廓尔喀为西藏铸之银币的样式、成色都有所改变，藏人拒用；另外在边境贸易（主要是粮米与藏盐之间的交易），也因收税和货物质量方面，双方也有争执，经多次交涉，未能解决。正在这时，红帽系十世活佛却朱嘉措从西藏逃到廓尔喀投靠，盛称扎什伦布寺的富有，进行利诱，唆使廓尔喀发兵入侵后藏。却朱嘉措的企图，正中廓尔喀的下怀。这样，廓尔喀王与却朱嘉措就互相勾结起来，却朱嘉措当上了廓尔喀入侵后藏的谋士。

1788年（清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王以西藏拒用所铸之银币，边境贸易之争议为借口，派军第一次入侵后藏，后因清军入藏，而被迫与西藏当局议和。红帽系十世却朱嘉措当时即是代表廓尔喀方面的议和人之一。后来，藏人不肯履行议和条款，却朱嘉措又致书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威胁。

1790年（清乾隆五十五年），红帽系十世却朱嘉措又勾结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西藏，洗劫日喀则，把扎什伦布寺的金银财宝抢掠一空，并把寺内宝塔上镶嵌的绿松耳石、珊瑚等也挖走，赶走了大批的牛羊，给藏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以达赖、班禅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急请清政府出兵。清政府立即命令四川总督鄂辉率军由康定进藏，又命令大将军福康安由西宁进藏。1791年（清乾隆五十六年）清军击败廓尔喀侵略军，廓尔喀王向清军乞降，红帽系十世却朱嘉措畏罪自杀。大将军福康安奉旨受降，命廓尔喀王归还红帽系十世却朱嘉措尸体及其妻子、徒众、从人等。却朱嘉措的尸体运回到藏后，乾隆皇帝命令将其骨殖分挂前后藏及西藏各大寺院，以为叛国者戒。把以羊八井寺为首的红帽系寺院和所属土地、牧场、农牧奴全部查抄归公。羊八井等寺的

红帽系僧人一律勒令改宗黄教，禁止红帽系活佛转世。从此，噶玛噶举红帽系断绝。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在他著的《土观·宗派源流》中对噶玛噶举评说道：“由于迦玛系的那些掌教人心怀阴谋，肆意捣乱，致使迦玛教派，沦于衰败。后来廓尔喀兵入寇扎什伦布，据说就是由所谓红帽系活佛却朱嘉措（法成海）勾引而来的。清廷将他革封查办，尽毁羊八井等处的红帽系所有寺庙。迦玛系教法从此极为衰微。”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

(1737—1801)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松林乡人。大师六岁时被认为青海互助自治县佑宁寺（佑宁寺藏名郭隆寺，在青海互助县东五十里红岩子沟，位于湟水支流的北岸。该寺是1604年第四世达赖喇嘛为了在多麦地区发展黄教，派遣他的弟子顿悦却季嘉措在此修建的）土观胡图克图阿旺却吉嘉措的转世灵童，邀请到佑宁寺坐床，成为第三世土观活佛。他年青时在佑宁寺学习佛教典籍多年。十九岁时前往拉萨，入哲蚌寺郭莽扎仓学经。在拉萨七年中，他主要依止甘南拉卜楞寺第二世嘉木样活佛季美旺吾为师学习因明。公元1763年返回青海，任佑宁寺第三十六任法台。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他奉诏进京，在北京曾任掌印喇嘛、御前常侍禅师等职，颇得乾隆帝的赏识，他受到无比荣宠，大大加强了黄教在甘肃、青海的地位。他与章嘉国师有师徒之谊，交往甚密，又参与过章嘉国师主持的《四体清文鉴》、《满文大藏经》的翻译和编纂工作，因而受到朝廷和佛教界人士的敬重。他从北京返回青海后，于公元1789年至1793年，任青海塔尔寺法台。后来常住于佑宁寺，专心从事著述。他的

《宗派源流》（又作《宗派源流晶镜史》、《章嘉国师必多吉传》、《佑宁寺志》等书，颇为学人所重视，先后已有汉文译本出版。公元1801年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巴丹益喜

(1738—1780)

巴丹益喜，是第六世班禅，后藏南木林宗扎西则地方人。生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十一月十一日。父名唐拉，母名宁达旺姆。清乾隆五年（1740）九月九日被认定为五世班禅“转世”的“灵童”。七世达赖给六世班禅取法名罗桑巴丹益喜，简称巴丹益喜。清乾隆六年（1741）五月初九日，扎什伦布寺公推拉仁岗巴·吉仲罗桑才旺为札萨喇嘛，以便由他主持六世班禅巴丹益喜的坐床大典。六月初一日。由札萨喇嘛给六世班禅剪了发，换了僧装。次日，迎到扎什伦布寺，住到五世班禅住过的噶当木颇章宫内。同年六月四日，在扎什伦布寺的日光殿上，隆重举行了六世班禅巴丹益喜坐床典礼。1742年，六世班禅拜扎寺的普觉阿旺强巴为师，受了格年戒。次年，六世班禅聘请扎寺的安钦·罗桑苏巴担任经师职务，每天定时给六世班禅教授经典。1744年，由经师安钦·罗桑苏巴授了沙弥戒。

1747年（清乾隆十二年），颇罗鼐郡王逝世，次子珠墨特那木札勒袭封郡王。因其“乖戾诡谲”，行事非常专横，不但不把驻藏大臣放在眼里，对七世达赖也不放在眼里。对这样的人“留

之终必生事”。于是在清乾隆十五年（1750）十月十三日驻藏大臣傅清遵照清廷“俟间歼除”之命，歼除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在这个过程中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也在乱中被杀。清朝政府派策楞、班第等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二月一日抵达拉萨，惩办凶手，将杀害驻藏大臣之首犯罗卜藏札什等七人“凌迟处死”。将要犯拉扎布等三人“俱斩决”。将随从作乱之札什喇卜坦等“俱绞决”。惧罪自杀之杯陇沙克巴等人“俱戮尸”，“仍各枭首示众”。接着，乾隆皇帝宣布废除藏王制，政务由噶厦管理，直接受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的领导。次年（1751），七世达赖亲政。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二月初三日，七世达赖在布达拉宫去世。西藏政教事务暂由第穆诺门汗摄政。对七世达赖的逝世，六世班禅感到非常悲痛，下令扎什伦布寺的全体喇嘛举行三天哀悼，集合在大经堂诵经。僧众上大经堂时，一律脱下黄教僧帽，以示哀悼。

是年，六世班禅巴丹益喜已十九岁，到了受比丘戒的年龄，因七世达赖已故，由经师罗桑群培给六世班禅授了比丘戒。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是清高宗五十大寿。六世班禅派巴也尔堪布一人，前往北京，向清高宗祝寿。是年十二月，经过各种宗教手续的检验后，认定六世班禅在噶丹热不结寺内看视过的那个小孩，就是七世达赖“转世”的“灵童”。经驻藏大臣奏清高宗批准，继任为八世达赖喇嘛。

176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元月11日，在扎什伦布寺的益格穹曾殿上，由六世班禅给八世达赖剪了发，并取法名为吉总罗桑丹白旺觉强白嘉措贝桑布，简称强白嘉措。之后，在1765年和1777年先后又给八世达赖授了沙弥戒和比丘戒。此时，摄政第穆诺门罕去世，由甘丹喜热图诺门罕（即策满林）继任摄政。1778

年，六世班禅请求于庚子年（1780）到北京为皇帝祝寿。经乾隆皇帝同意，特命在热河承德筑与扎什伦布寺相似的喇嘛庙，赐名“须弥福寿寺”。同时清高宗还作了精心的部署，在1779年谕军机大臣等：“明年（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7月间，班禅额尔德尼来避暑山庄谒见，届期朕欲遣皇六子迎接，例应有一领侍卫内大臣随往，尤须得一老成练达者方妥。永贵熟悉外藩事务，且伊原系总谙达，朕欲即令伊为领侍卫内总谙达，随皇六子前往。”当时永贵还在新疆，立即下令调回。这样，永贵就负责迎接六世班禅的一切事务。

班禅巴丹益喜接受了前往避暑山庄觐见清高宗的邀请以后，立即进行长途旅行的准备工作，决定了路线与行程。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月十七日，自扎什伦布寺启程，是年十月十五日抵达塔尔寺。班禅为了准备过冬，在塔尔寺居住了五个多月。在此期间，班禅给远近前来膜拜的数万蒙藏群众“摸顶”，给塔尔寺的全体僧众熬茶，放布施，共用白银6,700余两。次年三月十日，六世班禅离开塔尔寺，取道宁夏、内蒙伊克昭盟、察哈尔部，直赴承德避暑山庄。于同年七月二十一日，抵达承德。直赴须弥福寿寺（即热河扎什伦布寺），在那里略略休息，遂乘轿前往避暑山庄觐见清高宗。七月二十三日，清高宗亲赴须弥福寿寺看望班禅。见面时清高宗用藏语问：“朕派皇六子迎驾，沿途恐多不周”。班禅答以“太子劳驾，小僧愧感无已”。清高宗又说：

“昔第五世达赖来朝，我祖特建黄寺以馆之。朕今特建热河扎什伦布寺，以备喇嘛驻锡，切欲对话，教学藏语，……”。未几，清高宗返回避暑山庄。八月初七日，为清高宗七十大寿之日，班禅随同高丽国庆贺使臣、蒙藏各地王公、满汉大臣，向清高宗祝贺万寿，班禅特向清高宗献上长寿佛画像八十一帧，作为寿礼。

祝寿完毕以后，清高宗要到东陵和西陵祭祖，又命皇六子陪同六世班禅一行于八月二十四日离开承德，九月初二日抵达北京，行宫设在五世达赖喇嘛住过的黄寺。在京期间，皇六子曾陪同六世班禅参观了圆明园、香山昭庙、南苑德寿寺，后又到雍和宫等各大佛寺讲经说法。九月初九日，清高宗回京，六世班禅随同王公大臣前往“接驾”。九月二十五日，清高宗亲赴黄寺看望班禅。十月初一日，在紫禁城保和殿设宴招待班禅。十月二十六日，班禅感觉身体不适，不思饮食，腿部发现红疹，苏本堪布等疑是天花，非常惊恐，告知了章嘉呼图克图，同时在北京各佛寺上供、诵经、祈祷，并给北京市贫民施放布施，共用白银3,024两。自此六世班禅病势日益沉重。十月二十九日下午，清高宗亲临黄寺看望班禅病况，回宫后即命御医前去诊治，断为天花。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一月初二日下午，六世班禅巴丹益喜在北京黄寺逝世，享年四十二岁。

清高宗为了纪念六世班禅巴丹益喜，在他逝世后的第四年即公元1784年，特命在他生前居住的黄寺西侧，建立了一座宏伟的“清净化城塔”，并筑了围墙，修了庙门、大殿、碑亭、僧房等，形成了一座规模完整的庙宇，人们把它称作西黄寺，而把五世达赖与六世班禅住过的黄寺，称之为东黄寺。东黄寺早已不存在了，唯有西黄寺还存在，特别是纪念六世班禅的“清净化城塔”完好的保存着，并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内有清高宗“御制”的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写的碑文，也完好的保存着，象征着民族团结永世长存（见《班禅大师全集》、《班禅额尔德尼传》）。

强白嘉措

(1758—1804)

强白嘉措，是第八世达赖喇嘛。1758年（清乾隆二十三年）生于后藏托布加地方拉日岗的一贵族家中。父名索南达吉，母名彭错拉茂。此家贵族与六世班禅的父母家族都有亲戚关系。因儿子成了达赖，所以在西藏政治上取得了很高地位，清朝政府封为公爵，达赖和噶厦又赐了很多庄园，成为西藏大贵族之一，即今之拉鲁（见《达赖喇嘛传》）。

176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强白嘉措五岁时，被由乾隆皇帝派到西藏的章嘉呼图克图认定为七世达赖格桑嘉措的转世灵童。于1762年迎至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

1765年6月4日，强白嘉措拜六世班禅为师，受沙弥戒，从师学法。1777年，强白嘉措又从六世班禅受了比丘戒。

1781年（清乾隆四十六年），乾隆皇帝降旨，命八世达赖亲政，掌管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册封第八世达赖喇嘛金册文是：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咨尔达赖喇嘛之瑚碧勒汗，昨班禅额尔德尼来自后藏，庆祝朕七旬万寿，朕询及尔年岁学业。据奏：尔年已及岁，经文该博，夙慧圆成，志心利益众生，继承法教，深慨朕

怀。……尔前身蒙圣祖恩眷，特封圆满教乘导引群生达赖喇嘛，今以尔慧性光明，该洽经典，爰自龆龀，承袭法教，志心利益，坚持戒律，使群部皈依朕甚嘉之。兹特依前七辈达赖喇嘛之例，封尔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咀喇达赖喇嘛。’”（见《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19页）。

但是，乾隆皇帝仍然命策满林继续掌管商上事务，协助八世达赖办事。1791年策满林逝世，乾隆皇帝又命大拭诺门汗（即功德林）为摄政，继续掌管商上事务。清朝政府的这一任命，目的是非常明确，即不让达赖直接掌政。

在这期间，发生了廓尔喀人两次侵略西藏的事件。第一次是1788—1789年。第二次是1791—1792年。先后两次战争共历时五年。廓尔喀人第二次入侵西藏，占领了后藏许多地方，抢掠扎什伦布寺。对此，清高宗派嘉勇公福康安为大将军，超勇公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率兵入藏。根据清高宗的旨意，先将侵入后藏地区的廓尔喀人全部驱逐出境，然后由福康安、海兰察统大军由济咙攻入廓尔喀境，攻占阳布（即加德满都），始准投降。依据这一作战计划，福康安与海兰察即率大军前进，于1792年5月间，收复了聂拉木、济咙、宗喀各宗，侵入后藏境内的廓尔喀人已全部驱逐出境。七月间，清军深入廓尔喀境700余里，进抵距阳布20里的地方，廓尔喀王拉特纳巴都尔求降，缴出了从前“贿和”的合同，退还抢去扎什伦布寺的财物，写出了以后“永不侵犯西藏地方的甘结”。1792年9月，清军撤离廓尔喀。

1792年10月15日，福康安等抵达拉萨，八世达赖喇嘛在离拉萨十余里的地方，远道欢迎，这是前所未有。据福康安“奏摺”中称：“窃臣等于初六日自后藏启程，差官赴前藏问候达赖喇嘛，而达赖喇嘛先已差堪布喇嘛等来迎。据该堪布喇嘛稟称：……

达赖喇嘛感谢大皇帝保卫深恩，至为真切，是以一闻大军回藏之言，先已下山，在布达拉宫十余里外甲木参罗布登庙内等候迎接。臣等当即差官驰往阻止，不敢远劳迎接，辞让再三，达赖喇嘛不肯即回。臣等于十五日行抵前藏，在甲木参罗布登庙内与达赖喇嘛相见，……坐谈多时，达赖喇嘛总系感仰恩惠，形于辞色。……察看达赖喇嘛感戴情形，一切唯命是听，断不至稍形格碍。”

在处理廓尔喀侵藏事件中，清高宗赏罚严明：有功必赏，有过必罚，毫不留情，除这一突出的政绩之外，还值得指出的另一重大政绩，即制定了有名的“二十九条钦定章程”。清朝治理西藏二百多年，基本上就是按“二十九条钦定章程”办事的。清高宗制定“金瓶掣签”制度，是对西藏宗教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实行这项改革，也是由沙玛尔巴（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十世，法名却朱嘉措）叛国一案引出来的。他亲眼看到六世班禅、仲巴呼图克图、沙玛尔巴都出自一家，而且都是由“降神”决定的，其中必有串通作弊之事，所以才制定“金瓶掣签”制度。

1804年，八世达赖强白嘉措患痘病，医治无效，于10月在布达拉宫去世，时年四十七岁。八世达赖逝世后，嘉庆皇帝命令掌办商上事务的功德林大拭呼图克图摄政，同时寻找转世灵童。

贡唐·丹白仲美

(1762—1823)

贡唐·丹白仲美，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学贯三藏、精于中观的著名高僧。是该派六大寺院之一的甘肃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之下的“四大赛赤”（即贡唐仓、霍尔藏仓、萨木察仓和德瓦仓）之一，即贡唐仓第三世。

贡唐·丹白仲美出生于安多藏区，即现在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地方。幼年在夏河县拉卜楞寺出家为僧，七岁时被认为贡唐仓二世转世，遂拜第二世嘉木样活佛为师，授沙弥戒。十七岁时，去西藏拉萨哲蚌寺从名师格桑欧珠学习佛教经典，专攻《中观论》和《俱舍论》。1783年（清乾隆二十八年），贡唐·丹白仲美二十五岁，取得格西学位。同年年底，返回拉卜楞寺，又学习密宗，兼及医药、历算、诗镜论和音韵等，成为一个学贯三藏的大学者。

贡唐·丹白仲美一生著述甚丰，宗教方面的有《俱舍论撮要》、《婆罗密多撮要》等，辑有《贡唐·丹白仲美全集》传世。其中以《水树格言》为最著名，脍炙人口，流传广泛，被誉为继《萨迦格言》之后，一部享有盛名的格言诗，全书有较浓厚

的生活气息，包括两大部分，即以“水”作比喻的部分和以“树”作比喻的部分。以“水”作比喻的部分名为《格言水论二规具有波浪》；以“树”作比喻的部分名为《格言树论二规具百枝叶》。《水树格言》的主要内容是宣扬佛教的“无常”和“因果轮迴”的思想。认为皈依“三宝”才能达到至高无尚的境界，只有笃信“三宝”（佛、法、僧）才能获得解脱。主张“施舍”，但不是为了别人，归根到底是为了自己成佛。例如他这样写道：“在这华丽世间轮迴里，无一样事物是有意义的；被水浸透了的木头，从头至尾都是不坚实的。”“拯救众生怖畏的，只有无欺的三宝；被水冲走的什物，只有船夫才能打捞。”

贡唐·丹白仲美著作格言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宣扬佛教，但他对世间统治阶级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残暴行为，却是反对的，并给予一定程度的揭露。例如他说：“经常残害臣民的暴君，有一天仆人会反抗；用棍子去打豆堆，豆子也不会粘在棍子上。”这是说国王对待自己的臣民，不应当凶暴贪残，如果凶暴贪残，虐待迫害，人民是不会归心的。贡唐·丹白仲美和萨班·贡噶坚赞一样，他也勉励人们要坚持不懈地勤学，不断获得知识。他这样写道：“只要经常努力不懈，结果会得到渊博的知识；只要树根不离湿土，枝头会结满累累果实。”又如“知识积累非容易，荒废起来却不难；汇积滴水难满器，倾洒只是一瞬间。”他还劝人要谦虚，不要骄傲自大。如说：“知识丰富的智者，总是平易近人，果实累累的果树，枝头总是低沉”。贡唐·丹白仲美主张做事情应当先有计划，不能盲目从事。如说：“事先在木头上打墨线，以后下锯不会锯错；办事之前要多加考虑，事后追悔是十足的愚者。”他也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他是这样说的：“坏友和娼妓的笑容，不如忠言的怒目横眉好；旱云的颜色虽然

洁白，带雨的乌云才有益禾苗。”

贡唐·丹白仲美写的《水树格言》，自称是学习《萨迦格言》的，但他有自己的风格，尤其是艺术手法上是有独特的一面。整个格言集二百多首诗，都采用了四句七言体，并且以“水”和“树”来作比喻，恰当地与当时社会现象联系起来，形象很鲜明。这说明贡唐·丹白仲美对于生活现实以及对客观事物的观察是非常深刻的。每首诗都深入浅出，便于读者理会，给人以启发和教育。

另外，他写的《黄教兴盛祈祷词》除拉卜楞寺的僧众祈诵外，也为藏、青、川等地的黄教僧众所祈诵。

公元1823年，贡唐·丹白仲美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丹白尼玛

(1782—1853)

丹白尼玛，是第七世班禅，系后藏白朗宗吉雄谿卡人，出生于1782年（清乾隆四十七年）。父名巴丹敦主，母名季美甲姆。

六世班禅巴丹益喜圆寂以后，共找了四个转世灵童。扎什伦布寺派出六世班禅的苏本堪布前往四个“灵童”的家属进行明察暗访，并拿出六世班禅生前用过的茶杯、铃杵、念珠等，让“灵童”自己挑选，以行试验。据说只有白朗宗吉雄谿卡的“灵童”选出的器物，都是六世班禅用过的。于是苏本堪布首先肯定这个“灵童”确系六世班禅的“转世”。于是扎寺即请驻藏大臣博清额转奏清高宗予以批准。1782年，清高宗批准了奏请。七世班禅完成了认定手续。

1784年，“灵童”被迎到扎什伦布寺，八月十二日在扎寺日光殿上举行了七世班禅坐床大典，由驻藏大臣博清额亲自主持。九月初七日，在扎什伦布寺的益格穹曾宫内，举行了八世达赖给七世班禅剪发并取法名的典礼，取法名为吉总罗桑巴丹丹白尼玛确来南加贝桑布，简称丹白尼玛。接着，又授近事戒。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六月四日，由八世达赖授给沙弥戒。1801年（清嘉庆六年）七世班禅丹白尼玛十九岁，由八世达赖授比丘戒。

七世班禅自坐床以来，是清朝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统治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钦定二十九条章程》和西藏重大政治制度与宗教制度，都是在这一时期制定的。但是，西藏地方开始遭到外国势力的侵略，廓尔喀人两次攻入西藏，把扎什伦布寺抢掠一空，幸亏当时清朝政府及时派兵入藏，将侵入西藏的廓尔喀人全部驱逐出境。在廓尔喀人入侵时，扎什伦布寺本身不仅遭到重大破坏，扎寺所属百姓，更遭到敌人的残酷蹂躏。由于七世班禅的辛勤工作，领导有方，再加上国家的大力支援，到七世班禅晚年时，扎寺及所属百姓，基本上恢复到灾前的水平。这些都应说是七世班禅的贡献。七世班禅一生经历了清高宗、清仁宗、清宣宗和清文宗四个皇帝的统治，和他共事的驻藏大臣前后有37人，帮办大臣有39人（其中有些帮办大臣后来升任办事大臣）。七世班禅始终坚定地站在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站在西藏地方属于清朝中央的立场，对于历代皇帝都是非常恭顺的，对历任驻藏大臣都是很尊重的，凡是扎寺的大事，都通过驻藏大臣请示皇帝批准；清朝皇帝要他办的事情，他都是尽心尽力办理。所以历代皇帝与历任驻藏大臣对七世班禅都是很信任的。这是七世班禅在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方面的重大贡献。另外，七世班禅是八世达赖的徒弟，他又是九、十、十一世达赖的师傅，他和这几代达赖的关系都是很好的。他很注意搞好与达赖集团的关系。例如，在清道光二十四年，清宣宗令他为西藏摄政，起初他不愿担任，后因不能违抗“圣旨”，而勉强担任了八个月摄政，以后坚决辞去。这种明智的态度，对巩固西藏内部的团结作出了贡献。

1853年（清咸丰三年）农历正月十四日，久病不愈的七世班禅丹白尼玛，在扎什伦布寺的拉让内圆寂，享年七十二岁。

罗桑图旦季美嘉措

(1792—1855)

罗桑图旦季美嘉措，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寺主第三世嘉木样活佛。他是青海同仁县保安镇年托乎地方人，其父仁钦嘉措，是该地世袭土把总。母亲名卡毛吉。第二世嘉木样董·季麦旺吾圆寂后，经土观活佛寻找后，由达赖、班禅主持，清嘉庆皇帝派员参加，在拉萨大昭寺抽签认定罗桑图旦季美嘉措为第二世嘉木样转世灵童。于1798年农历正月11日，迎至拉卜楞寺，时年七岁。同年2月在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座前受戒为僧，取法名罗桑图旦季美嘉措。拜拉仁巴洛桑旦增为启蒙师，开始学习藏文。十岁时开始学教理，对辩论学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十三岁从贡唐·贡却丹贝仲美授沙弥戒。十六岁为全寺僧众讲“道次三要”，并传单身大威德洪名灌顶。在附近各地，亦讲法结缘，各契其机。在本寺之西建“乃琼”护法殿，亲为开光。当时，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大师圆寂，转世佛尚幼，洛桑图旦季美嘉措应邀前往青海佑宁寺，为转世佛传单身大威德长寿三尊等胜法，并传近事戒。返寺以后，继学因明、量论等法称菩萨所传经典，细研精义。1809年(清嘉庆十四年)十八岁的洛桑图旦季

美嘉措启程入藏学法，同年八月抵达拉萨。于大昭寺及达赖喇嘛供养无量，又赴后藏从班禅大师受长寿灌顶，于扎什伦布寺僧众广修供养，祈愿正法宏扬。十月返回拉萨，布施三大寺，后入哲蚌寺郭莽院，拜鲁本阿旺慈成和洛桑却增二人为师。“法会”（僧众集体讨论时间）从不间断，“法间”（系个人学经时间）中唯涉阅经典，目不旁顾，不苟笑言。大师二十一岁时（1811年），赴后藏在班禅洛桑丹白尼玛座前授比丘戒。二十二岁时即1813年5月13日大师同赞布诺门罕，启程东返，沿途信士云集，相继迎请，广修供养，师均为祈祷、迥向。8月上旬抵达拉卜楞寺时，迎者寺僧3,000余人，俗众满山满谷。此后，广惠、曲藏、佑宁、塔尔、妙翅崖各大寺，相继迎请，师为众讲《菩提道次第》及《辨了不了义论》等，普降法雨。并在各寺广行布施，尤其在塔尔寺宗喀巴大师圣迹前所献供养，极为殷重。10月初，返回拉寺，即闭关静修。二十三岁即完成五部学业。二十六岁，任本寺赤哇（寺主），除为众僧开示经义外，并整理改进寺规。到了五十九岁时，大师应塔尔寺僧众之请，兼任该寺方丈（赤哇）。教不厌，诲不倦，凡听声闻语，一睹慈颜，甚至忆念师容者，并成义利。即极大恶人，亦自然消除恶心，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因此，清道光皇帝颁赐敕印，封“扶法禅师”称号。

大师晚年，大都在闭关静修，政教事务，皆由寺院襄佐、堪布二人代为料理。大师一生不穿新衣，不用金银器皿，不坐绣垫，于身口意细微制罪，亦不稍违犯。故清静戒行之体香，经常馥氲由旬。

1855年（清咸丰五年），大师嘱贡唐呼图克图任总法台，火尔藏仓克图克图任摄政。同年9月6日圆寂，享年六十四岁。拉卜楞寺及所属各寺僧众，以白银四千两，为其修建肉身灵塔，以

示尊敬。

第三世嘉木样洛桑图旦季美嘉措一生的主要著作有《散论总集》传世。

隆朵嘉措

(1805—1815)

隆朵嘉措，是第九世达赖喇嘛。1805年（清嘉庆十年）生。西康邓柯地方人，系该地春科土司之子。父名丹增曲结，母名团柱卓玛。

八世达赖强白嘉措逝世以后，就由噶厦和三大寺派出代表，前往各地找寻“转世灵童”。结果在西康邓柯地方找到了一个“灵童”，系当地春科土司之子，生于1805年12月1日。根据清高宗制定的“金瓶掣签”制度，九世达赖的选定，必须经过“金瓶掣签”的手续。于是就由七世班禅、摄政济咙呼图克图、三大寺代表、全体噶伦领衔，请驻藏大臣玉宁写了一道“奏摺”，请他转呈清仁宗。认为这个在邓柯找到的“灵童”，确系先辈达赖的转世，请求免于“金瓶掣签”。

九世达赖被清仁宗批准以后，噶厦和驻藏大臣即派专人前往扎什伦布寺，邀请七世班禅前来拉萨，给九世达赖剪发并取法名。是年11月初十日，班禅自扎寺启程，11月29日到达拉萨，住在大昭寺特设的行宫里。

因为隆朵嘉措三岁（1807年）被认为达赖灵童，由西康迎至

拉萨，在公塘寺暂住。噶厦选定1808年2月24日，为九世达赖剪发并取法名的吉日。是日七世班禅前往公堂寺，在该寺的萨苏切麦丹登且哇殿上，与九世班禅见了面，就给九世达赖剪发，取法名为罗桑丹白觉乃阿旺隆朵嘉措，简称隆朵嘉措，并给换了法衣。

是年9月，九世达赖隆朵嘉措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典礼。七世班禅只派他的哥哥才旺和卓尼热布登二人前往拉萨，参加坐床典礼，并代表七世班禅向九世达赖送了礼品，表示祝贺。清仁宗特从北京派遣都楞郡王、噶勒丹勒图呼图克图、侍郎及侍卫多人前来拉萨，“看视坐床”，赏白银一万两，并批准九世达赖可乘前世达赖乘坐的黄轿，启用前世达赖使用的金印。此后，隆朵嘉措入哲蚌寺学法。

在九世达赖生活的这个时期，西藏发生了英国人潜入西藏，直达拉萨，前往布达拉宫，与九世达赖会见，并且还居住了很长时间的事件。这是西藏历史上，英国人第一次进入拉萨的一次重大事件。

1813年，九世达赖隆朵嘉措九岁，到了受沙弥戒的年龄。因七世班禅是九世达赖的师傅，沙弥戒应由班禅传授。噶厦特派卓尼冲夏吉仲和噶仲噶雪二人前来扎什伦布寺，邀请班禅前往拉萨。9月19日七世班禅到达拉萨，仍住大昭寺。9月22日，九世达赖从布达拉宫来到大昭寺，在释迦牟尼佛像前，由七世班禅给九世达赖传授了沙弥戒。

1815年正月16日，九世达赖隆朵嘉措不幸在布达拉宫暴亡，时年只有十一岁。

九世达赖只活了十一岁，清仁宗感到意外，赏银五千两，“在灵前燃灯念佛”，并决定由策穆呼图克图“领办达赖喇嘛事务”，即出任“摄政”。

楚臣臣措

(1816—1837)

楚臣嘉措，是第十世达赖喇嘛。生于1816年，西康理塘地方的都那布村人。父亲罗桑年扎，原是当地的头人，后随楚臣嘉措入藏，清朝政府照例封为公爵，西藏地方政府也拨给了很多田庄和百姓，遂成西藏大贵族之一，即今之字妥；母名南甲布赤。

九世达赖隆朵嘉措逝世以后，噶厦和三大寺即派出代表寻访九世达赖“转世”的“灵童”。结果在西康地方共找到了三个“灵童”。1822年（清道光二年），道光皇帝命将三个“灵童”都送到拉萨，正月十五日，在布达拉宫的皇帝牌位前举行“金瓶掣签”仪式。掣签仪式由七世班禅主持，由驻藏大臣文干和帮办大臣保昌亲自执行，结果抽出西康理塘生的小孩为十世达赖，即由七世班禅剪去头发，换了僧衣，并取法名为阿旺罗桑丹增楚臣嘉措，简称楚臣嘉措。同时给十世达赖授了近事戒。二月初三日，七世班禅又给授了沙弥戒。

同年8月8日，十世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七世班禅派他的哥哥康建堪布和卓尼多确二人为代表，前去拉萨参加坐床典礼，并向十世达赖致贺。清宣宗（道光帝）特命成都副都统

苏冲阿和章嘉呼图克图前来西藏“看视坐床”。并谕“前世达赖喇嘛俱经赏用黄轿、黄缰、黄鞍坐，著加恩现在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仍准赏用。”又谕“……赏给前世达赖喇嘛之金印，该呼毕勒罕坐床时现经捧用，坐床后著加恩折内仍前钤用”。

1829年（清道光九年）十世达赖楚臣嘉措到哲蚌寺学经，时年十三岁。

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4月8日，又拜七世班禅为师，在大昭寺的释迦牟尼像前举行了授比丘戒的仪式，由七世班禅授了比丘戒。

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9月1日，十世达赖楚臣嘉措又在布达拉宫暴亡，只活了二十二岁。到逝世为止，十世达赖一直没有亲政。

凯珠嘉措

(1838—1855)

凯珠嘉措，是第十一世达赖喇嘛。生于1838年。西康打箭炉（康定）泰宁寺附近人。父名才旺顿珠，凯珠嘉措被选定为十一世达赖后，受封公爵，遂成西藏大贵族之一。母名永仲布赤。

十世达赖楚臣嘉措逝世以后，又由噶厦和三大寺派出代表，前往各地访寻十一世达赖转世的“灵童”。在西康地方找到了四名“灵童”（见《班禅额尔德尼传》171卷）。1841年，清宣宗下了谕旨，仍由“金瓶掣签”决定。同年5月24日在布达拉宫内清朝皇帝牌位前，举行“金瓶掣签”仪式，由驻藏大臣孟保和帮办大臣海朴执行。掣签结果是西藏泰宁（藏名噶达）的那个孩子，当选为十一世达赖喇嘛。然后由七世班禅给灵童施发，换了僧衣，并取法名为阿旺噶桑丹白卓麦凯珠嘉措，简称凯珠嘉措。之后将十一世达赖迎至布达拉宫居住。

1842年4月，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十一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清宣宗特派成都副都统什蒙额和章嘉呼图克图到拉萨“看视坐床”，并赏白银一万两，作为坐床的费用。当时，正值驻藏大臣琦善与西藏摄政策凌·扎布失和之际，驻藏大臣向道光皇帝参奏摄政

“贪黩营私”，查办结果是共没收前摄政家藏白银十四万四千余两，分别赏给前后藏各寺庙，“以示优恤”。又没收大米二百七十八石，麦、豆、青稞共六千九百四十六石，著赏给前后藏“番官兵丁，俾得均沾惠泽。”琦善建议由七世班禅摄政，掌办商上事务。

1845年，驻藏帮办大臣瑞元等前往后藏一带地方“巡边”，途经扎什伦布寺时，扎什伦布寺的僧众代表，要求七世班禅仍回扎寺主持教务。驻藏帮办大臣返回拉萨后，即向清宣宗上了一道“奏摺”，内称班禅久住拉萨，引起后藏僧俗人民的不安，可否即让班禅仍回扎寺，所任摄政一事，拟由热振阿齐图诺门汗接替。不久就接到清宣宗批准的回旨。七世班禅辞去摄政职务，清宣宗命热振阿齐图诺门汗继任摄政。

1846年（清道光二十六年），十一世达赖年满八岁，由七世班禅授沙弥戒。1852年（清咸丰二年），十一世达赖凯珠嘉措由驻藏大臣陪同，前往色拉、哲蚌、噶丹各寺讲经说法，熬茶放布施。

1855年（清咸丰五年），咸丰帝命令达赖亲政，仍由热振呼图克图掌办商上事务。凯珠嘉措于是在正月13日亲政，还不满一年，突于是在12月15日在布达拉宫暴亡，只活了十八岁。

罗桑楚臣达吉嘉措

(1846—1906)

罗桑楚臣达吉嘉措先后担任青海佑宁寺第八十五任法台和第九十五任法台。土族。青海海北门源仙米寺附近的库隆沟人，1846年藏历9月22日出生。七岁时被认定为灵童，八岁时由仙米寺郭莽仓三世罗桑隆朵却觉嘉措剃度出家。取法名健白楚臣，迎入佑宁寺，以仙米噶居巴·索南桑布为经师，始学藏文及经典。

1876年，他十九岁时，内蒙古敖汉王派专人来请，遂去内蒙从事宗教活动达二十年之久。1876年，三十岁时返回佑宁寺。返寺后，一度从六世土观罗桑雪智旺秋（1839—1894）的经师香敦·却吉加布学习密宗灌顶、教诫。1879年，三十四岁起，任佑宁寺第八十五任法台。同年4月15日，从香敦·却吉加布等受比丘戒。是年，负责寻访五世章嘉罗桑图登达吉（1849—1874）的“转世灵童”，最后由他和五世松巴罗哲彭措南杰（1854—1922）于却藏寺认定罗桑丹增坚赞为六世章嘉活佛。他任职佑宁法台期间，大兴土木，修建了佑宁寺大经堂。1883年他辞去法台之职。同年迎六世章嘉在佑宁寺坐床。之后，又被请去内蒙古从事宗教活动达四年时间，于1899年10月返回佑宁寺。1900年，他五十五岁，再

次当选为佑宁寺第九十五任法台，一年后，辞去法台之职，专修“六座”及“四座瑜伽”。1906年正月初三日圆寂，终年六十岁。

米 庞 嘉 措

(1846—1912)

米庞嘉措，是近代藏族著名高僧、宗教学者。他是康区境内雅曲定琼（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境内）地方人。他自幼聪明好学，六、七岁时即随父亲学习藏文及历算等。十二岁出家为僧，十八岁时曾去西藏朝佛，后返回家乡。成年以后，到各地遍求名师学修佛法，如他拜当时著名学者绛央钦孜旺布等为师，广学显密经论及“五明”等。因此，成为一个兼通显密，通晓“五明”，誉满康区和前后藏的著名学者，有班智达称号。他讲学授徒，从者甚众。民间传说，米庞嘉措还精于医术，救助穷苦人民，深受百姓的尊敬。

米庞嘉措一生著述甚多，由其弟子呷脱司徒等辑成《米庞全集》传世。另外，他所著的《王道论》（又译作《国王修身论》），全书共有二十一章，主要内容是论述国王（属于领主一类的人）应谨慎自持，以身作则，及治理国家应当注意的事项。有些格言说的很有道理。例如说：“国王自身守法，才能依法治民；自己若违法犯纪，怎能去做人君。”“最好的君主们，为了判别理与非理，不仅要学习各种经论，还要依靠贤人才士。”米庞嘉措主张

选拔使用人才，要选那些具有高尚情操，私欲极小能为百姓着想的人，决不能授“下流人”以高位。例如他说：“所有一些君王，为了本国的安定，国内大小官职，都应选贤举能。”“胸怀宽大看得深远，对待取舍善于判断，私欲小而为百姓着想，这样的人不论是谁皆可为相。”“若将下流人安置高位，就会侵凌自己的族类，最后连自己也走向灭亡，就象‘蓝皮’狐狸一样。”从以上举例来看，米庞的格言集《王道论》，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米庞所处的时代，是整个中华民族遭受深重灾难的时代，也是藏族封建农奴制走向没落的时代，米庞又是一个比较接近群众的僧人，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映了人民的某些痛苦，提出了一些改良的主张，应当说是进步的。但是，米庞毕竟是一位佛教徒，一位上层喇嘛，他的目的还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为维护农奴制度说教的，对劳动人民还是轻视的。例如他说：“宗教的用度政治的法度，这是古制都应确保，不合前规的一些行为，发展下去是招致毁灭的先兆。”又如“和下等人厮混，谁能对你尊敬？不但会遭轻视，也要受到讥讽。”这里所说的“古制”当然指的是封建农奴制度了。所谓“下等人”无疑指的是穷苦人民。公元1912年去世，终年六十六岁。

丹白旺修

(1855—1882)

丹白旺修，是第八世班禅。后藏托布加谿卡人，生于清咸丰五年（1855）八月八日。父名丹增旺嘉，母名扎西拉姆。

七世班禅丹白尼玛圆寂以后，扎什伦布寺派出代表到各地找寻其“转世”的“灵童”。当时共找了三个“灵童”。经1857年在布达拉宫举行“金瓶掣签”，掣出的是托布加谿卡丹增旺嘉的孩子的名字，遂被认定为八世班禅。由摄政噶征阿齐图呼克图担任堪布，给八世班禅剃发换僧衣，并取法名为曲结扎巴丹白旺修贝桑布，简称丹白旺修。

清咸丰十年（1860）十月初三日，迎请八世班禅到扎什伦布寺举行了坐床典礼。初七日由摄政噶征阿齐图呼图克图给授沙弥戒。八世班禅受沙弥戒以后，经驻藏大臣呈请清文宗批准任命噶青罗布藏丹巴坚赞为经师，“留心教习经典”，并赏给诺门罕名号。这时我国正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了圆明园，清文宗逃到承德避暑山庄，不久在承德逝世。接着清穆宗当了皇帝，改元同治。

1875年（清光绪元年），八世班禅年满二十一岁，由普觉活

佛给授了比丘戒。八世班禅受了比丘戒以后，对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的教义并不用心学习，他感兴趣的是“红教”（宁玛派）的教义。因此引起扎什伦布寺的喇嘛，特别是铁桑林扎仓的全体喇嘛的反对。据八世班禅的藏文传记载，经扎寺札萨喇嘛一再解释，一场风波才告平息。对这件事，《清实录》中也有记载：“光绪二年（公元1876）驻藏大臣松淮奏：班禅额尔德尼惑习红教，现令具结改悔。得旨，著随时察看，妥慎处理。”

1878年（清光绪四年）正月十一日，八世班禅在摄政、驻藏大臣、全体噶伦、三大寺代表等多人陪同下，到达公堂寺，在该寺大经堂内给十三世达赖剃发换了僧衣，并取法名。

八世班禅丹白旺修生活的这一时期，西藏发生了僧俗大农奴主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即摄政噶征阿齐图呼图克图与哲蚌寺罗赛林扎仓的堪布之间的矛盾公开化。结果噶征阿齐图呼图克图被清朝政府注销名号，不准再令转世。批准“即以汪曲结布协理西藏事务”。1864年，汪曲结布病故，经驻藏大臣满庆奏请清朝政府批准，由罗布藏青饶汪曲办理商上一切事务，并赏赐门罕名号。

八世班禅丹白旺修自受比丘戒以后，身体就不很健康。到了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病情加重，食欲不振，精神萎靡，扎什伦布寺僧官请他回到扎寺治病，他不愿回寺（当时八世班禅住在藏北甲错地方），而于是年五月初六日，移居他的故居养病，但病势日益严重，于7月15日圆寂。只活了二十七岁。

成烈嘉措

(1856—1875)

成烈嘉措，是第十二世达赖喇嘛。生于1856年（清咸丰六年），西藏沃卡俱卓地方人，父名彭措才旺，母名策仁玉准。

十一世达赖凯珠嘉措逝世后，噶厦和三大寺代表，也在前藏找到了十一世达赖“转世”的“灵童”三名。清文宗批示：“将此三幼童之名入瓶，敬谨掣定呼毕勒罕。”于是在1858年（清咸丰八年）正月十三日，在布达拉宫皇帝牌位前，由驻藏大臣满庆主持，举行了“金瓶掣签”仪式，抽定彭措才旺之子明珠尔丹测加木措为十二世达赖喇嘛。即由摄政噶伦阿齐图呼图克图担任堪布，为“灵童”剪了发，换了僧衣，并取法名为阿旺罗桑丹贝坚赞成烈嘉措，简称成烈嘉措。

1860年（清咸丰十年），十二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大典，清文宗特派理藩院司员二人将颁赐“敕书”，“赏费等件”，“驰驿赉往”，赏白银一万两，为坐床费用。并著驻藏大臣满庆、恩庆“前往看视”。

1864年（清同治三年），十二世达赖成烈嘉措年满八岁，到了受沙弥戒的年龄。因八世班禅也还年幼，不能充当授戒堪布。决

定由甘丹赤巴罗桑钦热旺觉担任给十二世达赖授沙弥戒的堪布，遂于是在年4月13日，给十二世达赖受了沙弥戒。对此清政府下了一道“谕旨”表示祝贺。“谕旨”说：“……本年四月十三日达赖喇嘛从伊正师傅受格隆小戒，实为吉祥之事，朕心实为喜悦。……著加恩赏给达赖喇嘛黄哈达一个，椰子念珠一串，玉碗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一对，著满庆接奉此旨，谕知达赖喇嘛照数祇领。”

1875年（清光绪元年）3月20日，十二世达赖喇嘛成烈嘉措在布达拉宫暴亡，只活了二十岁。亲政时间也刚刚一年光景。成烈嘉措逝世后，清政府一面命济咙通善呼图克图（即功德林大拭呼图克图）担任摄政，一面命令寻找转世灵童。

尕藏图旦旺徐

(1856—1916)

尕藏图旦旺徐，又译作格桑土登旺秀，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第四任寺主第四世嘉木样大师。

第四世嘉木样尕藏图旦旺徐1856年（清咸丰六年）正月25日生于西康德格金沙江畔吉祥天顶洞前的拉隆地方。传说该洞曾得莲花生大师加持，感应灵迹甚多。其父严潘德勒琼乃，母名严潘曲措（利他法生）。1859年（清咸丰九年）由拉卜楞寺德哇仓活佛和火尔藏仓活佛寻找第三世嘉木样佛转世灵童时，尕藏图旦旺徐被选定为转世真身。次年2月1日被迎至拉卜楞寺，大张盛宴，以事庆祝。时年五岁。由拉仁巴旦增嘉措为受业师，并从德哇仓佛受皈依颂等传承。七岁时又以喜饶嘉措贝桑布为亲教师，受沙弥戒，取法名尕藏图旦旺徐，并听受能熟之灌顶结缘。九岁时赴博拉安保唐、美武，美仁各部落念长寿经。十岁时至大殿（即大经堂）为全寺僧众讲单身大威德预备及开示。十一岁入闻思学院学习经典。十四岁时以善知识多人为侍讲，开始学习因明和般若二学。二十岁入藏学法，先于各寺院神殿，广修供养。后入哲蚌寺郭莽学院，拜罗桑南木加为受业师，复从班禅及甲塞活佛听法

多种。后在强巴大师座前受丘比戒。大师居藏四年，广学般若，后返回拉卜楞寺以后，仍继续习研《中观》、《俱舍》、《戒律》，皆得究竟。

1879年(清光绪五年)，大师二十四岁，创建喜金刚学院，落成后亲任赤哇(方丈)，并传“欢喜金刚灌顶”及“虚空瑜伽”、“金刚手大轮”等修供法。之后，又因种种需要，在该学院之侧修建“载麻日”护法殿。1883年，二十八岁时，任拉卜楞寺总法台，除讲授经论外，并切实整顿教规。又应塔尔寺僧众之请，兼任该寺总法台，使两寺关系，更为密切。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大师四十三岁，启锡东行，先赴山西五台山，朝礼供养。之后，又去北京朝雍和宫，并在北京谒见了光绪皇帝，颁赐甚厚。返回时复往蒙古，每日前来顶礼者甚众，有时达万人之多。四十四岁时回到本寺。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光绪皇帝颁赐“广济禅师”册印。1902年，四十七岁赴原西康甘孜、理塘、昌都、德格、巴塘以及青海果洛等地传法。五十岁返回拉卜楞寺。此后四年中，遍至附近各寺及凉州等处。其间十三世达赖喇嘛至塔尔寺，师往谒见，恭敬承事，并率本寺学者，向之辩论经义。

1909年，五十四岁，再度赴藏，朝卫藏，萨迦、杂惹、当惹、冈底斯山和羊卓雍湖等名山圣迹。五十六岁返回拉卜楞寺。1914年，袁大总统世凯颁封大师为“广济静觉妙严禅师”。杂藏图旦旺徐一生，遍足前后藏、康、青海、蒙古和甘肃等地，所至凡高僧大德均供养求法。寺庙丛林，无分大小，均熬茶放衬，名山圣迹及灵著佛像，均恭敬顶礼，详细瞻仰，殷重修供，并虔诚为正法之宏扬，众生之安乐，作甚深广大之祈愿。每于途中，凡前来顶礼者，不分贵贱，或摩顶加持，或洒散法露，因此声誉日隆。大师在寺期间，亦经常为本寺各活佛及僧众传显密各法，及沙弥、

比丘等戒，日无暇晷。对寺院陈规旧习，有所改革和建树：如1882年（清光绪八年）农历10月25日，建立宗喀巴圆寂日灯会即燃灯节；健全背经制度，规定般若部毕业后，学僧仍可继续学习天文、医药、文学等；加强“盖扎哇”，指对念经的音韵、语调及嗓音的锻炼，并作定期检查；规定学期当中，僧人不分老幼，一参准时参加，违者受罚；重申僧人不能赌博、不搞非宗教玩耍、不打架、不当牙行、不买卖牛羊、不穿俗人衣服和不持武器等；加强印经院制度，提高印经质量，要求写好、刻好、印好，并保存好印板；建立八个假期。假期内僧官率员巡检是否有闲人、妇女进入寺院等制度；建立“朗洪”（又译“林本”）制度。僧人十余户设“朗洪”一人，负责检查治安、卫生等工作，外人进入寺院，一定要“朗洪”报告；建立“香浪”（为郊游、浪山之意）制度，每年的三、四、五、六、八、九月各有一次；规定囊佐、司食、司衣、承宣、护卫、总财务、亲王府代表（指河南蒙旗亲王驻寺代表）、卫士等官员可以穿有袖子的衣服。

四世嘉木样尕藏图旦旺徐，自幼聪颖，三岁时即有著作。劝世多以歌曲形式出之。共四函，皆为济世良药。另外有《尊者洛桑季美土登嘉措传》、《桑钦却吉尼玛传》和《瑜伽虚空修习法》等传世。

1916年2月23日圆寂，享年六十一岁。2月25日，由大班智达阿莽仓活佛摄政。3月25日荼毗。僧众献银四千两，修建骨灰宝塔供养。

土登喜措

(1876—1933)

土登嘉措，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生于1876年5月5日，拉萨东南部达布地区朗敦村人。父名贡噶仁钦，后因其子罗布桑塔布克甲木错（十三世达赖乳名）被选为十三世达赖喇嘛，随其入藏，受封为公爵，升为西藏的大贵族。其母名罗桑卓玛。

十二世达赖成烈嘉措逝世以后，由噶厦和三大寺派出代表前往各地找寻十二世达赖“转世”的“灵童”。1877年（清光绪三年），在前藏达布地方找到了一个“灵童”，噶厦与三大寺的代表共同认定确系前世达赖“转世”，恳请清朝政府免予“金瓶掣签”。据《清实录》载：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六月，“驻藏大臣松淮奏请将访获灵异幼童可否免其掣瓶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一摺，得旨：工噶仁青之子罗布桑塔布克甲木错即作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勿庸掣瓶”。

1877年（光绪三年）十月，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和三大寺喇嘛派代表把灵童接到公堂寺供养。次年元月，八世班禅在摄政、驻藏大臣、全体噶伦、三大寺代表等多人陪同下，到达公堂寺，在该寺大经堂内给十三世达赖剪了发，换了僧衣，并取法名为阿旺

罗桑土登嘉措鸠差旺觉却勒南巴甲哇巴桑吉，简称土登嘉措。

十三世达赖剪发并取法名以后，即由公堂寺移住到日加三丹林寺，等到举行坐床典礼以后，才能进住布达拉宫。坐床必须事先请示清政府批准。据《清实录》载：光绪五年（公元1879）“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坐床，赏给黄哈达一方、佛一尊、铃杵一份、念珠一串，并赏给伊父工噶仁青公爵。准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铃用金印及黄轿、黄车、黄鞍、黄缰并黄布城”。批准十三世达赖之父“戴用宝石顶戴花翎。”同时任命通善济咙呼图克图阿旺班垫曲吉坚参加为十三世达赖的经师，沙布咙普尔觉罗布藏楚臣坚巴勒佳木撮为副经师。并命四川总督丁宝桢从司库内提银一万两，作为十三世达赖坐床的费用。

同年6月13日，十三世达赖由日加三丹林寺迎接至布达拉宫，在日光殿上举行坐床典礼。

1882年（清光绪八年），因八世班禅有病，由经师通善济咙呼图克图在大昭寺给土登嘉措受沙弥戒。接着，继续在哲蚌寺学经求法。1886年，摄政通善济咙呼图克图逝世，光绪皇帝命第穆呼图克图继任摄政，掌办商上事务并总理西藏政教事务。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三世达赖已二十岁，按照旧例，应由班禅给他授比丘戒，但九世班禅年幼，刚受沙弥戒，不够资格，改由佛师普觉罗桑楚臣强巴嘉措传授了比丘戒。这时，西藏内部发生了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即摄政第穆呼图克图暴亡，由十三世达赖亲政。在同年十月，第穆“因病”请求“辞退”，驻藏大臣奎煥向清朝政府上奏，批示是：“谕军机大臣等，……第穆呼图克图既据奏称因病力求辞退，著即准其所请，所有藏番政教两务即归达赖喇嘛掌管”。据十三世达赖的藏文传记载，摄政第穆呼图克图名义是“辞退”了，实际上仍操纵着大权，并进行

诅咒，想把十三世达赖害死。据说有一天第穆呼图克图之弟傲布才仁给十三世达赖送了一双靴子，达赖穿上以后感到身体不适，就请乃迥降神询问，乃迥说第穆呼图克图送的靴子里面有鬼，达赖把靴子拆开检查，果然发现里面藏有达赖生辰年月日的咒符，可使十三世达赖早日死亡。于是十三世达赖就逮捕了第穆呼图克图之弟傲布才仁进行审讯。当晚第穆呼图克图即在他的丹吉林寺暴亡。时年四十五岁。

第穆呼图克图逝世后，十三世达赖就完全掌握了西藏政教大权。当时他面临着英帝国主义者军事侵略的进一步威胁，英人已放出了进攻拉萨的狂言。对于抵抗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十三世达赖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决心领导西藏僧俗人民进行第二次抗英战争。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英军第二次入侵西藏。次年，英军攻占春丕、帕里。当英军到江孜时，受到藏军有力的阻击，双方发生了激战，英国人也死伤不少，这就是西藏历史上有名的江孜保卫战。后来，英军又派来了增援部队，即向拉萨进发，当年八月三日占领了拉萨。十三世达赖在英军抵达拉萨的前夕，从布达拉宫出走，经黑河，越过唐古拉山，而进入青海，前往外蒙古，当到达外蒙古之库伦时，企图逃往俄国。后来，由于受到清朝驻外蒙古大臣和从北京派来的钦差大臣之劝阻，赴俄的目的才没有达到。对十三世达赖出走，驻藏大臣有泰向清朝政府的奏摺中“弹劾”十三世达赖“平日跋扈妄为，临事潜逃无踪，请褫革达赖喇嘛的名号。”清朝政府回电：“著即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摄。”对于十三世达赖在英军占领拉萨时出走一事，应该理解为他为了避免被英军俘获，是被迫出走的，似为妥切。因为十三世达赖到达外蒙古以后，即通过清政府库伦办事大

臣德麟向清朝政府代奏，请求援助抗英。对清朝政府“革除”达赖名号一事，西藏僧俗群众非常不满，驻藏大臣有泰也感到这事办的很不妥当，乃向清政府请求“开复达赖名号，以顺番情”。清朝政府的批示是：“著俟达赖喇嘛由库伦启程后，再降谕旨。”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4月，十三世达赖由库伦启程返藏，九月抵青海塔尔寺。陕甘总督升允向十三世达赖转达了清朝政府的“奉旨款留，暂不回藏”的“上谕”。因此，十三世达赖就在塔尔寺等候“谕旨”。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清朝政府命令十三世达赖先到山西五台山朝佛，然后“赴京陛见”。土登嘉措即于是年11月离开塔尔寺，次年正月十八日到五台山，在此停留了约半年。7月27日，清朝政府特派军机大臣和山西巡抚前来五台山，敦请十三世达赖入京“陛见”。8月4日，土登嘉措到达北京，受到妥善的接待，仍令住在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居住过的黄寺，清德宗在中南海紫光阁为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设宴洗尘。不仅“开复”了“名号”，而且加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并决定给达赖每年“廪饩银”一万两，由四川藩库按时拨付。在北京期间，十三世达赖数次与慈禧太后和清德宗会晤，据十三世达赖的藏文传记载，当时土登嘉措要求他直接向慈禧太后和清德宗“奏事”，没有批准，仍要他有事必须通过驻藏大臣“代奏”。接着，慈禧和清德宗相继逝世，溥仪作了皇帝，改元宣统。经清朝政府批准，十三世达赖即于是年11月28日离京返藏。1909年（清宣统元年）10月30日返抵拉萨，驻藏大臣联豫在扎什城表示欢迎。

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回藏后，与驻藏大臣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而矛盾的焦点，则是川军入藏问题。土登嘉措未抵拉萨之前，联豫即奏请由四川调两千官军入藏，得到清朝政府的批准。按理讲

这是正当的。因为西藏是大清帝国的领土，迭遭英帝的侵略，为了保卫边疆，巩固国防，中央政权应该派军队进驻西藏。但是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进驻西藏的军队，应是经过训练、军纪严明的部队。然而川军进藏以后的纪律很坏，川军一入拉萨，沿途开枪，击毙巡警一名，又在琉璃桥畔杀了济仲大喇嘛。川军还向布达拉宫开枪乱击，“达赖恐遭危险，即挈其左右逃往印度。”

（见朱彝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

十三世达赖逃亡印度以后，清朝政府又下令宣布革去十三世达赖名号，并要驻藏大臣另找灵童代替。这样，不仅在西藏引起极大的震动，即在内外蒙古、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地蒙藏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感。但清朝政府不愿收回成命，只令驻藏大臣联豫派人前去印度，设法劝说十三世达赖回来。

接着，在内地辛亥革命成功，清帝宣布退位，成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藏历五月初五日，十三世达赖从大吉岭启程回藏，曾与九世班禅会晤于热隆寺。不久，十三世达赖从热隆寺又转移到桑顶寺，因拉萨战事尚未结束。他在桑顶寺住了两个月，于是年八月二十九日离开桑顶寺，十二月十六日到达拉萨。当十三世达赖到达拉萨之时，国内政局已发生新的变化，孙中山先生辞去大总统之职，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民国元年（1912）7月19日，北洋政府设立了蒙藏事务局，任命蒙古喀喇沁王爷贡桑诺布为总裁。十三世达赖主动给贡桑诺布写了一封信，派蒙古族喇嘛罗布桑东珠尔为代表，前往北京。

袁世凯见到十三世达赖来信以后，即于民国元年10月28日发表了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的命令。该命令称：“……现在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前达赖喇嘛诚心内向，从前误解自应捐释，应即复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以期维持黄教，赞助民国，

同我太平。此令”。十三世达赖接到“开复”名号的命令以后，即通过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给袁世凯转去一电，达赖要求北洋政府派人到印度大吉岭进行谈判，反映了当时西藏形势的迫切需要。当拉萨川军兵变，包围色拉寺失败，反而被藏军反包围以后，西藏靖西同知马师周等人即由印度致电四川都督尹昌衡告急，请求速发援兵入藏。陆兴祺也由印度致电北洋政府和四川都督尹昌衡，云南都督蔡锷，要求速由川滇出兵援藏。这样，尹昌衡和蔡锷接到命令后，立即采取了行动，川军越金沙江，到达了察木多，拟由中路直达拉萨。滇军也进入康区，攻克了乡城，拟由南路经波密进军拉萨。

英帝国主义看见川滇两军进展顺利，立即出面进行干涉。一再提出要求，要北洋政府派遣代表到印度大吉岭召开西藏会议，并主张西藏方面也要派代表参加。北洋政府在英方压迫之下，不得不命令四川都督尹昌衡与云南都督蔡锷停止向西藏进军，同时也向英国表示同意举行谈判，派陈贻范和王海平二人为中国方面的全权代表，西藏方面则派伦青霞札等人为代表，英国方面派印度外务大臣麦克马洪为代表参加。会议由原来在印度大吉岭召开，改在印度西姆拉召开。西姆拉会议以英国提出的“折衷”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折衷”方案的换文中还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但主要内容是把我国藏族居住的所有地区划为“内外藏”两部分，“内藏”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居住地区，由中国政府直接管辖；“外藏”则包括西藏与西康地区，中国政府“承认外藏自治”，“不干涉其内政，而让诸藏人自理”，“但中国仍派大臣驻拉萨，护卫部队限三百人”。并强迫中国代表在草约上签了字。签字消息公布后，引起全国各界人士强烈反对，北洋政府乃命令陈贻范拒绝在正约上签

字。英国即宣布英藏两方签字，中国未签字，不得享受条约上的权利。至此，英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西姆拉会议彻底破产。英帝国主义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勾结，秘密篡改中印边界地图，提出了所谓“麦克马洪线”的非法边界线，妄图将历来属于我国西藏地方的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印度版图。

1919年，北洋政府通过甘肃督军张广建，派遣朱绣、李仲莲及红教喇嘛古浪仓等由青海赴藏，“与达赖联络感情”。同年八月抵拉萨，受到西藏各界的热烈欢迎，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也会见了朱绣一行，并有悔改之意，在朱绣一行由拉萨启程返回之时，十三世达赖设宴饯行，席间十三世达赖表示：“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特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云云。”（见《西藏六十年大事记》）。

达赖这一段话，态度还是友好的。朱绣临行前，九世班禅从扎什伦布寺，“送来藏字公文一件及礼物多种，其倾向共和之心较达赖殆有过之”。这是朱绣等人的感觉，认为九世班禅的态度比十三世达赖更为友好。

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积极干涉西藏内部事务、直接危害到达赖和他代表的阶级利益，达赖集团和英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达赖开始有了觉悟，又想和祖国各族人民联合，以便对抗英国。

此时，1925—1927年的大革命已经失败，国共和合作已经破裂，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但仍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招牌，使达赖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若干幻想。1928年冬，西藏驻五台山堪布罗桑巴桑奉达赖指示，前往南京见

蒋介石，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托他回藏后交给达赖，这是西藏和国民党政府发生关系的开始。1929年7月，国民党政府以文官长古应芬的名义，派刘曼卿前往拉萨，试探达赖的态度。刘曼卿于1930年春抵拉萨，先见达赖，达赖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当刘要离拉萨返回内地时，达赖又答应再予接见。这次接见时，达赖向刘曼卿谈了很多问题，嘱刘回去报告国民政府。如说：“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予以分厘权利，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吾于政府所希求者不大，能于最近予藏以织布机、制革机及各种工人足矣。”这说明达赖还是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康藏问题是中国内部问题，是拥护祖国统一的。

达赖之所以与国民党政府建立关系，一方面是反映了当时西藏上层对国民党政府存在若干希望，以便了解国民党政府究竟有无力量能不能帮助西藏摆脱英帝国主义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向英帝国主义者表示了一下态度，英帝若再要干涉西藏内部事务，西藏就要投向祖国怀抱，要英国政府放聪明点，适可而止。一般的书籍把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的这种政策，叫做“骑墙政策”。

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在1928年派北京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前往南京，陈述西藏地方政府坚决拥护中央政府的意愿。

同时，在西藏达赖十三世发现黄教各寺喇嘛不守清规，吃烟、喝酒、嫖妓、赌博或出外谋生等等，事态严重，每况愈下，所以进行了严厉整顿。

1930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蒙藏委员会会议。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派僧俗官员参加，并委任楚臣丹增等人为常驻南京的代表。次年，正式成立“西藏驻南京办事处”。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在拉萨布达拉宫去

世，享年五十八岁。

十三世达赖逝世以后，三大寺代表和噶厦僧俗官员会议决定在十四世达赖未执政前，特请热振呼图克图出任摄政，掌管西藏政教事务。

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在繁忙的政教事中，仍抽时间从事写作，他的著作据藏文传记称有：《佛师普觉传及建塔史略》、《关于音韵学的注释》、《关于僧众戒律问题》、《佛教讲论经典的解释》等（参考《达赖喇嘛传》和《班禅额尔德尼传》）。

曲吉尼玛

(1883—1937)

曲吉尼玛，系第九世班禅的法名，全称是罗桑图丹曲吉尼玛格勒南结贝桑布，他的乳名叫仓珠嘉措。前藏达布地方噶夏村人，生于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正月12日。刘家驹的《班禅大师全集》说，“寄父名当珍，母名当琼措姆”，“班禅生而母哑”。

八世班禅丹白旺修去世以后，扎什伦布寺派出代表多人，寻找“转世”的“灵童”，结果在西藏地方找到了三个“灵童”。遵照清朝政府批准择定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正月15日，在布达拉宫皇帝牌位前面，举行掣签仪式，从金瓶中用象牙筷子抽出一名，是达布地区的仓珠嘉措的名字，于是就认定为九世班禅。当天在布达拉宫的日光殿上，九世班禅拜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为师，剃发取法名为吉总罗桑曲吉尼玛格勒南结贝桑布，简称曲吉尼玛。

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正月初三日，九世班禅在扎布伦布寺坐床。摄政第穆呼图克图给九世班禅授了沙弥戒。为了祝贺九世班禅坐床，清朝政府特赐白银一万两，由四川总督刘秉璋由

“司库提领”，“派员迅速解往”。九世班禅坐床以后，特派堪布罗布藏荣垫前往北京，向慈禧太后和清德宗“谢恩”。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由十三世达赖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给九世班禅授了比丘戒。同年五月初十日，九世班禅由拉萨返回扎什伦布寺。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从出生到受比丘戒这一时期，正是英帝国主义者向西藏地区进行军事侵略时期，也是西藏僧俗人民进行英勇的抗英战争时期。第一次抗英战争发生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当时英国人全部占领了哲孟雄（锡金），已与西藏接壤，西藏方面为了阻止英人入侵，在与哲孟雄接壤的隆吐地方，构筑防线，不准英人逾越。为了表示西藏僧俗人民的抗英决心，光绪十三年（1887），西藏三大寺、扎什伦布寺、西藏地方政府的七品以上全体官员，向驻藏大臣文硕上了一道公禀，声明“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当时的驻藏大臣文硕忠于职守，站在西藏人民一边，全力支持他们的抗英正义斗争。但是，由于当时清朝政府执行对外屈服政策，加上英国的新式武器与藏军的弓箭刀矛和火枪的相差悬殊，隆吐防线被英军攻占。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抗英战争。

在第一次抗英战争中达赖方面和班禅方面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达赖方面是由三大寺出面，班禅方面是由扎什伦布寺带头出面。开赴前线的藏军中，也有班禅管辖地区的民兵。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元月4日，英军攻占春丕，6日攻占帕里。4月11日英军进抵江孜，在此双方又发生激烈的战斗，江孜堡垒被毁，藏军损失很大，英军也死伤不少。这就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江孜保卫战。8月初英军攻占拉萨。十三世达赖在英军抵拉萨的前夕，为了避免被英军俘获，被迫出走，经过青海，到了外蒙古。对此，驻藏大臣向清朝政府的奏摺中“弹劾”十三世达

赖“平日跋扈妄为，临事潜逃无踪，请褫革达赖喇嘛的名号。”清朝政府回电：“著即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革去，并着班禅额尔德尼暂摄。”

然而，九世班禅是有政治远见、顾全大局的。他考虑到十三世达赖离藏期间，由他代理达赖的职权，只会增加他们之间的隔阂，对西藏内部的团结是很不利的。因此，九世班禅接到驻藏大臣的通知后，以“后藏为紧急之区，地方公事须人料理，且后藏距江孜仅二日程，英人出没靡常，尤宜严密防范，若分身前往前藏，恐有顾此失彼之虞。”没有接受要他前去代理达赖职务的要求。

英帝国主义者乘十三世达赖逃亡之机会，命在江孜留驻的鄂康诺大佐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9月24日，率英军50余人，突然到达日喀则，借口他不日即将回国，特来向九世班禅告辞。九世班禅还是很有礼貌地接待了鄂康诺。在接见中，鄂康诺突然提出让九世班禅赴印度。“班禅当即回称：我往印度不难，但须稟陈欽宪，奏知大皇帝殊批照准，方可起程，否则难以从命。该英员即称，该国有信，不去不行，请细思之等语。”并且以英军要占日喀则和扎什伦布寺为由进行威胁。在此情况下，九世班禅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10月12日离日喀则去印度。九世班禅到印度后见英皇太子时，鄂康诺要班禅跪拜，“班禅未从，当称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仍行执手常礼。”当时清朝政府外务部“已电达驻印欽使及印督等，班禅来印赴会则可，若逼令干预藏事，即令班禅亲自画押，盖用印信，均作为废纸。”这样，英人的阴谋未遂，不得不厚礼送归九世班禅。

九世班禅一行1905年12月返回江孜，在江孜休息两天后返回

扎什伦布寺。这次班禅被迫赴印，未做丝毫有损主权的事情。

1909年（清宣统元年）4月15日，十三世达赖又自塔尔寺启程，八月初八日到达西藏北方的重镇那曲（黑河）。九世班禅曲吉尼玛从扎什伦布寺远道前来那曲，欢迎达赖回藏。与此同时，川军入藏，对此达赖不满，遂与驻藏大臣发生尖锐矛盾。按理讲，驻藏大臣要求清朝政府派官兵入藏，清朝政府也予以批准，是正当的，因为西藏是大清帝国的领土，迭遭英帝的侵略，为了保卫边疆，巩固国防，中央政府有权也应该派遣军队进驻西藏。但是，在1910年“川军前队抵拉萨，联豫（驻藏大臣）派卫队迎之。卫队归途开枪，击毙巡警一名，大昭寺之济仲大喇嘛于琉璃桥畔饮弹而亡，卫队又向布达拉宫开枪乱击，僧众亦有带伤者，一时全城震动，人心不安，达赖恐遭危险，即挈其左右逃往印度。”（见朱绣著《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因十三世达赖出逃印度，驻藏大臣联豫紧追不舍，于是达赖由亚东，逃到了印度大吉岭，受到英国官员的“热诚接待”。对此清朝政府又根据驻藏大臣的建议，宣布“革除”达赖名号，并要另找灵童代替，引起很大震动。但清政府不愿收回成命，只令驻藏大臣联豫派人前去印度，设法劝说十三世达赖回来。直到1912年（民国元年）袁世凯发表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的命令。同时，也加封了九世班禅，加封令是1913年（民国二年）颁发的，全文是：“大总统令，据班禅额尔德尼称，久仰中邦，实沾德喜。凡在我属汉边官军民等，借饷筹食，无微不至等语。该额尔德尼实赞共和，效忠民国，维持藏事，备著勤劳。本大总统实深嘉慰。应即加封致忠阐化名号，以彰民国优待忠勤，尊崇黄教之意。此令。”

九世班禅接到加封命令后，向袁世凯写信表示感谢：“癸丑年，番三月二十五日，陆委员兴祺专人至招，蒙大总统加封致忠

阐化名号，谨在扎什伦布寺内，恭设香案，敬叩抵领跪谢。致忠
阐化班禅额尔德尼谨呈”。

1912年，十三世达赖从大吉岭回藏以后，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其原因是：1915年，达赖在日喀则设立了基宗（相当于内地行政专员公署），任命僧官罗桑敦主、俗官木霞二人基宗（后藏总管）。基宗的职权很大，他们除管辖达赖在后藏的所有宗谿之外，也管辖班禅所属四个宗和所有谿卡，这就侵犯了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在设立了基宗之后，即向班禅辖区的百姓征收与摊派军粮、税款和乌拉。这样就使班禅与达赖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1916年班禅写信给达赖，指出基宗干涉寺政不当，并要求会晤，解决问题，达赖复信拒绝。到了1919年春，达赖同意班禅去拉萨会晤，但无结果。这样，一直到了1923年，达赖命令扎什伦布寺的几个负责官员前往拉萨，这几个官员到拉萨后，未经审问，即被投入监狱。当班禅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是大祸临头的先兆，如不逃走，势将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立即决定，向内地出走。但他怕日喀则基宗发觉，作了必要安排。1923年11月15日夜，九世班禅领侍从15人，向北出走，无人知晓。三日之后，即11月18日晚，九世班禅的苏本堪布罗桑坚赞等100余人乘月色逃出，追赶班禅，疾行五日夜，才会合一起，直向藏北羌塘前进。由那里越唐古拉山脉，即入青海境内。1924年农历5月4日到达兰州，甘肃督军陆洪涛率领官员、军队数千人在兰州郊外迎接，班禅经过的街道皆用黄布铺路，扎了彩色牌坊，“备极庄严”。北洋政府大总统曹锟特派李乃芬为“迎护专员”，率卫队百人由北京前来兰州欢迎。从此，九世班禅在国内各地流浪了整整十四年之久。

1937年，当九世班禅回藏受阻以后，仍将行辕设在青海玉树

大寺的甲拉颇章时，当时日军已侵占了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抗战形势日趋严重，班禅即从玉树捐献三万元，购公债二万元，并动员行辕全体同仁踊跃捐款，汇集前方，慰劳抗战将士及救济伤兵与难民。并在玉树寺诵经祈祷抗战早日胜利。同年11月4日，九世班禅饮食难进，每食即吐，左肋剧痛，不能安卧，而且日趋严重。到12月1日，在玉树大寺甲拉颇章宫内圆寂，享年五十四岁。1941年2月4日，九世班禅灵柩运到后藏，在扎什伦布寺建宝塔供养。

九世班禅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斗争的一生。九世班禅不仅佛学造诣极深，而且政治上也很成熟。早期他与十三世达赖共同领导了抗英斗争，晚年又积极从事抗日斗争，可说是一位勇敢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士。至于他对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维护，更是始终一贯，坚持到死，在西藏宗教上层人物中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是西藏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反帝爱国领袖人物（见牙含章《班禅额尔德尼传》）。

喜 饶 嘉 措

(1883—1968)

喜饶嘉措，系藏传佛教当代著名高僧和学者。1883年（清光绪九年）出生于青海省循化县道帏起台沟一个贫苦农民家中。父名拉隆嘉，母名拉隆吉。喜饶嘉措幼年名叫多杰，他是独生子。在他五岁时，笃信佛教的父亲将他送入家乡的古雷寺出家，由郭莽扎仓拉然巴格西俄日布仁波且授以沙弥戒，取法名喜饶嘉措，遂在老僧人罗赛身边当“完德”（小沙弥），学读经文。由于他聪明颖悟，勤奋好学，几年之后，他竟背诵下了不少经卷，从而奠定了藏文和佛学知识的基础。

十一岁那年，喜饶嘉措告别了自己的家乡和他的启蒙老师罗赛，来到拉卜楞寺求学。但生活得不到保障，又不能成为拉卜楞寺正式僧人以得到布施。为了学经，他以从事打扫经堂、佛殿来维持生活，孜孜不倦地苦学钻研。十六岁那年，他才被正式吸收到铁桑琅扎仓（拉寺闻思学院）诵经修习，成为拉卜楞寺正式僧人，并由著名学者贡唐罗追为他授了比丘戒。由于他基础扎实，加上能刻苦勤勉，进拉寺后连续跳级进修，到二十一岁时他就学完了三藏（论藏、律藏、经藏）和三学（戒律、禅定、胜慧）等

大量经典，在每年拉卜楞寺内举行的新年经会上，他总是独占鳌头，而为寺主第四世嘉木样尕藏图旦旺秀活佛所器重。贡唐罗追亦认定喜饶嘉措是一位很有前途的青年，就建议他到西藏哲蚌寺进一步深造，以取得格西学位，并表示自己可以帮助筹备入藏费用。1904年春天，喜饶嘉措自己背着背架，赶着一头牦牛，随着拉卜楞入藏商队踏上了进藏的行程。半年之后，即1904年冬，喜饶经过一路艰辛，终于来到了西藏拉萨，投入哲蚌寺中。可是不久就遇到了不少困难，当时西藏三大寺的僧侣集团，主要为西藏农奴主所垄断，多为贵族子弟所充纳，而他只身一人，又远离家乡，政治上既无背景，经济上也无依靠，所以入寺不久生活上便失去了着落。为了学经，他不得不经常到乡下化缘和念经度日。事也凑巧，有一天他在乡下念经时，一位贵族被他的精神和学问所折服，主动提出给他当施主提供生活所需，以解除他学经的后顾之忧。他加入哲蚌寺郭莽扎仓修习经典，先后依止精通显、密经典和大小五明的大学者却珠尕布和波堆·洛桑耶喜丹巴嘉措等三十多位学者为师，系统地学习和研究显、密经论、大小五明学，从事讲经、辩论、著述等活动。尤其他辩经的方法之妙，技巧之高，效果之好，使同辈学者望尘莫及。1915年，喜饶嘉措三十二岁时，荣获了拉然巴格西学位称号，在罗布林卡的辩经考试中名列第一，名声大震。1917年，三十四岁的喜饶嘉措奉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命，校堪新刻布顿·仁钦朱（1290—1364）文集。后又奉命主持校堪拉萨新版《甘珠尔》。新版《甘珠尔》印刷后，第一部献给达赖喇嘛，达赖赐给他“嘉华坚贝罗追·喜饶嘉措”的尊号。同时，还完成了《第悉·桑结嘉措全集》的校对工作。在此期间，他还多次担任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上下密院著名格西的辨证人。

1937年，喜饶嘉措应聘赴内地讲学，抵南京时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之后，西藏上层内部的亲英分子在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操纵下趁机进行分裂活动。为了扭转和改变这种局面，以喜饶嘉措为首的十余人赴藏，当抵达西藏黑河地区时，受到亲英势力的阻挠，未能成行。1948年，全国即将解放，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在土崩瓦解之际，国民党玩弄所谓改组政府的把戏，在蒙藏事务委员会委员长之下增设蒙、藏籍副委员长各一名，以白云梯为蒙籍副委员长，以喜饶嘉措为藏籍副委员长。全国解放前夕，他回到了自己家乡古雷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喜饶嘉措为和平解放西藏，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做出许多有益的贡献。曾先后担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文教委员会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佛学院院长等职。并先后当选为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在青海逝世，享年八十五岁。

法尊法师

(1902—1980)

法尊法师，是中国佛教当代著名高僧、著名的藏文翻译家、汉藏佛教文化的沟通者。法尊法师俗姓温，河北省深县人，1902年生。幼时因家境困难，曾到保定学做皮鞋。1920年春末，在山西五台山出家，投玉皇庙瑞普（法名觉祥）师座前落发，取法名妙贵，字法尊。

1921年冬，到北京法源寺从道阶法师受戒，礼谒了太虚法师。此后，随传戒诸师到南京宝华山慧居律寺学习传戒法，并在宝华山听讲《天台四教仪》，阅读《教观纲宗》等。1922年冬，武昌佛学院开学，遂下宝华山前往武昌。在佛学院，先学《俱舍颂》、《因明》、《佛教史》等一般论述。次年，听讲《三论》、《解密经》、《文殊般若》及《成唯识论》等大乘空有两宗的要典，又听了《密宗纲要》等，对于大小显密得到了一个轮廓认识。1924年夏，在武昌佛学院毕业，回北京入大勇法师筹办的藏文学院，学习藏文。1925年初夏，藏文学院全体人员进藏，路经武汉、宜昌、重庆，后到嘉定，登峨眉山避暑。入秋时下山返嘉定乌尤寺。在乌尤寺加紧学习藏文，并手抄《四体合璧》一书中之

藏汉名词（世俗语）4册，又抄日本出版的《四体合璧翻译名义集》中汉藏名词（佛教语）4册，作为学习参考资料。是年冬，经雅安，越大相岭到康定，住安却寺，特请一位邱先生教藏文。1926年春，随同大勇法师、朗禅法师上跑马山，亲近慈愿大师，先学藏文文法《三十颂》、《法相论》、《异名论》、《一名多义论》、《宗书》等关于藏文的初级书籍；次学宗喀巴大师讲的《苾刍学处》、《菩提戒品释》、《菩提道次第略论》等佛教正式典籍，为学习藏文佛学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1927年春，和朗禅法师搭商人拉噶仓骡帮进藏，抵达甘孜时，西藏政府阻止汉僧进藏（疑是政府派遣的）。因此就住在甘孜札噶寺学经。在札噶寺依札噶诸古（指札噶活佛）数年，初学《因明入门》等书，次学《现观庄严论》、《辨了义不了义论》，听受了札噶大师的著述和许多传记文类。在这期间，法尊法师翻译了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并略加解释。摘译了《宗喀巴大师传》和《阿底峡尊者传》，俱在《海潮音》上发表。

1930年春，到昌都亲近安东格西，适值传金刚鬘论法会，受该论中40多种法。同年秋，随安东格西进藏，冬季抵达拉萨。1931年以后，依止安东格西，学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密宗建立》、《五次第论》、《入中论》等。又在此时，开始翻译《菩提道次第广论》。是时，汉藏教理院在四川重庆成立，受太虚法师的多次书信邀请，遂结束学业，于1933年冬初，离开拉萨，搭商帮，往印度，由海道回国。在途经印度期间朝礼菩提场、波罗奈斯、拘尸那等圣迹后，又往尼泊尔朝礼许多圣迹。1934年春，到缅甸仰光朝礼大金塔。同年夏初离开仰光，乘轮船经槟榔屿、新加坡、香港，6月间抵达上海，到宁波育王、雪窦，谒见太虚法师之后，又回上海，到南京稍住时，为

安钦大师当翻译（时安钦大师为南京诸信士传吉祥天女法）。后回到北京，到家乡探亲。同年秋，经武汉入川，到重庆汉藏教理院任教并兼管院务。是时继续翻译《菩提道次第广论》，为同学讲授。同时还翻译了《苾刍学处》、《菩提戒品释》等。1935秋，为迎请安东格西到内地弘法，再度入藏。不料到藏后不久，安东格西圆寂。遂于1936年，依止绛则法王学法，听讲《苾刍戒》、《俱舍随眠品》等。是年在拉萨翻译了《辨了义不了义论》等。同年秋后，仍绕印度由海路回国，到汉藏教理院继续作翻译和教学工作。翻译了《现观庄严论》，并加以略释。抗日战争期间，除在汉藏教理院讲学外，还编写了《藏文文法》、《藏文读本》，翻译了《入中论善显密意疏》等。又受安东格西嘱托，将《大毗婆沙论》200卷译成了藏文。为讲授西藏的佛教历史，编写了一部《西藏民族政史》。1949年夏，完成了《大毗婆沙论》汉译藏工作。同年冬，四川解放，他非常想家，于是在旧历腊月初离开成都，经重庆、汉口、石家庄，一路顺利地回到家，老母尚健在，不胜喜慰。

1950年，法尊法师在北京菩提学会参加了翻译组，接受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即今国家民委）文件翻译工作。直到1954年间，为民族出版社翻译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又将却扎编的《藏文辞典》译成汉文。又译出《五次第论》和宁玛派的《七宝论》。

1956年秋，中国佛学院成立，任佛学院副院长，兼讲授佛教课程，译了《四百论颂》、《入中论略解》、《俱舍颂略解》等。“文革”中，被打成“黑帮”，1972年解除“黑帮”名义，恢复自由。1978年8月由藏文译出阿府峩著的《菩提灯论》等。1980年秋，中国佛学院决定复课，法师出任院长。这一年中，他

每天伏案写作，至12月中旬，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第四届代表会前夕，他抱病译撰的因明方面的著作已全部脱稿，准备在四届代表会后到佛学院履职，不料，在12月14日下午1时45分，法师安祥而去。法师逝世后，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的领导同志和赵朴初会长等都赶到广济寺，向法师的遗体告别。

法尊法师是我国著名佛学大师，藏文佛学翻译家，数十年游心法海，口不绝吟于三藏之言，手不停披于五乘之编。直到一期报命将尽之时，仍兢兢业业，不弃分阴，翻译藏文佛学要典，嘉惠后学。法师生平译著的佛学典籍已出版的有20多种，积数百万言，为沟通汉藏佛教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中国佛协第四次代表会上，佛协副会长正果法师及佛协副秘书长隆莲法师提议在五台山为法尊法师建塔，以资永久纪念，并将具体任务交给杨德能居士办理。由于山西省及地方各方面支持，建塔工作进行非常顺利，从择地、奠基，到施工落成，仅一个月时间。塔身六米多高，赵朴初会长有“翻经沙门法尊法师灵骨塔”十一个大字闪闪发光，标志着法师毕生历尽艰辛，呕心沥血的著述和译著将永远留在人间，成为有志之士研究和应用的宝贵财富（见净慧敬记《法尊法师自述》、胡继歌《回忆吾师——法尊法师》）。

洛桑登真·扎巴他那

(1903—1950)

洛桑登真·扎巴他那，即为西藏和平解放而献身的格达活佛。他出生于四川省甘孜县白利土司辖区的德西地村。父亲是白利土司属下的一名差巴（意为支差的人）。1910年他七岁时，被选定为甘孜县白利寺活佛。1920年，他赴西藏甘丹寺学法，由于他刻苦学习，不仅通晓显密经典，而且对藏族的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医学等都有较深的造诣，八年后获得甘丹寺格西学位（格西，藏语音译，意为善知识）。

从西藏返回甘孜后，虽然他是在白利寺念经作佛，但极喜帮助穷苦群众，他把白利寺所得布施和其他收入，除寺院费用以外，大都用来周济附近的穷人。他还经常用藏药为群众治病解痛，或编写出词句优美的歌曲教群众传唱，以驱逐寂寞和悲伤。他极端仇视国民党反动派对藏族人民的压迫，一些遭受军阀官僚迫害而无家可归的藏族群众常常得到他所在寺院的保护。

1936年春、夏，震惊世界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先后到达康北高原，两大主力就会师于格达活佛的故乡——甘孜县。红军到藏区以后，宣告藏、汉、回各民族一律享有

平等的权利，禁止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任何人不得称呼藏族同胞为“蛮子”等等。这时，格达活佛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贺龙总指挥的亲切教导下，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感召下，思想发生巨大的变化。他逐渐认识到只有工农红军才是为各族人民谋利益的军队，只有跟着共产党走，藏族人民才能获得解放。于是他勇敢地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之中，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36年5月，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藏族）自治政府在甘孜县庄严宣告成立了。三十三岁的格达活佛，以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在藏族中的崇高威望而当选为自治政府的副主席。此后，他忘我地工作，学习和战斗，一方面热情地宣传党和红军的革命主张和政策，力图让更多的人觉悟；另一方面率领僧俗群众为红军作通司、当向导、救护伤病员、筹措军粮马料等。他动员群众多吃野菜，把青稞、豌豆节省下来支援红军。据当年红军政治部出具的收条、证明表明，仅格达活佛住持的白利寺，半年交纳的“拥护红军粮”就有青稞一百三十四石，豌豆二十二石；支援红军马十五匹，牦牛十九头。为此，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特为白利寺颁布布告以示感谢和表彰。

“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扰，违者严办，切切此布。

公历1936年4月17日令”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关向应的领导下，战胜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之后，继续北上。当红军离开的第二天，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农

奴主还乡团疯狂地进行反扑，博巴政府的成员和革命积极分子被杀者达四十余人。惨案发生后，格达十分震惊，他挺身而出，与敌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先是耐心地与大金寺、甘孜寺当局进行说理、劝阻，继而巧妙地派贴心喇嘛色波把红军伤病员205名送至道孚县章谷寺，委托扎夏活佛掩护治疗。他还组织僧俗群众拿起火枪、刀矛、锄头进行自卫，保护了大量的革命群众。格达活佛还写信给桑根寺活佛桑根顿珠，谆谆告诫他不要辜负贺龙总指挥的期望，要全力保护隐藏在贡拉森林里的红军伤病员，信中说：“据透露，红军冲破了险阻，已胜利到达北方，开始了新的战斗，……要留根种，等待着未来的春天——开花、结果吧！”后来，他又请人从青海西宁买回一张《八路军奋战图》，挂在墙上，时常对着这些图片思念亲人，并为他们天天诵经祈祷。他和群众一道，编写了一首首独具民族风格的诗歌来抒发自己的真挚情感。例如：

“红军走了，
寨子空了。
寨子空了心不焦，
焦心的是红军走了。
彩云是红军的旗帜，
高山是红军的臂膀。
红军啊！你们给我留下了金石的语言，
藏族人民永远在你的指引下成长……
起来呀，赶走草原上的豺狼，羊群才能兴旺，
起来呀，赶走阿门里的坏奔波，人民才有吉祥。”

1949年冬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传到藏区，传到格

达的故乡。格达活佛兴奋异常，率先与博巴政府时期共过忧欢的夏克刀登、邦达多吉一起派代表穿过敌人的严密封锁线，绕道青海、甘肃赴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献旗、致敬，表达藏族人民盼望解放的心愿，请求“神兵”迅速降临康藏。1950年春，西康重镇康定解放后，格达在甘孜县召开了三千人的庆祝大会，并组织代表团赴康定欢迎解放军，动员藏族人民积极为解放康藏的部队修筑道路，充当向导，运送粮草。

之后，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委员兼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时，他当选为副主席，并兼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6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他被聘为特邀代表，共商国家大事。

1950年7月，格达活佛受中央人民政府的派遣前往西藏，对西藏地方进行劝阻，以消除对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切误解，促使谈判早日举行，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同年7月24日，格达活佛抵达西康重镇昌都，立即受到英美帝国主义间谍福特（公开身份是英国驻昌都电台台长）的重重阻挠，不能前行。8月22日遇害身亡，时年仅四十七岁。

格达活佛不幸遇难之后，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成立了以王维舟副主席为主主任委员的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并责成西康省人民政府办理身后事宜，委任张国华委员代表该会致祭。1950年11月25日，在重庆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事委员会、西南军区的负责人邓小平、王维舟、李达、张际春、梁聚五等亲临大会致哀。同一天，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西藏一定要解放——悼念格达活佛》的社论和贺龙同志撰写的《悼格达委员》的纪念文章，赞扬他“生得伟大，死得光荣”（见周锡银《为西藏和平解放而献身的格达活佛》，邓珠拉母收集整理的《格达活佛》、1950年11月重庆《新华日报》等）。

根敦琼培

(1905—1951)

根敦琼培，原名阿勒克·吉扎，是一位学通藏英，见闻博广的藏族宗教学者。他1905年出生于色莫宗的日贡（今青海省同仁县）晓邦村，父亲叫阿勒克甲波，母名白玛，他们都属于藏传佛教宁玛派（俗称红教）。他的父亲精通藏文，熟习宁玛派经典，是当地的一位学者。根敦琼培自幼好学，四岁时即能识藏文，七岁时父亲病世，他家的财产被贪婪的叔叔骗走，他母子被赶出家门，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但敦根琼培仍然坚持学习，到九岁时他已掌握了藏语文法，并学会作诗、绘画和写文章。

根敦琼培十三岁入日贡寺出家为僧。他的师傅给他取法名为根敦琼培。在寺院里他学习了因明和其他佛教经典，他几乎是一读即悟，过目不忘。他的学习成绩惊动一些著名的大活佛，包括德东索甲仁波且和多仁波且，他们对他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给他以种种帮助。约两年时间，他在日贡寺和只厦寺学完初级经典，之后转入甘肃省夏河县拉卜楞寺继续学习。

藏传佛教是非常重视辩论的，根敦琼培就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辩论者。他在拉卜楞寺的辩场中，曾舌战群僧，击败所有向他发问

的人。他的辩才赢得了人们尊敬，但他并不为此而骄傲，甚至不时地故意守哑吧戒，避免过分地显露。他不愿意突出自己，除正式辩论而外，他对人是很谦虚的，在辩论中获得一次巨大胜利后，就要冷静一个时期，这成了他一生的习惯。

后来，他寻认为是一位宁玛派喇嘛的化身，称为多扎仁波且（即多扎活佛）。但是这位多扎活佛的拉章很穷，虽然把他寻认为转世，但他却一点好处也没得到，仍然过着一般喇嘛的生活。后来，由于他对经典的解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受到上层喇嘛的攻击，使他不得不离开拉卜楞寺。这时他已二十五岁，他和其他僧人一道去西藏学经。到了拉萨后，入哲蚌寺郭莽扎仓（又作郭莽学院），拜喜饶嘉措大师为师。喜饶嘉措是他的同乡，也是当时拉萨最著名的学者。他们师徒之间常有争论，而且在辩论中他的这位老师也经常败下阵来。他当时在哲蚌寺可算是无敌的。

1943年，印度学者拉胡勒桑克洛维那访问西藏，其目的是想找寻贝叶经，另外想找寻几位进步的西藏学者，以取得指导和帮助。碰巧有人把根敦琼培介绍给他，他们见而后谈得很投机，两位学者的相识，结成了终身的友谊。就在藏历年将要来临，即将在举行的传昭大会考取拉仁巴格西的时候，根敦琼培却突然随拉胡勒离开拉萨到印度去了。这事引起了人们很大的惊异，因为根敦琼培是被推荐参加考试的，在西藏的僧人中，把考中拉仁巴格西看作无上光荣，就像汉人考上状元一样，不少僧人一生就是为这一目标而奋斗的，但根敦琼培却把拉仁巴弃如敝屣了。根敦琼培和拉胡勒取道山南转后藏，经尼泊尔抵达印度以后，以极大的求知欲学习他所看到的新事物。他游览佛教圣地，参观博物馆，结识印度的学者，受到印度学术界和藏学家们的欢迎。

他在锡金认识了一位基督教修女，对他很友好，他开始向她

学习英语。他在大吉岭时，和一位叫喀钦拉多的佛教徒同屋。这位佛教徒发现根敦琼培虽然满腹经纶，但从不见他念经，更不见他拜佛，甚至别人念经时，他还报以不屑的神气。他觉得这是一位怪人。当一位著名的俄国藏学家罗列赫想找一位藏族学者合作时，他就把根敦琼培介绍给他。罗列赫带着根敦琼培到了印度西北部的库奴（这里过去曾是阿里的一部分，居民多为藏裔，通藏语的人很多）。他们在这里合作用英语翻译两本重要的西藏著作：《释量论疏》和《青史》，后一部著作主要是根敦琼培完成的。

根敦琼培在瓦措纳西唯识学院学习巴里文，孟加拉皇家亚细亚学会利用他整理翻译他所搜集到的藏文资料，他也充当了班第达桑克拉提亚那在巴特那图书馆研究藏学的助手。他还从一位库奴喇嘛丹津坚参学习梵文。

他在印度时，生活十分清苦，有时几个月没有收入，有时朋友们和学者们送给他几百卢比，使他可以勉强度日，他日夜坚持学习，特别是看到敦煌资料的本子后，更引起对西藏古代史的浓厚兴趣，他与罗列赫和其他藏学者讨论这些文献资料，决定编写《白史》。他的这本书，开创了科学利用古代文献资料的先河。

根敦琼培在印度住了大约十一年，除了踏遍印度和尼泊尔各圣地之外，还访问了锡兰。他在锡兰住了两年多，访问了所有重要城市和名胜古迹，仔细地研究了锡兰的历史、地理和宗教制度，同锡兰的佛教学者们讨论了有关问题，并把《法句经》从巴里文译为藏文。

当他从锡兰回到印度时，正是印度独立运动高涨的时期，到处都有游行示威和不合作运动。由于战争的缘故，英国当局实行军事管制，许多要求独立的领袖被关起来。但是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未因此而低落，英国统治者只得允许印度人民于战后实行独

立。这些都使得根敦受到教育，他同情印度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尤其是他看到印度的所谓贱民不仅受到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也受到本国统治阶级和落后的种族制度（喀斯特）的压迫，他对这种落后的社会制度深为反感，这也许是他后来追求进步的原因之一。

根敦琼培在印度交了儿位朋友：一个是罗列赫，一个是班智达桑克那拉特亚那，是英国殖民当局的反对者。他和一些年轻的藏族热烈讨论了西藏社会的改革问题，重要人物有邦达饶噶和凭错江皆等。他们中的关键人物是邦达饶噶，他和他的二哥邦达多吉都是反对西藏地方政府的，特别反对亲英分子摄政达扎。实际上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小集团。根敦琼培在要求改革西藏旧制度方面，和他们有共同之处，所以也和他们有较密切的往来。他们的活动被英国当局侦察得清清楚楚，根敦琼培受到英国当局的警告而离开了印度。他取道门达旺错纳一线回到西藏。一进入纳错宗，当地宗本就把他拘留起来，押送拉萨。到拉萨后，噶厦并没有立即拘留他，只是暗中监视着。由于邦达饶噶由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介绍，给他安排了一个专员虚职，每月几百藏银的津贴，在这段时间他正在编写《白史》。

1947年，在西藏历史上是动荡的一年，这年春天发生“热振事件”。支持热振的色拉寺戒扎仓僧人与西藏地方政府发生武装冲突，结果该扎仓被洗劫。许多热振的亲信被处死和流放，西藏贵族中的亲英势力大为抬头。这时国内正在进行解放战争，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西藏的农奴主集团一片恐慌，于是疯狂地进行分裂活动。就在这时，拉萨传出了有共产党活动的消息，而根敦琼培是第一个受怀疑的人。大约是1947年的7、8月间，他被捕了。因为没有找到证据，只得释放他。不久，又被捕入布达拉山下的监狱。到了1951年11月，革命形势迫使摄政达扎退位，十四世达

赖提前亲政，西藏的噶厦政府以此为理由，宣布了大赦，根敦琼培也蒙赦出狱。三年的狱中生活，虽然摧毁了他的健康，但并没有丝毫改变他的政治信念，那些利用他的才华的好心人，希望他“改邪归正”，埋下头来写点东西。他却一笑置之，他吸烟饮酒，找寻麻醉，但人们找他辩论时，他还是和以往一样尖锐犀利，他对西藏统治阶级的反感有增无减。因此，他们觉得他仍然是一个危险人物，于是和逮捕他时的手法一样，用另一种鄙卑的手段（在酥油茶里放毒）把他害死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951年12月18日，年仅四十六岁。

根敦琼培是我国藏族中的一位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他处在帝国主义分子妄图分裂我国的活动中，他在封建领主的残酷统治下，在宗教气氛弥漫的环境里，不同流合污，茕茕孑立，难能可贵。他又是藏族中倜傥不拘，热情奔放的杰出诗人，对藏族历史、佛教哲学、美术、逻辑学、语言学、地理学，均有造诣，堪称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许多重要著作，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在他的佛学著作中，尤其是佛教哲学和西藏历史方面的著作中，对佛教教义，特别是对黄教的许多教律教规，作了深刻的批判。例如，他在《喜玛拉论释》一文中，对西藏佛教中传说的“雪山白狮”的观点，从自然科学的事实和理论的高度，给予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指出根本不存在所谓“雪山白狮”。这是由于他在国外读了一些外文的马列著作，因而具有唯物观点和科学态度，才能作出正确的论断。

他的著作有：

历史类：《白史》，拉萨刻本仅包括松赞以下三代赞普。目前国外也只有此未完本。

哲学类：《动论》、《智论》、《中论要义》、《唯识派

论》、《艰难之明路》、《外道异见明析》。

翻译类：《昙钵偈》（译自巴里文）、《巴纳歌》（与印度学者普拉班达难答合译第十二章）、《瑜珈真信》（与同一学者合译，1941年在大吉岭出版）、《沙恭达拉》（剧本噶世达原著，根敦以诗歌体译出，译文极美）、《释量疏》（由藏文本译为英文本）、《青史》（他协助俄国学者罗列赫将藏文本译为英文本）、《军事操典》（由英文本译为藏文，至今在印度的藏民学校中仍在采用）。

游记导游类：《一位学者旅行家看图解的印度史》、《草药及饮食之二十种滋味》（以上二书原稿可能存拉卜楞寺）、《印度圣地巡游记》（此书1939年由印度菩提学会出版）、《从拉萨到大吉岭》（以通俗文写成，极生动幽默）、《喜马拉耶巡礼》（据说原稿现存不丹）。

评论类：《火堆之升起》（与阿布拉中合作编写，系讽刺作品）。

杂类：《爱情之艺术》（其中一部分是印度古代著作，爱经藏译），《藏文字典》（与噶伦堡藏文报编辑塔钦合编）。

注：此资料请见李有义《藏族历史学家根敦琼培传略》载《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六期。

坚白赤烈

(1913—1984)

坚白赤烈，通称结巴堪索坚白赤烈，又名措康活佛，是藏传佛教中当代的一位博学多闻，精通经、律、论三藏，以辩论著称，在各教派中享有很高威望的一位黄教高僧。他是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锡仲区人。属邦达家族的差民。父母务农，笃信佛教，兄妹5人，长兄居家，后弃农从商，三弟格桑，四弟登培皆出家为僧，入拉萨哲蚌寺学经。妹妹在家奉养母亲。

坚白赤烈3岁时被芒康丝乌寺认定为该寺东仓活佛的转世灵童，接入寺庙抚养，8岁坐床后遂依阿西阿乃经师学经。他从小聪慧过人，有过目不忘之称。13岁时已能熟读“五部大论”（指概括西藏教经、律、论三藏主要内容的著述，即，《释量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俱舍论》和《戒律本论》）。以后，得到邦达家族兄弟为施主资助，于1926年到拉萨哲蚌寺学习经论，并被追认为罗色林扎仓的措康活佛。曾先后依止以论辩著称，显、密、学、修精湛的德嘛与东培格西处学习。学因明学系统的《释量论》、《集量论》及宗喀巴大师与其两大弟子贾曹杰和克主杰对《集量论》的注释。在此基础上，学习般若系统的《现

观庄严论》及大般若经十万颂、八千颂要义，以及宗喀巴大师有关般若系统的注疏。接着，学习月称论师所著的《入中论》，龙树论师著的《中观论》及宗喀巴大师的《缘超赞》和对中观系统学说的有关论述。20岁（1933）时，依阿闍黎德嘛与东培受比丘戒。受戒以后，他又学习德光论师著的《戒律本论》及《四分律》、《十诵律》等戒学著作。最后学《俱舍论》及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主巴对该论的注释。在学习上述各部论著的同时，他还结合学习宗喀巴大师的代表著作《菩提道次第广、中、略论》。由于学习刻苦勤奋，坚白赤烈在青年时代对显教的各种经论及注疏，都能口诵心悟，得其精要，立宗论辩，无能胜者。27岁时，在全藏的格西考试中获得了一等格西——拉仁巴格西的学位。28岁时（1941年）在西藏佛教各教派学者云集于拉萨的传召大法会的21天中，立宗答辩无能胜者，于是誉冠全藏。

显教学业取得成就，他便入居堆扎仓（上密院）学修密宗。依止宗喀巴密部第二十八代康萨喇嘛为根本上师，习研《密宗道次第》，从事密、行密入手，进行学习瑜伽、无上瑜伽第四部密法及各种仪轨、灌顶、坛城等密部传承。同时，还学修《大威德怖畏金刚》、《集密金刚》及《大乐金刚》等本属仪轨。在这一时期内，他著有《因明精要》及《疏释》等论述，刻版流行于世。

31岁时，他在上密院考取了密宗学位昂仁巴。次年被推任为哲蚌寺的结巴堪布。

1956年2月，在任堪布期间，被选为我国佛教徒参加印度“菩提伽耶咨询委员会”的代表，前往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回国后，在北京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会晤时甚投其缘，后来成为在佛学研习上的最好同参。他接受了喜饶嘉措的建议，参加了民族参观团，到祖国各地进行了参观学

习，深感祖国的伟大，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正确英明。同时深感西藏的落后，群众的贫苦，认为其原因是制度不好，西藏必须走民主改革的道路才能根除落后和贫困的状态。为此，他后来一直拥护西藏的民主改革，拥护社会主义制度。1956年冬，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成立时，他被选为秘书长，主持佛协的日常工作，并以其身份和影响在哲蚌寺的僧侣中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宣传民主改革的意义和好处。1957年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时，坚白赤烈坚决反对叛乱，并在哲蚌寺劝说受蒙蔽的僧侣投诚，劝说逃跑的僧人回寺，对平叛工作起了好的影响。平叛改革时，他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了西藏的民主改革。1960年，任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二届理事会副会长。1961年，任西藏国庆观礼团副团长，带队前往北京观礼后又到祖国各地进行了参观学习。1962年，积极筹办西藏佛教经典研究班，选择学员，选写教材，不辞劳苦地亲自备课，给学员教授经论，为西藏佛教培养了一批人才。1964年，被选为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积极参与政治协商工作。“文革”中，他同其他爱国人士一样，受到了极左路线的冲击，但他坚信中国共产党的信念从未动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统战、宗教政策逐渐落实，坚白赤烈先后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等职，并主持佛协西藏分会的全面工作。1983年筹办西藏佛学院时兼任院长，在筹建校址、维修校舍、招考学员、研制教学计划、编写教材等方面尽职尽责，做了大量艰苦、耐心、细致的工作。1983年底，他不顾病魔缠身，为了佛教事业，长途跋涉，前往北京出席全国佛教协会四届二次理

事会议，对赵朴初会长提出的“人间佛教”理论非常赞同。返藏以后，他传达了会议精神，并组织佛协西藏分会的同仁们进行学习。1984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四届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前夕，他突然病重，但仍然不忘佛协的工作，再三嘱咐同仁们一定要开好这次会议，要遵照佛协章程办事，要认真协助党和政府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要爱国守法，爱国爱教。

1984年12月12日上午，他安祥结跏趺坐，在所供奉的主要本尊“大威德怖畏金刚”坛城前舍极西逝，享年七十四岁（见周敦友《坚白赤烈生平简介》）。

丹 贝 坚 赞

(1916—1947)

丹贝坚赞，汉名黄正光，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转世活佛之一，黄教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住持（寺主）第五世嘉木样活佛。1916年农历3月12日，出生于原西康理塘的营官坝彩玛村。父名贡保端主，汉名黄位中，系所谓噶遮冬三族中之噶族拉日端主之子，天性介直英勇。母名姑如拉措，天性温淑，虔敬三宝，乐善好施。1919年，四岁（按，岁数按我国旧法计算），经第九世班禅大师卜算，由拉卜楞寺德哇仓活佛找寻，被认定为第四世嘉木样的“转世灵童”，并赐号“善慧妙音圣智教幢”。

1920年，五岁。农历2月11日，拉卜楞寺德哇仓活佛率随从人员到西康彩玛村迎请。同年8月6日，在僧俗数千人欢迎中，自家乡启程北上，其家属随行。9月22日抵达拉卜楞寺，数千僧众仪仗列队，虔诚欢迎。遂于正殿中升无畏法座，举行坐床典礼。僧众举行立宗辩论；班禅大师遣使以附有五彩飘带之无垢白螺为贺仪，由贡唐仓呼图克图摄位献于师手，大开吉祥瑞兆；拉卜楞寺根本檀越河南蒙旗亲王献曼陀罗、白银及服饰等；本寺各活佛、各学院和所属各寺院、部落亦依次奉献供养；宁海镇守

使、河州镇守使和西军帮统等军政界人物也都派代表送礼致贺。次年，2月8日，在持律大德嘉木样钦饶嘉措为师，受清淨近事戒。以智华嘉措为师，开始学习藏文，领悟极速。1922年，大师七岁，从拉科仓·季美成来嘉措受沙弥戒。1923年农历2月8日，大师“莅临说法大会，为无量众讲‘祈祷正法炽燃颂’、‘现观庄严本颂’、宗喀巴‘妙喜意乐传’等，于菩提道行次第，特依噶当派根本六论而说，深广圆融，得未曾有，时师尚未开始学习教理，以是智者聰闻，莫不自然倾服。”时年8岁。

1924年，大师9岁。由于宁海镇守使马麒对拉卜楞寺的宗教事务进行干预，引起僧俗群众的强烈反抗。寺院上层人士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决定，在大师未成年之前，政教事务暂由其父、兄代为掌管。为了控诉马麒屠杀藏民的罪行，于1924年农历5月第五世嘉木样及其家属离开拉卜楞寺，经河州到兰州。五世嘉木样谒见班禅大师（九世班禅），聆受长寿灌顶，前后供献供养银二十余秤（每秤五十两）以及坐骑、轿舆、伞盖、乐工艺。班禅也回赐服饰全套。同年冬，从兰州返至河州。1925年，大师10岁。从河州前往陌务新寺、作格旧寺、日多玛、完科洛、恰盖、莲花山等地巡视。1926年，又前往欧拉、乔科、阿哇、安曲、毛儿盖等地，朝礼圣迹，发大宏愿。1927年，12岁。自从离开拉卜楞寺以后，由于长兄罗桑泽旺（汉名黄正清）的奔走控诉，又得中国共产党党员宣侠父、贾宗周的具体帮助，于同年春，订立了《解决拉卜楞案件的条件》。之后，宁海军撤离了拉卜楞，成立了拉卜楞设治局和拉卜楞番兵司令部，委任黄正清为司令。同年6月，五世嘉木样丹贝坚赞也返回拉卜楞寺院，受到广大僧俗群众的热烈欢迎。1928年，大师十三岁。创建续部上院（居多巴扎仓），并为该院制订了清规学则。从此大师开始从师学习教理，至二十二岁的十年中，学完五

部大论。

1929年，大师为拉卜楞寺总方丈牟多活佛、土观活佛等三千余人传法。又应甘加各部落之请，往传圣法，各如其愿。1933年11月，得悉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讯，为完成其愿故，齐全寺僧众，命诵祈愿速疾转世文，并虔修广大供养。此时，其兄罗桑泽旺（黄正清）赴南京晋谒蒋介石，备受优礼。蒙藏委员会以历代嘉木样均为护持教法大士，前清历代帝王，皆有封赠，乃呈请国民政府封第五世嘉木样为“辅国阐化禅师嘉木样呼图克图”，并颁册印。

1936年夏，九世班禅大师应邀抵达拉卜楞寺。从这年闰五月十六日起，全寺大小活佛和僧俗达七万余人，先后聆听大师传法。嘉木样五世向班禅大师敬献曼陀罗、白法螺、白银以及全副服饰用具，以谢师恩。六月十日，以班禅大师为亲教师兼轨范师，在持律僧伽十众中为嘉木样五世受比丘戒。六月十五日在大殿无量海会中，嘉木样五世复献曼陀罗、元宝、犏牛等。七月四日，班禅大师启锡入藏，嘉木样五世率全寺活佛执事僧俗众等恭送。

1937年，大师二十二岁，农历五月初五日，启程赴西藏学法。教区僧俗，纷送程仪，沿途各地，均热烈欢迎。当到青藏交界的黑河沿时，原西藏地方政府派员及牛马乌拉来接。十月九日至拉萨近郊，西藏地方政府摄政热振活佛、哲蚌寺郭莽扎仓（即郭莽院）哈东康村阿秀米村、色拉寺吉扎仓哈东康村，或遣代表，或全体亲自设帐郊迎。到达拉萨后，西藏地方政府重要官员及哲蚌寺堪布，亦亲自来迎。瞻无比能王释迦二真身像时，虔献不可思议之各种供养，殷重祈祷正法宏扬，政府永固，中日战争，早日结束，众生安乐。朝礼布拉达官达赖宝座时，献黄金、白银、绸缎、茶、马等。嘉木样五世自入藏学经到学成离藏的三年中，先后布

施于西藏各大寺院僧众和寺院附近村民六万余人（大体每人银二两左右），以及供灯、斋饭等，粗略估计，仅白银用去二、三十万两。入哲蚌寺郭莽院，以康撒活佛为经师，研习佛法，“勇迈精勤，昼夜不倦。”同年冬，闻班禅大师圆寂讯，持广修功德，祈愿早日转世。

1938年，大师三十三岁。西藏地方政府派员分赴安多各地寻访达赖转世灵童，五世嘉木样特电其兄罗桑泽旺，竭力协助。在学法之余，他经常宣传抗战，揭露日寇暴行。同时电令其弟阿旺嘉措（汉名黄正基）率领僧俗代表，携锦旗及慰劳品赴重庆，慰劳抗日将士。同年夏，师赴后藏各地，在扎什伦布等寺礼朝圣迹，精研密法，并上布施。1939年冬，在哲蚌寺郭莽院修业期满，曾与郭莽院及罗赛岭的僧众辩论教义，名列第一，威信日增。

1940年春，嘉木样五世启锡东返，拉卜楞寺及各属寺代表来迎者，络绎不绝于途。同年6月3日抵达拉卜楞寺。他给续部上学院捐献经典、佛像及法器，并为该院勘定院址，正式奠基修建。国民政府为之捐款大洋七万元。甘肃省捐大洋三千元。从拉萨请来续部学院经师二人，专司教授音韵及五彩坛城堆制法。无论巨细，均按拉萨续部学院而制定。是年，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命其兄罗桑泽旺率其弟阿莽仓活佛，前任总方丈那格仓活佛及僧俗代表多人，赴重庆觐见致敬，并捐献飞机三十架之巨款，以支援抗日战争。政府各方，均热烈欢迎，殷勤招待。旋任命五世嘉木样大师为蒙藏委员会委员，赐“输财卫国”匾额一面。

1945年春，大师发动全寺僧众，植树造林，在卓玛山，先后栽种松柏等树30余万株，并做好浇水、管理工作。同年4月，拉卜楞寺喇嘛职业学校正式成立，教育部特聘五世嘉木样为校长，即亲自主持开学典礼。此后，他经常过问学生学习情况及生活情

况。五世嘉木样还与浪仓活佛编写藏戏《松赞干布》，督导学生排演，使此剧传遍藏区各地。

1947年4月14日，五世嘉木样因感风寒，继染痘疹，医治无效，遂于菩提法苑圆寂，终年三十二岁。4月23日火化，修建舍利灵塔。塔之四周，饰珊瑚、琥珀等珠宝万余件，极为精致。

俟后，编纂《辅国阐化禅师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纪念集》一部，以示纪念。

第五世嘉木样·丹贝坚赞(汉名黄正光)虽然一生在世较短，但对于宏扬佛法，革新拉卜楞寺管理制度，扩建寺院做出了贡献。如创建续部上学院，扩建了本寺印经院，重修了宗喀巴佛殿和建立了“议仓”制度等等。他一生聪明好学，爱好医学、历算、书法和照相等。他在治教之余，还努力学习汉文，注意发展藏族文化教育事业。《黄正清与五世嘉木样》一书中说：“由于接受了新的思想，意识到文化落后是经济落后的根子。于是，1944年秋向教育部建议成立喇嘛职业学校，”得到批准，亲自担任校长，为发展藏族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

确吉坚赞

(1938—1989)

确吉坚赞，即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俗名贡布慈丹，1938年2月3日(藏历土虎年正月初三日)生于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一个藏族农民家庭。父名公布才旦，母名索南卓玛。1989年1月28日在西藏日喀则市他的新宫德虔格桑普彭逝世，终年五十一岁。

第九世班禅1937年在青海玉树逝世后，班禅堪布会议厅于1941年按照宗教手续和宗教仪轨，派出由僧俗官员组成的转世灵童寻访团，选定当时三岁的贡布慈丹为第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1944年接到青海塔尔寺供养，并用班禅堪布会议厅扎萨喇嘛桑坚赞的名义，报告当时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请求批准。

1949年6月3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颁布命令，批准贡布慈丹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免于金瓶掣签。之后，按宗教惯例，举行剃度、受戒等仪式，取法名罗桑赤烈伦珠确吉坚赞，简称确吉坚赞。同年8月10日，国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在塔尔寺主持举行了坐床典礼，并颁发汉、藏文合璧的“西藏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印鉴。至此，确吉坚赞正式继承

历辈班禅的合法地位和职权，成为第十世班禅，受到广大僧俗群众的信仰和崇敬。

1949年9月西宁解放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即派人同中国共产党联系。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即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愿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并提出“待命返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复电勉慰，对他的爱国主义举动予以高度赞扬。1951年4月，班禅大师亲自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主要官员到北京，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心，积极推动和支持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事宜的谈判。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式签字。5月24日，他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全体官员向毛泽东主席致敬，祝贺《协议》的签订。5月28日班禅堪布会议厅发表声明，热烈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表示“为了西藏民族的彻底解放和发展，为了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的胜利，今后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为正确执行全部协议，为西藏民族与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而奋斗。”5月30日他给达赖喇嘛发出祝贺电报，指出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西藏僧俗人民的伟大胜利，“班禅愿竭绵薄，精诚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协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实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十世班禅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全体官员于1951年12月从西宁起程返藏。毛泽东主席派当时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同志为代表专程去西宁送行。1952年4月28日，十世班禅大师及其一行到达拉萨，受到了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等领导人和僧俗群众隆重热烈欢迎。当天下午，班禅大

师即赴布达拉宫，在日光殿与达赖喇嘛举行了历史性会见。6月23日返回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

十世班禅大师回到西藏以后，始终不渝地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藏汉民族的团结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为促进西藏内部的团结，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1954年9月，班禅大师同达赖喇嘛联袂来到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此期间，他多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每次会见中，他都表达了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祖国的富强和民族的进步出力的决心。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班禅大师任自治区筹委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同年11月，应印度政府邀请，与达赖喇嘛一道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并去印度各地朝拜和参观访问。在印度期间，他在各种场合都热情赞扬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强调要遵守《十七条协议》，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光明磊落的爱国立场。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为了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公然撕毁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西藏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班禅大师高举爱国、团结、进步的旗帜，拥护中央关于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积极支持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平息叛乱。同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任命班禅大师为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大师第二天立即致电毛主席、周总理，拥护国务院决定，并迅速从日喀则赶到拉萨主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此后，在他亲自主持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平叛和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等重大决议和

决定。他提出的“宪法进寺庙”的正确主张，写进了有关寺庙民主改革的决议中。在西藏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实行民主改革，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伟大历史变革中，班禅大师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亲密共事，为西藏人民的翻身解放，为西藏的社会发展进步，做出了积极的有益的贡献。1959年4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六十年代中期，由于“左”的错误，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班禅大师遭受到残酷的迫害，经受了严峻考验，但是他对在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对祖国的热爱，从来没有动摇过。

粉碎“四人帮”以后，班禅大师衷心拥护和积极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80年重新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年8月，邓小平同志同他谈话时，称赞他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他跟随着时代步伐前进，更加关心祖国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关心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为维护祖国统一，发展藏族地区和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为巩固和发展国内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关系，他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和强烈的事业心，奋力工作，殚思竭虑，积极向中央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他满腔热情地支持和拥护中央为西藏工作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在近十年来，他多次去全国各地和藏族地区视察工作，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无论走到哪里，他都热情地宣传中央的方针政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宣传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性。近几年来，他几次率代表团，出国访问，在国内多次会见外宾。在这些活动中，他坚持实事求是地向外国友人解释我国的各种政策和各方面工作，既讲成

就，也讲不足和困难；同时又表明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对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心，博得了外国友人的高度赞扬和信任。

班禅大师作为我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在佛教经典的研习上有较深造诣。1956年在访问印度期间，被授予婆罗奈斯佛教大学荣誉佛学博士学位。1958年在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辩经大法会上，考取“噶钦”学位。1958年起，就在青海塔尔寺和扎什伦布寺开讲佛教经典《菩提道次第广论》、《时轮金刚灌顶法》等显密教义。他精心钻研宗喀巴大师的经学著作，著有《菩提道次第广论简释》、《双身喜金刚生圆次第》等经学著作。近年来，他致力于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管理寺院和培养僧尼重大问题，并在他的主寺扎什伦布寺亲自主持试点，总结出了一套很有价值的经验。在他倡导和主持下，在北京创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亲自担任院长，为培养政治上热爱祖国，宗教上有较高佛学造诣的佛教知识分子，开创了良好的范例。

班禅大师历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1963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班禅副会长的一生，是为维护祖国统一而奋斗不息的一生，是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繁荣而辛勤操劳的一生，是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肝胆相照的一生，是为弘扬佛法、引导信教群众为人民谋福利的一生。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见《中国西藏》1989年第一期增页）。

后记

这本《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是前些年我的老师王沂暖教授指导我们几位同志编写《藏汉佛学词典》时，一次先生提出可以写本藏传佛教名僧录，也是很有意义的。于是在工作之余，开始注意收集资料，断断续续，一写一停地拖了好几年，收集了一百二十几位藏族名僧（除藏族僧人外，系其他民族的，都作了注明）。这项工作仅仅是个开始，是个起步，很不完全，其中包括藏族在内的还有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等藏传佛教中的许多著名的僧人，尚未收录，这主要是笔者读的书少，看到资料不多的原因。好在藏学研究工作正方兴未艾，希望同行中有兴趣者可以合作起来续写。把藏传佛教的著名高僧的事迹写出来，按时间顺序进行编排，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佛教在藏族及其他民族中的传播、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还可以看出藏传佛教僧人在加强祖国边疆地方与祖国内地关系中，为维护祖国统一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和贡献；他们不仅是加强祖国边疆与内地关系的桥梁，也是藏汉文化发展的交流者。

本书中凡引用藏学界先辈或其他同行者的研究成果的地方，都作了注明。但也可能因疏忽而未能注明清楚的，请能予以见谅。

在编写的过程中，曾得到王沂暖教授的指导。成稿后王教授还抽时间看了稿子，并写了序。同时，得到甘肃省宗教局领导同志的关照和支持，特别是甘肃省宗教局王全根处长，他在看了书稿后，对书名等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深致谢意！

编 者

1990年6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国藏传佛教名僧录

作者 =

页数 = 303

S 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序言 & 王沂暖

巴桑囊（公元八世纪人）

桑希（公元八世纪人）

毗卢遮那（公元八世纪人）

藏玛（公元九世纪人）

钵阐布娘·丁艾增桑波（公元九世纪人）

班第钦布贝吉云丹（公元九世纪人）

拉垅贝吉多吉（公元九世纪人）

贡巴饶色（892—975）

鲁梅慈成喜饶（九世纪后期人）等十人

仁钦桑波（958—1055）

琼波南交（990—1140）

卓弥·释迦益西（994—1078）

苏尔波且·释迦迥乃（1002—1062）

仲敦巴（1005—1064）

玛尔巴（1012—1097）

苏尔穹·喜饶扎巴（1014—1074）

博多哇（1031—1105）

贡却结保（1034—1102）

京俄瓦·楚臣拔尔（1038—1103）

米拉日巴（1040—1123）

内邬素巴（1042—1118）

卓浦巴（1074—1134）

娘麦·达波拉结（1079—1153）

热琼巴（1083—1161）

绛曲格哉（1084—1167）

贡噶宁布（1092—1158）

杰贡钦波（1094—1171）

东敦·罗追扎巴（1106—1166）

帕木竹巴（1110—1170）

都松钦巴（1110—1193）

杰擦（1118—1195）与衮丹（1148—1217）

向蔡巴（1123—1194）

林热·白玛多吉（1128—1188）

索南孜摩（1142—1182）

达垅塘巴扎西贝（1142—1210）

止贡巴仁钦贝（1143—1217）

扎巴坚赞（1147—1216）

藏巴嘉热·益西多吉（1161—1211）

却门朗（1169—1233）

楚臣喜饶（1173—1225）

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
杰瓦·洛热巴(1187—1250)
郭仓巴·贡布多杰(1189—1258)
绒·却吉桑波(约十一世纪人)
古宇仁钦衮(1191—1236)
噶玛拔希(1204—1283)
杨衮巴坚赞贝(1213—1258)
邬坚巴仁钦贝(1230—1309)
八思巴(1235—1280)
仁钦坚赞(1238—1279)
意希仁钦(1248—1294)
扎巴俄色(1255—1303)
加样仁钦坚赞(1256—1305)
桑结贝(1267—1314)
达玛巴拉(1268—1287)
扎巴僧格(1283—1349)
攘迥多吉(1284—1339)
雍敦巴多吉贝(1284—1365)
布顿(1290—1364)
贡噶洛追坚赞贝桑布(1299—1327)
隆钦然绛巴(1308—1364)
却吉坚赞(1332—1359)
乳必多吉(1340—1383)
仁达哇·旬努洛追(1349—1412)
释迦也失(1352—1435)
宗喀巴(1357—1419)
贾曹杰(1364—1432)
绛央却杰(1379—1449)
俄尔钦贡噶桑波(1382—1456)
得银协巴(1384—1415)
克主杰(1385—1438)
汤东结布(1385—1464)
根敦主(1391—1474)
吐顿·贡噶南杰(1432—1496)
索南却朗(1439—1504)
却扎益西(1453—1524)
根敦嘉措(1475—1542)
擦尔钦·罗赛嘉措(1494—1566)
巴卧·祖拉陈瓦(1504—1566)
罗桑丹珠(1505—1566)
弥觉多吉(1507—1554)
索南嘉措(1543—1588)
罗桑曲结(1567—1662)
多罗那他(1575—1634)
云丹嘉措(1589—1616)
咱雅班智达(1599—1662)

却英多吉（1604—1674）
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
罗卜藏旺布扎勒三（1635—1723）
华秀·俄项宗哲（1648—1721）
罗桑益喜（1663—1737）
卓尼·扎巴谢珠（1675—1749）
仓洋嘉措（1683—1706）
阿旺赤烈嘉措（1688—1738）
绛曲多吉（1703—1732）
松巴堪钦·益西班觉尔（1704—1788）
格桑嘉措（1708—1757）
章嘉若必多吉（1717—1786）
董·季麦旺吾（1728—1791）
却朱嘉措（1733—1791）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1737—1801）
巴丹益西（1738—1780）
强白嘉措（1758—1804）
贡唐·丹白仲美（1762—1823）
丹白尼玛（1782—1853）
罗桑图旦季美嘉措（1792—1855）
隆朵嘉措（1805—1815）
楚臣嘉措（1816—1837）
凯珠嘉措（1838—1855）
罗桑楚臣达吉嘉措（1846—1906）
米庞嘉措（1846—1912）
丹白旺修（1855—1882）
成烈嘉措（1856—1875）
尕藏图旦旺徐（1856—1916）
土登嘉措（1876—1933）
曲吉尼玛（1883—1937）
喜饶嘉措（1883—1968）
法尊法师（1902—1980）
洛桑登真·扎巴他那（1903—1950）
根敦琼培（1905—1951）
坚白赤烈（1913—1984）
丹贝坚赞（1916—1947）
确吉坚赞（1938—1989）
后记
附录页